# 东方论坛

双月刊　一九八八年创刊

二〇一八年第四期　总第一百五十二期

## 《东方论坛》学术委员会

委员：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杜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叶维廉（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蔡仁厚（台湾东海大学荣誉教授）
崔根德（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陈荣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陈启生（马来西亚孔教会秘书长）
李瑞智（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伯海（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执行委员：

蔡德贵　董京泉　冯国荣　刘忠世

主　编　　钱国旗

副主编　　刘喜华　冯济平（常务）

二〇一八年第四期
（总第一五二期）

# 目　录

□经济研究

我国老龄化率及其空间差异演化的预测研究　逯　进　李　琳　郭志仪·1·

“工匠精神”与青岛知名企业品牌培育的研究　陈　珂　臧海亮　胡严文·12·

□法学研究

论知识产权运营与新旧动能转换　于正河　段雅静　王晓珮·18·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企业破产法的实施　丁　燕　白文莉·23·

论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的注意义务　韦稼霖·29·

□历史研究

嫡长之制与我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汪　荣　徐燕斌·35·

试述规矩和准绳及其神秘性特征　董　涛·43·

青岛国术馆史实考论　邓以华　葛吉生　初学玲·55·

□哲学研究

道安与东晋清谈　赵　伟·60·

《庄子》文化渊源论析　乔守春·68·

出 版 日 期
二〇一八年八月

□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批判 韩 琛 王紫玉·76·

日常生活关联下的新历史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论 关 峰·84·

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的形成 徐 萍·91·

2006—2016年老舍研究述评 魏韶华 李雅坤·98·

新发现四则老舍佚文 金传胜·107·

人物品藻与六朝文学批评 王今晖 张晓晴·113·

别具只眼的唐宋古文研究

——近五十年台湾地区与日本、美国的古文研究回顾与反思 李 伟·119·

□图书评论

系统动力学学科建设薪火相承

——评《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 贾仁安 徐 波·125·

当代小说应有的理论深度与价值担当

——《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读札 刘 佳·127·

# THE EASTERN FORUM

## The Contents of the 4th Issue for 2018


Predictive Studi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Evol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China
.....LU Jin LI Lin GUO Zhi-yi（1）
Craftsmanship and the Cultivation of Qingdao Well-known Business Brands
.....CHEN Ke ZANG Hai-liang HU Yan-wen（12）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YU Zheng-he DUAN Ya-jing WANG Xiao-pei（18）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 of Bankruptcy in the Era of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DING Yan BAI Wen-li（23）
Duty of Care for Indirect Patent Infringement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WEI Jia-lin（29）
Th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of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and the Royalty in Ancient China
.....WANG Rong XU Yan-bin（35）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Their Mysterious Features
.....DONG Tao（43）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Qingdao Guoshu Institute
.....DENG Yi-hua GE Ji-sheng CHU Xue-ling（55）
Dao An and Idle Talk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AO Wei（60）
On the Cultural Origin of *Zhuang Zi*
.....QIAO Shou-chun（68）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HAN Chen WANG Zi-yu（76）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Poetics of Daily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GUAN Feng（84）
Late Q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U Ping（91）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Lao She in the Past Ten years
.....WEI Shao-hua LI Ya-kun（98）
Four Lost Works by Lao She Rediscovered
.....JIN Chuan-sheng（107）
Character Evalu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WANG Jin-hui ZHANG Xiao-qing（113）
A Review of Tang and Song Classical Prose Study
.....LI Wei（119）


英文翻译：岳玉庆

# 我国老龄化率及其空间差异演化的预测研究

逯 进[1] 李 琳[1] 郭志仪[2]

（1.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基于1993—2015年全国31省区的老龄化率数据，采用基因表达式编程（GEP）算法建立老龄化率预测模型，预测了2016—2035年各省老龄化率，并讨论了未来老龄人口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第一，预测期内，我国老龄化率呈上升趋势，2020年和2035年全国老龄化率将分别达到12.59%和20.36%，且2020—2035年老龄化率增速高于2015—2020年老龄化率增速。第二，老龄化率在2020年之前总体上呈现从东北、东部、中部至西部逐渐递减态势；同时各省区老龄化率高低与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联性。第三，全域空间关联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区老龄化率呈现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但自相关系数逐渐下降说明老龄化率的空间集聚效应不断减小；局域空间关联性则表明，部分省区老龄人口呈现空间离散特征，且存在这一特征的省区数量在逐渐增加。

**关键词：**基因表达式编程；老龄化率；预测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01-11

## 一、引言

一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生育意愿以及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的一般逻辑为，一方面生育政策的限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持续降低人口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一旦突破人口更替水平，则人口结构老化会随之快速加深。因此，人口结构老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人口经历了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及80年代两次人口生育潮的出现，人口规模持续膨胀。但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繁荣，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至90年代中后期的1.8[1]；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又持续下降至1.22和1.18。这意味着中国已迈入严重少子化阶段。与低生育率相对应，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快速上升。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了近3.5%，人口老化程度在快速加深。

在上述背景下，近十多年来讨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活跃，主要论题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特征。姚静和李爽（2000）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寿命的延长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并且经过定量分析认为我国存在一下特征：一方面，我国老龄化进程较快，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与综合国力发展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显著[2]。徐升艳和夏海勇认为在不考虑迁移时，生

**收稿日期：**2018-06-18

**作者简介：**逯进（1974-），男，甘肃天水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琳（1993-），女，山西长治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郭志仪（1949-），男，甘肃通渭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因素，且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更大[3]。国内不少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4-7]。陆杰华和郭冉认为现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城乡不均衡，老龄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未富先老都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鲜明特点[8]。除了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何保臣认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迁移会使老龄化人口在某个地区集中[9]。第二，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人口预测是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的一种模拟，进行前瞻性预测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已有很多学者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的人口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谢安利用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和人口生命表对2001—2050年的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他发现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规模大[10]。程永宏亦利用人口预测软件CPPS计算出2001—2060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并且其发现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11]。张荣艳等通过建立GM（1，1）动态预测模型和灰色新陈代谢模型预测了我国2012—2050年老龄人口的数量及比例[12]。翟振武等借助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对我国2015—210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13]。第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于学军认为从长期趋势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影响[14]。但蔡昉等提出，人口老龄化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15]。冯剑锋和陈为民从中介效应角度出发，通过因素分解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三种中介路径[16]。徐翔通过理论分析和数量模拟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含义，其认为提高生育率和社会教育供给水平可抑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17]。第四，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研究。近年来，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地区差异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李日邦和王五一提出老年人口分布在全国东西差异的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18]。杜鹏和王武林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明显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19]。王志宝等认为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区或省区之间因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演化阶段、特征与趋势方面的区域差异；二是区域内部由于城乡人口迁移等原因带来的老龄人口城乡倒置等问题和大都市区内部的老龄人口分布差异[20]。刘华军等通过研究也发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区域差异正持续扩大[21]。

从上述研究看，有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已形成完善的体系与结论，但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展开更为科学、新颖而有效的预测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这方面，多方法预测所形成的比较，将为准确校准与把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进而为人口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为此本文将展开进一步讨论。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为，首先，在本领域尝试性引入一类全新的预测方法，对中长期我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水平做出有效预测，并通过与其他既有研究的比较，讨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特征；其次，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人口老化存在差异，进一步对我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变动可能存在的空间变动特征做出解析。

## 二、研究方法

基因表达式编程（Gene Expression Program，简称GEP）方法是一种借用生命科学中基因、染色体等概念和思路、并通过遗传进化进行数据挖掘、公式发现、预测以及最优化的一种仿生智能算法[22]。GEP融合了遗传算法（GA）及遗传编程（GP）的优点，利用简单编码解决复杂问题。由于具有很强的稳健性且适用于多种问题的研究，该方法被用于电力需求预测、疾病诊断、石油价格预测等多种领域[23][24][25][26]。

基因表达式编程算法（GEP）作为新型的进化算法，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人口预测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刘萌伟等提出一种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算法的人口预测新方法，证明该方法的预测精度显著高于单变量GM（1，1）模型和多变量神经网络模型[27]，能以极高的拟合度改善预测质量。这为老龄人口比例的预测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GEP算法的运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步：第一，将随机产生的初始染色体解析为表达式树。对应于本文研究对象，也就是将既往年份已知的变量值通过各类表达式组合呈现出不同的预测公式，此为GEP的主要特色。第二，采用适应度函数值、拟合优度等指标对表达式树进行评估。每个预测公式都有对应的适应度值和拟合优度值，根据得到的适应度值和拟合优度值就可判断预测的效果

与准确度。第三，若未进化到最终目标，则采用轮盘赌、锦标赛方法等采样选择，并进行遗传进化，得到新一代染色体。也就是说如果计算出的适应度值和拟合优度值没有达到精度要求，则可进一步改变函数参数，采用新的预测公式重新预测老龄化率。此为算法收敛的关键。最后输出最终目标，如满足条件的函数关系式和预测值等。具体流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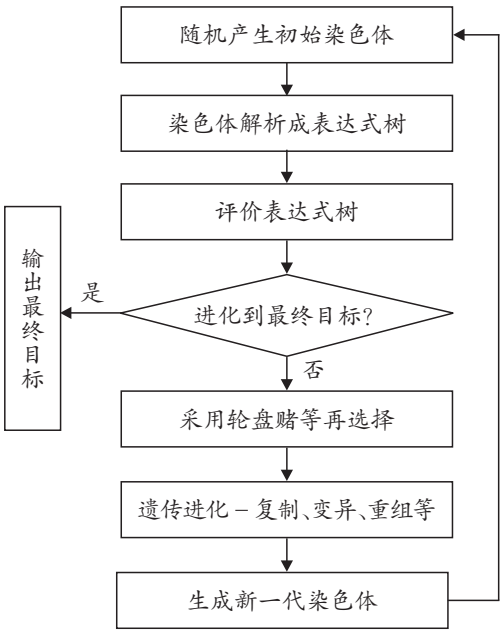



**图 1　GEP 算法流程**

1. 染色体原理与解析规则

输出函数关系式（表达式树）是 GEP 的核心目标，GEP 的特色在于函数关系式可由代表染色体的基因型编码解析而得。基因型编码表示待解决问题的可行解，是转换成表现型编码（表达式树）的基础。染色体由一个或多个基因构成，每个基因对应一个 K 表达式（基因型编码的编码区）和一棵表达式树。

GEP 的基因用长度固定的符号串来表示，由头部和尾部两部分组成。其中，头部既可以包含函数符也可以包含终结符，而尾部则只能包含终结符。函数符是指用来连接终结符的函数操作符；终结符是指基因表达式编程中程序的输入、常量以及没有参数的函数。尾部长度 t 和头部长度 h 之间满足以下关系：

$$t = h \times (n-1) + 1 \tag{1}$$

其中 $n$ 代表函数符集中的所需变量数最多的函数的变量个数（例如，在一般数学运算中，对于开方运算，$n$ 为 1；对于乘号或加号运算，$n$ 为 2）由染色体转换为函数关系式是对染色体的解析过程，本文以单基因组染色体为例，阐述 GEP 的编码规则。假设单基因组染色体的基因型编码为式（2）：

$$\begin{matrix}0&1&2&3&4&5&6&7&8&9&0&1&2\\ *&+&/&a&b&Q&a&b&a&a&b&b&a\end{matrix} \tag{2}$$

式（2）中，函数符集为 {*、+、/、Q}（Q 表示开方运算），终结符集为 {a、b}，若基因头部长度 $h$ 为 6，则根据式（1）尾部长度 $t$ 为 7，基因总长度为 13。

解析规则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直到结点为终结符。表达式树的起始点为第一个符号，终止点一般并不是最后一个符号，终止点后的基因组成非编码区。根据该规则，可得到相应的表现型编码（表达式树）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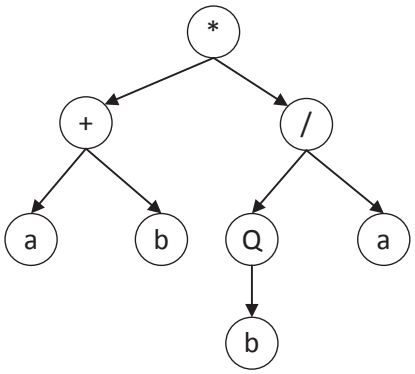



**图 2　GEP 表达式树示例**

该表达式树对应的 K 表达式为式（3）：

$$(a+b) * (\sqrt{b}/a) \tag{3}$$

上例中，表达式树的基因长度为 8，而实际基因长度为 13，则最后 5 位符号组成该基因的非编码区。这正是 GEP 编码的优点，非编码区的存在提高了算法运行的效率，并为遗传进化提供了很大的变异空间。表现型编码和基因型编码的不同，实现了遗传编码的简洁性与复杂性的平衡统一，克服了 GA 功能复杂性的不足与 GP 难以产生新

变异的缺陷，使得种群在进化的时候不易陷入早熟性收敛。

2. 适应度函数

将染色体解析为 K 表达式之后，需对表达式进行评价，即检验表达式计算得到的拟合值与实际值（训练数据）之间的符合程度。拟合优度 R2 值是多元统计中常用的指标，GEP 运算常用适应度函数来评价表达式。适应度函数有多种，其中基于均方误差的适应度函数如下：

$$f_i = 1000 \cdot \frac{1}{1+E_i} \tag{4}$$

$$E_i = \frac{1}{n}\sum_{j=1}^{n}(P_{ij} - T_j)^2 \tag{5}$$

式（4）、（5）中，$f_i$ 表示染色体 $i$ 所对应表达式 $i$ 的适应度，$E_i$ 表示表达式 $i$ 的均方误差。$P_{ij}$ 为基于该表达式 $i$ 求得的第 $j$ 个样本的拟合值，$Tj$ 为第 $j$ 个训练样本的实际值，为样本数量。当拟合值等于实际值时，均方误差 $E_i$ 达到最优值 0，适应度 $f_i$ 则达到最大适应度 1000。GEP 运行同时对各省每个可行染色体进行个体评价，即为采用式（4）（5）基于均方误差的适应度函数实时获得适应度值。

## 三、变量、数据及参数说明

1. 变量说明

本文将老龄化率作为变量，具体计算式为：

$$X_i = \frac{a_i}{A} \tag{6}$$

其中，$X_i$ 为调查省份的老龄化率，$a_i$ 为本省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A 为本省人口总量。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1993–2015 年我国大陆 31 省的老龄化率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部分年份缺失数据经拟合而得。

**表 1　全国老龄化率的描述性统计**

| 年份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1993 | 0.061 | 0.114 | 0.034 | 0.015 |
| 1995 | 0.064 | 0.114 | 0.036 | 0.016 |
| 2000 | 0.067 | 0.115 | 0.043 | 0.016 |

续表

| 年份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2005 | 0.087 | 0.120 | 0.060 | 0.016 |
| 2010 | 0.085 | 0.116 | 0.051 | 0.015 |
| 2015 | 0.104 | 0.133 | 0.057 | 0.019 |

经式（6）可以计算出 31 省份的老龄化率，进而可以得到全国平均老龄化率。部分年份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知，全国老龄化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从 1993 年的 6.1% 上升到 2015 年的 10.4%，且在 2000 年之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

3. 建模参数设置

老龄化率预测模型的遗传编码环境是一个二元组 <F, T>。其中，终结符集合 T 为原始数据经过相空间重构而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变量集合。经过相空间重构技术确定嵌入维数为 8，延迟系数为 1，因此预测模型的终结符集 T={*d0*、*d1*、*d2*……*d7*}；函数集合 F 为连接这些终结符的函数符号集，结合训练数据的大致趋势和拟合情况，本文的 GEP 预测模型选用 {+、–、*、/} 构建函数符集合 F。其余建模参数见表 2。

**表 2　老龄化率的 GEP 建模参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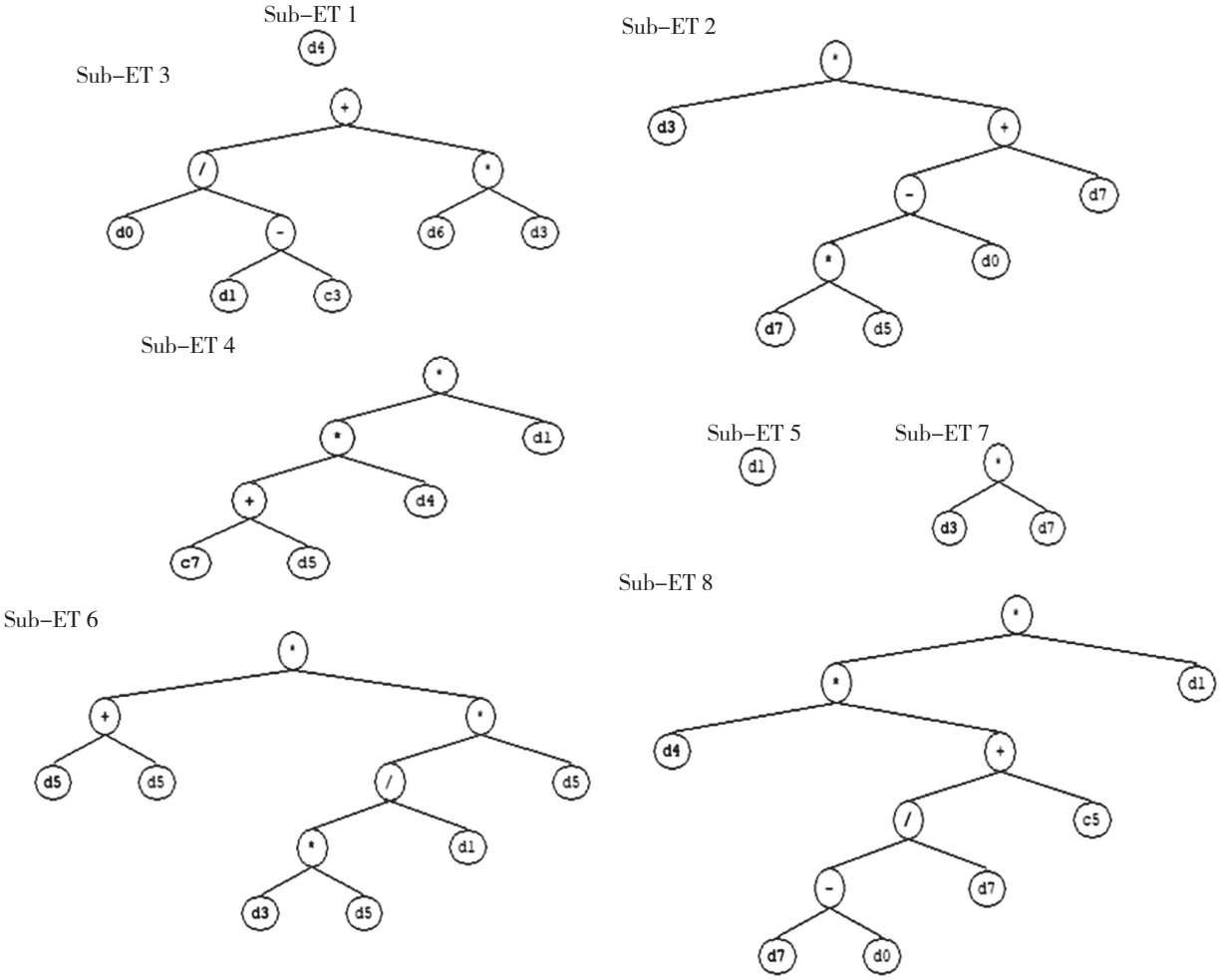
| 参数 | 取值 | 参数 | 取值 |
|---|---|---|---|
| 染色体数 | 100 | 变异率 | 0.044 |
| 嵌入维数 | 8 | 基因数量 | 8 |
| 延迟系数 | 1 | 连接函数 | + |
| 头部长度 | 8 | 适应度函数 | MSE |

## 四、预测结果分析

4.1 预测过程解析

这里将全国 31 个省份 1993—2015 年的老龄化率数据按上述参数进行建模并进行预测。因篇幅所限，如下以上海 为例展示表达式树及函数关系式的结果。运行构建的 GEP 老龄化率模型，可得上海的最优染色体的适应度值为 987.268，模型的拟合系数为 0.760。上海的最优染色体各子树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知，最优染色体的表达式树包括 8 个子表达式树。通过实验可以得到如下能较好反映未来老龄化率的基因：




$\mathrm{Sub-ET1}$：$d_4$

$\mathrm{Sub-ET2}$：$*d_3+-d_7*d_0d_7d_5$

$\mathrm{Sub-ET3}$：$+/*d_0-d_6d_3d_1c_3$

$\mathrm{Sub-ET4}$：$**d_1+d_4c_7d_5$

$\mathrm{Sub-ET5}$：$d_1$

$\mathrm{Sub-ET6}$：$*+*d_5d_5/d_5*d_1d_3d_5$

$\mathrm{Sub-ET7}$：$*d_3d_7$

$\mathrm{Sub-ET8}$：$**d_1d_4+/c_5-d_7d_7d_6$

根据上述基因表达式可以写出函数表达式，即可获取上海市老龄化率的预测函数关系式。

X=SubTree1+SubTree2+SubTree3+SubTree4+SubTree5+SubTree6+SubTree7+SubTree8

其中，

$\mathrm{SubTree1}=d_4$

$\mathrm{SubTree2}=d_3*((d_7*d_5-d_0)+d_7)$

$\mathrm{SubTree3}=d_0/(d_1-c_3)+d_6*d_3$

$\mathrm{SubTree4}=(c_7+d_5)*d_4*d_1$

$\mathrm{SubTree5}=d_1$

$\mathrm{SubTree6}=(d_5+d_5)*(((d_3*d_5)/d_1)*d_5)$

$\mathrm{SubTree7}=d_3*d_7$

$\mathrm{SubTree8}=d_4*((d_7-d_0)/d_7)+c_5)*d_1$

在上述关系式中，X 代表被解释变量老龄化率的预测值，$d_0-d_7$ 分别代表第 t 至 t–7 期的老龄化率数据。$c_0-c_9$ 表示数值常数，在每个子表达式树中都有相应的数值。表 3 为模型得出的上海 8 个子表达式中各自对应的 $c_0-c_9$ 值。其他 30 省的运算过程类似，对应表达式树和函数关系式不再列出。

表 3　上海市老龄化率预测模型对应的数值常数

| Gene1 | Gene2 | Gene3 | Gene4 | Gene5 | Gene6 | Gene7 | Gene8 |
|---|---|---|---|---|---|---|---|
| C0=−4.618 | C0=−5.825 | C0=−4.354 | C0=−9.090 | C0=−5.844 | C0=−1.640 | C0=−4.977 | C0=−8.118 |
| C1=5.171 | C1=6.881 | C1=6.043 | C1=2.050 | C1=5.849 | C1=6.588 | C1=−2.828 | C1=9.979 |
| C2=−0.164 | C2=5.922 | C2=9.774 | C2=−7.651 | C2=−3.286 | C2=−4.548 | C2=−4.025 | C2=−2.345 |
| C3=−1.240 | C3=4.136 | C3=10.000 | C3=−2.434 | C3=8.632 | C3=−9.946 | C3=−1.822 | C3=7.165 |
| C4=3.687 | C4=−4.600 | C4=0.427 | C4=4.360 | C4=−4.083 | C4=−7.983 | C4=−4.618 | C4=−1.671 |
| C5=1.663 | C5=−7.757 | C5=−3.508 | C5=−1.144 | C5=−9.144 | C5=0.500 | C5=−7.851 | C5=−2.019 |
| C6=4.763 | C6=−7.677 | C6=9.419 | C6=8.861 | C6=7.683 | C6=6.989 | C6=−1.279 | C6=6.813 |
| C7=7.599 | C7=−4.413 | C7=9.723 | C7=−7.529 | C7=2.687 | C7=−3.043 | C7=−0.433 | C7=−7.124 |
| C8=−9.780 | C8=7.526 | C8=−8.000 | C8=7.397 | C8=4.980 | C8=4.643 | C8=2.685 | C8=2.977 |
| C9=2.344 | C9=−9.463 | C9=−3.653 | C9=−9.783 | C9=1.313 | C9=−0.245 | C9=2.858 | C9=2.698 |

4.2 预测结果分析

表 4 展示了各省老龄化率 GEP 预测模型的最优适应度值和拟合优度 $R^2$ 值。由表 4 可知，各省的最优适应度值中最大值为 1000，最小值为 987.268，各省的拟合优度 $R^2$ 值中最大值为 0.996，最小值为 0.709，全国适应度的平均值为 998.233，拟合优度的平均值达到 0.858，说明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表 4　各省老龄化率 GEP 预测模型最优适应度值和拟合优度

| 样本 | 适应度值 | R2 值 | 样本 | 适应度值 | R2 值 |
|---|---|---|---|---|---|
| 北京 | 995.920 | 0.852 | 湖北 | 999.999 | 0.977 |
| 天津 | 994.899 | 0.709 | 湖南 | 995.413 | 0.746 |
| 河北 | 999.994 | 0.872 | 广东 | 1000.000 | 0.996 |
| 山西 | 999.995 | 0.900 | 广西 | 999.287 | 0.815 |
| 内蒙古 | 999.982 | 0.713 | 海南 | 997.912 | 0.913 |
| 辽宁 | 995.380 | 0.815 | 重庆 | 994.390 | 0.828 |
| 吉林 | 999.974 | 0.848 | 四川 | 999.963 | 0.855 |
| 黑龙江 | 999.998 | 0.973 | 贵州 | 999.996 | 0.918 |
| 上海 | 987.268 | 0.760 | 云南 | 999.999 | 0.960 |
| 江苏 | 999.251 | 0.985 | 西藏 | 996.848 | 0.792 |
| 浙江 | 999.997 | 0.976 | 陕西 | 999.986 | 0.825 |
| 安徽 | 995.367 | 0.755 | 甘肃 | 999.993 | 0.940 |
| 福建 | 998.531 | 0.972 | 青海 | 999.981 | 0.743 |
| 江西 | 999.988 | 0.762 | 宁夏 | 997.714 | 0.813 |
| 山东 | 999.996 | 0.932 | 新疆 | 999.996 | 0.833 |
| 河南 | 997.188 | 0.820 | 全国 | 998.233 | 0.858 |

利用本文的 GEP 老龄化率预测模型预测 2016–2035 年的老龄化率，部分年度预测结果见表 5。这里将预测期设定为短期（2016–2020 年）及长期（2016–2035 年）两个时期，可以分别观察两时期内各省区老龄化率的变动情况。同时，考虑到人口结构变动的空间特征，如下还将进一步分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①]，通过比较讨论各区域的变动情况。

①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 5　各省老龄化率当前及未来部分年度预测结果

| | 省份 | 2015 | 2018 | 2020 | 2023 | 2025 | 2028 | 2030 | 2033 | 2035 |
|---|---|---|---|---|---|---|---|---|---|---|
| 东部 | 北 京 | 0.1065 | 0.1200 | 0.1229 | 0.1100 | 0.0967 | 0.0935 | 0.1143 | 0.1480 | 0.1605 |
| | 天 津 | 0.1029 | 0.1419 | 0.1477 | 0.1450 | 0.1431 | 0.1378 | 0.1611 | 0.1495 | 0.2121 |
| | 河 北 | 0.1017 | 0.1089 | 0.1107 | 0.1132 | 0.1195 | 0.1356 | 0.1410 | 0.1391 | 0.1560 |
| | 上 海 | 0.1282 | 0.1234 | 0.1383 | 0.1432 | 0.1496 | 0.1282 | 0.1187 | 0.1060 | 0.1432 |
| | 江 苏 | 0.1269 | 0.1352 | 0.1358 | 0.1222 | 0.1591 | 0.1470 | 0.1719 | 0.1302 | 0.1760 |
| | 浙 江 | 0.1127 | 0.0976 | 0.1123 | 0.1005 | 0.1028 | 0.1042 | 0.0653 | 0.0909 | 0.1342 |
| | 福 建 | 0.0901 | 0.1170 | 0.0985 | 0.0693 | 0.0570 | 0.1435 | 0.0732 | 0.0310 | 0.1230 |
| | 山 东 | 0.1166 | 0.1215 | 0.1329 | 0.1486 | 0.1528 | 0.1664 | 0.1820 | 0.2122 | 0.2481 |
| | 广 东 | 0.0737 | 0.0951 | 0.0892 | 0.0505 | 0.0469 | 0.0557 | 0.0920 | 0.1755 | 0.1927 |
| | 海 南 | 0.0844 | 0.1011 | 0.1471 | 0.1511 | 0.1035 | 0.0784 | 0.0596 | 0.1916 | 0.3167 |
| | 均 值 | 0.1044 | 0.1162 | 0.1235 | 0.1154 | 0.1131 | 0.1190 | 0.1179 | 0.1374 | 0.1862 |
| 东北 | 辽 宁 | 0.1287 | 0.1533 | 0.1520 | 0.1270 | 0.1522 | 0.2202 | 0.2591 | 0.2032 | 0.1893 |
| | 吉 林 | 0.1091 | 0.1134 | 0.1129 | 0.1417 | 0.1511 | 0.1520 | 0.1773 | 0.2070 | 0.2096 |
| | 黑龙江 | 0.1084 | 0.1573 | 0.1768 | 0.1640 | 0.1510 | 0.2061 | 0.3579 | 0.3946 | 0.2419 |
| | 均 值 | 0.1154 | 0.1413 | 0.1472 | 0.1443 | 0.1514 | 0.1927 | 0.2648 | 0.2683 | 0.2136 |
| 中部 | 山 西 | 0.0919 | 0.0870 | 0.0980 | 0.0905 | 0.1135 | 0.1089 | 0.1087 | 0.1531 | 0.1439 |
| | 安 徽 | 0.1118 | 0.1291 | 0.1421 | 0.1590 | 0.1671 | 0.1887 | 0.2187 | 0.2882 | 0.3409 |
| | 江 西 | 0.0906 | 0.1390 | 0.1705 | 0.1088 | 0.0889 | 0.1360 | 0.1344 | 0.4988 | 0.2498 |
| | 河 南 | 0.0985 | 0.0925 | 0.1006 | 0.1345 | 0.1020 | 0.1477 | 0.1752 | 0.1396 | 0.2343 |
| | 湖 北 | 0.1123 | 0.1188 | 0.1050 | 0.1507 | 0.1995 | 0.2351 | 0.2178 | 0.1904 | 0.2828 |
| | 湖 南 | 0.1122 | 0.1201 | 0.1195 | 0.1247 | 0.1291 | 0.1349 | 0.1391 | 0.1452 | 0.1694 |
| | 均 值 | 0.1029 | 0.1144 | 0.1226 | 0.1280 | 0.1334 | 0.1585 | 0.1657 | 0.2359 | 0.2369 |
| 西部 | 内蒙古 | 0.0956 | 0.1282 | 0.1569 | 0.1510 | 0.1641 | 0.1489 | 0.2194 | 0.2318 | 0.3025 |
| | 广 西 | 0.0976 | 0.0947 | 0.0962 | 0.0965 | 0.0964 | 0.0982 | 0.0970 | 0.0999 | 0.1183 |
| | 重 庆 | 0.1329 | 0.1474 | 0.1585 | 0.1715 | 0.1781 | 0.1956 | 0.2067 | 0.2221 | 0.2479 |
| | 四 川 | 0.1294 | 0.1455 | 0.1671 | 0.1834 | 0.2123 | 0.2402 | 0.2479 | 0.3130 | 0.2461 |
| | 贵 州 | 0.0948 | 0.0931 | 0.0961 | 0.0977 | 0.0972 | 0.0984 | 0.0992 | 0.0993 | 0.1095 |
| | 云 南 | 0.0841 | 0.0855 | 0.0931 | 0.0943 | 0.1051 | 0.0903 | 0.1041 | 0.1254 | 0.1678 |
| | 西 藏 | 0.0571 | 0.0602 | 0.0694 | 0.0607 | 0.0586 | 0.0536 | 0.0565 | 0.0626 | 0.0733 |
| | 陕 西 | 0.1035 | 0.1143 | 0.1114 | 0.1237 | 0.1296 | 0.1370 | 0.1413 | 0.1553 | 0.1738 |
| | 甘 肃 | 0.0936 | 0.0980 | 0.1001 | 0.1050 | 0.1087 | 0.1141 | 0.1184 | 0.1252 | 0.1406 |
| | 青 海 | 0.0710 | 0.0780 | 0.0807 | 0.0864 | 0.0906 | 0.0978 | 0.1034 | 0.1132 | 0.1310 |
| | 宁 夏 | 0.0736 | 0.0877 | 0.0934 | 0.0902 | 0.1290 | 0.1158 | 0.1578 | 0.1468 | 0.2073 |
| | 新 疆 | 0.0713 | 0.0944 | 0.0984 | 0.1037 | 0.1030 | 0.1126 | 0.1281 | 0.1722 | 0.2035 |
| | 均 值 | 0.0920 | 0.1023 | 0.1101 | 0.1137 | 0.1227 | 0.1252 | 0.1400 | 0.1556 | 0.1776 |
| | 全国均值 | 0.1037 | 0.1185 | 0.1259 | 0.1253 | 0.1302 | 0.1489 | 0.1721 | 0.1993 | 0.2036 |

依据表 5 中的预测结果，可从两方面对我国各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展开讨论。

第一，从四大区域看，2015 年，东北三省的老龄化率均值为 11.54%，东、中、西部老龄化率的均值为别为 10.44%、10.24% 和 9.20%，老龄化率呈现从东北、东部、中部、西部逐次递减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而从省域层面看，辽宁的老龄化率达到 12.87%，为东北地区老龄化率最高的省份；上海和江苏的老龄化率分别为 12.82% 和 12.69%，是东部地区老龄化率最高的两个省份；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也是各自区域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省区。上述省份在各自区域属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较好的地区，这进一步表明，老龄化率高低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有关。究其原因，如果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生活质量就会越高，这将有效延长居民的平均寿命，同时会降低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进而从这两个方面加深了老龄化率。但一个值得考虑的不同现象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老龄化率普遍较高。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除政策性因素和生育意愿因素导致生育率极低外，东北近年来经济快速下滑导致了明显的人口外迁，人口净迁移多数年份都为负值，大量年轻人口的外迁进一步推动了本地区人口老化率。同时，东北以老旧工业为主的产业就业形态，固化了既有产业人口的老化态势，但无法吸引更多的年青人口进入。

第二，从老龄化率发展趋势看，首先，在 2015—2020 年的 5 年时间里，全国平均老龄化率从 10.37% 增加到 12.59%，到“十三五”末期（2020 年），东北地区的平均老龄化率达到 14.72%，东、中、西部的平均老龄化率分别达到 12.35%、12.26% 和 11.01%。四大区域的老龄化率都会快速提高。而从各省区看，上述经济水平较高的省份依旧在各区域中处于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其次，我国老龄化率在 2020—2035 年的增长速度将高于 2015—2020 年的增长速度，在 2015–2035 年的 20 年时间里，各省份老龄化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老龄化率将增加一倍，达到 20.36%，进入重度老龄化发展阶段。同时可以发现，东北地区仍然是四大区域中老龄化率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将超过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率仍然处于四大区域的最低水平。

4.3 比较检验

表 6 列出了本文及既有部分典型老龄化率预测研究的结果。比较看，几类模型预测的结果差异很小，其它研究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预测结果。这意味着，本文在老龄化人口预测领域所开辟的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具有准确性及实践应用价值。

**表 6　不同预测模型得到的老龄化率结果**

| 模型 | 文献名称 | 2015 | 2025 | 2035 |
|---|---|---|---|---|
| GM（1,1）动态预测模型 | 2012–2050 年我国老龄人口预测研究 | 0.1037 | 0.1434 | 0.2062 |
| 灰色新陈代谢模型 | 2012–2050 年我国老龄人口预测研究 | 0.1041 | 0.1448 | 0.2004 |
| PADIS—INT 人口预测 | 2015–2100 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 | 0.1041 | 0.1441 | 0.2123 |
| GEP | 本文 | 0.1037 | 0.1302 | 0.2036 |

## 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空间关联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预测期内我国老龄化率不仅呈逐步递增态势，而且各区域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呈现明确的变动规律，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据此，为更好揭示未来我国老龄人口的空间变动特征，如下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推进至 31 省区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空间特征解析方面，借此讨论未来老龄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不同省区间老龄人口变动可能存在的关联性。

5.1 空间分布总特征

从三个时点（2015 年、2025 年、2035 年）看 31 个省区老龄化率的空间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大部分省区在 2015—2035 年期间老龄化率呈上升趋势，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差异非常明显，且老龄化率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总体看，东北、东部、中部形成了连绵的老龄化集中区。

5.2 全域空间关联分析

全域空间相关性（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是一种从整体上描述变量空间分布模式的研究方法，可用单一数值指标来反映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相关程度。在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中，Global Moran's I 指数是一种最常用的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

指标( Rey,1999[28] ； 朱子明等,2009[29] )。其计算公式为：

$$I=\frac{\sum_{i=1}^{n}\sum_{j=1}^{n}W_{ij}(X_i-\overline{X})(Y_j-\overline{Y})}{\sum_{i=1}^{n}\sum_{j=1}^{n}W_{ij}}\bullet\frac{n}{\sum_{i=1}^{n}W_{ij}(X_i-\overline{X})^2} \quad (8)$$

其中，I 为 Global Moran's I 指数，Xi、Yi 分别为区域 i 及其相邻区域 j 的属性观测值，n 为研究区域总数，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此外，需要运用标准化 Z 统计量对计算出的 I 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其中标准化 $Z=\frac{I-E(I)}{\sqrt{VAR(I)}}$ 。利用 GeoDa 软件测算中国大陆 31 省 2015—2035 年各省区老龄化率的全域 Moran's I 值，并对其进行 Z 检验，发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三期数据老龄化率的全域 Moran's I 值及 P 值见表 7。

**表 7　全国 2015—2025—2035 年老龄化率的全域 Moran's I 值及 P 值**

| 年份 | Moran's I | P 值 |
|---|---|---|
| 2015 | 0.3295 | 0.002 |
| 2025 | 0.2293 | 0.019 |
| 2035 | 0.1238 | 0.098 |

从表 7 可以看出，研究期间，全域 Moran's I 值全部为正但总体趋势在下降。这意味着，全国 31 省区之间老龄人口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即老龄化率较高的省区，其周边区域的老龄化率也很高，在老龄化率较低的省区，其周边区域的老龄化率也较低。我国的人口的老龄化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空间集聚特征存在减弱的趋势。前述空间分位图对此亦有相似的表征。

5.3 局域空间关联分析

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是从整体上衡量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只能反映老龄人口在空间上的整体聚集程度，而不能反映各个集聚区的集聚程度和集聚种类，而局域空间相关分析可以弥补这一缺点，其还可以进一步有效揭示局域空间存在的相异于整体正空间相关性的非典型特征。Local Moran's I 为测度局域空间相关性的常用指标：

$$I_i=(x_i-\overline{x})\sum_{j=1}^{n}w_{ij}(y_j-\overline{y}) \quad (9)$$

其中，$I_i$ 为 Local Moran's I 指数，$X_i$、$Y_i$ 分别为区域 $i$ 及其相邻区域 j 的属性观测值，$n$ 为研究区域总数，$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同时，其显著性判断标准与 Global Moran's I 相同。若 $I_i$ 大于零且显著，表明 $i$ 区域的属性值 X 与相邻 $j$ 区域属性 Y 的观测值存在空间集聚特征，若 $I_i$ 小于零且显著，则显示为空间离散特征。

将 Local Moran's I 进行可视化处理可以得到 Moran 散点图[30]，可直观描绘出区域分布存在的异质性特征，见图 5。其中，第Ⅰ象限表示集聚区( HH )，即高观测值与高观测值相邻，表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第Ⅱ象限表示空心区( LH )，即低观测值与高观测值相邻，表现出负的空间相关性；第Ⅲ象限为萧条区( LL )，即低观测值与低观测值相邻，显示正的空间相关性；第Ⅳ象限为孤岛区( HL )，即高观测值与低观测值相邻，亦呈现出负的空间相关性[31]。同时，通过比较图 5 各省 2015、2025、2035 年的 Moran 散点图，可得出全国各省区老龄化率的分布特征，见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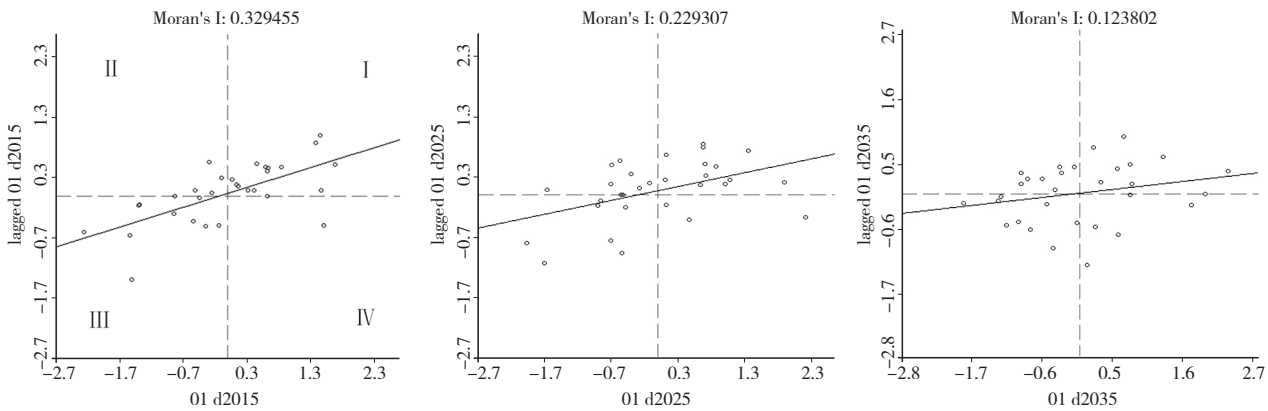



**图 5　全国老龄化率空间分布的 Moran 散点图( 2015—2025—2035 )**

由图 5 结合表 7 可知，全国各省区老龄化率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其明确显示出被全域 Moran 值所掩盖的负空间相关性区域，即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的非典型区域。总体看，局域分布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呈现正空间关联性省域由 2015 年的 24 个减少到 2025 年的 19 个，并进一步减少为 2035 年 17 个。呈现负空间关联性的省域由 2015 年的 5 个增加到 2025 年的 10 个，2035 年增加到 12 个。这意味着大部分省区老龄化率逐步呈现离散的趋势，我国老龄人口的集中趋势将持续减弱，老龄化将显现出全国性蔓延之态势。

第二，全国普遍存在的老龄人口集聚的省区在持续减少的同时，将单一显现出以中部为中心的老龄人口集聚区。同时 2015 和 2025 年，老龄人口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东北、东部以及西部的经济发达省份，但至 2035 年，将主要分布于东北和中部。

第三，北京和上海由 2015 年的老龄人口集聚区变为 2035 年的老龄人口萧条区，说明北京和上海的老龄化率将出现下降，其将持续吸引周边省区以至于全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前去生活和工作。西部的四川省一直处于老龄人口分布的孤岛区，而老龄化率较低的内蒙古和新疆在 2035 年亦将成为老龄人口分布的孤岛区，这意味着西部的主要省区将处于与京、沪类似的状态。另外，东北三省在 2015 年和 2025 年一直处于老龄人口分布的集聚区，但至 2035 年辽宁将处于了老龄人口分布的空心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辽宁将持续吸纳黑龙江和吉林的青壮年人口，造成三省之间人口年龄结构的绝对化差异。

综合看，我国今后将呈现以区域性核心省区为中心的人口集聚区，但总体上将很难出现大范围的老龄人口的集聚区，老龄人口的分散化趋势将逐步显现。

**表 8　主要时点全国老龄化率 Moran 散点图对应省域表**

| 象限 | 2015 | 2025 | 2035 |
|---|---|---|---|
| H–H（集聚区） | 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湖北、重庆、陕西 | 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内蒙古、重庆、陕西、宁夏 | 黑龙江、吉林、山东、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宁夏 |
| L–H（空心区） | 河南、江西、内蒙古、贵州 | 北京、河北、山西、河南、贵州、甘肃、西藏 | 辽宁、河北、江苏、浙江、山西、湖南、陕西、甘肃 |
| L–L（萧条区） | 福建、广东、山西、广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福建、广东、江西、广西、云南、青海、新疆 | 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 |
| H–L（孤岛区） | 四川 | 湖南、天津、四川 | 天津、内蒙古、四川、新疆 |

## 六、结论

本文的预测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的老龄化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20 年全国老龄化率达到 12.59%，2035 年将达到 20.36%；2020—2035 年老龄化率上升的速度高于 2015—2020 年老龄化率上升的速度。在 2015—2035 年的 20 年的时间里，我国老龄化率将会增加一倍，达到 20.36%。第二，老龄化率在 2020 年之前呈现东北、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态势，2020 年之后中部地区老龄化率超过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率，并且在各个区域中各省区老龄化率的高低与这个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正相关性。第三，全国各省域老龄人口分布呈现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但老龄人口的空间集聚效应在不断减小；同时大部分省域老龄人口呈现不断离散的趋势。

基于上述结果可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是我国目前及今后将面临一项极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面对复杂的老龄化人口局面，今后在统筹与完善人口生育、人口迁流、社会保障等重大政策改革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借此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应对人口老化问题。


**参考文献：**

[1] 邬沧萍,王琳,苗瑞凤. 从全球人口百年（1950~ 2050）审视我国人口国策的抉择[J]. 人口研究, 2003,（4）.

[2] 姚静, 李爽.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成因及对策分析[J].人文地理, 2000,（5）.

[3] 徐升艳, 夏海勇. 人口老龄化机制研究: 基于生育率持续下降视角[J]. 人口学刊, 2011,（4）.

[4] 王桂新, 陈冠春.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J]. 人口學刊, 2010,

2010,（3）.
[5] 李建新.倒金字塔理论与21世纪中国老龄社会[J].中国人口科学,2000,（3）.
[6] 罗淳.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兼以中国为例[J].人口与经济,2002,（2）.
[7] 王金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J].人口学刊,2009,（3）.
[8] 陆杰华, 郭冉. 从新国情到新国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思考[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5）.
[9] 何保臣. 浅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对策[J]. 现代农业, 2017,（6）.
[10] 谢安.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变化趋势及特点[J]. 统计研究, 2004,（8）.
[11] 程永宏. 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3）.
[12] 张荣艳, 王爱苹, 孙贵玲. 2012—2050 年我国老龄人口预测研究[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5）.
[13] 翟振武, 陈佳鞠, 李龙. 2015~ 2100 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J]. 人口研究, 2017,（4）.
[14] 于学军.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1995,（6）.
[15]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人口转变新阶段与人力资本形成特点[J]. 中国人口科学, 2001,（2）.
[16] 冯剑锋, 陈卫民. 我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中介效应视角的探讨[J]. 人口学刊, 2017,（4）.
[17] 徐翔.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研究[J]. 金融研究, 2017,（6）.
[18] 李日邦, 王五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地理研究, 1999,（2）.
[19] 杜鹏, 王武林. 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 人口研究, 2010,（2）.
[20] 王志宝, 孙铁山, 李国平. 近 20 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J].人口研究, 2013,（1）.
[21] 刘华军, 何礼伟, 杨骞.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空间非均衡及分布动态演进: 1989~ 2011[J]. 人口研究, 2014,（2）.
[22] Ferreira C.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Modeling by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2, 1（3）:223–225.
[23] 李菁, 马彦琳, 梁晓群.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电力消费预测模型——武汉市的实证[J]. 统计研究, 2008,（4）.
[24] 赵建刚, 王玉, 司宏宗,等. 基因表达式编程辅助诊断脂肪肝的新模型研究[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0,（12）.
[25] 卢毅, 雒香云, 张欢.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公路工程造价预测模型[J].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1,（6）.
[26] Mostafa M M, El-Masry A A. Oil price forecasting using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4（1）:40–53.
[27] 刘萌伟, 黎夏, 刘涛.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的人口预测模型[J].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6）.
[28] Sergio J. Rey, Brett D. Montouri. U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 Regional Studies, 1999, 33（2）:143–156.
[29] 朱子明, 祁新华. 基于Moran'I的闽南三角洲空间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09,（12）.
[30] Haining R, Wishes, MA.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software for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a GIS environment[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ystem, 2000,2（3）: 257–286.
[31] 杨振山,蔡建明,高晓路. 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解析北京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模式[J]. 地理学报,2009,（8）.

**责任编辑：胡燕京**

# Predictive Studi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ce Evolu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China

LU Jin[1] LI Lin[1] GUO Zhi-yi[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evolutionary algorithm,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algorithm (GEP)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fields, but the research on population prediction is still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plans to us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31 provinces from 1993 to 2015 as a time series, use the GEP algorithm to establish an ageing population proportion prediction model, predict the proportion of aged people in each province in 2016-2035,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grey prediction model and the metabolic model and thus explore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uture aging population. Firs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s on the rise. The GEP model predict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will reach 12.59% in 2020,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in the country will reach 19.36% in 2035.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at a high rate from 2020 to 2035. Seco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ged population as a whole shows that the Northeast, East, Central, and West gradually decline, and the proportion of aged people in each region of each province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rovince. Third, the global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aged population in each province across the country present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bu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the old-age population continue to decrease while in the analysis of local spatial correlation, most of the provinces the aged population shows a constant proliferation.

**Key words:** gene expression programming; proportion of aged population; prediction

# “工匠精神”与青岛知名企业品牌培育的研究

陈 珂[1,2] 臧海亮[3] 胡严文[3]

（1.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2.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企业文化部；
3.青岛市网络文化管理办公室，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青岛市被称为“品牌之都”，拥有中车四方、海尔、海信等一批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企业。品牌是城市的象征，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在“工匠精神”传播环境中，企业的品牌塑造与其具有深刻的联系。如何理解“工匠精神”的内涵，驾驭新媒体传播渠道，探索“工匠精神”传播规律，并与青岛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是目前企业品牌传播和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难题。本文以青岛知名企业“工匠精神”的传播为例，探讨企业品牌塑造的对策。

**关键词：**工匠精神；大国工匠；企业品牌；新闻宣传；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F27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12-06

## 一、“工匠精神”激发青岛企业品牌的腾飞

###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由于央视《大国工匠》栏目的热播，让来自不同行业的8名能工巧匠，引发起一场持续三年却热度未减的新闻现象。工匠们在获得尊敬的同时，“工匠精神”也为企业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品牌价值。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大国工匠们依靠技术的传承与钻研，在坚守和磨砺中缔造出令人赞叹的“中国制造”，是各行各业的楷模；从企业品牌的层面来看，他们为企业赢得更多关注度，甚至成为所在行业的形象代言人，带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品牌宣传效果。

所谓“工匠精神”[1]，“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其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工匠精神也是一种职业能力，包括工匠在产品质量、技术创新、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精益求精。“工匠精神”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或理念，而更像是一个评价标准，一种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向“高精尖”迈进的目标。

2017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工匠精神”确立为全国范围内的品牌创建目标；2017年3月，继2016年之后，“工匠精神”再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从新闻报道热点到政府决策内容，“工匠精神”从新闻品牌升级到产业品牌，又升华为政府打造“中国品牌”的有力支撑，成为大众传媒影响政府决策的又一典型案例。

新媒体环境下，“病毒式传播”不仅是负面新闻的专利，热点话题的发酵速度取决于网民与新闻的契合度。“工匠精神”在传播过程中，触碰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兴奋点，尤其在大谈国外工匠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高技术人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工匠精神”这一延伸品牌的共鸣。

**收稿日期：**2018-4-18

**基金项目：**2017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工匠精神舆论宣传的研究”（QDSKL1701225）；2017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工匠精神传播为例研究网络正面宣传的规律性”（17CHLJ43）

**作者简介：**陈珂（1984-），男，山东泰安人，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企业文化部政工师、记者，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臧海亮（1965-），男，山东莱阳人，青岛市网络文化管理办公室干部；胡严文（1984-），女，山东烟台人，青岛市网络文化管理办公室干部。

对企业来说，“工匠精神”的品牌价值在于让企业获得更大发言权，将企业新闻信息的属性转变为接受度更高的时政新闻或经济新闻。在“工匠精神”背景下，企业的品牌形象、生产经营信息传播，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政府决策内容相连接，在新的语境中，对工匠和品牌的宣传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而更具有政府背书的意味。同时，在“工匠精神”社会热点受关注期间，拥有典型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企业，在全社会一致赞誉的大潮中，品牌亲和力会大幅度上升，新媒体环境中信息被多次传播的动力也会增强。

（二）青岛企业品牌与“工匠精神”

青岛被称作“品牌之都”，青岛的百年历史中，城市与知名企业品牌是荣辱与共、相辅相成的。[3]“工匠精神”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为青岛的城市品牌形象带来更多的溢价和增值。由于央视《大国工匠》栏目的热播，让来自不同行业的 8 名能工巧匠，引发起新闻热潮，青岛企业借助“工匠精神”的传播，也在品牌建设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从郝建秀到许振超，再到宁允展，从纺织行业到港口，再到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青岛知名企业的品牌发展，均与知名工匠、高技术人才、奉献和创新密切相关，在如今的语境下，即为“工匠精神”。在知名品牌汇聚的青岛，诸多企业借助“工匠精神”的传播，体现出深厚的底蕴。长期以来，青岛作为知名工匠辈出的城市，“工匠精神”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灵魂。可以说，青岛制造业的历程，也正是“工匠精神”在青岛成长的过程。在“工匠精神”的品牌影响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铺天盖地的“蹭热点”，不仅为信息传播的正面宣传带来切入点，更提升了民族品牌和中国制造业自信度。“工匠精神”在历史上创造中华文明之后，在新时代再次成为百业兴旺、质量提升的保障，成为青岛知名企业品牌形象不断高涨的重要基础。

**央视《大国工匠》栏目第一季的八位劳动者**

| 姓名 | 出生日期 | 单位 | 工种 / 职务 | 绝活 / 美誉 |
|---|---|---|---|---|
| 管延安 | 1977 年 6 月 | 中交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Ⅴ工区航修队 | 钳工 | 中国“深海钳工”第一人 |
| 高凤林 | 1962 年 3 月 |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 特种熔融焊接工 | 设立“高凤林班组” |
| 周东红 | 1967 年 1 月 |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 捞纸工 | 生产“御用画纸” |
| 胡双钱 | 1960 年 7 月 |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 钳工 | “航空”手艺人 |
| 孟剑锋 | 1974 年 2 月 | 北京工美集团握拉菲首饰有限公司 | 錾刻工艺师 | 亲手打造“国礼” |
| 张冬伟 | 1981 年 12 月 |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 电焊工 | 焊出“天衣无缝” |
| 宁允展 | 1972 年 3 月 |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 车辆钳工 | 中国高铁首席研磨师 |
| 顾秋亮 | 1955 年 10 月 |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 | 装配钳工 | 打造“蛟龙号” |

在 201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出“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近些年来充斥媒体的“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精造”、“工匠精神”，如今成为决策层共识，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得尤为难得和宝贵。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在当前形势下，各级媒体机构把弘扬工匠精神作为宣传重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人力物力，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青岛市也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大国工匠”，比如：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宁允展、郭锐、周勇、李文龙等，青岛港集团的许振超、郭凯、刘恩磊，海尔集团的王阳阳等。他们受到中央和省市媒体的关注，成为蓝领群体的先进代表。青岛的“大国工匠”群体，不仅成为青岛制造业的先模人物，也成为青岛企业的品牌标签，在他们的鼓舞下，中车四方、青岛港、海尔这些老牌企业再次焕发青春，迈向事业的新高峰。[4]

从“大国工匠”到“工匠精神”，传播媒介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在央视的平台和优质节目推动下，工匠这个词汇的覆盖面，从制造业的特殊群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重要精神寄托。可以说是媒体重新塑造了“工匠精神”这个概念，并在新媒体环境下获得了大范围传播，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成为企业品牌宣传和信息传播的动力。

作为工匠代表，中车四方厂的宁允展的脱颖而出也是新闻素材挖掘的过程，如何塑造“大国工匠”形象，从企业品牌宣传的角度来看，他的“媒介”特点有以下几个：一是所处行业具有代表性，在中国高铁行业中，宁允展的工种是高铁研磨师，容易引发关注；二是技术精湛，定位臂的研磨精度能精确到0.01毫米，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凤毛麟角；三是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宁允展的故事挖掘中，我们发现他在家中自费设立了一个小车间，回家后继续钻研技术，这样的故事令人眼前一亮，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如何深入研究“工匠精神”的内涵，让这种精神鼓舞更多的行业和从业者，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和企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5]

（三）新媒体与“工匠精神”

工匠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我国历史上工匠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成就的兴衰。青岛市建设“三中心一基地”的规划，对工匠精神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弘扬“工匠精神”，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推动，更对企业的人才培养、品牌推广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工匠精神”的备受关注，与媒体宣传密不可分，利用四通八达的新媒体渠道开展“工匠精神”的宣传，塑造和刷新企业品牌，已经成为青岛知名企业的重要手段，比如微信公众号“海尔集团”、“高铁四方”、“海信”、“青岛港”等，都已经成为这些企业对外宣传的窗口，其中对高技能人才、知名工匠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在新媒体传播中，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一批能工巧匠再次成为焦点，通过他们不同的特点和个人发展情况，品牌宣传中为他们做了精致包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衔”，比如“工人院士”周勇、“大国工匠”宁允展、“钳工大师”郭锐、“齐鲁工匠”刘建树、“金牌工人”李文龙等。[6]

新媒体的崛起，为“工匠精神”的正面宣传工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平台的出现，让官方发布信息有了更大权威性，也是更好展示各项工作的平台，不仅速度快、容量大，还能根据行业特点不断调整方向和内容，具有很大的自主性、灵活性。善用新媒体，就不能把企业的自媒体平台当成大杂烩，要用严格的取舍标准，提高自媒体平台稿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须紧抓外宣与党建工作相融合的核心思路。另一方面，企业要对外宣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精准判断形势和媒体特点，将最有价值的信息传递出去，提升企业的品牌转化能力，获得良好的党建成绩和外宣效果。

这个时代的“大国工匠”与“工匠精神”传播，起点是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但第一季的8集节目，却在网络传播中大放异彩。2018年6月的百度搜索数据显示，搜索“大国工匠”一词，共找到网页结果176万个，新闻22.9万篇；搜索“工匠精神”一词，共找到网页结果1150万个，新闻78万篇。大量衍生的信息中，仅仅极少部分与中央电视台、首批“大国工匠”有直接关系，新闻内容早已经脱胎换骨，不断被嫁接到新的企业、人物和事件中。

**二、品牌培育中“工匠精神”研究存在的问题**

“工匠精神”已经不仅是制造业的品牌丰碑，并且在各行各业中掀起了跟风热潮，青岛作为“品牌之都”，诸多知名品牌也在不遗余力开展“工匠精神”的探索与宣传。一家企业如何将自身的品牌经营与“工匠精神”挂钩，不仅需要有底气的产品或服务，更需要通过深入研究，了解新环境下企业品牌形象塑造的规律。在以“工匠精神”为契机的青岛知名企业品牌塑造和宣传中，如何做好“工匠精神”的研究、定位，对企业的战略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在企业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工匠精神”的研究探索，导致大量工作信息被反复宣传，缺乏深入人心的案例报道和品牌内涵提升规划，让企业品牌塑造过程中的后继乏力特性暴露出来。企业品牌从业人员和研究者对“工匠精神”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模糊不清

“工匠精神”的说法走进《政府工作报告》，反映出国家经济战略的转变，要让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走上创新、质量的发展高速路。社会各界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价值观”的层面，认为这是劳动者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工匠的气质或内涵，对工匠来说是一种溢美之词。这种语境之下，“工匠精神”容易被理解成为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这种内涵界定有它的偏颇之处[7]，一是忽略了“工匠精神”的经济价值，这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中凝练出的观点，其基础是经济环境，而并不仅仅是指工匠的思想境界；二是忽略了“工匠精神”在技术层面上的内涵，产业发展要符合社会需求，要不断革新技术、

创新理念，形成更具有生命力的技术竞争力，这是“工匠精神”被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三是部分研究者忽略了“工匠精神”的时代属性，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这种精神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对未来的创新，一旦过分强调“慢工出细活”，就会为落后的产能披上不合理的外衣，实际上，“工匠精神”的创新内涵，是它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

（二）企业品牌塑造与社会热点脱节

作为非时政新闻范畴的社会热点，“工匠精神”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热度。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转移到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读者身上，他们在复杂交叉的新媒体环境中，自发地炒热点、蹭热点让“工匠精神”话题经久不衰。面对这一热点，企业层面的外宣多浮于表面，缺乏对“工匠精神”的重新解构和重现，缺乏灵魂人物和故事的泛泛而谈，让这一波蹭热点空有热度而缺乏实质。

品牌宣传缺乏技巧性，是“工匠精神”传播效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新媒体的高速发展，传统媒体的弱势愈加明显，企业获得了更多自媒体渠道，获得了新闻传播中的发言权。但企业以微信和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账号，在运营过程中效果差距明显。分量重的新闻素材、有创意的信息组合、视频类的感观变化……这些正面的品牌宣传方式并不多见，多数是企业日常内部工作的堆砌，难以与读者产生互动，传播能力受限，不利于产生品牌影响力。

企业品牌宣传蹭热点还普遍存在品牌契合度低、触及敏感话题、反应不及时等问题。蹭热点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品牌曝光度，若热点事件与品牌缺乏有效结合，文案又缺乏独特视角，比如2017年高考引来高档汽车、技工院校等蹭热点，既缺乏情怀又没有契合性，甚至连笑点都不存在。蹭热点不及时，也是制约多数企业推动品牌宣传的难点，这与运营团队专业水平、分工程度和反应速度有关，对一个社会热点来说，快速、准确、高质量的“蹭上”并不容易，多数企业缺乏足够专业的团队，难以获得高效率。另外，蹭热点还容易因为三观不正、伤害他人、涉及私利而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三）企业宣传未能及时传递“工匠精神”

从信息传播的内容和导向来看，不论是党政机关发布性新闻，还是企业信息传播，都有内部宣传与对外宣传的界定。前者受众范围小，普遍只有特定领域的内部人员关心，或者人为限定信息传播范围；后者的受关注具有普遍性，涉及较大范围的知情权或受益人群。企业开展企业品牌宣传时，往往不能及时传递“工匠精神”，而是事无巨细展现公司品牌价值观和生产管理活动，容易让读者在自说自话的“过度营销”中产生逆反心理。在相当数量的企业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企业发布的信息集中在领导会议、员工活动、内部工作等领域，缺乏围绕品牌形象塑造的互动活动、拉近读者与企业距离的稿件、彰显企业社会影响力的产品宣传，导致对“工匠精神”的深入研究和宣传不到位[8]。企业的内宣与外宣工作混为一谈，未做好平台划分和内容分类，导致品牌宣传成为近乎偏执地自说自话，外界读者难以在企业自媒体平台上产生阅读兴趣，更无法获得有价值信息。最终，企业自媒体平台的粘性和传播力受到限制，难以通过新媒体渠道实现品牌价值的提升。

品牌形象需要日积月累形成，与广告营销截然不同，但在媒体资源高度集中的传统媒体环境中，企业养成了一蹴而就的心理期待。“工匠精神”的一夜爆红，看似是央视节目的骤然发力，但实际上也离不开生产企业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8名“大国工匠”的脱颖而出，更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四）缺乏对优秀工匠的深入挖掘

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品牌意识相对较弱，更缺乏专业人才操盘品牌建设工作。加上不善于对外合作，打造品牌的能力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企业发展较快与品牌建设跟不上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明显，将成为困扰很多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很多企业都号称要打造百年老店，却连简单的长期品牌宣传和发展规划都没有，做起事来更是目光短浅，想一出是一出。环视当下，一个品牌能存在十几年、几十年已属不易，能在其行业位居前列的更是凤毛麟角，国内的绝大多数品牌与真正的国际百年品牌相比，差距还是全方位的，未来仍是任重道远。

高技能人才的挖掘力量不足。对企业的品牌宣传来说，“工匠精神”的新媒体背景带来了巨大影响力，但从本质上讲，央视《大国工匠》塑造的工匠形象，是全国知名企业厚积薄发的结果，每一名工匠都能代表一个产业的高技术水平。然而在这场跟风报道过程中，多数企业并没有挖据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优秀工匠，而是千篇一律地介绍普通工人的经历，缺乏技能基础和深入人心的幕后故事，品牌包装难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出

现这种人才挖掘的困境，也与人才储备总量和技能提升不足有关，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发展和优秀工匠，在很多依靠手工操作的领域，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挑战技术极限的工匠，才能真正体现出“工匠精神”的内涵。

**三、工匠精神符合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的企业品牌建设要求**

在当前形势下，各级政府、媒体机构把弘扬“工匠精神”作为重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人力物力，让其成为典型的现象级传播。在新媒体传播中，青岛市也涌现出一批知名的“大国工匠”，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崇高的爱岗敬业精神，受到中央和省市媒体的关注，成为新时代蓝领群体的代表。青岛市作为山东经济龙头城市，也出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转折点上，传统产业升级，发扬“老字号”的品牌魅力，通过技术、品牌、商业模式的创新，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水平，并积极引导传统产业在融合经济、平台经济、绿色经济、品牌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大胆尝试，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符合青岛市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品牌发展的要求，青岛正传承老品牌的工匠精神和文化基因，强化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产业的融合改造，实施“标准化 +”和品牌战略，重点升级发展商贸、纺织、机械设备、橡胶化工等产业，重新塑造青岛知名企业的全新品牌，进而带动青岛经济的再次腾飞。做好“工匠精神”与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企业品牌的升级发展，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新的尝试，做好新经济形势下的“工匠精神”研究和实践。

（一）品牌抱团，借助新媒体创造舆论环境

在“工匠精神”传播过程中，企业新媒体居功甚伟，主要源于其三个特征：一是企业新媒体拥有完全的信息发布自主权，这与个人自媒体、自媒体营销账号类似，管理人员通过自建的工作流程，可自主完成信息的生产和发布，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体的素材筛选和刊期安排；二是企业新媒体信息发布时效性超前于传统媒体，企业的外宣素材，通常优先在企业新媒体平台发布，传统媒体或网络媒体则需要在获得素材后，进行编辑制作或等待刊发周期；三是企业新媒体信息表现形式多样化，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直播等方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媒体表达方式，传统媒体无法应用的H5、小程序等，也能在微信中实现，大幅度提升读者的体验效果。

央视《大国工匠》的经典难以复制，但青岛也曾做过一次尝试，以品牌抱团的方式，提升青岛市大型制造企业的品牌影响力。2016 年 8 月，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新华社开展“解码青岛制造”专题报道，十余名新华社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对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海尔集团、青岛港集团等知名企业走访，深入挖掘青岛制造业扬名海外的秘诀，其中对工匠精神的探讨，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这种政府主导的集中采访，具有平台高、覆盖广、影响深远的优势，尤其借助“青岛制造”“工匠精神”的热点，对企业品牌宣传意义非凡。[9]

换一个角度来说，企业也要主动创造自媒体联盟的优势，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借力机会。2016 年 9 月，万达集团成立自媒体联盟，涉及 700 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也标志着作为企业的万达进入了自媒体传播的新阶段，不仅提升了渠道自主权，也拥有了自媒体整合能力，依托于多种纵向平台而打造更具优势的横向平台，更减弱了对传统媒体和官方新媒体的依赖。以此为范本，企业之间应该加强衔接互动，并对接社会自媒体平台和账号，形成自媒体联盟网络，在抱团中取长补短获得传播优势。

（二）依靠人才抓住品牌传播的时代红利

对企业来说，“工匠精神”可谓是这个时代品牌传播的最大“红利”，不仅为新媒体传播带来优质切入点，也为企业传播带来一只“下金蛋”的鸡。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为例，在“工匠精神”的大背景下，涌现出周勇、宁允展、郭锐、刘建树、李文龙等工匠代表。既然工匠成为品牌“卖点”，中车四方迅速围绕技术高超、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等标准，将一批技术人才挖掘出来，塑造成有血有肉的新闻人物。

不难看出，在这一轮的“工匠精神”时代红利中，只有技压群雄、与众不同的工匠，才能获得更高的传播属性[10]：一是要拥有技术光环，是否拿过全国、省市的技能大奖，是否有独门的高超技术，是否有令人瞩目的产品，这是与“工匠精神”挂钩的基础因素；二是要挖据出独特事迹，单纯的辛苦、付出固然能打动读者，但千篇一律并不符合新媒体传播特点，须与读者产生广泛的共鸣；三是要集中力量选树最有价值的典型人物，在数量和质量之间，企业要善于舍小取大，集中优势力量实现品牌影响力的最大化。

（三）打造企业宣传的自媒体矩阵。

微博与微信是新媒体环境中的传播寡头，多

数企业都有其自媒体账号，受到较高阅读量和关注度的影响，企业的自媒体渠道也多集中在这里，涌现出一批知名大号，比如中国中车、支付宝、海尔集团、杜蕾斯、星巴克等。在最热门的新媒体渠道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主流模式传播品牌价值，是企业宣传的必选项，但渠道只是企业宣传的手段，覆盖更多读者并转化为品牌影响力才是最终目的，自媒体矩阵的重要性得以体现。

打造企业外宣的自媒体矩阵，从渠道上看，指的是在多家平台上开辟自媒体账号；从手段上来看，是通过内容或风格的调整，在全面影响目标用户时彼此独立又遥相呼应；从前瞻性来看，新媒体更新换代迅速，提前在各类平台安营扎寨，有利于后期的战略调整。企业要明确主流自媒体平台的主体地位，并在其周边开发来自多平台的自媒体账号，以不同风格的文字、图片、视频形式进行信息推送，互为犄角，提升数据量。

根据品牌定位和更加具体的外宣目标，企业应在头条号、百家号、搜狐号、凤凰号、企鹅号等诸多自媒体平台中筛选，以官方或第三方的形式运营自媒体账号，通过多层次的信息发布，营造铺天盖地的品牌传播氛围，提高有效读者的信息传播覆盖率，获得品牌影响力的有效转化。[11] 有海外市场营销需求的企业，还应该在 Facebook、Twitter 建立专属账号。在“工匠精神”的背景下，新媒体环境中的企业品牌宣传获得了更多契机，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并在短期内难以自愈。企业不妨引入第三方专业团队运营自媒体平台，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共同打造自媒体矩阵。


**参考文献：**

[1] 徐耀强.论“工匠精神”[J].红旗文稿,2017,（10）.

[2] 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文字实录）[EB/OL].（2017-08-10）[2017-10-10].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05/content_5049372.htm.

[3] 王正林.从“青岛金花”到“品牌之都”[J].商周刊,2014（11）.

[4] 刘玉彩.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品牌传播的转型探究——兼论企业品牌传播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提升[J].中国商论,2017,（27）.

[5] 刘晓林,玉茗.高铁首席“研磨师”——访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车辆钳工高级技师宁允展[J].现代企业文化（上旬）,2016,（05）.

[6] 姜超.“工匠精神”环境下的企业文化传播探讨 ——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品牌传播为例[J].新商务周刊,2017,（18）.

[7] 王星. 我们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N].光明日报,2018-6-9（10）.

[8] 朱小娟.微信公众号中植入式广告的品牌传播——品牌与内容契合度对传播效果的影响[J].青年记者,2017,（09）.

[9] 林刚. 解码“青岛制造”[N]. 青岛日报,2013-01-18（002）.

[10] 巩合生.新媒体环境下纸媒大型专题报道研究——以五一国际劳动节专题人物报道为例[J].新媒体研究,2017,（09）.

[11] 王晓艳.品牌推广及应用研究[D].云南大学,2013.



**责任编辑：胡燕京**


# Craftsmanship and the Cultivation of Qingdao Well-known Business Brands


CHEN Ke　ZANG Hai-liang　HU Yan-wen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Educ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CRRC Sifang Co., Ltd. Qingdao 266000, China  2 Qingdao Web Culture Office, Qingdao 266000, China )



**Abstract:** Known as a "city of brands", Qingdao has a number of enterprises with high international prestige such as CSR Sifang, Haier and Hisense. Brands are the symbols of a city and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of "craftsmanship", brand building of enterprises is deeply connected with it.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raftsmanship", control the channels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e the rule of spreading the craftsmanship, and combine it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in Qingdao is a big problem facing the enterprise brand communication and relevant researchers. Taking as an example the spread of the "craftsman" of famous enterprises in Qingdao,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enterprise brands.



**Key words:** craftsmanship; craftsmen of the nation; corporate brand; news publicity; new media

# 论知识产权运营与新旧动能转换

于正河 段雅静 王晓珮

（青岛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际，我国正在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的新时代跨越，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社会形态。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推进经济社会持续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的关键要素，知识产权运营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动能源；知识产权运营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举措，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知识产权；有效运营；社会功能；经济价值；新旧动能转换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18-05

随着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决定了经济发展需要新旧动能转换[1]，新旧动能转换是推进经济社会持续进步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要素。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内容是挖掘和寻找新动能资源，在各种新动能资源中，创新所产生的知识产权是核心源动力，是新形态经济发展和价值增长的重要内能，而知识产权运营是这种内能实现有效功能的关键过程。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知识产权运营推进策略和措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一、知识产权运营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共同要素

### （一）知识产权运营

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作为无形商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过程中起到法律保障、激励规范和调控作用[2]。从劳动价值论分析，知识商品的使用价值尤其需要知识产权运营。我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但知识产权质量的高度还不够，很大一部分授权后的知识产品被“束之高阁”，未能及时转化为经济效益，转化为生产力，而知识产权运营为此提供了一个破解的良招。知识产权运营是以转让、许可、融资、作价入股、技术服务等为主要模式，以实现知识产权经济价值为直接目标的商业活动行为，其实质是技术（专利）、资本、产业三者的互动，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3]。只有好的知识产权客体并加之于推广运营才能够通过经济市场的检验来实现经济价值，能够通过运营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势必形成良性正向的激励，推动知识产权量质齐升，加速知识和信息向生产力转化，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4]，有助于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促进新动能要素的创生，并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创造无限的经济价值。

### （二）新旧动能转换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经济意义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经济增长低谷期、“新常态”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主动性重大调整期与强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的所谓“四期叠加”的新阶段[5]，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决定了经济增长需要新旧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6]以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为双引擎，以“四新”促“四化”为驱动，以技术创新为引领，呈现双创、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推动的显著特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着力点。新动能主要以人才、知识、技术、信息和大数据等新生产要

**收稿日期：**2018-05-06

**作者简介：**于正河（1956-），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教授；段雅静（1989-），女，河北张家口人，青岛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王晓珮，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

素为动力源，由此创造出来的知识产品和知识产权是构建新经济格局的框架资源；传统动能在坚实底盘的基础上通过因时因地因势的延伸和重构来焕发新活力[7]。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在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助推和促进作用。

（三）知识产权运营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共同要素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是智力创新活动所产生的重要法定成果形态，知识产权制度不但是激励创新活动和调动创新要素的法律保障，而且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保护伞。本文所述的知识产权运营包括知识产权的应用、转化、转移和经营等产业化要素，它与新旧动能转换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依赖关系，而知识产权及其有效运营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从而使知识产权运营与新旧动能转换的三类基本构成要素紧密相关，具有共同的对象。

智慧型人才是产生知识产权和知识产品的最佳基础动能源，在所有的生产力要素中，人才是最好的、最活性的和最直接的生产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因素就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特别是要有一支智慧和技能型人才队伍及其知识结构[8]，所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新旧动能转换都需要首先创建一支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目的，智慧和创新型人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佳保证，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和微观方向来考量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能源因素，智慧型人才是生产知识产权新动能的第一要素。

知识和技术是形成知识产品和知识产权的最佳基础条件，没有知识和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知识产权和知识产品，也就难以形成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条件，最终也就不可能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新型能源，所以，知识、技术和技能是新动能形成的点火器，是知识产品和知识产权的能源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能源。

信息和大数据资源是新动能的存储器和输送泵，是创新型人才发挥智慧才能的一种教科书，在当今这个高度网络化的新时代，信息处理和信息传播是知识产权运营的最佳选择，也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新动能传递的有效手段。在信息通信网络化过程中，大数据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分析利用成为完全可能，大数据的计算机分析时代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润滑剂和加油站。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目标就是要把创生知识产权新动能的人才、知识、技术、信息和大数据等最具影响力的要素抓好抓实。

## 二、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价值功能

（一）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经济价值

知识产权运营具有经济增长的促动作用，也是新生产力要素产生的重点来源，知识产权运营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目标和战略任务，法律给予知识产权充分的保护作用，其实质是在保护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要素的过程和结果，而生产力转化的目标就是增加经济效益，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创新创业的经济增长率和增长点也是在创新成果的转化过程中产生的，而创新和创业的过程本身就是创生知识产权和运营知识产权，是通过知识产权运营实现创新创业发展经济的目的[9]。所以，知识产权是经济发展的新能源，知识产权运营是增长经济价值的加油站，是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新动能输出泵。

（二）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社会功能

知识产权运营机制是连接创新和产业化市场的轴承，也是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带。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成果财产权，也赋予创新主体对创新成果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以及通过成果转移转化获取收益的权利，在这种权利驱动状态下，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其创新劳动者有了继续创造发明的动力，循环进行不间断的创新活动，循环式带动新动能的创生，从而发挥出知识产权制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社会功效[10]。作为知识产权的最佳客体内容，专利技术方案运营是一种最好的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源，专利技术方案是创新活动最频繁的成果形式，因此，专利权运营也是最好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库，专利技术方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特色鲜明的社会功能作用；商标或品牌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用，商标具有产品和服务来源功能、广告宣传功能、信誉功能、质量保证功能和企业文化传播功能，商标专用权及其运营同样具有潜伏的社会价值作用；青岛啤酒的商标运营在啤酒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新动能，也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发挥了驰名商标的社会功能；文化产品及其文化产业的新动能作用同样重要，文化产业发展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迎来了良好的时机，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在传播过程中会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步，会鼓舞人心向善发展，这是一种重要的新兴动能形式，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取之有道的新能量。

## 三、知识产权运营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举措

知识产权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金刚钻”，知

识产权运营是实现知识产权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金钥匙”,故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助推剂功能：知识产权运营为新旧动能转换进行产权界定并提供激励机制；知识产权运营为新旧动能转换进行资源配置并提供有序的市场交易；知识产权运营也为新旧动能转换施加产权保护并提供规范机制[11]。所以,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好知识产权运营的动能源和助推剂作用。

（一）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激励与保护作用

知识经济是新常态下传统产业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也是经济发展的动能再生社会阶段,知识经济呈现出知识产权密集存在和循环创造的特点；而知识与其他生产要素是以思想范筹的无形状态体现的,具有易传播、无消耗性和广泛性的特点,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智力成果产权化的本质是将具有公共特征的知识变成具有人身属性的权利,同时清晰划分权利的边界范围,从而诱发创新活动的良性竞赛,激励人们对知识生产的投入,使之成为新动能的发源地、驱动力和挖掘机。在知识经济时代,事先明晰产权是促进生产力的前提,任何交易和合作是以产权边界清晰为前提的,且社会经济结构的真正改进是通过知识传播实现的,因此,以产权保护制度激励创新的同时也存在阻碍知识传播的可能性[12]。知识产权运营能够有效突破产权障碍,连接起知识与市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既激励了知识创意的产生,也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广泛传播,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容,是一种兼顾知识生产与传播诸环节均达到高效率的制度。

知识产权运营能够以更大的力度促进知识和智力资源尽快实现经济价值,加快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新格局；同时营造出包容支持创新创业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制度保护环境[13],强化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意识,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各种技术孵化器和创新基地的快速发展,促使众创、众包、众筹和众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

（二）要科学合理地配置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知识产权资源

在当今世界的新经济时代,创新型人才、知识、技术、信息和大数据等资源在全球流动的速度、范围和规模已经达到活跃高峰期,知识产权的生产、流通、分配和运营的新模式迅速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以专利申请和智能分析的数据组合为基础预估技术发展领域未来事件,专利数据成为现代投资者决定把时间和金钱投向何处的“水晶球”[14]。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利用知识产权运营促进新生产力要素合理流动,发挥智力资源合理配置作用,充分发挥其放大社会生产力的乘数效应,是“智造时代”的重要创新资源。

在目前的创新资源和市场交易之间尚缺乏清晰匹配和有机协调,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隐含着对资源过度投入的激励并诱发相应的资源浪费。在知识生产者分散、相互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即使研发计划很强的企业,也可能出现在研究途中或结束时,发现刚好有其他企业先于本企业取得了同样内容的知识产权。在现实中,为了追求具有垄断性知识产权的个人独占,采取过度投入而非最优投入的情况的确比较多；至于创新竞赛诱发的“睡觉专利”带来的浪费,则是知识产权运营制度的另一个弱点[15]。知识产权运营通过独占许可、交叉许可、转让等方式为知识生产资源提供市场交易,促进社会对知识运用的能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优势,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运用及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促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升级。

（三）要用知识产权制度规范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新动能流通秩序

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创新的积极性和创新成果的保护都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和支撑作用[16]。随着“互联网 +”“分享经济”在各领域持续发酵,以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制造、能源、农业、交通以及其他产业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并推动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步伐；而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近乎零成本的传播使得创新成果很容易被“复制粘贴”,必然会严重阻碍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知识产权运营通过多种模式交易智力成果这种无形资产,有效保护智力劳动和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专利制度以充分公开技术换取法律保护的原则,也为知识产品的流通创造和构架了公正平台；知识产权运营以特殊的商业活动为创新成果在市场中的流通提供良性循环的渠道,既实现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又规范了市场机制、稳定了市场秩序,对于推动整个技术进步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革将为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创新保护放出“源头活水”，正在构建的专利、商标和版权“三权合一”的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新格局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大方向[17]。上海浦东新区、上海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青岛市和长沙市等市地已率先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综合管理改革的实践，确立了专利、商标和版权“三合一”集中管理体制，形成了司法保护、行政保护、调解仲裁、社会监督“四轮驱动”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和行政保护模式，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降低了社会创新成本，以适应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需要，特别是有利于加快新动能源的流通和转移速度。

（四）要合理调配和利用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活的动能源要素

所谓活的动能源要素包括人才、智慧、知识、信息和大数据等可流动和可传播的知识产权的本源成份及其载体，他们能够通过拥有者的劳动直接产生积极的知识产权[18]。要发挥好知识产权运营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活的新动能源的功效，就必须合理的、科学的调配和利用好能够拥带和传播知识产权客体的活的动能源要素。知识产权运营也需要依靠这些活的动能源要素实现其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

在这些活的新动能源要素中，人才既是产生知识产权和产品的本源，又是拥有和传播其它知识产权的活的动能源要素的工具，要合理调配和利用好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活的动能源要素，其根本的关键在于把拥有知识、智慧、技术、信息等人才调动和发挥好。知识产权制度调整、激励和规范其客体的创造、转移和应用，而其核心内容是调动和规范人的创新活动，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调动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发挥性是最好的利用其他活的新动能源要素钥匙。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调整和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中人才流动的重要法律规范，没有合理与科学的人才规范机制，就不可能利用和发挥好知识、技术、信息和大数据等活的新动能要素。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人才的合理流动调配将成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要防止人才流动的不平衡性和经济趋向性，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人才合理流动和积极性充分调动的政策机制。

**四、结论与思考**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知识产权运营正在融入产业创新体系之中，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力军。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体系中存在的关键核心知识产权缺乏、知识产权运营需求乏力、激励制度保障欠缺和硬件政策措施支撑不力等问题依然制约着产业创新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要实现知识产权运营业务专业化、运营内容系统化、运营主体协同化、运营资源全球化和运营机制市场化[19]，还必须很好地通过知识产权运营的良性循环来提升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

首先，提高“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任务在于把智力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思想认识，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正在加快政策引导，克服过多偏重知识产权量的增长，而忽视知识产权质的提升及其商业价值的转化。通过构建激励与扶持技术成果转化运营的政策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的作用机制、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奖励机制和评价体系，更好的发挥知识产权运营的目的，实现让知识产权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

其次，发挥政府看得见的管理作用，强化政府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统筹管理，合理利用政府财政支持资金，更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政策措施上给予引导和扶持，支持市场主体设立专业化的知识运营机构或基金，鼓励行业内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联合利益相关企业实施知识产权复合式运营模式，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

同时，为了有效促进知识产权与创新资源、产业发展、金融资本的融合，搭建综合性知识产权运营与服务平台及运转机制，加强数据共享和业务联系，发挥知识产权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双重作用，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和保护政策体系，着力推动知识产权运营与实体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带动区域重点产业的知识产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有利于助推新旧动能的转换和开发。

另外，综合应用型的知识产权运营专业人才供需矛盾突出，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制订知识产权运营人才的培养计划，有重点地支持高校开展正规的知识产权人才教育，培养一支专业化、实务化和国际化的知识产权运营专业人才队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智力支撑，是新旧动能转换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划者和实现者，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是人才集聚的基地，也是活的新动能源要素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平台，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其人才的引进和使用，高成本的大量的引进同学科的人才组合，是否会科学合理的调动和发挥好高端人才的内涵作用，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探索。特别是在当前各地

方政府、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高成本大吸引力引人的浪潮应该引起国家政策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 赵丽娜. 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 理论学刊, 2017,（02）.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EB/OL]. http://www. sipo .gov .cn/wqyz/dsj/201305/t20130503_79 7 167.html.

[3] 朱国军, 纪延光. 企业专利运营能力演化的行为解析[J]. 科技管理研究, 2010, 30（10）.

[4] Langinier C, Moschini G C, Rothschild M.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J]. Books, 2002, two volume set:16–62.

[5] 黄少安. 新旧动能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09）.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顶你接续转换的意见[N]. 国办发[2017]4号, 2017–01–20.

[7] 张新文. 以“四新”促“四化”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J]. 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17,（7）.

[8] 孔宪香. 强化创新人才支撑 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EB/OL]. 山东宣讲网, 2017–11–21.

[9] 李伟.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转型升级[J]. 市场观察, 2017,（9）.

[10] Hall B H, Ziedonis R H. The Patent Paradox Revisit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tenting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79–1995. [J]. General Information, 2000, 32（1）:101––128.

[11] 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①[EB/OL]. http://www.yangxian.gov.cn/gk/bmgk12/18659.html.

[12] 曹勇, 胡欢欢. 辨证分析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理论述评[J]. 科学学研究, 2008, S2（26）.

[13] 营造严格保护环境 助力新旧动能转换[EB/OL]. http://www.sipo.gov.cn/wqyz/dsj/201611/t20161116_1301 791.html.

[14] 专利数据——现代投资者的水晶球[EB/OL]. http://www.sipo.gov.cn/ wqyz/dsj/201703/t20170330_130914 5.html.

[15] 张耀辉. 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5）.

[16] 宋清辉. 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J]. 中国经济信息, 2017,（19）.

[17] 袁于飞. 知识产权制度为创新插上翅膀[N]. 光明日报, 2017–03–29.

[18] 马秋林.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开拓江苏经济发展新局面[J]. 唯实, 2017,（8）.

[19] 常利民. 我国专利运营对策研究[J]. 专利运营, 2014,（8）.



**责任编辑：侯德彤**


#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YU Zheng-he　DUAN Ya-jing　WANG Xiao-pei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stitut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China is leaping from a big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ry to a powerfu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ry, and its economy is entering a stage where new growth drivers are replacing old ones. Based on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concepts and common elements of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per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above-mentioned replacement. It reveals that the replacement has been becoming a key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w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 continuously, in which process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s as a source of dynamic energy. Accordingly,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boost the replacement by the ope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side and pursu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effective operation; social function; economic value;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企业破产法的实施

丁 燕[1] 白文莉[2]

（1.青岛大学 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莱西市人民法院，山东 青岛 266600）

**摘 要：**我国经济面临化解过剩产能、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局面，中央提出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产是解决产业结构深层次矛盾、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质效的重要法治途径。以企业破产法的实施为导向，通过发挥破产清算制度对“旧动能”出清功能和破产重整制度对“新动能”的培育功能，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关键词：**新旧动能转换；破产清算；破产重整

**中图分类号：**D922.29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23-06

“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10月召开的政府会议中，首次以“新旧动能”的概念对我国当前经济进行了初步判断。新旧动能转换是化解过剩产能置换形成新动能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各种风险和挑战，既有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挑战，也有淘汰、改造落后技术、过剩产能、传统模式的压力。破产法律制度是改造升级落后企业、清理僵尸企业的一项现代制度，与中央提出的发挥市场机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要求高度一致。破产制度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作用中日益凸显，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现代破产法，包括破产清算、和解和重整三套程序且可依法转换。破产法是警醒正常市场主体“向死而生”之法，是帮助困境企业“涅槃重生”之法，是促使“僵尸企业”规范退出之法[1]。我国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破产法》重申了破产制度的法律意义，旨在规范企业破产程序、概括性清理债权债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我国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企业破产法被赋予了更高的期许，将被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实施。

## 一、破产法的制度价值

破产，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概括描述债务人资不抵债的事实状态，与“倾家荡产”一词概念重叠，系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我们所说的法律意义上的破产，对破产这一事实状态赋予法律效力，名之为破产制度。传统意义上对破产制度的界定是：法院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为概括的强制执行而公平分配给全体请求权人的程序[2]（P3）。简言之，强制清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是由破产清算制度、破产和解制度和破产重整制度协调作用、共同支撑形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破产法在此基础上确立，实现破产的体系化设计，涵盖了破产重整制度和破产清算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市场主体退出制度，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有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3]。

### （一）法理基础

#### 1. 审视破产法之性质

破产法体现了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的相互作用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取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公权力干预的交互融合。破产法形式上系追求债权公平受偿、兼顾债务人生存利益之法，实质上是维护社会公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之法，故应属公私融合法[4]。同时，破产法对私权本位理念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使其兼具了民商法与经济

**收稿日期：**2018-06-08

**作者简介：**丁燕（1979-），女，新疆乌鲁木齐人，法学博士，青岛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文莉（1984-），女，山东烟台人，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

法的双重属性。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的是申请主义而非职权主义：破产程序的开始需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排除国家干预，并非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法院即可依职权启动。如此立法，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尊重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合意，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同时，赋予法院批准权，司法公力强制介入，实现各方利益平衡，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 探究破产法之本意

政策性破产与法治理念背道而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理念的逐步建立，1986 年 12 月 2 日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破产法。破产法律制度最早产生于破产清算程序，首先是为了满足债权人需求，通过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障债权实现，维护债权人利益。为弥补清算程序的不足，近代诞生了破产和解程序，即为清偿或减免债务，使债务人走出困境，恢复清偿能力，债权人与债务人进行协商，强调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合意，重视保护债务人的合法利益。破产重整程序的出现，是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基础上，重点是对债务人实施挽救，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破产法律制度涉及主体利益广泛，不仅包括债权人、债务人，还有职工、股东、投资人等，处理债权债务程序、流程纷繁复杂，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亟需法律予以规范和保证实施，使之沿法治化轨道前行。

（二）实践基础

中央依法治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应采取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应对治理

1.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旧的发展动能不断衰减，资源环境约束加剧。部分企业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生产要素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和市场发展要求，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破产清算程序的功能是彻底清算债务人财产，强制分配给债权人，将债务人清退出市场。破产法诞生之初就是建立在清算程序基础上的，以企业为适用对象。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者和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居供给侧的核心位置。对没有挽救可能和必要的企业，其存在极大损耗社会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不符合“低碳、环保、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模式”，应及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

2.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业库存高企、企业杠杆率偏高，以“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抓手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这与破产法清理债务人财产、挽救债务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价值不谋而合。经济发展的推动，破产法由最初的清算型破产功能，伴随破产和解程序和破产重整程序的出现，增加了预防型破产功能：通过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实现挽救企业，维护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具体体现为：一是钢铁、煤炭等远高于需求的产能，挤占了清洁能源的发展空间，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去产能的目标；二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通过破产和解或重整程序，采取债转股手段，实现去杠杆的目标；三是运用破产重整制度，培育新动力、新技术、新业态，实现降成本、补短板。

3. 新经济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旧动能”共同构成新常态背景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力量。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新动能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续接转换，需沿法治轨道推进，才能实现其目的。清算制度和重整制度作为破产法的两大支柱，在各自领域内积极发挥其功能并相互作用。破产清算制度侧重于出清旧动能，破产重整制度侧重于培育新动能。

**二、清算制度对“旧动能”的出清功能之述评**

与“新动能”相对应的是“旧动能”，是指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能源、资源的投入，能耗大、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产能利用率低，以传统理念模式进行管理，缺乏技术支撑的传统产业和经济模式，包括钢铁、煤炭、冶金、石油化工、水泥、玻璃、轮胎、养殖畜牧等产业，连年亏损、主要依靠当地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续贷，没有市场竞争力。这些产业产生大量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若不及时化解、淘汰，将形成僵尸企业，挤压新经济、新业态的生存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①]。企业具备《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7 条规定的破产清算原因，即可在当事人申请、法院审查后，依法被宣告破产。破产清算是与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并列的三大独立程序之一，是破产法律制度创立的最初形态和发展的基石。不同于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破产清算制度没有挽救的功能价值，而是通过公平清理债权债务，将没有挽救可能和必

①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又称为“格雷欣原则”（Gresham's Law），起源于 16 世纪的英国，是经济学的古老原理，最初适用于货币领域，即消费者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undebase money）（贵金属含量高），使用成色低的货币（debased money）进行市场交易、流通。是指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或银子（良币）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要的企业清退出市场，具有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直接作用。正是由于破产清算制度的存在，破产法被认为是企业的死亡之法，是解决市场主体规范退出的制度，倒逼了企业主体“向死而生”的精神品质[5]。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加速落后低效产能的退出，为先进产能腾出空间。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适用《企业破产法》，以实现清算制度对“旧动能”出清的功能。

（一）公平与效率兼顾

实现破产清算淘汰落后产能的功能，必须公平与效率兼顾，二者并行不悖。《企业破产法》明确了破产法律制度所具有的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立法宗旨，通过变价债务人财产，达到清偿债权人的目的。公平不是平均，不但要体现形式公平，更要保障实质公平。《企业破产法》第109条[①]保证了担保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有观点认为，根据破产财产整体处置原则，担保债权人的权利应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是消灭优先受偿权，而是推迟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推迟受偿还是随时受偿，是法官公平价值观的体现，需要法官审判智慧，立足法律体系，探究立法本意，准确把握实质公平的适用。笔者认为，应保证担保债权人可随时对属于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主张优先受偿权；除非单独处置担保财产会降低其他破产财产的价值而应整体处置，管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应及时变价处置。如此，既不违背物权法对担保物权的规定，恢复担保物权的本来面目，又防止担保债权人恣意行使权利，最低限度保护了破产财产整体性，维护了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破产财产并不是平均清偿债权，要按照法定顺序清偿，居于第一顺位的是欠付职工的工资等，第二顺位是相关社会保险费和税款，最后是普通债权，这体现了对权利人地位差异性基础上的公平分配原则。将职工权益放在第一顺位，实现了实质公平蕴含的以人为本价值，劳动者债权属于弱势群体享有的权利，法律应当予以倾斜性保护。破产分配的二、三顺位，是实质公平蕴含的社会公益优先原则之体现。

为保证效率，清算程序与和解、重整程序之间在符合法定实体要件、程序要件的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但不允许三大程序之间进行多次转换。主要基于成本的考虑，为节省资源，提高清算效率，对此不能无限制。但效率和公平也是对立统一、互为表征、相互交融。《企业破产法》第114条规定破产财产应当以货币形式分配。这一规定便于公平分配财产，债权人公平受偿；同时规定“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即当破产财产无法变价而不能以货币形式分配时，人民法院可以积极探索多种、更加有效的破产财产处置方式和渠道，可采取变价拍卖或实物分配的形式，最大限度提升破产财产变价率，使破产财产的分配方式在法律框架内更加灵活，保证公平与效率。《企业破产法》第118条、119条规定了债权人对破产财产分配的受领期限。逾期受领的，债权人将丧失破产财产的分配权，将逾期受领债权人的破产财产分配给其他债权人。法条中的“二个月”和“二年”，性质应属于除斥期间，不可延长。否则，看似保证了逾期受领债权人的利益，实则既侵害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期限履行权利义务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形成了实质不公，也增加了破产费用、导致破产程序延长，与破产清算的效率价值背道而驰。

（二）法治与稳定并重

在法院审理的所有类型案件中，破产案件是投入司法资源最多、司法成本最高的一类案件：审理周期长、涉及主管部门多、对法官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要求高，在审理破产清算案件过程中，既有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也面临大量职工安置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法院推进破产清理案件的审理，是清理僵尸企业、盘活存量资产、释放资源要素、加快经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换，从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之举，势在必行。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应严守法律底线、在法治轨道上保证破产清算程序的稳定性。依法与稳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后，破产财产的变价和分配成为各方诉争的焦点，关系到破产清算程序能否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应确保债权人会议在法律框架内，对破产管理人依法制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和分配方案充分讨论，尊重和体现债权人的意见。其次，关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规定了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优先清偿欠付的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这一规定也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相符，维护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

清理程序依法推进，既要保证社会稳定，也要实现经济稳定。《企业破产法》第123条对追加分配作了明确规定，自破产程序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或者无财产可供分配而终结之日起2年

①参见《企业破产法》第109条。

内，发生法定情形，债权人享有追加分配请求权。既充分保证了法定情形下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因追加分配发生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立法对追加分配进行了严格限制，如：规定2年除斥期间、破产程序终结的原因、进行追加分配的条件等，防止追加分配权被滥用，有利于经济稳定。

**三、重整制度对“新动能”的培育功能之探究**

新旧动能转换要求培育新动能、实现旧动能向新动能接续转换，与之相伴的是风险和挑战。因产能过剩而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大量出现，会冲击我国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风险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必然，提前预防和后续补救是化解风险的方法。破产重整制度是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再建希望的企业，在法院主持下，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并借助法律强制性地调整其利益关系，进行企业营业重组与债务清理，以挽救企业、避免破产、获得更生的法律制度[6](P213)。该制度是由美国联邦破产法最先创立，现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纳，为各国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破产法改革运动中的一大课题：即适应建立和完善以企业复兴为目标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7]。重整制度是破产预防制度，集中体现了破产法的拯救功能，代表了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兼融了私权本位和社会利益，实施破产重整制度，对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意义重大。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中有8个是破产重整案例，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正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通过破产重整程序，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最终实现涅槃重生。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半的审理，积极引导推进破产重整工作，最终形成各方满意的重整方案，2018年5月14日，青岛造船厂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青岛杨帆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案宣告重整成功，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实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审理破产重整案件时，应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严格审查重整对象，防止破产重整程序被滥用

启动破产重整程序，首先要确立重整企业甄别机制，即确定破产重整对象。《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债务人可在两种情形下进行重整：一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二是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4日印发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文简称“《会议纪要》”）第14条明确重整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破产重整程序是促使企业真正解决债务负担、实现重建更生的重要途径。因此，拟进入重整的企业要有重新盈利、清偿债务的空间和前景。不是所有的困境企业都有重整的可能和必要，困境企业的拯救价值体现在其继续经营价值高于清算价值，维持企业的继续经营有利于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各个利害关系人，有利于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8]。根据《企业破产法》第70条、第134条第1款规定，破产重整的申请人包括债务人、债权人、债务人的出资人及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等，故困境企业成为破产重整的对象，还需要各个利害关系人秉持破产重建、相互妥协的意愿。实践中，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的积极性缺乏，对破产重整的认识和理解不足，缺乏破产保护的观念，破产有损企业和个人名誉的想法尚未根除；债权人更是怠于启动破产程序，争先申请保全和执行等程序。各方当事人应认识到：破产重整的目的不仅仅是清偿债务，更重要的是使企业获得重生，从而使相关各方分享重整价值。

《企业破产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破产重整的企业进行审查，认为符合规定的，裁定债务人重整。可见，人民法院对困境企业的审查是启动破产重整程序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法官有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知识储备。一方面，法院应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规定的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方面的标准，杜绝技术落后、能耗高、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僵尸企业，借破产重整名义，逃避应予淘汰的命运；另一方面，法院应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进行释法工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破产迹象、有重整可能的企业，即应鼓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在当事人申请破产重整过程中，给予立案指导。

（二）破解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与变更等现实困境

重整计划是重整程序的关键环节，是重整程序的核心和灵魂。重整计划包括制定、表决、批准和执行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决定着破产重整程序的成败。重整计划是以谋求企业复兴为主要目的，参与破产重整各方利害关系人通过清理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谈判、协商，最终达成合意后经法院批准方能生效，兼有公私融合性质[9]，决定了破产重整制度能否实现对困境企业的拯救功能。

1. 重整计划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是重整计划制定人的选择问题。计划制定

人决定重整计划草案的内容，至关重要。根据《企业破产法》第80条规定，重整计划制定人由自行管理的债务人或管理人担任。实行谁管理谁制作的原则。二者各有优劣：债务人作为重整计划制定人，比较熟悉自身财务及经营状况，有相对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同时会倾向维护债务人自身利益或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损害债权人利益；管理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在制作过程中与各方利害关系人展开讨论，但制作的重整计划因未侧重保护债务人利益，在执行阶段，可能遭遇债务人执行不能的后果。二是法院在正常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审查。而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又面临“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①]，游走在“不敢适用”及“滥用”两个极端，尤其在适用要件存在不确定性时，无疑加重了法院的责任，降低了强制批准的制度功效。三是缺乏有关重整计划变更方面的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93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倾注大量资源和智慧制作的重整计划，最终因执行不能或不执行而被终止，对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2. 找准定位，为重整保驾护航

找准法院在重整计划中角色定位，审慎合理适用法院强制批准权，保障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提高重整的成功率。

首先，在重整计划的制作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加强与管理人或债务人的沟通，引导其分析债务人陷于困境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例如：完善困境企业差异化处置机制，创新债权债务、职工安置等配套政策；对传统产业中技术落后、能耗高及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项目，予以淘汰，科学调整产业布局，完成环保搬迁和梯度转移；鼓励和支持优质企业实施收购重组，以产权转让、资产置换等多种方式盘活有效资产；依法落实企业重组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研究去产能和产业升级企业停产期间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加快引用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培育形成新动能基础力量。将“债转股”纳入破产重整计划，但应尊重债权人自治意愿，不宜强力实施。因重整的重点是企业的营运价值，人民法院在审查重整计划时，除合法性审查外，还应审查其中的经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重点审查关于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能力的经营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表决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克服由债务人或管理人作为重整计划制定人的不足，确保重整的成功。

其次，法院应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至少有一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为保证少数者的权益，“各表决组中反对者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满足上述条件，法院才能行使强制批准权。

再次，借鉴域外立法成果，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生执行不能的情形，审查执行不能的原因，对重整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变更。法官应灵活适用《企业破产法》第93条，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以期真正实现重整制度的挽救价值。一方面，重整计划的变更程序适用于因客观原因无法执行，并设立了变更的次数和最后裁定批准的期限，防止滥用变更程序，体现效率和公平价值，维护重整计划的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变更程序的启动基于管理人或本身也是执行人的债务人的申请，债权人和法院均有权决定重整计划变更程序是否启动。重整计划的变更是基于各方利害关系方合意的结果，并介入司法强制力，充分尊重了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保障了变更后重整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最后，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建立“府院联动机制”，解决政府在破产案件中整体缺位、个案越位的情况，帮助管理人或债务人解决重整计划制定过程中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为法院高质量、高效率地审理破产重整案件，提供了保障和依据。温州中院审理的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案中，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在重整计划通过后，法院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

（三）探索提升破产重整效率的有效路径——预重整

破产重整作为破产法三大独立程序之一，对于推进破产法实施，释放旧动能、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意义重大，不言而喻。然而，学术界存在一些对破产重整制度的质疑，实践中，破产重整程序的推行也存在困难，质疑声和困

① “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是1950年由Merrill Flood和Melvin Drisher提出的，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代表性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难主要来自重整程序启动难、时间长、投入多、成本高及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债务人过度保护等方面[10]。为克服上述不足，提高重整效率，英美国家的破产重整制度将传统破产重整制度与庭外重组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破产重整制度，一般被称为“预重整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预重整的明确规定，但理论和实务界对预重整制度均有讨论。通常认为，预重整制度是将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相结合。庭外重组开始于重整程序开始前，排除公权力干涉，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拟定出重组方案，充分体现各方当事人的意愿，避免利益失衡，作为重整计划草案的依据，极大增加了重整计划执行的可能性。在重整程序开始后，重整人将重整计划草案直接提交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实行案件繁简分流，提高重整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对成功挽救困境企业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预重整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会议纪要》仅对此作了制度性说明，没有规定具体措施，在施行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有待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进一步研究探索。

**结语**

当前，基于发展程度、地方政策、企业观念等不同，人民法院审理破产类案件情况呈现不平衡态势。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破产类案件相对较多。加大破产法的实施力度，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审判功能，完善破产审判机制，建立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尝试将部分事实清楚、“无产可破”的案件纳入快速审理范围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破产清算制度和重整制度，是顺应经济发展态势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 王欣新.破产法文库.总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2] 邹海林.破产法–程序理念与制度结构解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 曹守晔.破产法的生命在于实施[N].北京:法制日报,2006–09–05.

[4] 徐阳光.认真对待破产法:破产法的学科地位反思[J].月旦财经法杂志,2016.

[5] 徐阳光.认真对待破产法:企业破产法（试行）的立法争论与启示[J].月旦财经法杂志,2016.

[6] 王新欣.破产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 王卫国.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01）.

[8] 贺小荣,王富博,杜军.破产管理人与重整制度的探索与完善[J].人民司法.应用,2018,（13）.

[9] 丁燕.破产重整计划法律问题研究:理念、规则与实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0] 胡利玲.破产重整制度之审思[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04）.



**责任编辑：侯德彤**


#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w of Bankruptcy in the Era of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DING Yan　BAI Wen-li

( 1.School of Law, Qingdao University  2. The People's Court of Laixi,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of resolving overcapacity,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To meet the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maintains that market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reduce outdated capacity so as to promote structural reform. Bankruptcy serves as an important legal way to solve deep-seated problems, optimiz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Guid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Bankruptcy, the shift in driving forces for development can be continuously achieved with resort to bankruptcy liquidation in resolving outdated capacity and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in cultiv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Key words:** replace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bankruptcy liquidation;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①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保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意见，2018 年 6 月 6 日。

# 论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的注意义务

韦 稼 霖

（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 100088）

**摘 要：**电商领域专利保护问题涉及专利权人及网络技术提供者的利益平衡。讨论电商平台的专利间接侵权责任，必须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目前我国现有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存在对过失过错形态的忽视，以及对平台商的利益的过分关注。注意义务是承担过失责任的基础，目前而言，确认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既有现实需求，也面临诸多困境。当前阶段，有必要逐渐完善电商平台的治理体系，并随着实践的积累对电商平台注意义务予以逐渐丰富和细化。

**关键词：**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过失；注意义务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29-06

当今中国，处在一个网络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齐头并进的时代。中国开启了建设网络强国的征程，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在新时代也被党中央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①]。然而，如同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大变革一样，信息时代技术进步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样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过度的保护知识产权，为网络技术发展设规立槛则压制网络技术蓬勃发展的激情，造成信息时代前进动能的缺失。而过度的注重技术发展、信息共享，为网络自由空间摇旗呐喊则容易带来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加剧而压制创新的困境。

具体到当今在我国如烈火烹油般迅速兴起的电子商务领域[②]，专利侵权就在电商平台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面临日益泛滥的隐忧。电子商务带来了网络交易的超大规模、超广受众、超快速度，打造了全新的市场生态，深刻影响着传统生产、销售、消费模式以及传统产权的保护模式，对专利的销售、许诺销售等多项权能打开了新的实施天地。这不仅仅意味着专利保护战场的转移而带来了对专利保护手段的挑战。同时规模大、受众广、速度快还带来侵权数量的激增，[③]这对构建更为高效、合理的保护措施提出了更为现实的需求。

在大量的涉及电商平台的专利侵权案件中，电商平台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它往往不是侵权行为的直接发起者，仅仅为侵权商户提供了交易平台，但它又发挥着促进交易，推动信息传播的重要作用。这种相对“超然”的枢纽作用，使得电商平台在专利侵权中应当扮演如何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存在诸多争论。为平衡创新利益及网络技术发展利益，现有立法主要以“知道”作为网络服务商过错的认定标准，同时借鉴于版权网络侵权领域的“通知—删除”规则日益凸显出其重

**收稿日期：**2018-06-02

**作者简介：**韦稼霖（1990-），男，山东巨野人，就职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战略协调处。

①4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刻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在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方面的重大意义。

②《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22.97万亿元，同比增长25.5%，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2240万人。

③例如，2017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专利执法办案量由2016年的13123件激增至19835件，同比增长51.1%。但是我们隐约可以感到，这或许不过是电商领域庞大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的冰山一角。

要的作用，但是理论及实务层面对以上规范的过度迷恋也使得专利领域的追究平台商侵权责任的努力日益走向僵化。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现有规则进行重新审视，系统的理解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①

## 一、无过错、无责任

对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的具体分析离不开体系化的视角。法律体系的枝叶和树干需要兼顾和协调，完善的法律制度如同精密的大型机器，其内部的制度细节则如一个个精密的零部件，需要彼此配合才能保证机器良性运转。在制度细节嵌入制度整体的过程中，不能出现系统性的矛盾和制度的分裂。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早为学界所普遍接受，知识产权虽有别于动产、不动产、债权等传统民事财产权，但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对各项私权的适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吴汉东教授曾说过："离开了民事权利体系，知识产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找到其应有的法律归属"[1](P2)。因此，探讨知识产权，需要放到统一的私权体系之下。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事侵权行为一般性的归责原则，长久以来处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归责的核心地位。它意味着行为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引起损害赔偿责任。耶林曾经指出：使人负损害赔偿的，不是因为有损害，而是因为有过失，其道理如同化学上之原则，使蜡烛燃烧的，不是光，而是氧，一般的浅显明白[2](P144)。"过错与责任有密切关联，这是由现代民法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即过错责任原则决定的"[3](P107、207)。过错责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公民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活动自由，尤其是经济活动自由。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平衡权利人与公众利益的制度，过错责任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即侵权责任可以因为没有过错而得到避免，通过合理注意义务的履行获得了广阔的自由空间。无过错责任，乃至公平责任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原则的例外，本质上是结果归责，侵权者无法通过预防措施的采取而避免侵权责任，将严格限制行为人的经济活动自由，必须谨慎设计，并由法律所明文规定。调动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网络服务商积极履行预防义务以遏制专利侵权，同时又不窒息网络经济活动空间、限制网络投资热情是过错原则的重要价值。

民事侵权的过错形态在传统意义上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对于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而言，对于故意的理解争议不大。相比而言，过失能否作为电商平台间接侵权的过错形态，学界认识并不统一。有不少学者认为，鉴于我国网络知识产权间接侵权采用"知道"规则，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是一种故意责任，而不包括过失责任[4]。此种考量一方面是对现有法律规范的现实分析，另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规则体系解释的举重以明轻，与直接侵权行为作出区分，为网络服务设置宽松的发展环境。当然，也有诸多观点则认为故意和过失均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网络间接侵权的主观要件。本文同意后者，认为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的过错形态应当包括过失，其依据不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解释，而是来源于对于制度价值的分析。第一，传统民法理论上，教唆类间接侵权的过错形态体现为故意。而对于帮助类间接侵权而言，故意和过失均为帮助侵权的过错形态，对于网络帮助侵权行为的理解也不能偏离一般法。第二，强调过失责任是发挥过错归责制度价值的重要方面，设立合理的过失责任及引起过失责任的合理注意义务，能够防止电商平台等网络服务商完全漠视专利侵权，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网络技术和创新权利的协调发展。第三，注意义务是承担过失责任的基础，而注意义务本身是类型化的，考虑到侵权人的控制能力、被侵权人的行为能力、侵权行为的危害程度、注意义务履行的成本、注意义务履行的难度等方面，注意义务设置有着较大的区分。同时，注意义务的设置不是一成不变的，亦可以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完善改变。因此，只要过失责任的规则设置合理，电商平台并不会处于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在更好保障专利权人利益的同时，并不会遏制网络技术的进步及网络产业的发展。

## 二、现有规范对过错认定的不足

对于网络环境下电商平台责任的主要立法依据来源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②，本条不仅仅是对网络环境下侵权的原则性规定，也是目前电商

①本文仅论述间接侵权问题，不考虑直接侵权问题，譬如自营，销售分成等新的营业模式可能构成直接侵权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畴。

②该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专利侵权领域的核心法律依据。由于目前并没有一部专门的司法解释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进行具体适用的解释，如何把握该法条对网络服务商过错的认定产生了不少争议。依据本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在“知道”侵权行为发生后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责任。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引进的发端于网络版权侵权领域的避风港原则适用的扩大化。可见《侵权行为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为“知道”这样一种主观状态及未采取必要措施这样一种客观行为。

目前可以参考用于确定电商平台的主观过错认定的还有两部尚在制定中的法律。其一是《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①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规则，对《侵权责任法》36条进行了细化。关于如何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知道”进行了扩大解释，理解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二是对必要措施进行了具体化，并做了兜底规定。第二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对电子商务平台商的责任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②。可以发现该草案关于过错的认定依然是以被通知及是否知道侵权行为的实际发生为依据。

通过以上规范的观察，可以发现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商过错时有两个词十分重要，即“通知”和“知道”。关于通知，实际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被通知”，是十分具体化的被动行为，往往对应着故意（明知而追求或放任侵权）的过错形态。而关于侵权行为法的“知道”，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知道仅包括明知，不包括应知③，二是认为知道包括明知和应知[5]（例如著作权领域的现行规定④）。而对于第二类的“应知”，同样存在两种解释，一为指推定的知道（constructive knowledge），区别于客观上的实际知道。它在证据法上表现为：不能确定无疑证明但可以依据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证据来认定当事人很可能知道有关事实。二为应当知道而不知道，即过失—因违反注意义务而不知道[6]。在前述三种理解中，第一种“明知”对应故意，第二种“应知”—“推定知道”对应的也为故意，第三种“应知”—“违反注意义务而不知”对应的是过失。当然，要突破字面理解将侵权行为法规定的“知道”引申理解为“实际不知道”显然需要十分复杂的解释技术。从现有规定的角度来看，在《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尚未能施行时，仍然无法回避在现有制度下第三种解释的弱势地位，导致原则上应认为“知道”不包含过失的过错形态。

论述及此，可以发现现有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的两点不足。

一是由规则的具体化引发对过失过错形态的忽视。在法律体系的框架下，规则的发展不能侵蚀原则的适用，工具理性不应当压制价值理性，而应当以价值理性滋养工具理性，同时透过工具理性反思价值理性。如今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过错的认定上仍在探索之中。借鉴于版权领域的“避风港”原则及“红旗标准”在专利制度中也得到了逐渐的借鉴发展，但是规则本身的发展导致隐匿在其后的过错责任被具体化，明确化，复杂化，乃至被限缩和异化。实际上，在如今研究相较专利网络侵权领域更为成熟的版权网络侵权领域，已有学者提出了坚持“得意忘形的服

①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侵犯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未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侵权产品链接等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的，应当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其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的，可以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前款所述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合格有效的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专利行政部门认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的，应当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本条第一款所述必要措施予以制止，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②例如，第54条规定：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接到知识产权权利人发出的平台内经营者实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通知的，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知识产权权利人因通知错误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平台内经营者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向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提交声明保证不存在侵权行为的，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将该经营者的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告知该权利人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应当及时公示收到的通知、声明及处理结果。

③持以上观点的例如：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张新宝、任鸿雁：《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解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4期；杨明：《〈侵权责任法〉第36条释义及其展开》，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李雨峰：《迷失的路———论搜索引擎服务商在商标法上的注意义务》，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8期；袁雪石、陈怡：《〈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2期。

④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船舶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等必要措施，或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应认定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务器标准”而产生的“向原则条款的逃逸”[7]，正是规则发展与原则本身冲突的表现。如前所述，对于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而言，过错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从对现有规范的反思中，可以发现无论是“知道”规则，还是“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乃至进一步发展的“通知—转通知－必要措施”规则，都表现为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因他人的主动作为得知侵权行为发生后因而需要被动采取措施的义务模式，没有明显预留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作为的空间。过度体现出故意的过错形态，而忽视了对过失这一过错形态的关注，从而导致了目前在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领域不够完整的过错认定体系。

二是过分保护平台商的利益而在过错认定的规范构建方面踌躇不前。任何类型化的注意义务都需要结合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在事物的初级发展阶段，法律的观望和滞后是必然存在的。将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作为新事物保护在襁褓之中，设定相对保守且明确的规则具有阶段性价值，一方面如慈父般关照到了电商平台的利益，保障了网络产业本身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又为司法审判提供略带束缚性的规范指引，保障了司法判决的确定性要求。然而，在当今电子商务发展逐渐成熟，产业模式逐渐清晰的趋势下，停止观望，开启对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探究已十分必要。“未被通知”、“不知道”不能永远成为电商平台的挡箭牌，否则电商平台能够在茫茫专利侵权大潮来临时也不愿苏醒且不需苏醒，彼时电商平台的“避风港”同样也会成为专利侵权的“避风港”。参考版权领域，传统无论是“避风港”还是“红旗标准”，采用的都是对过错的限缩理解，即知道或必然知道的故意。如今传播技术及审查技术都在进步，对不合理降低网络服务提供商注意义务的现有规则的反思逐渐觉醒[8]，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主动审查义务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其背后的逻辑即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理应存在的注意义务及与此相关可追责的过失。在实务层面，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对于版权内容过滤措施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接纳态度，国家版权局 2015 年在关于网盘服务的通知中指出，“网盘服务商应当建立必要管理机制，运用有效技术措施，主动屏蔽、移除侵权作品，防止用户违法上传、存储并分享他人作品。”①2016 年在关于网络文学的通知中再次重申了类似要求②。对于相同制度体系下的专利网络间接侵权，如何理解电商平台的注意义务也需要学术研究及制度构建越来越多的关注。

## 三、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现实需求及困境

要求电商平台承担专利间接侵权责任具有现实需求。一是基于网络时代显而易见的经济考量。间接侵权必然要求直接侵权的存在。为何绕过直接侵权者而大量关注间接侵权者的责任，这是缘于网络时代的特殊需求。在电商平台领域，商品的出售体现出范围广泛、主体众多的特征，一项侵权商品的出售也同样如此，成百上千的商家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上出售同一件、乃至数件侵犯专利权的商品也并不罕见。无论是从管辖角度考虑，还是从主体数量角度考虑，针对个体商家采取行动均是既费时费力又代价高昂的事件，如斗量海水、蚍蜉撼树。从专利权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电商平台是网络的守门人，对于侵权行为的存在，他们不能够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电商平台是危险性的放大器，网络侵权在此呈现出“一帮多”的特性，因此使居于中间位置的平台商的作用突出化，成为解决问题的轴心。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如果让看门人承担责任是防止侵权最经济有效的措施，那么让其承担责任就是可取的[9]。

二是考虑风险的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的负担必须考虑对何种主体施加义务可以更好地达成义务的施加目的。从停止侵权和控制侵权行为进一步蔓延的角度来看，电商平台具有任何直接侵权人不具有的掌控能力。发生侵权损害事实时，平台经营者能够采取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每天与危险相伴的人，越容易控制风险。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消费者、经营者、权利人对于交易内容、过程的理解呈现出片面化、碎片化、感性化的特点，对于各项数据、信息并不是十分了解。而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经营者对于交易过程更了解，掌握最便捷、最多样化的手段控制交易流程及经营主体，更易于控制整个局面，对于规避、消除风险具有较强的能力。

三是防止因获利行为导致的对侵权的放任。选择了利用某事物后，除了享受该事物带来的利益以外，还应承担事物带来的损害，而不能只享受事物的利益，而将事物可能造成的损害抛给他人，这样做是明显违反公平的价值追求的[10]。但如

①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2015）第 2 条。

②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2016）第 10 条。

果能够从侵权行为中获利，那么指望责任人—电商平台的道德觉醒，从而主动遏制侵权行为只是唤醒企业责任徒然的主观愿望，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能性。电商平台经济的核心在于交易机会的增加以及交易额的增长。在这个意义上，电商平台不会有意愿对交易行为做法律判断和价值判断，而仅仅会做经济判断，任何交易行为的达成对于电商平台而言都是正向收益。在特殊的交易形态中，譬如商家获得优先筛选或主页推荐，商家获得电商平台信用或资质背书，广告商投放大量资金而获得广告增值，电商平台的收益会更高。当然，当侵权假冒商品泛滥而严重危机企业形象时，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作姿态性的妥协和暂时性的控制是有可能的。但是，基于电商平台内在的经济逻辑，以及主动承担注意义务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其对于专利侵权行为的心态显然是放任甚至是追求的。因此，如果没有法律上对注意义务的确认，电商平台必然是以被动的姿态等待权利人的侵权“通知”，不会放弃现有法律规定的消极立场。

但是，对电商平台施加较大强度的注意义务，会因为电商平台审查能力的欠缺和注意成本的高昂而具有来自现实可行性的挑战。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要求电商平台主动出击进行全面的侵权审查，除非仅针对假冒专利行为，实为不可取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电商平台一般情况下并不知道哪些商家的行为会对哪些专利权构成现实威胁。即便侵权商品已经出售，交易已经达成，电商平台也无从知晓这项交易是否侵权。如果要求对每一项商品进行审查，实际上耗时、费力，电商平台的成本将会无节制的增加，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经济上也不具有丝毫可行性。这也是目前法律要求分散的专利权人自己负担监督成本，而电商平台仅接受通知而采取删除等措施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现有专利侵权审查的难度决定了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单靠电商平台无法实现有效的侵权判定。专利侵权判定有赖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完善的数据信息、有效的检索工具，即便如此，在时间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也难以摆脱较高的错误率的存在。

以上所述两个方面，是决定了对电商平台施加注意义务所的必须有所考虑的现实制约条件。注意义务应当不是泛泛的、全面的，而是在经济效率的限制下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的。注意义务的承担也不能是片面的，需要权利人的配合，乃至社会力量的介入。此外，注意义务的高昂成本是必须进行考虑的，合理的成本分配制度有待建立和逐步完善。没有这些系统的考虑，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履行便无法跨越其现实困境。

**四、谁来捍卫创新—注意义务的具体化**

抽象的注意义务仅具有指导意义，无法完成特定时期具体的法律适用。贯彻过错责任原则需要找寻到一个临界点，即一个判断行为人履行了何等的合理注意义务，因此无需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临界点。由于社会结构，经济要素的演变，这个临界点必然是随时代的变化的不断调整的。从长远来看，它呈现出永恒的变化特征，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为，注意义务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追究电商平台的专利侵权义务，则注意义务的范围可能得到扩展，过失认定的可能性得到增加。如果法院认为过于严格，则可以大幅限缩注意义务，认定“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从而认定无过错。如今，电商平台技术发展迅速，迭代快捷，在专利侵权纠纷出现之前，很可能没有明确的行为标准，只能根据正常和理性人的标准来判断，在个案中探索。这种自由裁量空间和现实探索直接导致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增加，从而对行为自由产生限制。因此，在电商平台这一新生领域，必然内生的存在对稳定性的需求，而稳定性直接导致的要求是具体化和类型化。现有规则对注意义务漠视因而产生的侵权泛滥风险，和注意义务具体化的困难，这是遏制电商平台专利侵权的两难困境。

从现有条件下，在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以外，可以考虑从以下角度入手，逐步发展电商平台的治理体系，随着实践的积累逐渐丰富和细化电商平台注意义务。一是完善准入机制及退出机制。进行合理的身份审查，完善身份认证体系，逐步构建起商家的诚信记录。针对长期侵权、反复侵权的，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不定期抽查制度、优先受理通知等制度予以遏制。此外，通过完善服务协议及经营规则，加强平台商之间的联动，限制侵权商家的市场准入，可以加大震慑力度。二是逐步建立起有区别的审查责任。对于置顶商品、促销商品、广告商品等需要有区别于一般商品的审查责任。通过主动审查确立其无明显侵权危险或要求商家提供有关合法证明。此外对于社会上已引起较多关注的足以引发合理怀疑的商品也要主动进行审查。三是建立与社会、政府的联动机制。引入专业力量提升审查能力，加强与行政执法的

有机协调。同时要加强电商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合作，逐步完善审查及过滤成本的分担机制，防止电商平台承担难以忍受的经济成本。

专利权法涉及创新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它要求在权利人和社会之间合理地分配侵权预防的成本。重大的技术进步往往会改变现有法律规则对成本分配的平衡，这在著作权法领域也得到了印证。在电商平台专利间接侵权这一领域，注意义务所引发的主动作为义务不会完全封闭，但除却身份审查、恶意侵权记录等技术上具有时代可能性的义务外，又无法在现时代更多的具体凸显其血肉，它所留下的空白，有赖于技术性进步带来的成本及效率的均势转变而进一步得到填补。


**参考文献：**

[1] 吴汉东.知识产权多维度学理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 曹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主要对象[J].知识产权,2012,（11）.

[5] 陈锦川.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的研究[J]. 知识产权, 2011,（02）.

[6] 冯树杰.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J].中国法学,2016,（04）.

[7] 崔国斌.得意忘形的服务器标准,知识产权[J].2016,（08）.

[8] 崔国斌.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J].法学研究[J].2013,（04）.

[9] 万柯.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J].环球法律评论 2011,（01）.

[10] 姜昕.网络服务提供者间 接侵权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D].2016年6月.



**责任编辑：侯德彤**


# Duty of Care for Indirect Patent Infringement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WEI Jia-lin

(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



**Abstract:** The issue of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involves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rights holder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providers. To discuss the patent indirec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norms of our country have neglected the fault of the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 and have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latform providers. The duty of care is the basis of fault liability. At present, confirming the duty of care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conforms to the practical needs but faces many predicaments.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s the accumulating of the practice experiences, the duty of care for the e-commerce platform is going to be enriched and refined gradually.



**Key words:** e-commerce platform; indirect patent infringement; negligence; duty of care

# 嫡长之制与我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汪 荣[1] 徐燕斌[2]

（1.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2.武汉理工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从制度之礼的层面来探讨礼与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主要从名分制度与嫡长制度两个方面着手。从名分制度来说，它强调礼制秩序中的每个人各负其责，各安其分，时刻意识到个人永远是生活在制度、社会中的人，使个体对于整体礼制秩序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惯性依赖，这为整个王权秩序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名分制度还渗入到民众的生活层面，成为“日用之常”，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从而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奠定统治的合法性的心理基础。从嫡长制度来说，其要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来对继位之君的合法性提供了程序规范，以血缘的先天决定性来确保最高权力能在一个家族内和平传承。在一个王朝的守成时期，最能证明嗣位之君合法性的是他们独一无二、卓而不群的家族血脉和谱系。在儒家观念中，嫡为贵，长为尊，嫡长子被认为血统最为纯正，地位最高，身份最尊，因此，嫡长继承制度是从程序规范的层面来构建王权的合法性。

**关键词：**我国；嫡长之制；古代王权；合法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35-08

## 一

众所周知，宗教之礼为人间合法性解决了终极基础问题，提供的是政治合法性的终极价值依据，所以君主行祭天之礼，表现“天之历数在尔躬”。[1]（P35）然而，实际情况是，除了开国君主之外，后世君主权力的取得乃是间接而来，其直接来源在于父祖。清儒庄存与在《春秋正辞》第一卷中谓：“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继体者，继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故王者奉祖法以守天下。”因此嗣王继先祖之正体，非受之天而是受之祖。和平时期的君主在论证其合法性时尽管也会以德性或者功业为根据，但究其根本却是诉诸他们独一无二、卓而不群的家族血脉和谱系。《公羊传·庄公四年》说：“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何以为一体？国君以国为体，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可见，在《公羊传》作者看来，国君为一体，“先君”与“今君”一体，所以，嗣王之君所以能继承天命，是因为他们与受命祖为一体（而且是正体）。无可否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传承的根据在于家族谱系，在于‘种’”[2]。继位之君所以能取得君位，是建立在家族的纵的血缘联系上的，故最能证明其合法性的就是自身与先祖的血缘一脉相连，然后才有资格从前代君王手中直接接掌过权力，进行政治统治。所以传统的合法性要求继承上血统上的正当性（就同一朝代内部传承而言）；何以传统中国必须严格遵祖先家法，都可从此一角度得到部分新的解释。因为帝王不仅是作为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作为家族中的一员，这是宗法血缘关系在政治中的具体反映，同时也势必对最高权力的行使造成重大的影响。一般而论，君主要想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必须始终对赋予其继承资格的祖先心存敬畏，谨守祖宗成法。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君－祖一体，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亲属结构形态外，在中国古代，它还

**收稿日期：**2018-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2017ZDA180）

**作者简介：**汪荣（1975-），男，重庆市人，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徐燕斌（1978-），男，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被赋予了伦理规范的意义，包含有德的价值在内。所谓“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这就为王位世袭找到了依据：嗣君不必德高望重，他有权享有祖宗的德荫。继位之君不必是圣哲，不必有大德，即使其德行不如其父其臣，仍可合法占有天下，因为只要其子“守父之德”，继父之志即可以合法占有权力，“继统”成为天子。[3](P361、388)而且功德越大，传世越久远。因此，这种基于血缘传承而具有的合法性，是以“父德子承”为合法性的释义基础的。父祖功德盖世，创业垂统，可以将基业传之子孙。王位的继承意味着天命的传承，这叫做德及子孙，这也是以“大德者必受命”作为合法性依据的。这样，血缘关系的权力传递链，就在守德继位的理由下，得到合法的承认，血缘关系与社会权力传递，得到了文化与伦理的认可，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最有力量的、最普遍的支配基础。[4](P194)因此，祖德遂成为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必须遵循的典范，嗣王继体若要求保天命，就必须要保祖德于不衰。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对于天的崇拜与对于祖的崇拜也是相互贯通的。早在殷商时期，商王已经将自己的先祖当作是上帝（天）的嫡系子孙。[5](P80-81)所以《诗·商颂·长发》中歌颂的“有戎方降，帝立子生商”，这种观念也为后世帝王所继承，因此，后世对祖先的祭礼往往要配飨天帝。由于先秦儒家君主论的天命性依托直接上承于父系氏族社会而来的宗法制，因此，对天帝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便最终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合而为一。[6]我们试看孔子对此的看法：

>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
>
>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可见，在孔子的思想脉络中，“本于天”与“本乎祖”在逻辑上具有一贯性，人“报本”以“配上帝”，所以敬天必奉祖，二者不可或缺。正因为祖与君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公羊传》桓公元年何休注以为新君即立，必须“先谒宗庙，明继祖；还之朝，正君臣之位也”。故谒宗庙是确立继体君最重要的程序，新君即位，必须先谒宗庙，确立其与先祖的传承关系，表明其继先祖之正体，才能以继体君的身份在朝中正君臣之位。因而，联结君与先祖的宗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有着异常重要的政治功能。

本来宗庙是古代亲缘由空间活动以凝聚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空间”。但当某一家族成为“支配者”，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则此以具有私人血缘性的空间，却在成员身份的渗透下，有了政治的意识。[7](P85)《白虎通·宗庙》云：

> 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祭宗庙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弥远。谓之禘祫何？……以其能世世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由亲及远，不忘先祖也。

这种见解便很能说明宗庙最初原是属于联结家族的内部血缘关系认同的一种纽带，是古代亲缘团体在空间上借以联系、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最主要中介。后来因为家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者，因而原本属于私人祭祀的家族内部以承父子继承为内容的宗祧继承，成为一种国家制度。从而受祭者的身份，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成员而已，他们同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权拥有者。从血缘上他们是父子、祖孙；从政治上，他们是历代先王或先君。事实上，也由于这种角色及关系的重叠，以此，在宗庙中所进行的活动，常常不能只是统治家族内部的私事，公与私的界限在这空间中被模糊了。从帝王家族来看，可以将帝王即位视为大宗的宗祧继承，但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却是一种最高权力的转移与过渡，帝王要想自身的合法性得到认可，必须同时通过宗庙之礼与祭天之礼来对这两种身份的资格进行确认，体现了君统与宗统的统一。①

①当然，这里宗统与君统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西周时期，二者混而为一，但因强调了宗统会削弱君统的绝对权威，因此，秦汉以后，逐渐君统取得了优势地位，帝王作为宗子的身份逐渐从属于其作为天子的身份。如《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但宗统与君统仍是分中有合，互相依存。参见季乃礼：《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宗统”与“君统”的分与合》，《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72-78页；龚建平：《宗统与君统之间——试论传统社会中个体人格的成长空间》，《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第70-76页；钱玄：《三礼通论》，第438-440页。

## 二

现在我们试就在宗庙举行的具体活动中来考察这其中所体现的君—祖关系。如上文所论，宗庙是存在于祖先与后代子孙之间的一种纽带，在宗庙的中介作用下，在一个亲缘团体内，古今、生死乃至时空的阻隔，都可消弭于无形。因此，已经过世的祖先，仍继续在子孙的生活中发挥影响，甚至其地位还超过在世的子孙。也因此，人是子孙的许多重要事情必须在宗庙举行，或者须先奉告祖先。[1](P139)宗庙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事务，当属即位、告朔、册命几项。就即位礼一般而言：不管是天子或诸侯，其即位之礼大抵于宗庙举行。如前引《公羊传·桓公元年》何休《解诂》认为：诸侯即位当“先谒宗庙，明继祖也；还之朝，正君臣之位也。”汉代以后，这一礼仪大体得到承袭。其次，告朔视朝必于宗庙。告朔乃指王者班朔之后，诸侯于每月朔日，以牲羊告于庙，谓之告朔。告朔之后，复有听朔。指天子与名堂、诸侯于太庙中听治一月之正事。对于听朔的地点，与告朔略有不同。《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诸侯……皮弁以听朔于大庙。”这种国家大事的规划，在宗庙中进行，实代表了古代血缘关系在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性。[7](P87)因为王者统治合法性在于血缘关系的连续性，其地位来源于祖先的功德，所以每有大事，听朔于太庙，使统治的合法性受到先王先祖的认可，并有祈祷祖先灵魂庇佑之含义在内。所以孔颖达说“天子听朔于明堂，明受之天与祖也；诸侯听朔于大庙，明受之王与祖也。”这里天子与诸侯听朔地点的不同，也表明了天子与诸侯在合法性来源的细微差别：天子的合法性源于天与祖，祖是直接根源，天则是终极根源，故孔氏言“明受之天与祖”即是；而诸侯的合法性源于其与天子的关联性及与其祖先的血缘纯正性，故诸侯听朔于大庙，‘明受之王与祖也。”

再者，古代“册命”之礼，也多于宗庙举行。《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

> 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人拜。

上文杜预注“大室，祖庙。”可见古时册命之礼，也多于宗庙之内举行。因为册命储君，关乎统治者全宗族之事，而不是任何一代国君个人私事，国君就是宗庙主，所以必须在宗庙进行。

以上即位、告朔、册命之礼，都属于统治者合法性的程序要件，其所要确立的，主要是嗣位之君与先王的传承关系，所谓“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这种昭穆之序，是王位传袭的基础。如前所述，当一个家族取得政治上的支配权时，宗庙的血缘活动，便成为一种国家的政治活动，因而，帝王的继位，首先在家族内部而言，必须通过宗庙之礼，来确认继位者与先王一脉血缘（父子一系）连续性，这是其最高统治权合法性的一个前提。于是“亲亲”的血缘关系，进入国家领域之中，使得“尊尊”的上下支配关系在血缘关系的连续中，塑模而成。“亲亲尊尊”在宗庙的空间意义上，确认了最高统治权合法性在纵的方面的延续性，由家族内部的亲亲，转化为社会阶层之上的尊尊，君与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传承的合法性链条。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在中国古代君权的传承中，与父祖的“血缘距离”是其基本立足点。由于“血缘距离”是一种天然秩序，与先王“血缘距离”的远近不是后天可以选择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排除了主观意愿的多样性。因此，国家最高权力传承的合法性，正奠基于这种“血缘距离”关系的先天决定性。中国古代汉语中，“嫡”意为“正”，指宗法制度下血统最近的家庭的正支。《增韵》解“嫡”曰：“正室曰嫡，正室所生之子曰嫡子。一曰嫡，敌也，言无与敌也。”这样，根据妻妾与男主人的关系，女人所生之子可划分为嫡子、庶子、嗣子、养子和奸子等等。虽然同为父之子，在古人心目中，其地位尊卑是不同的，“嫡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在儒家看来，由嫡妻所生长子即为嫡，嫡为贵，长为尊，嫡长子被认为血统最为纯正，地位最高，身份最尊，因此，在继承帝位的候选人当中，其理所当然位列第一位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最高权力获取方式上的程序合法性，实质是基于宗法精神支配下所体现的合法性，是一种“自然血缘的合法性”。

基于上述原因，嫡长制自周公制礼之后，被儒家公认是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程序要件，被奉为“不易之制”、“万世常法”。在王朝的守成时期，君主的权力直接源于父祖的传授，因而，君主的合法性体现在其与先祖血缘的纵向联系上。儒家观念中，嫡长子与先王血缘最为接近，地位最

尊，因而，理所当然的被视为承祖传国的合法继承人。

正因为嫡子制度是君主权力合法性的程序要件，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现实，必然导致国家对民间家族内部嫡庶之别的极度关注，甚至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家族内部的嫡庶废立进行严格规范，其典型的代表是在唐代。①如《唐律·户婚》中规定："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其《疏议》云："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谓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为户绝。"[8](P69)《唐令拾遗·封爵令》规定："案封爵令，公侯伯子男，身存之内，不为立嫡。亡之后，嫡袭爵，庶子听仕宿卫也。袭爵嫡子无子孙，而身亡者除国，更不及兄弟。"[9](P219)《大唐开元礼》卷第三"序例下·衣服"也载："凡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听假以四品冕服。"唐代的宗法传承之制，既见于刑律，又见于礼制，可见国家对于嫡庶之别的重视，这当然是出于对维护王朝秩序的长远考虑，因为以嫡庶为特征的宗法礼制是皇权存在的社会基础，若宗法制度被破坏，必然也会危及皇权自身。因此，唐代由宗法制度必然产生的传承制度当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10]这种嫡长之制是承宗袭爵的一般规定，对于违犯者要受到国家刑罚的制裁。《唐律疏议》卷二十五《诈伪律》云："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徒二年。非子孙而诈承袭者，从诈假官法。"《疏议》云："依《封爵令》，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以次承袭，具在令文。其有不合袭爵而诈承袭者，合徒二年。'非子孙'，谓子孙之外诈云是嫡而妄承袭者，'从诈假官法'，合流二千里。"王公侯伯子男子孙尚且如此规定，对于事关皇室与国家稳定的帝位继承，就更不能例外了。

按照嫡长继承制度，如果在位之君嫡庶子皆无，除了立弟之外，便只有立嗣的方法确定继承人。其基本要求是同宗中有最近血缘关系者。《唐律疏议·户婚》中有对此的一般性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又云："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此法虽不是专门皇位继承人的规定，但在皇家中依然适用，即选本族中昭穆相当者，虽然在唐代帝位传承中尚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在亲王爵位中却是有例可循。如《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高祖第三子李玄霸无子早逝，武德四年"封太宗子泰为宜都王以奉其祀"，"泰后徙封于越，又以宗室赠西平王琼之子保定为嗣"。这种方法确保帝王在没有直系亲属的情况之下国家最高统治权仍然有章可循，实现权力的顺利过渡。

## 三

嫡长子制度自被确立为中国皇位继承的合法传承制度以后，对于这种制度本身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应当说，仅就皇位嫡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嫡长制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片面强调继位者出身的血统的纯正性（嫡长身份），而不考虑其实际才能和品行操守。因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承方式，势必在嫡长制的产出与君主专制政体的需求之间造成严重的脱节。"[11]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是从君主统御国家而设的，君主在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处于中枢地位，他在国家治乱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一言以兴邦"，也自然可以"一言以丧邦"，这在客观上要求君主具有极高的行政管理与协调能力，这势必与作为古代君权的程序合法性要件的嫡长制之间严重抵牾，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君主拥有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大权，另一方面君主由于自身能力限制，无法有效的行使制度赋予的权力。因此，宦官、外戚专权现象成为中国皇权的一个尾大不掉的痼疾。如唐代武后、韦后主政之时，其对储君的废立易如反掌；唐代中后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连皇帝也处于宦官的威胁之下，如大太监李辅国就曾经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可以说，这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项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缺陷。

从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定息止

①《唐律疏议》卷四"注'谓以嫡为庶以庶为嫡违法养子'"条下有同样的说法。仁井田陞所辑录的《唐令拾遗·封爵令》"二乙"条中也有类似说法，参见［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

争，但从历史实际来看，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实际效能并没有那么灵验。春秋之世，改立太子、宗子和争立国君、卿大夫事端不断，“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可谓春秋二百余年间几无宁日。以后历朝的嫡长制度，却一样没有息事宁人。苏轼甚至认为世袭制会加剧对世袭爵位的争夺：三代“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害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曾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苏氏之论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因为嫡长子继承制度本身并不排除其他皇子的继承资格，只是其继承顺序的差别，因而并没有完全阻断其他皇子觊觎帝位的野心。另一方面，嫡长子制度的实行，在历史上也并不总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以周代为例，史家吕思勉对西周封建宗法制的“消亡之道”作了精辟的分析：

> 古代天子诸侯间之关系，实多宗族之关系。天子之抚诸侯，宗子之收恤其族人也。诸侯之尊天子，族人之祗事其宗子也。讲信修睦，同族之相亲也。兴灭继绝，同族不相翦也。……然则何以卒至于灭亡也？曰：行封建之制者虽强，有自亡之道焉。盖既知宗族，即有亲疏，此无可如何之事也。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至矣，无可复加矣。而立宗法者，必欲以百世不迁之大宗持结之，使虽远而不散。其所持结者，亦其名焉而已，其实则为路人矣，路人安能无相攻？……国与家，大利之所在也。以大利之所在，徒临之以宗子之空名，而望其不争，其不难哉？此诸侯卿大夫之间，所以日寻干戈也。[12]（P373-374）

西周的封建管理体制是金字塔型的，宗法制是其基本的管理制度，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宗族。一旦诸侯、各宗一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致使中央无法任贤使能，任命有利于维护周王室、有利于诸侯统治的人才，中央对地方诸侯就会缺乏控制力，诸侯对各大夫就会缺乏控制力，以至于王纲解纽，政令不一，各自为政，此官僚体制金字塔就会有倒塌之危险。[13]

嫡长子继承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还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中，并未设置任何对君主权力进行约束的强制性规范，儒家观念中的种种制君手段，都是一种说教式的软制约，它更多的是依靠君主自身的内在道德自省与自律。在君主制度之下，并不存在对君主权力的制度性制衡，这增加了嫡长子继承制施行的不确定性。因为君主的个人好恶而废嫡立庶的事情屡有发生，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带头废长立幼，以后章帝、和帝、安帝又皆如法炮制；唐代太宗先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又将大位私许魏王泰，终经长孙无忌等的力争而作罢。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自身能否遵守礼法，成为嫡长子继承制能否最终确立的关键。

既然嫡长制有上述诸多弊端，那为什么儒家观念一直将之视为“百世不易之正法”，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和平时期获得皇位的基本合法要件？显然儒家是有其深远考虑的。

首先，从政治形态上来说，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西周分封制度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内的急剧的变革和碰撞，虽然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它基本上属于“华夏各民族内部的同质文化的交流，并未遭到异质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与挑战，因而不会打断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过程，使得传统的东西更容易继承和保存。”[11] 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作为嫡长子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宗法制度并未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而土崩瓦解，除了秦帝国之外，宗法制度依然是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局面并未得到改观，其观念和基本原则深深渗透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政权寄托在具体个人或氏族部落上，依宗法世袭制维系政权于久远，遂使政权成为一静态的实有……具体个人虽可变灭，而有客观法度以延续之，则政权即可以成为不可变者。”[14]（P228）因此，这种思想背景决定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王朝要想自身的统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获得知识阶层和民众的认同，就必须尊重这种宗法秩序。同时，嫡长制对于帝王维系统治，实现其家天下于万世一统的目的也是最为有效的制度载体。

其次，嫡长制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皇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自古至今从来就没有一种制度能彻底消除权力斗争，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排他性的稀缺资源，只要权力存在，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明争暗斗就永远不会终止。但嫡长子继承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争夺皇位的冲突，起到稳定政治秩序的目的。这

是从嫡长子继承制度与其它继承方式的对比的意义上来判断的。古代中国的帝王由于妻妾众多，一般都会皇子众多。如何确立一个既可以安社稷，使得这种最高权力的传承限定在一个家族内部，又不会导致骨肉相残的继承制度，确是一个千古难题。在儒家观念中，本来还有一个“尚贤”的传统。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从理论上说，选臣僚尚且要求贤明，作为国之储君的人选，自不能例外。对于这种矛盾，儒家用三世学说来进行解答。在孔子看来，嫡子继承制属小康之制，即春秋制；选贤举能后大同之制，即太平制。嫡子继承制是家天下的产物，如果在大同之世还未到来时骤然实行太平制，虽可博得立贤之美名，但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因为在小康之世的政治生活中，君民很难有公天下的观念，政权必为一家一姓所把持私有。如果实行选贤举能之制，则极易被人利用成为篡权夺位的借口。[15](P164)因为贤与不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一个在制度上可以量化的标准；同时各皇子为了争取人心，往往会投其所好，做出温良恭俭、礼贤下士的姿态，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如果以这种模糊不定的方式作为最高统治权的传承依据，势必引起国家局势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在嫡子继承制中，政权转移所依据的血缘与年龄均出于自然，天生而成，任何人均无法图谋享有，自然也不能有非份觊觎之心。这种基于自然形成的继承标准一望即知，自嫡夫人至左媵侄娣的继承顺序也非常清楚，简单明了，形成制度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继承的资格限定在“嫡”、“长”这些天赋的无法变更的条件上，通过血缘上的先天因素来“绝庶孽之窥箭，塞祸乱之本源”，用制度建起人们的皇权正统的合法性观念，把一切觊觎皇位的战争或政变都置于人人得而诛之的非法境地。[16](P143)对此，王国维先生曾经作过精当的分析：“盖天丁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之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后取重，挚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这一分析可谓是一语中的，指出了中国历代在皇位继承制度上舍贤让嫡的问题实质。后来唐君毅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历代皇帝之世系相传，不以德而以血统者，则因血统纯由天定，而不由人定。则人于此得免于思虑之安排，亦所以绝纷争，而使社会易长治久安。在长治久安之中，有一由天然血统所定之万世一系之皇室，以为天下在时间空间上之一统之客观象征，人乃可更有一悠久无疆之太平之感。”[17]因此，立贤立能只是儒家一种政治理想，一旦进入现实操作层面进行权衡利弊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是在两难（贤与良）困境中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选择。

从血缘关系的距离来说，嫡长子继承制度也较之殷商时期的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更容易实现。如前所述，商代的王位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兄终弟及”，这种继承方式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大弊端，正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说，传弟既尽之后，则嗣立者应该为兄之子，还是弟之子？这种两难就为确立王位继承人带来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儒家的理想应该是帝王应该做出大公无私状，将皇位传于兄之子，但从人的血缘本性来说，“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之尊有不如父”，要求帝王将最高权力拱手让与非直系血亲的兄之子，这无疑需要君主有极高的道德自觉。而实际情况却是皇室内部在权力的本能渴望下而展开相互倾轧，导致国家的动荡。殷商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这正是说殷商由于继承人的不确定而导致了政局不稳；而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对于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不能不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正是为了矫正商朝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病，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秩序，西周的统治者才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11]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嫡长子制度设计是基于整个社会的理性合作与利益均衡而建立的相对合理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断皇子之间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实现皇权的稳定过渡。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嫡长子继承制度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本身亦包含在周礼的体系之中，众所周知，孔子对周代的文物制度非常景仰，曾称赞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这其中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周公所创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孔子之后的大儒孟子也是支持实行嫡长制度的。例如，孟子指责：“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他所开列的具体罪名之一，就是这些人违背了“立嫡立长”的君位继承原则。此后《公羊传》的君统传延论以注释经典的形式，肯定了立嫡不立贤的政治原则，成为后世讨论君位继承问题的理论根据。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者设计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初衷不过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平稳的过渡，实现统治者家天下的政治目的。但因其与儒家所倡导的周礼之间的这种从属关系，从而原本是一种皇家内部的权力传承模式的嫡长子制度似乎又寄托了儒家的理想，具有了文化上的某种神圣意义，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获得了合法性。①

## 四

此外，从中国人的经验、感情的角度来说，传统中国人特别重视以父子这种自然血缘为基础的伦理纽带。钱穆先生说：“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短生命融入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18](P51)这种纽带也被视为维系社会与国家和谐存在的关键，所谓“人道，亲亲也”。《礼记》做了一番理想化推理：“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法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由人伦领域内的“亲亲”之义而自然延伸到政治领域中的“尊尊”，这为嫡长继承制奠定了深厚的伦理基础，从而将整个古代社会纳入到一套有序的宗法原则之中。这是古代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在王位继承制度上的一种体现，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凝结，家国一体。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原则只是家族内部合法性原则的提炼、集中和浓缩而已。这样，就形成了下述认知逻辑：支配资源的先天性（嫡长子只有一个），决定了它的独占性；支配资源的不可选择性（谁能成为嫡长子不取决与人的意愿）。由于排除了人为的选择性，所以其事实结果就体现为公平性。因而，基于嫡长子的君位继承制度在中国古代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它是中国宗法政治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更容易获得传统的中国民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正如蒋庆先生所言：“小康之世人性欠完满的情况下则是不得已的事，因而也是必要的制度。”“如此精心的理性设计在今人看来亦叹为观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时礼制的最高水平”[15](P164)牟宗三也将周代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视为“华族文化一大发展”，标志着“法制的自觉”，[19](P230)都是从这一意义而言的。

在嫡长继承之外，也有人提出过辅以“立贤”，作为补充。至于在“立嫡”与“与贤”之间如何操作，关键是要视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定夺，按王夫之的说法就是：“立子以适（嫡—下同）长，此嗣有天下，太子诸王皆生长深宫，天显之序，不可以宠嬖乱也；初有天下，而创制自己，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作君师以佑下民，不可以守法之例例之矣。”[20](P935)就是说，王氏认为在王朝的守成时期实行嫡长制度，而在王朝初创或危难时期，却不妨可以“以贤以功，为天下而得人”。后一种权力传承方式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如唐代睿宗时期，太子李成器为嫡长子，按照礼法，本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平王李隆基有兴复李氏社稷之功，究竟将如何传位，睿宗犹豫不决。此时李成器上书云：“国家安则先嫡长，危则先有功”，最终隆基继有天下。当然这种方式并不常见，属于特殊时期的特例，是嫡长子继承的变通情况，非皇位传承的一般规则。以上述事例而言，若从合法性的视角而言，显然李成器更具备继承帝位的资格，李隆基继位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其掌控朝中大局，同时也是李成器成全之故。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王朝存续的大多数时期，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君主获得权力的正当程序或形式，而嫡长子身份被认为是取得皇位最具合法性的程序要件。

嫡长子继承制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具体运行方式更具有无比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因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赋予帝王个人极大的自主权，君主的个人才能直接事关国家的兴衰，但在中

①对于儒家关于传贤与传子的态度，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一方面，嫡长子制度本身符合儒家的宗法制原则；另一方面，儒家又有传贤的理想，如《韩诗外传》所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传贤，家以传子。”对于这种矛盾，儒家也并未给出恰当地解释，孟子的说法是“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也，必若桀纣者也。”回避了对这个问题进行价值判断，而以结果来论证其合理性，将嫡长子继承制度与天相联。在孟子看来，只要符合天意，传子也是合法的，只要继位之君不像桀纣那样残暴失德，天就不会剥夺他的统治权。张星久先生认为儒家对于嫡长子继承制合法性的默认是出于儒家对于“现实政治的包容性。”，参见张星久：《君权合法性研究》，第92-93页。

国古代合法性语境中，只是强调继位者的嫡长子身份，而放弃了对君主个人才能与品行的要求，这使得王朝的运势充满了变数：如果继位者既能合法地继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话，则会国泰民安；如果继位者虽具有合法统治者的身份，但昏庸无能，则会导致民生凋敝，国势衰微。而且，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外戚、宦官干政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政治中强调嫡长子身份的合法性要件有关——制度又赋予了皇帝强大的权力，必然会导致年幼或昏庸的皇帝大权旁落，成为专制主义的象征符号。纵观几千年来的最强大的王朝如汉唐之盛，也无法逃脱这一历史的宿命。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嫡长子继承制度是统治者在综合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抉择，也是在两难困境中的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同时，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儒家思想中也被视为是“万世常法”和“不易之制”，是在正常时代君主取得最高权力的程序合法性要求，它对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M].台北:三民书局,2006.

[2] 周濂.正当性与证成性: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J].2004年现象学与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届中国现象学年会会议论文集[C].

[3] 张分田.中国的帝王观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白华.儒家礼学价值观研究[D].郑州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5]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 欧阳祯人.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2,（5）.

[7] 林屏生.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缘问题与国家[D].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1995年博士论文.

[8]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9]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M].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

[10] 陈戍国.唐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 ——兼论李唐皇室氏族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1）.

[11] 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J],武汉大学学报,1998,（5）.

[12]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3] 蔡先金.从“宣王伐鲁”看嫡长子继承制[J],人文杂志,2002,（4）.

[14]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台北:学生书局,1980.

[15] 蒋庆.公羊学引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16] 李宝臣.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17]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台北:正中书局,1953.

[1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台北:学生书局,1980.

[20] 王夫之.读通鉴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侯德彤**


# Th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of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System and the Royalty in Ancient China


WANG Rong　XU Yan-bin

(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Law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00,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of the rite and the royalty from the ritual of the system, mainly from the status system and the primogeniture system. The status system emphasiz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person in the ritual order and makes them always aware that individuals live in the system and society, so that they form a kind of institutional inertial dependence in the overall ritual system,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whole royal order. Furthermore, the system also infiltrates into people's life and becomes "daily routine", forcing them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of the supreme power dominance and laying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ruling legitimacy. The essence of the primogeniture system is to provide a procedure for the legitimacy of inheriting the throne in the form of an institution, and to ensure the peaceful passing-down of the supreme power within a family by consanguinity. In the keeping of a dynasty, it is their unique and outstanding family blood and lineage that can best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succession. In Confucianism, the eldest child by the wife is respected, and regarded as having the purest blood and the highest status.



**Key words:** China; primogeniture system; royalty; legitimacy construction

# 试述规矩和准绳及其神秘性特征

董 涛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 要：**“规矩”和“准绳”是历史早期的测绘工具，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矩的起源较早，主要用于测绘方圆，绘图用的圆规则起源较晚，而且形制并不固定；测量横平的所谓水准可能并非是固定的仪器，而测量竖直的绳需要配合悬垂使用，有时也用于墨斗，可以绘制标准的直线。可以发现，“规矩”具有测绘方和圆的功用，而这正切合了古人的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样“准绳”测绘横平竖直也逐渐被赋予更多“衡量”的功能。是以“规矩”和“准绳”逐渐具有神秘化特征，以“规矩”和“准绳”为核心的特殊符号也开始出现，并广泛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类器物之上。

**关键词：**伏羲女娲；《墨子》；工倕；日廷图；博局镜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43-12

## 一、作为测绘工具的矩和规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矩是一种起源很早的测绘工具，至于其使用方式，《墨子·法仪》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1]（P20），《荀子·不苟》也说：“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2]（P49）再者，《吕氏春秋·分职》也说：“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3]（P669），都提到以“规矩”测量和绘制方形以及圆形图案。另外，矩也可以用以测定角度，例如《考工记·冶氏》说：“倨句中矩”[4]（P915），“倨”的意思是钝，“句”的意思是锐，在这里分别指的是钝角和锐角，而“矩”则指的是直角，意思是矩可以被用于测定是否为直角[5]（P211）。《考工记·车人》提到“半矩谓之宣”[6]（P933），是说矩为九十度，而矩的一半是“宣”，也就是四十五度。除此之外，矩还有多种功用，《周髀算经》载有矩的使用方式：“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也就是说，矩能够校正水平，测高度，深度以及距离，并能够画圆和画方，是一件具有多种不同用途的工具。刘东瑞曾对文献记载中矩的使用方式有过详尽的讲解，他认为测高、测深和距离都采用的是三角形相似比的原理。[6]（P238）

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矩的形状基本确定，即有一个九十度的折角和两条边，与今天的矩尺差别不大。《说文解字》工部说：“巨，规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巨或从木矢，矢者中正也。”[7]（P201）《战国古文字典》认为“巨”字写作“ ”，其实就是人手持“工”，也就是画直角的工具。[8]（P495）甲骨文中“工”字写作“ ”，或许这就是早期的矩的形状。而陈政均引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经法》中的“矩之内方曰”一句，证明古人其实是用矩的内侧画直角的，并指出实际上汉代的矩只是截取了古矩的部分，古矩的功用要比矩尺用途广泛得多。[9]这些看法可能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金文中的“工”字简化为“ ”，仍保留了规矩的形状。

有学者认为早期的矩可能是三角形的，天津市文化局收集有一件商代的青铜器名“ 父觶”，有学者认为这个字读作“疆”，就是《说文解字》中的“畕”字，并认为它中间的三角形就是丈量田亩的矩，同时指出这种丈田用的矩，在汉武梁祠画象中亦有所见，即伏羲手持之器。[10]然而我们知道，

**收稿日期：**2018-06-20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战国秦汉日者群体研究”（106112015CDJSK47XH22）

**作者简介：**董涛（1984-），男，河南驻马店人，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矩是用来绘制直角或者圆形图案的，所以早期的矩一般都没有刻度，且即便有刻度，一般的矩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显然用来丈量土地并不合适。所以这个字中的三角形和矩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是应当存疑的。

1933 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楚国的青铜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较早历史时期的矩的实物形象。根据介绍，这件矩的两边长度相等，均长 23.3 厘米，约等于楚国一尺。边宽 2.5 厘米，边厚 2.7 厘米，通体素面，没有刻度，折角为九十度。[11] 总体而言，这件铜矩与文献记载中矩的形状大致相符，刘东瑞征引《墨子》以及《考工记》等材料，认为矩本来就是没有刻度的等腰三角形，寿县出土的这件矩就是其较早期的形态，这样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和这件青铜矩共同出土的还有青铜锯、铜刀和铜斧等多件加工木制品的工具，证明这件青铜矩确实是实用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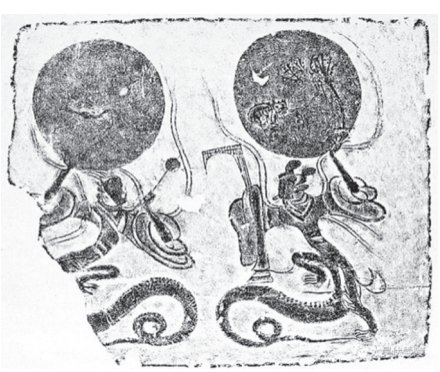
根据出土文物和画像石等材料，可以发现到了汉代矩的形状发生了变化，例如根据实际的需要，矩的两边不再相等，而且有的矩上出现刻度，其实就是矩和尺结合在一起，成为矩尺。[5]（P211）矩最初的作用是绘制方形和圆形，因而是否有刻度并不重要，但两边不等长以及有刻度显然更多考虑了实用性需要，例如根据学者的推测，两边长短不等是为了便于手持操作，而刻度可以当作量尺使用，在观测的时候可以随时读出数据，便于计算 [12]。而矩的长边被称为股，短边被称为勾，《周脾算经》中也说“故折矩以为勾，勾广三，股修四，径偶五”，这也就是所谓的“勾股定理”。

汉代的矩目前出土了多件，其中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青铜矩两边分别长 22.5 厘米和 37.6 厘米，其中短边大概是汉代一尺的长度，而长边大约是汉代一尺半的长度。

1994 年陕西省子长县城关桃园村出土了一件汉代铜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据介绍，这件铜矩两边分别长 23 厘米、11.5 厘米，大约相当于汉代一尺和半尺的长度。这件铜矩长边的两面均有刻度，分为 10 等份，每份约合汉代一寸。短边两面也都有刻度，分为 5 等份。[13] 另外，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也藏有一件类似的铜矩，据介绍，这件矩边有刻度，分五格，长 11.6 厘米，合汉代一尺的一半，也就是五寸。

汉代以后直至现在，矩的形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日本人嘉纳治兵卫《白鹤帖》收录了一件铜矩尺，罗振玉将时代定为南朝，这件铜矩尺两边分别为 24.9 厘米，9.96 厘米，长边约合一尺，短边约为半尺，这和前述汉代铜尺形制基本相同。另外，这件铜矩尺长边平均分成十个格子，短边平均分成五个格子，每个格子的长度约为一寸，格子中间镂刻精美的风纹，边缘装饰点状连续纹样，推测这些纹样应当也具有测量的功能。[14]（P285）

此外，汉代画像石中也出现了矩的形象。伏羲女娲是汉代画像石的重要题材，而在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会手持“规矩”等道具，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女娲手持圆规，而伏羲则手持曲尺形的矩，这件矩有一长一短两边，大体上符合之前讨论的汉代矩的通常形状，只是连接长边和短边有一道斜梁，在文献中没有被提到过。类似带有斜梁的矩也出现在其他相关主题的画像砖中，但在出土的青铜矩中还没有见到过。我们推测斜梁的出现可能和矩的质地有关，现在出土的几件矩都是青铜铸造的，但不应排除早期的矩有竹、木质地的可能性。如果是竹、木质地，那么长边和短边结合不牢固就会导致无法获得理想的直角，而斜梁就能起到固定作用。当然这种推测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撑。



四川省崇庆县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画像砖，画面中位于右侧的女娲右手持矩，左侧伏羲左手持规。只是区别于出土文物中的矩，女娲手中的这件短边向上略有突出，使得这件矩看起来有点像“门”字形。无独有偶，这样形状的矩在四川合江出土的画像砖中也可以见到，位于画面左侧女娲手持的矩已经比较接近“门”字形了。此外，这两件画像石中的规也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相关问题详见下文的讨论。

唐代“伏羲女娲”主题绢画中，有时会出现伏羲女娲一人持规，一人持矩的形象。其中矩的形状和汉代大致相同，都有一长一短两边，证明直至唐代，矩的形状都没有太大变化。其实到了唐代，矩已经被称为“曲尺”，宋代也沿用了这一说法，例如《营造法式·取正之则》说：“用曲尺校令方正”。有学者指出，南宋以后曲尺与鲁班尺配合使用，在测绘的同时也可以判定吉凶宜忌。例如天一阁藏明代《鲁班营造正时》提到：“曲尺者有十寸，一寸乃十分。凡遇起造至营、开门高低长短度量皆在此上。须当凑对鲁班尺八寸吉凶相度，则吉多凶少为佳。匠者但用仿此。”[5]（P215）

总体而言，从战国到秦汉，矩的形状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长边和短边的区分或者是为了手持的方便；而长边一尺，短边半尺的设定，也是为了测量的方便。另外，汉代以后矩上出现刻度，也是为了在测量的时候直接读出长度。刻度的一般单位是寸，但也出现了比寸更小的单位“分”，这说明矩尺在精度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至于规的出现，则显然要晚于矩。首先上文征引《周髀算经》关于矩的使用方式说道：“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也就是说，矩能够校正水平，测高度，深度以及距离，也能够画圆和画方。也就是说，在历史早期，几乎所有的几何学测绘都可以由矩这一种工具完成，甚至在绘制圆形的时候都不必使用“规”。

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古文字中的“规”和工具也没有直接关联。《说文解字》夫部说：“规，有法度也。”段玉裁注云：“法者，刑也。度者，法制也。规矩者，有法度之谓也。凡有所图度匡正皆曰规”[7]（P499）。其实金文中的“规”字最突出的特征是大眼睛，可能取注视、规谏之意，无法和汉代以后画图的圆规联系到一起。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规”的本意是树枝，而树枝在早期被作为画圆的工具使用，这种说法显然具有很大的推测成分，暂且存疑。[15]（P57）

画图的圆规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而且质地通常为竹子和木材，所以截止目前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出土确切证明为圆规的实物，但在一些文物中却出现了使用圆规的痕迹，其中最明显的应当就是铜镜背面纹饰的绘制。有学者对铜镜的铸造工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认为铜镜背面的纹饰显然是使用了圆规和直尺等制图工具完成的，而且在某些铜镜背面的几何纹饰中，也的确能够找到一些当初制模过程中用圆规画的圆，以及圆中心画出的十字线，可以证明这些铜镜在制模时使用圆规进行了机械制图。[16]有学者指出，汉代铜镜上的几何绘图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对圆进行标准的三等分、六等分、八等分或者十二等分，等分的目的是为了在铜镜边缘绘制圆弧的需要。这些都表明汉代铜镜制图已经形成了规范的制图体系[17]（P12），而且必须需要圆规与直尺等制图工具才能完成。

另外需要使用到圆规的制造工艺是铜钱的铸造，有学者指出，汉代钱模铸造的时候要“先以规画圆，于中刻四界成形”，[18]（P1638）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推测。陕西省长安县窝头寨遗址被认为是汉代上林三官国家铸币工场之一，这里出土有大量红陶钱范，其中有的钱范穿的中心有圆心点，是刻制时使用圆规的痕迹。[19]另外，山东齐国临淄古城遗址内也出土有汉代钱范，其中两枚无字，考古工作者推测是用圆规画好的钱模外廓。[20]（P3949）此外，一些土木工程的进行可能也需要使用到圆规。

前文提到，汉代“伏羲女娲”主题的画像石和绢画中，有时会出现伏羲女娲一人持规，一人持矩的形象。其中圆规的形状较为奇特，从画面上看去它应当是在矩尺的长边垂直增加一个横杠。这

种规显然与西方以及现代常用的两脚规有较大的差异，有学者推测其基本形制是在一根细长的木片或者竹片一端安装固定的脚，另一端装上笔，使用的时候固定住圆规的脚，旋转笔的一端获得圆形。[21]（P808）到唐代还有对这种形制圆规使用方法的介绍，例如《新唐书·天文志》记载："削篾为度，径一分，其厚半之，长与图等，穴其正中，植针为枢，令可环运。"[22]（P808）所谓"穴其正中，植针为枢，令可环运"正是对这种类型圆规使用方式的形象描述。我们由此观察画像中的矩的形象，可以发现矩完全可以完成这种规的功能，也就是将矩的一端固定，另一端绕其转动一圈，就可以得到圆形，这也就是所谓"环矩以为圆"的说法。[23]（P34）当然这也可以证明矩的出现要早于圆规。

前文曾经提到四川崇庆县和合江县出土了两件伏羲女娲为主题的画像砖，这两件画像砖中矩的形制类似，但又与其他地区画像砖中的矩有明显区别。同样，合江画像砖中伏羲手中所持的圆规也与其他地区不大相同，这件圆规整体呈"T"字形，在使用的时候应当也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旋转成圆形。而崇庆画像砖中伏羲手中所持器物不易分辨，但与合江画像砖类似，这件器物的顶端可以看到为圆形，而且有较细的直线突出，应当可以判定两者是形制相同的圆规。我们推测，这两件画像砖中的"规矩"未必真是实用的器物，画像砖的制作者虽然根据传统或者当时的流行，要在伏羲女娲手中加上"规矩"等道具，但是对矩和圆规的形制和用途未必真切了解，所以导致这两件圆规呈现出特异的形制。

这种类型的圆规使用细长的竹片或者木片制作而成，因而可以就地取材，随意加工，所绘制的圆形的半径也就可长可短，这为古代数学的运算也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周髀算经》中有"七衡图"，有学者用规定的比例进行了换算，得出这种图的半径小的有 4.2 寸，大的有 8.4 寸，这样大的圆形，显然在绘制的时候特意选取了较长的竹片或者木片进行辅助才能够完成。而这种形制的圆规在后来明代人绘制的《三才图绘》中也可以见到，其主体是一个细长的木条，木条的一端有两个小孔，另一端有六个小孔。圆规还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固定在圆形的枢轴，应当就是圆规的脚，另一个是画圆规的笔。可知木条上的六个小孔，应当是插销固定附件所用的，通过附件在小孔上的间距来控制圆的半径大小。

需要注意的是，画像材料中也有类似两脚规的圆规。例如山东沂南北寨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夹盘古而立，女娲手中所持的明显就是一个两脚规。再例如开凿于西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壁画中，可以清楚看到伏羲手中所持的两脚规，而新疆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画像中的圆规也都是两脚规，这说明从秦汉到隋唐时期，两脚规也确实是存在的。敦煌壁画中两脚规的形制非常清晰，可以推测这种两脚规应该是使用一根柔韧性较强的竹条或者木条，对折之后将交叉点固定，在使用的时候一脚固定，另一脚旋转。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交叉点的位置，控制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因此可以得到不同直径的圆形。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规"和"矩"这两种测绘工具最大的不同是，矩的形状大体保持不变，而圆规却至少有两种基本形制，其他形态的变化就更多了，不同时期的人们都会根据对圆形的需要而改变圆规的形制，这或许与古人在使用工具的时候注意其实用性有关。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我们对"规矩"形制的变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多的了解，是因为它们反复出现在伏羲女娲主题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以及帛画之中，"规矩"成了伏羲女娲的重要象征，而在文献记载中，"规"和"矩"也分别是大禹，以及句芒和蓐收等历史和神话人物手持的道具，"规矩"背后的思想观念，我们留待下文再作讨论。

另外，出土文物中有汉代用于测量日影变化以确定时间的圭表，例如南京博物院中藏有 1965 年出土于江苏仪征石牌村的铜圭表，这件圭表可以根据日影的变化确定方向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天文仪器。有学者指出，这件仪器实际上也是根据一边（表）和一锐角（光线与表的夹角）来确定一个直角，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件随时可以改变边长的矩尺。[6]（P238）对于这样的看法，本文并不认可，对于规和矩的使用方式以及背后包含的思想观念，在文献记载中是清晰明确的，而圭表的使用方式和思想观念，古人也有着非常准确的描述，因而二者并没有必要混而为一。有关圭表的讨论详见下文。

## 二、作为测绘工具的准和绳

和前文提到的"规矩"一样，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准"和"绳"也是两种重要的测绘仪器，其中"准"是用来测绘横平的仪器，而"绳"则是用来测绘竖直的仪器，正如《墨子·法仪》所言"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孙诒让引

《考工记·舆人》也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另引《庄子·马蹄篇》说："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1](P21)这里提到的以规矩测绘方圆已见前文叙述，而所谓"立者中县，衡者中水"，就是以绳悬挂垂球测量竖直，利用水的特性测量横平。

"水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现代测量工具中有所谓"水平仪"和"水准仪"，前者可以测量水平，后者也可以通过运算测量两点的高差，然其最根本的原理都是通过水来确定平准。对于"水平"的特性，古人早就有较为直观的认识，《庄子·天道》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成玄英疏云："夫水，动则波流，止便澄静，悬鉴洞照，与物无私，故能明烛须眉，清而中正，治诸邪妄，可为准的，纵使工倕之巧，犹须仿水取平。"[24](P459)《白虎通义·五行》也说："水之为言准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陈立疏证引《释名·释天》："水，准也。准，平物也"，另引《说文·水部》："水，准也，北方之形，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另引《尔雅疏》云："水，准也。言水之平均而可准法也。"陈立疏证指出或者正是因为水性平，所以《周礼·考工记·轮人》提到制作轮子的时候说："水之以视其平，沈之均"，《考工记·匠人》也说："匠人建国，水地以县"，这其实是两种利用水来测定平准的方式。[25](P167)

前引《考工记》中的两条材料是以水定平的具体方法，所谓"水之以视其平，沈之均"，《周礼注疏》解释说："两轮俱置水中，观视四畔，入水均否。若平深均则斫材均矣。"[4](P909)也就是将车轮沉入水中，观察车轮是否平衡下沉，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测量水平，还可以测量木材的质地是否均匀。

《考工记》记载古人选择都城的时候要先"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一句中"水地以县"是确定地表平整的方法，郑玄认为所谓"水地以县"就是在四角立直木，以水望其高下，如果高下定了，那么这块地方就是水平的。贾公彦疏说得更为详尽，指出要使用悬绳的办法确定立木是否垂直于地面，然后在远处用水平之法遥望，确定木的高低，然后确定地表的高低平整。[4](P929)实际上，现代水准仪的测量原理，也正是根据水准测量的原理，利用一条水平视线，借助水准尺，测量两个地点的高差。

不过我们认为，郑玄和贾公彦的解释可能都太繁复了，"水地以县"在实际中的运用应该要简单有效得多。有学者认为，在商代的时候就开始以水来确定平准，例如有学者讨论甲骨文中的"癸"字，认为这个字就是以水测平的水沟体系，并推测当时的测量方法是："其测平之法为，先挖直交之二条干沟成X形，再在沟之两端挖直交之小沟，遂成 形，灌水其中，即可测地面之水平。癸字本意即为测度水平，为揆之初义。故《说文》训：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像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26](P382)据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干沟和枝沟，据说就是匠人以水测平用的。[27](P113)显然如果我们以"癸"字形水沟解释"水地以县"，可能更符合实际，而且这个办法简单实用而且精确，确实体现古人的智慧。

而郑玄所谓立直木，然后通过"望"的办法确定地面水平和高差，应该是汉代实际使用的一种测量方法，《史记·河渠书》记载："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史记索隐》认为"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颜以为表者，巡行穿渠之处而表记之，若今竖标，表不是名也"[28](P1410)，颜师古的说法见于《汉书·沟洫志》注释。显然颜师古的看法是正确的，"表"不是人的名字，而是测量工具，即"立表测影"的"表"，也就是颜师古所谓的"标"。同样是修建水利工程，表的使用也见于《汉书·西域传》："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29](P3907)在这两条材料中，"表"的作用显然是测量方位，而对于河渠的修建而言，水平高差的测定同样极为重要，这关系到水流的落差问题，是河渠能否成功的关键，例如《汉书·沟洫志》也提到"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29](P1686)，所谓"准高下"就是测量水平高差的意思。这里所谓"表"的使用方法应该与郑玄的描述基本相同，即使用固定长度的标杆，通过水面获得水平，也就是现代水准仪工作中使用的水平视线，准确测量两个地点的高差。实际上，这应当就是"重差术"在实际中的运用，《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都提到了这种测量高度和距离的技术，后来刘徽又有重差九问，对重差的基本公式和运用进行了推广，也就有了《海岛算经》的相关记载，基本操作方式是通过表的不同位置，来求得山高水深。其中《周髀算经》明确提出"二表下地，依

水平法定其高下”的方法，这里特意强调的“水平法”，就是考虑了水作为平准测量工具的特性。[30]

《汉书·律历志》曾提到使用井水测量量器的水平问题，“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则平也。”师古曰：“概所以概平斗斛之上者也。”[29]（P967）可见这也是一种使用水获得准平的方法。

在汉代，人们以水类比货币，所以钱也被称为“泉”，管理国家经济的部门的官员被称为“平准令”，取的就是水的平准含义，所以《史记索隐》说：“大司农属官有平准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贵贱相权输，归于京都，故命曰平准”[28]（P1417）。其背后也是以水获得平准的思想。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天文仪器上出现了用于测量水平的水平槽，据《隋书·天文志》记载，“至明元永兴四年壬子，诏造太史候部铁仪，以为浑天法，考璇玑之正。”这件天文仪器的重要特点是用水测平，所谓“其制并以铜铁，唯志星度以银错之。南北柱曲抱双规，东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龟负双规。”[31]（P518）这里的“十字水平”，就是制作成十字形的沟槽，然后注入水以测定水平，与前文提到商代工程建设中用到的“癸”字形水沟原理类似。至唐代制作的游仪，史书记载说：“柱在四维，龙下有山云，俱在水平槽上，并铜为之”[32]，特意提到测定水平的十字水平槽。《宋史·天文志》把这种十字水平槽称为“水臬”，所谓“十字为之，其水平满，北辰正。以置四隅，各长七尺五寸，高三寸半，深一寸。四隅水平，则天地准”[33]（P954）。

天文仪器上设置水平槽以确定水平，史料中也记载南北朝时期祖暅制作的圭表，《隋书·天文志》载：“造八尺之铜表，其下与圭相连。圭上为沟，置水，以取平正。揆测日影，求其盈缩”[31]（P524）。河南登封古观象台的土圭部分有两道凹槽，祖暅铜表上测量水平的凹槽大概也就是这种形制。与之类似，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有明清时期的圭表，土圭部分也有两道凹槽，应当就是水平槽，这也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代“水平仪”实例。

唐代史料中还记载了被称为“水平”的水准仪，北宋《营造法式》也详细记载了“定平之制”，元明清各时期也都有测定水平的相关仪器，详细的讨论参见李浈《中国传统建筑木作工具》“测定及定向工具”[5]（P215），此不赘述。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水平仪”主要用于天文仪器的水平测量方面，在工程中用到所谓“水准仪”可能是更晚历史时期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在之前历史时期重要工程修建过程中的精密测量的实现，事实上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了简单实用的工具，也就是充分利用水的特性实现“平”的精度测绘。所以，虽然在早期历史中并没有所谓“水平仪”或者“水准仪”之类的工具，但平准的获得是毫无问题的，而与之相伴，人们对横平观念的认识也是极为深刻的，详见下文的相关讨论。

与水可以测量平准类似，人们发现绳加上垂球也可以测绘竖直，当然也可以与墨斗配合引出直线，用于切割木料，另外也可以测量距离和高度，甚至可以结绳记事，因而“绳”在古人观念中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也正是因为绳这种工具，人们在思想中逐渐产生了所谓“直”的观念，所谓“直绳”也就随之具有了严厉和严格的含义。

绳作为一种工具工具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或者就是人类较早掌握的工具之一，《说文解字》丝部说：“绳，索也”，手部则说：“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甲骨文中这个字像是两手搓粗草绳，指的是制作绳索的方法。另外，段玉裁注释提到除了草之外，制作绳索可以竹，也可以木，可见绳索类的工具取材方便，也较为常见。

在确定竖直的时候，绳索一般配合垂球使用，这也就是所谓的“悬”，有时候在文献中直接写作“县”。前引《考工记》有“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的说法，这里的“县”也就是“悬”，是说在用表测量日影变化的时候，确保表与地面的垂直是极为关键的因素，因而“水地”也就是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极为精准的水平面，然后利用从表顶端垂直而下的绳索，通过观察绳索与表是否平行，来确定表与地面是否垂直。

现代垂球一般为圆锥形，由金属制作而成，在使用的时候以圆锥的尖端对准地面，另一端系以细绳，其自由下垂的方向就是地球重力线的方向，古代垂球也利用了基本相同的原理。虽然在考古发掘中，绳索是极难保存的，但垂球却出土了若干件，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出土于江西省德安县陈家墩商周遗址的木制垂球，根据介绍，这件垂球是用一根直径 4.5 厘米，长 7.2 厘米的的小圆木制作而成，整体分为两段，上段为圆顶平面，下段修成尖锥形。这件垂球的质地为杂木（当地人称为“斗栗

木”），制作较为精良。[34] 根据介绍，这件木质垂球和木质觇墩共同出现于水井之中，考古工作者分析这两件器物可能都是用于水井修造工程，并推测其具体使用方法为：水井每开挖到一定深度，都以细绳悬挂垂球，测量井壁和细绳是否平行。而觇墩则是用于校准中心，确定水井的圆周。[35] 由此可见，至少在商代的时候人们对于工程中使用绳索和垂球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实际上，即便是现在，水井和烟囱以及墙壁等工程的建造中，垂球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也出土了春秋时期的木垂球，根据介绍，这件木垂球由坚硬缴密的木材制作而成，整体为桃形，表面打磨光滑，全长7.7 厘米，横断面为椭圆形，长径 6 厘米，短径 5.4 厘米。垂球的中心凿有长方形的穿孔，下端中心削尖，穿孔中心刻有线状凹槽，与垂球下端的尖端位于同一直线上。[36]（P38）

秦汉时期也有类似的木质垂球出土，广州秦汉时期的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了一件木制的垂球，垂球为方锥形，上端如方榫形凸起，已残断，残高 5.8 厘米，宽 3.5 厘米。[37] 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可能是造船时取垂直用的吊线工具。同时出土的还有铅块，被认为是切割木料时划线用的，孙机指出汉代文献中有“怀铅”的说法，可知铅在历史早期是较为常用的书写和绘画工具 [38]（P24）。

广州造船工场出土的铅块被认为是切割木料时划线所用，这种说法当然含有较大的推测成分。而我们所熟知的木工划线则是使用墨斗，这样能够得到较为标准的直线。墨斗通常由墨池、线轮和棉线等部分组成，棉线经过墨水浸泡，在使用的时候抽出棉线，固定在木料一端，通过弹线的方式得到笔直的墨线。另外墨斗中的棉线也可以做测量垂直的吊线，与前文所述垂球测直的功能类似。1993 年安徽省天长县祝涧村汉墓出土了一套 28 件木工工具，其中就有所谓“墨斗线陀”。根据介绍，这件“墨斗线陀”为束腰六边形器，断面呈六边形，显然这件器物与常见的墨斗还是有较大的区别，推测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绕轮。另外，与这件“墨斗线陀”同出的，还有一件木质长方形的器物，这件器物呈案形，长 32 厘米，宽 16 厘米，通高 14 厘米，背部鼓起，正面平，中间刻一长方形平面，两端各设三个方形的穿孔，每个穿孔上都有可起伏的活动木构件。对于这件奇怪器物的用途，考古工作者猜测可能就是所谓的“水准仪”[39]（P53）。古代垂球的基本形制已见前述，这件器物是否用于测量竖直方向，应当存疑。

古代墨斗实物虽不多见，但考古发掘工作中却经常能够见到使用墨斗绘制直线的实例，例如北京大葆台汉墓中，黄肠木的开料比较规整平直，有些大黄肠木的内向一端平面上留有清晰的十字形墨线，有些黄肠木的扁平面上，也留有墨色直线。根据介绍，这些墨线都很直，推测可能是使用了墨斗之类的工具。另外，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的木棺内侧的木板上，留有多处清晰的墨线痕迹。这些墨线粗细均匀，线的边缘还有毛刺，显然是弹上去的，和现在木工用墨斗弹的墨线完全相同。[40]

魏晋南北朝以后也出土了多幅伏羲女娲画像，与秦汉时期的画像不同，伏羲女娲手中不仅有“规矩”，还多了墨斗的图像。例如开凿于西魏时期的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窟顶东坡中央有伏羲和女娲相对的形象，伏羲女娲均为人首兽身，伏羲在右，一手持规，女娲在左，一手持矩，而另一手所持的应当就是墨斗。可以注意到，女娲手持墨绳的一端，另一端垂吊着的是一件束腰形的器物，与前文提到的“墨斗线陀”形状类似，大概这本就是早期墨斗的基本形制。

新疆阿斯塔纳地区是唐代高昌故国，这里出土了三十多幅伏羲女娲画像，伏羲女娲手中一般都会持有一件墨斗，或者算筹之类。而与莫高窟壁画不同的是，新疆伏羲女娲画像中墨斗呈现更为显著的束腰形，有的壁画中墨斗直接悬挂在矩上，这也是较为少见的形式。

总的来说，以水测横平和以垂球测竖直都是利用了物理学上的重力原理，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发现了这样的原理，并加以利用，所以在工具并未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得较为精确的横平和竖直。当然更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人们经由对横平和竖直这两种现象的认识，在理念上也对“准绳”进行了深化，所以逐渐地这两种工具有就有了更多神秘化的特征。

**三、规矩和准绳的神秘特征**

作为实用的测绘工具，“规矩”和“准绳”的神秘主义意义应当引起我们注意，而这种神秘性的起源，很可能与古帝王和神人的传说有关，至于宣扬这些传说的人，或者就是早期工具的使用者，古墨者或者就是其中重要的人群。

前文已经提到，“规矩”和“准绳”在秦汉到隋唐时期的画像中是伏羲女娲手持的重要道具，在古人的观念中，伏羲一直都是三皇之一，而女娲的身份逐渐演变，大约在东汉时期也成为三皇之一。战国秦汉的文献中也常见伏羲女娲的记载，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41]（P445），《楚辞·天问》说：“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云：“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列子》、《淮南子》等文献中都记载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说文解字》、《风俗通义》中也出现了关于抟土造人的记载。然而在古典文献的记载之中，却几乎没有见到伏羲女娲与“规矩”或者“准绳”有关的记载。《鲁灵光殿赋》记载汉代宫殿中有关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画像，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与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类似，只是并没有提到手中持有规矩或者准绳、日月等。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有陈思王曹植为伏羲女娲画像所作之“赞”，其中提到女娲“人首蛇形”，也与画像石相似，但同样也没有提到伏羲女娲所持的道具。有学者指出，“规矩”或者“准绳”本身可能确实和伏羲女娲没有关系，只是到汉代被用于画像石中作为图像表现的有机成分，是图像的设计者刻意增加上去的。[42]（P61）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伏羲女娲以“规矩”为道具应当是汉代出现的，而以“准绳”为道具，则应当晚至魏晋南北朝才出现。

汉代文献记载中大禹治水的时候曾手持“规矩”和“准绳”，例如《史记·夏本纪》说：“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史记集解》引王肃曰“左右言常用也”，意思是大禹以准绳和规矩作为常用的工具，但《史记索隐》则认为“左所运用堪为人之准绳，右所举动必应规矩也”，强调规矩和准绳的象征含义。[28]（P51）结合大禹治水的历史事实，这里的“准绳”和“规矩”如果解释为常用的工具，应当是更容易接受的。大禹“左准绳，右规矩”的记载也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显然大禹手持“规矩”和“准绳”进行治水活动，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而在大禹治水题材的画像石中，大禹手持的多是实用的生产工具，而不是“规矩”或者“准绳”，例如在武梁祠画像石中，大禹是头戴斗笠、手持耜的形象，另在徐州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大禹手中所持的应当是锸，同样是用于生产的工具。这至少说明，在对传说人物形象特征的认识中，知识阶层和画像石的制作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淮南子·天文》以五行为基础，详述五帝所在的方位，以及五帝之佐，例如东方帝为太皞，其佐句芒，执规管理春天；南方炎帝，其佐朱明，执衡管理夏天；中间皇帝，其佐后土，执绳管理四方；西方少昊，其佐蓐收，执矩管理春天；北方颛顼，其佐玄冥，执权管理冬天。显然《淮南子》在这里想要构建五方五帝的体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五帝之佐手中所执的五种工具，它包括了本文讨论的“规矩”和“绳”，以及另外两种测量重量的工具，即权和衡。《淮南子》中五帝和五行、五方的排列方式显然和《礼记·月令》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同源，只是五帝之佐所执之“规矩”、“绳”与“权衡”，却不见于其他材料的记载。而这里将“规矩”、“绳”、“权衡”与方位神灵对应，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刻意性，或者并非是广为接受的观念。

在文献记载中，“规矩”和“准绳”的发明者是倕，有时候也写作“垂”，或者被称为“工倕”、“巧倕”。根据《尚书》、《史记》和刘向《说苑》的说法，他的特点是善于巧思，因而受到尧和舜的赏识，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将倕与“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益、彭祖”等人并列，说他们都是帝尧和帝舜时代的贤臣。司马迁另引《尚书》“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史记集解》引马融曰：“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28]（P39）。《汉书·扬雄传》引《甘泉赋》提到“般、倕弃其剞劂兮，王尔投其钩绳”，颜师古注释说：“般，公输般也。倕，共工也。”[29]（P3529）《后汉书·崔骃传》李贤注也说倕是“舜时为共工之官”[43]（P1705）。而《山海经·海内经》说：“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又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袁珂校注认为巧倕应该就是舜之子商均，并引《路史·后纪十一》说：“女罃（英）生义均，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41]（P533）

另外，《墨子》、《荀子》、《庄子》和《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都曾经提到过工倕，认为他是许多器物的发明者，其中就包括“规矩”和“准绳”。例如《墨子·非儒下篇》说巧倕是舟船的发明者，《荀子·解蔽》说巧倕是弓的发明者，而《吕氏春秋·古乐篇》则说：“帝喾命有倕作为鞮、鼓、钟、磬、管”，倕又是许多乐器的发明者。《世本》也提到“倕作钟。倕作规矩准绳。倕作铫。倕作耒耜。倕作耨。”看来“倕作规矩准绳”确实是广为接受的观念了。另外《庄子·胠箧》说：“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攓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玄英疏云：“工倕是尧工人，作规矩之法”，并说“工倕禀性机巧，运用钩绳，割刻异端，述作规矩”。[24]（P356）这里其实也是说倕是“规矩”和“准绳”的发明者。

至东汉王符《潜夫论·赞学》也说：“昔倕之巧，目茂圆方，心定平直，又造规矩绳墨以诲后人”，明确指出工倕是“规矩绳墨”的发明者，并说“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说巧倕发明规矩绳墨对后来工人的作用，就像圣人创作经典对于后来读书人的作用那样。[44]（P12）

其实，“规矩”和“准绳”这样的生产工具，显然是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未必真有一个发明者，当然在传说之中，类似的器物总是要有一个发明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可以推测，倕因为是被帝舜任命做过管理工程事务的工师，所以人们就认为他一定具备“巧”的特性，能够制造出如钩绳规矩之类的工具，或者是舟船、弓以及乐器等等。在这其中，“规矩”和“准绳”因为是工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所以发明者必然就是工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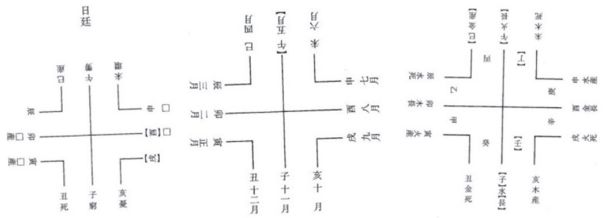
墨家被认为和工人有密切关系，应当是“规矩”和“准绳”之类工具的实际使用者，《墨子》一书中也多有以“规矩”和“准绳”举例进行讨论的内容，显示墨家对类似的工具非常熟悉，例如《墨子·法仪》载子墨子之言：“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孙诒让以《考工记》校之，认为“直以绳”之前应当有“平以水”，此说甚确。[1]（P21）另外，《墨子·天志》也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同样在《天志》中也说：“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圜，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圜。是以圜与不圜，皆可得而知也。”[1]（P191）《法仪》和《天志》都是《墨子》中重要的章节，也是阐述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墨子反复以“规矩”和“准绳”作为类比进行说理，确实显示出墨者对这两种工具的异常熟悉。

而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墨者的主体是居住于城中的工人，自然就包括使用“规矩”和“准绳”等工具进行木制品生产的工匠，所以墨家对“规矩”和“准绳”有着特殊的情结，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的看来，“规矩”和“准绳”是能够测绘方圆以及横平和竖直的基本工具，这也是古代工程中所必须要用到的，因而自古以来包括墨者在内的工匠们都十分重视这些工具。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工具具备测绘方圆以及横平和竖直的特征，所以逐渐在理念上被升华，再加上方形和圆形是人们认识到地和天的基本形状，横平和竖直也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孜孜以求的基本形状，所以这些工具就逐渐被赋予更多的理想化色彩。是以人们会认为只有最为“巧”的人才会是这些工具的发明者，而上古帝王手持的道具，也非这些工具莫属。

另外，在汉代社会观念中，“规矩”和“准绳”的“衡量”意义也被放大并神秘化，例如《淮南子》说度量轻重“生乎天道”，所以能“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还说“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45]（P184）《淮南子》中规矩准绳“衡量”天地万物的神秘主义意义，对于理解规矩的神秘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汉书·律历志》也说：“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翼天子。”[29]（P971）也是由“准绳”的实际使用方式上升到理念层面，最后甚至是“定法式”、“翼天子”，更上升至政治文化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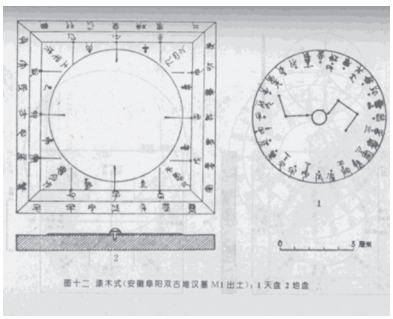
另外可以注意到的现象是，在先秦秦汉时期与“规矩”和“准绳”有关的符号十分常见，且通常出现在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器物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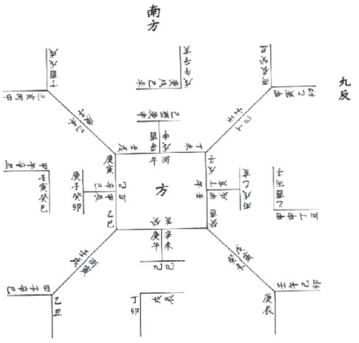
首先应当引起注意的图形是简帛材料中常见的日廷图，这种图形显然就是由“规矩”和“准绳”两种形状的符号组合而成的。“日廷图”这一名称见于王充《论衡》“诘术”篇，所谓“日廷图甲乙有位，子丑亦有处，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营卫，常居不动”[46]（P1027），王充以日廷图作为论据，可知这种图式在汉代是广为人知的。2000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孔家坡的汉代简牍《日书》中有一幅线图，上端有“日廷”二字，被认为是原有的篇题。[47]（P144）这几幅图与王充所述的日廷图特征相符，应当就是秦汉时期的日廷图。

日廷图的图形部分是所谓的“勾绳图”，也就是四个不同方向的矩的符号，以及垂直交叉的二绳，这两种符号显然来自于“规矩”和“准绳”。日廷图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勾绳图”与地支、天干有固定搭配，并由此形成时间模型和空间模型。而天干搭配勾绳图的也就是王充所谓的“甲乙有位，子丑亦有处，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营卫，常居不动”；地支搭配勾绳图见于《淮南子》中，所谓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丑寅在东北方，为报德之维；辰巳在东南方，常羊之维；未申在西北，为蹄通之维；戌亥在西南方，为背阳之维，是为“四维”，[45]（P207）恰好能够对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说文解字》说：“钩，曲钩也”，所以这种图形被称为“勾绳图”，有时也写作“钩绳”，但它本来确实是矩的形状。

也就是说，日廷图其实就来源于“规矩”和“准绳”这两种测绘工具，只是在日廷图中，“规矩”和“准绳”也可以用于表示空间和时间。就空间来说，两条垂直交叉的准绳表示的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四矩则表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方向。就时间来讲，规矩和准绳的十二个顶端表示十二个月、十二个干支，顶端中间的位置表示十天干。这样，勾绳图与天干地支搭配，就构成了完整的宇宙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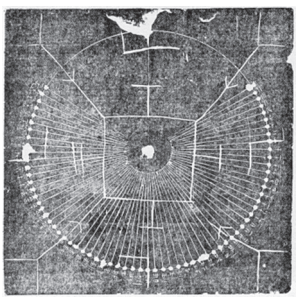
第二种含有与“规矩”和“准绳”有关的符号的图形是“式图”，也就是式盘的地盘上的图形。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重要占卜工具，式盘目前已经出土多件，可以认为，式图实质上就是将日廷图绘制在式盘的方形地盘之上，只是稍微复杂了些，增加了二十八宿等元素。关于式图前人已有丰富的成果，尤其是严敦杰、李零对考古出土的式盘有着精到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48]（P89）式图的图形部分多出一些方形区域，但这些区域并没有实际作用，可能只是用作装饰。文字部分除了天干地支之外，式图的最外侧一般都写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呈东西南北各七宿均匀排列，和天干地支并无严格对应关系，二十八宿是式图的主要特征。同样作为占卜吉凶所用的工具，日廷图有更多的原始特征，而式图则相对更为成熟完善，两者的关系已是十分明了。



第三种含有与规矩有关的符号的图形是所谓“博局图”。这种图形绘制于博局之上，是行棋的轨道，它的基本形式也和“规矩”和“准绳”的符号有着密切的关联。关于这种图形，中外学者都曾经有所论及，其中劳榦认为博局的布置是以古代宫室的形式为基础的，他指出中国古代宫室的基本形式是“亞”字形，试图将博局图与明堂图的研究结合起来。[49] 博局图虽看似十分复杂，其实它

的基本元素仍然是“规矩”和“准绳”，只是为实际行棋的方便故意使之复杂化。但图五的博局图并非用于行棋，它也用于占卜，使用方式和日廷图基本相似。

第四种图形是博局镜。博局镜也被称为 TLV 纹镜、规矩纹镜等，目前出土数量众多。TLV 纹镜这一名称可能得于沙畹，他最早在《北支那考古图录》一书中公布了博局镜的拓片，欧洲人才得以见到这种铜镜纹饰，并在之后几十年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推进。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坎曼（S.Cammann）所进行的研究，也正是他提出了博局纹镜蕴含着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念，他还认为铜镜中间的纹饰象征明堂，T 形符号象征四门，V 形符号象征五方，L 形符号（也就是规矩）象征四季。另外，李学勤认为规矩纹是古人观念中的宇宙模型的一个重要证据，他指出 T 形符号为二绳，L 为四仲，V 为四钩，并认为这种图形这种图形明确指示着四方或八方，其体现阴阳四时五行学说的功能即由此而来。[50]



第五种是日晷。较为著名的汉代日晷有三件，一件是端方旧藏，1897 年出土于山西托克托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怀履光旧藏，1932 年出土于洛阳金村，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还有一件是周进旧藏。日晷的用途是根据太阳的运行测度时间，其图案的意思应当是如孙机先生所说是“象征天宇”。[51] TLV 纹是古人思想中的天宇框架，太阳即在其间运行。李学勤认为，日晷与博局纹镜一样，都代表着古人的宇宙观念。

不可否认，日廷图、式图、博局图、博局镜、日晷都或多或少地都带有神秘主义特征，我们认为，这些器物的神秘特征有的直接来源于“规矩”和“准绳”，如日廷图、式图、博局图等，有的则因“规矩”纹饰而增强，例如博局镜等。如果深入探讨，可以发现这种神秘性特征都和对宇宙的探索有关，正如前文所述，方形和圆形是大地和天空的形状，而横平和竖直是人们切切追求的基本图形，当人们把这些形状组合起来，就逐渐具有了模拟宇宙的特征。另外，人们在绘制这种样式图形的时候，也会将表示时间和空间的天干和地支等元素增添在图形之中，使得这样的图形对宇宙特征的模拟更具有操作性，因为基于天干和地支的占卜术也正是因这种图形而起。

**四、结论**

“规矩”和“准绳”本来都是具有实用性的测绘工具，矩的形制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大约在汉代基本上固定下来。可以发现，古代绘图用的圆规是从矩中分离出来的，同样是在汉代，规和矩成为两种不同的工具，一者画圆，一者画方；另外，先秦秦汉时期的人们也利用水的横平特性，以及绳索悬重下垂的特性测绘横平和竖直。正因为“规矩”和“准绳”具有绘制和测量方圆的功用，使之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恰好衔接，而正是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规矩”和“准绳”等测绘工具逐渐完成了神秘化过程。而与此同时，“规矩”和“准绳”逐渐形成一种带有神秘主义特征的符号，广泛运用于包括日廷图、式图、博局图以及日晷等具有神秘主义的器物之上。


**参考文献：**

[1] 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李浈.中国传统建筑木作工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6] 刘东瑞.矩和矩尺[J].文史.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1980.

[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陈政均.试释“巨乘马”[J].文博,1984,（3）.

[10] 天津市文化局文物组.天津市新收集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64,（9）.
[11] 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J].田野考古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2] 眭秋生.“规”“矩”与我国古代数学[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7,（3）.
[13] 师小群,韩建武.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文物选释[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3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14] 邱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5] 李守奎.汉字学论稿[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16] 董亚巍郭永和.从汉代铜镜纹饰看圆规在制图中的应用[J].江汉考古,2003,（4）.
[17] 刘克明.中国工程图学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18] 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M].济南:齐鲁书社,1979.
[19]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考古调查组.长安窝头寨汉代钱范遗址调查[J].考古,1972,（5）.
[20] 张龙海.山东临淄近年出土的汉代钱范.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河南省山东省战国–秦汉5[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21] 李迪.我国历史上的一种圆规.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三[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22]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3] 孔国平.中国数学思想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5] 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6] 温少锋,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27] 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0] 钱宝琮.周脾算经考[J].科学,1929,（1）.
[31]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 于少先.木质垂球及木质觇标墩——测量工具的始祖[J].寻根,1997,（5）.
[35] 彭明瀚.吴城文化水井初探[J].考古与文物,2003,（5）.
[36] 政协大冶市委员会.图说铜绿山古铜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37]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J].文物,1977,（4）.
[38]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39] 周崇云.天长三角圩汉代木工工具刍议[J].文物研究第1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8.
[40] 赵吴成.平木用“刨”新发现[J].文物,2005,（11）.
[41] 袁珂.山海经校注[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42] 龙红.古老心灵的发掘——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与神话传说研究[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43]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4] 汪继培笺 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5]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6]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8]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9] 劳榦.六博及博局的演变[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期..
[50] 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J].文物,1997,（1）.
[51] 孙机.托克托日晷[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3）.

**责任编辑：侯德彤**

#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Their Mysterious Features

DONG Tao
(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

**Abstract:** Guiju (gauge) and zhunsheng (yardstick) are tool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existing materials, the origin of ju is much earlier, mainly used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circumstance, and the compasses used for drawing occurred later with unfixed shapes and structures. The so-called shuizhun measuring the horizontal may not be a fixed instrument, and the rope measuring the vertical with a pendant or sometimes also ink marker, can be used to draw standard straight lines. It can be found that guiju has the func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squares and circles while zhunsheng is used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Both of them gradually took on mysterious features and appeared on various utensils in the pre-Qin, Qin and Han periods.

**Key words:** Fu Xi and Nü Wa; Mozi; Gong Chui; Riting Figure; Boju Mirror

# 青岛国术馆史实考论

邓以华 葛吉生 初学玲

（青岛大学 体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青岛武术民国前主要以崂山道教武术与戍防卫所屯兵军事武术为主，1929 年 9 月青岛国术馆成立并发展壮大，为青岛武术文化繁荣创建了平台，并在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国术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国术馆员成立大刀队、爆破队、抗日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充分展现了爱国主义精神。

**关键词：** 国术馆；道教武术；东夷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4-0055-05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凝聚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物化着民族精神[1]，武术文化与区域传统文化相融，形成了区域武术文化，青岛武术文化见证着青岛百年来历经荣辱过程。青岛国术馆的成立，荟聚了全国武术界名人来此授课，不分社会层次、性别、年龄传授武术，为武术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篇文章以青岛国术馆的成立、发展及贡献史实进行了研究。

## 一、青岛武术文化历史源流

青岛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约 7000 年前东方民族东夷之地的原始部落居民在这片土地上集群而居，劳作生息。“东夷人，腰挎弓箭……粗犷勇武，仁义柔顺”，“东夷人勇武有力，是出名的武士”。《说文·通训定声》曰：“夷，东方之人也，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是典型的猎人形象。“后羿射日”族源神话也是反映东夷先民生活射猎的风习[2]。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3]（P164）被称为“兵器始祖”，东夷人曾统一于以蚩尤为军事首领 的部落联盟之中，遍及现山东全省、苏皖北部、辽东半岛、冀南部、豫东地区，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至到岳石文化，可以说当时的东夷文化在人类中最先进文化之一。在古代神话传说时期的山东区域住民在围猎技艺、巢居、造字等方面就有地域文化的先进性。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为了成就霸业，提倡拳勇、隆技击，就是重视提拔武艺、勇力、徒手搏击擅长之人，要求“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一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蔽才，其罪五”（《国语·齐语》），终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武风、武技及其先进的军事思想技影响深远。

青岛大部地区属齐国，今黄岛区有古齐长城遗迹，胶南沿海一带属鲁国，横跨齐鲁两国地域，兼有齐文化与鲁文化遗风，佩剑成为两国文人武士尚武的标志。孔子传授弟子六艺，“乐”之中的“武舞”“射与御”教学内容与武艺相关，《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可见齐鲁“尚武勇”之风盛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备”[4]（P1909）培养文武兼有的“勇士卞庄子、执矛杀敌的子路、仗剑保护孔子的公良孺”[5]，后经两汉三国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大迁徙，民族间文化交流，齐鲁武术体系更加完善，角力、角抵、骑射得到进一步发展。

青岛三面环海，历来是海边戍防重镇，也是倭人入寇海滨郡县之处。从元朝末年山东沿海一带（也包括现在的青岛地域）就遭到倭寇的侵袭，到了明朝倭寇袭扰愈演愈烈。为抗击倭寇、卫戍海防，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下诏全国郡县设立卫所军事建制。明

**收稿日期：** 2018-06-02

**基金项目：** 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青岛武术文化传播研究（QDSKL1701076）

**作者简介：** 邓以华（1976-），男，山东聊城人，青岛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葛吉生（1965-），男，山东潍坊人，青岛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初学玲（1954-），女，青岛大学教授。

初“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这样青岛设立了两卫五所，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武官军户组建了水、陆两军。青岛原住民较少，明政府多次从云南、山西、河南等地往青岛迁徙移民，增加住民人口，他们与青岛原住民、军户屯兵一起开荒务农、习武操练，防御倭寇进犯，过着“战时为军，闲时为农”的生活，当地的习武之风便是由此而起。

崂山道教武术从明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太清宫志》记载张三丰为崂山道教开山祖师之一，是崂山武当派拳术之师祖，三到崂山，把武当派刚柔并济的剑法、拳术，内外兼修的气功与点穴等独门武术倾囊传授与崂山道士，乃开崂山习武修道之先河。崂山道教武术是中国道教武术的重要门派之一，与崂山道教音乐合称崂山道教“两大精髓”。崂山道教武术主要特点是腿法变化万千，拳法以柔为主，柔中有刚，刚柔并济。崂山道教武术也是青岛最早的武术拳种传承流派之一，影响武术代表人物张三丰、孙玄清及现代的匡常修。匡常修之孙匡如湖嫡传崂山道教玄真内家拳，致力于崂山道教武术的推广，崂山道教武术于2010年4月入选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据以“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传承详细记载武术人物和传人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崂山惜福镇傅家埠的傅士古，字商贤，自幼爱武，拜莱阳许青云为师，与莱阳的孙可扬、宋允通合称‘胶东三杰’，精通‘仙人拱手’气功和双龙剑、三花刀、太极刀、拳械等”[6](P9)，傅家埠一村武术兴盛时达到拳房13处之多。傅士古短拳现入选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及成立了傅氏拳法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普及传承服务社会设立了固定的场所。

清政府末在青岛设立海防基地，用作边防军事驻地，以胶州湾为基地，防止外敌侵占胶州湾登陆内地，主要任务是防御海上入侵之敌。由于总兵衙门的建立，后经德国军队侵占成为租借地，通讯设施已成立电报房、邮政局，使已初步繁荣的港口成为一个市镇，使青岛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青岛在工商业繁荣、渔行业发达的情况下，社会文化也很活跃。每到传统节日，天后宫和附近都有戏剧演出，“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兆姑、梆柳、秧歌、江湖把式无所不有”[7](P3)，可见这时的青岛已是繁华的市镇，江湖三教九流人士自身就有武艺精通的人，他们走南闯北没有过人的防身武艺是无法立身的。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都指挥佥事，督察山东胶东沿海备倭屯田、训练军事等，对来自蓬莱、威海一带总兵衙门驻扎的军士居民习武遗风影响甚大。驻防兵士在军营还经常举办各种武术训练、竞技比赛等活动，随着结束兵营生活，部分人员回到原籍也有留置青岛当地发展，为武术的传承留下了种子。他们忙时种田闲时教孩子习文练武，为后代兴武很大的推进作用，这一期间涌现了颇有造诣的“戚家拳”“戚家棍”“戚门十三剑”等拳师，为青岛早期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二、青岛国术馆创立及其影响

### （一）青岛国术馆之创立

从清朝设立驻军海防基地到青岛开埠被德军侵占17年，青岛区域武术仅限于师徒、宗族血缘秘密之间相传承，崂山盛传的道教武术、螳螂拳等也是私下传承，都没有公开的传授武术。清朝是禁止民间练习武术的，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期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对境内练拳习武更加严管。青岛最早的武术组织“中华武术会”是张石麟、宋铭之邀请有关人士于1911年成立，但昙花一现很快凋零。根据山东武术志中记载：辛亥革命发生后，政府为了训练军警体质能打胜仗和培养学校师资，解禁民间习武培养会武人才，尚武之风渐盛。其中军政当局系统以马良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为代表，1914年在济南成立山东省军士武术传习所，也称之为“中华新武术”，随之于1917年改名为山东省武术传习所，聘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武术高手，如杨鸿修、李存义、常秉章等不分门派，各种拳械、流派任其传授，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发展。

在1919年著名武术家王子平率济南武术传习所武术表演团来青岛，齐燕会馆公开表演武术，武术活动才在青岛社会公开化。山东武术传习所于1922年解散后，总教习韩愧生带领王子平、常秉毅、杨明斋、李存义等多人来青岛公开开馆授徒传习武术[6](P10-11)，青岛习武之风渐盛，武术事业开始繁荣，多门派的武术内容促进了青岛武术的发展。1923年，韩愧生租借“齐燕会馆”礼堂背面，成立“国技学社”以授孙膑拳为主，成为青岛武术人士最早研讨传授武术场所；王子平、沙吉福在芝罘路“三江会馆”组织了“中华武术社”以教查拳为主；杨明斋在中学、小学开设了孙膑拳、查拳课程，也利用晚上时间传授武术。一直在青岛流传的螳螂拳拳师钟瑞臣、刘殿奎、张克勤等也在各自的住所附近设场传授武术，随之，一些教场发展起来了。1922年北洋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青岛主权，根据条约只准中国驻扎海军和警察保安大队，不准驻陆军，仅依靠警察维持秩序。日本侨民及开办的工厂到处皆是，他们保有特权，大批日本浪人横行霸道，气焰极其嚣张。于是老百姓自发练武、各工厂工人聘请武术教练习武，增加与日本浪人自卫对抗的能力，后政府拨经费予以支持，武术渐渐渗透到岛城各个领域，形成一种与日本浪人对抗的民间力量，是

战场外无硝烟的战争。

清朝末年梁启超就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被压迫是缺少“尚武”精神与民族精神之孱弱，激情写下名著《中国之武士道》，其在自序写到：“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8](P5)蔡锷的“以救国为根本目标、尚武为内在精神、军事为教育内容、强民为基本途径的军国民思想”，此师生两人通过“尚武救国”以求达到“身强、种强、族强、国强”，使民族不再受外人欺凌。此二人“军国民思想”与1927年北伐成功后，曾是西北军五虎将之首、西北军代总司令的张之江提出的“强种强国，御侮图存”[9](P56)救国思想一致，张之江离开军队后只在国民政府任委员，提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将其由民间推向上层”，随后，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最终，由国民政府“第174号令”批准备案，建立中央国术馆，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不受教育部的管辖，经费由国库开支，并将武术改称“国术”的申请，以提高武术的重要性，1928年3月24日，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并行文各省、市建立国术馆体系。青岛武术界经过筹备，以租馆陶路6号“齐燕会馆”的场所，“青岛武术馆”于1929年9月12日由马福祥任馆长正式成立，纳入政府管理，因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先后租借商河路仓库做活动场所，直到1933年，东北军海军副司令沈鸿烈任青岛特别市市长才开始筹建国术馆并任馆长。由市政府出面集资建主楼（三层）一座，平房三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楼四周均有大小不同的空地，设有沙坑、单双杠、拉力带、石锁、石担等训练辅助器材，当时设施、场地规模在全国一流的。国术馆教员均来自武术界名人，杨明斋、高凤岭、常秉毅、秘道生、尹玉章、纪炎昌、韩冠英等在此任教。

（二）青岛国术馆之比赛

青岛国术馆于1929年9月成立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止，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前夕是青岛国术馆武术教学、交流及发展鼎盛时期，从参加全国国术比赛取得的成绩及国术馆教员、学员积极参加抗日的爱国行为都是令人高瞻的。1937年日军进入青岛后，国术馆解散，高芳先副馆长带领学员进入崂山山区成立抗日游击队，杨明斋在鲁南加入抗击日军队伍，于1941年8月与日军交战时不幸殉国，国术馆历经20年为武术事业的发展、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年3月1日出版的“青岛特别市国术馆月刊”提出“用国术的刀剑斩断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用国术的枪棍，打倒帝国主义侵略”[6](P11)，从月刊提出就可以知道国术馆创建的宗旨就是强壮体魄用武力打击外来侵略者，与中央国术馆创办的《国术周刊》：“唤起全民尚武之精神，化除宗派，略域之界限。声应气求，不忘雪耻御侮之志”[10]的要义是同宗的。国术馆对社会各类私设拳房均予登记统一管理，1935年在册的练习场所有95个，1937年发展到151个，练习所的学术达到5000多人。青岛市在1935年制定了“全市中、小学学生体育标准”，然后把拳术、器械列入中小学及师范学校体育毕业会考内容，由国术馆指派与会同学校两方共同评定标准，这一时期，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学生练习国术的热情高涨，武术运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并将国术列为军队必修科目。青岛国术在中小学的普及发展，离不开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的支持，他早年东渡日本学习海军知识，接触到日本武士道教育对孩子体格发展重要性，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抵御外敌。他主张发展国术，国术无需设备，不费金钱，无论何时、何地均可练习，还组织纱厂工人成立纱厂练习所，兼收市民训练国术，由国术馆派教员指导，练习国术的青年工人热血澎湃，爱国情绪高涨，促进了国术在各个阶层普及。

1929年11月，李景林在浙江杭州举办了“全国国术游艺大会”（筹办时称：全国打擂比赛），青岛国术馆也组建了16人的代表团参加这次全国国术打擂比赛，国术表演中，高作霖展示了五形拳、纪雨人的孙膑拳三十二手、高守武的太乙拳、纪雨人与高作霖的孙膑拳对打，青岛国术馆其他馆员还表演了缠丝枪、缠丝刀、器械对练等，大会最后结果评出了26名最优和优等运动员，四名青岛武术馆馆员高作霖、祝正森、高守武、纪雨人名列获奖之中[6](P11)，高作霖（杨明斋入室弟子）获打擂台赛第二名好成绩，在这次比赛中青岛武术馆闻名于大江南北。于1933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华北第17届运动会国术比赛8个项目中常秉毅、韩冠英的对练，张培五的枪术、刀术、黄术堂的棍术，杨明斋的铁板桥（硬气功），韩冠英的其他器械这六项获得冠军，还有2项第二，1项第四[6](P12-13)。随之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国术项目组4个冠军、2个第二、3个第四，同时又在在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国术考试，有青岛王玉山、李忠先等18人组成的代表队过关斩将获得了国术考试总分第一名。“1934年10月，在华北第十八届运动会上，获国术5项冠军，2项第二名，1项第三名。孙子建、肖鸿义的对拳，田秉义的剑术，田秉义、纪炎昌的双器械，栾秀云（女）的杂项器械这五项获得冠军，肖鸿义的单拳、栾秀云的剑术获得第二名”[6](P13)。在这次比赛中，女运动员栾秀云成绩崭露头角，出现在大众面前，具有“青岛第一女剑客之称”。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六届运动会上，获4项冠军、2项第二、1项第三名、进入前6名的还有7人，男子李世基获单人器械第一名，杨为秀获中量级测力第一名，谭祖秀

获轻量级摔跤第一名，孟广增、蓝信成获双人器械第三名，齐秀兰、姜爱兰获女子双拳第一名，女子武术获团体总分第四名。

青岛国术馆学员在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国术考试中取得的成绩是骄傲的，参加的运动员数量多、比赛拳种项目丰富，每次比赛都有新的运动员出现，国术人才辈出。当时青岛国术馆比赛成绩卓越，社会影响力也很高，有“全国国术看山东，山东国术看青岛”的说法。1935年宋美龄到青岛，特别点名到青岛国术馆观看高凤岭表演的太乙醉及高凤岭与韩冠英的对练猴戏八仙，陪同前往的有韩复渠、沈鸿烈、张之江、于右任、何应钦、蔡元培等要员。1934年7月，著名作家郁达夫和妻子王英霞来青岛，闻栾秀云的大名，特请其表演了一套剑术，大为称赞并做《栾女士秀云为舞剑》：堂堂国士盈朝野，不及栾家一女郎。舞到剑飞人隐处，月明满地滚青霜。这首诗表明在青岛武坛也活跃着女中豪杰，同时折射出彼时青岛习武也受到了文人的关注。在当时青岛武术界，也活跃着文学巨匠—老舍，老舍先生是文武兼备之人，名副其实的“练家子”，根据舞剑心得，编写了《舞剑图》。在青岛居住时就曾慕名拜访杨明斋，观看杨表演的十八路查拳令其赞叹不已，还与青岛国术馆奠基人之一的毛利泉切磋武艺，以武会友、谈诗论文，留下了一段文武相会的传奇逸事和佳话。

（三）青岛国术馆之爱国事迹

民国时期日本人在青岛开了许多的纺织厂，其中有家大康纱厂，经常无理由解雇老工人，然后再廉价招新工人，当时用老工人一个月需要十七八元，而新工人只要七八元就可以，他们就这样肆无忌惮的压迫中国工人。在青岛国术馆学习的小刘正常去大康纱厂去上班，被日本门卫拦在外面不让进并说“你的走开，已换新人”，小刘见日本人如此欺负中国人，随之与日本门卫争执打起来，使用所学拳脚功夫打倒了七八个日本门卫，小刘见此知道惹了祸就离开了国术馆再没有回来。日方向市长交涉交出凶手，并要求解散国术馆，沈鸿烈市长也很强硬的答复日方，日方恼羞成怒派遣9艘军舰一千余海军包围了青岛港，以武力相威胁。日海军陆战队竟在青岛登陆，包围了市政府和国术馆，抓走了教习杨明斋及向誉久秘书并捣毁了国术馆设施。日本在国术馆抓人后，沈鸿烈市长出面与日本人交涉，杨老师的两千多学生及社会各界也呼吁放出杨老师。日本人在没有搜查到小刘的情况下，担心事态闹大了，又考虑在青岛的利益，被迫放了国术馆的教员及秘书。杨明斋出来后，把日本人捣毁的国术馆重新修复一番，挂上“青岛市国术馆”的牌子，大张声势，重新使国术馆运营教学，直至日本人全面攻占青岛。

青岛国术馆副馆长高芳先，从师于杨明斋孙膑拳得到真传，还从王永彬、杨庭栋、田鸿业、李义三、常秉义等学习北派少林拳、地功拳、形意拳、中国摔跤等，是技艺双全的武林高手。青岛沦陷时，高芳先将国术馆馆员组成“国术救国大队”，成立了大刀队和爆破大队。大刀队严密监视日侨行动，个个摩拳擦掌等待与日军进行贴身肉搏，这种高昂的斗志架势吓退了日军，因为他们在喜峰口战役中领教过中国大刀队的厉害。大刀队的武术招式破锋八刀，是针对日本兵擅长刺刀的特点编制的，有八套刀法，简单易练，双手握刀劈、砍快速有力，刀刀可中敌之要害。国民政府在撤离青岛时，国术馆组成的爆破队对日本的化工厂、九大纱厂实施了爆破，从沧口、四方到市内连绵三十里，爆炸声连续轰鸣，烟雾弥漫，日本工厂尽成焦土[11]。

高芳先组建的“国术救国大队”后被国民党召编为正规军青岛保安大队，高任大队长，带领队员进入崂山山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带领队伍袭击日军，卓效匪浅，因功勋彪榜，被誉为“崂山之狮”美誉，成为抗日名将，升至为少将师长。后因国民党军退居台湾，高芳先也带领部下青岛国术馆馆员及青岛保安旅来台，在台中市开设武馆，传授武艺，也为传统武术的传承、传播做了很大的贡献。

**三、青岛国术馆对青岛武术以后发展**

火器输入中国后，弃旧武术技击，增设兵操学习日本的军事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武术技击不学，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提倡技击，振兴尚武精神[12](P177-178)。1915年4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由北京体育研究社徐禹生等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议案认为，学校体育“皆袭他人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故兴学二十几年，而国民之强健，未见有若向之进步也，故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12](P25)，中国旧有技击合法化的列入各级学校体育课程。当时学校课程开设武术技击课没有充裕的师资教员，就聘任社会老拳师、各武术组织、军队教员等担任，如青岛“国技学社”教习杨明斋就担任北平路小学、商河路育英小学及附近中小学的国术拳师。国术在民国时期进入到了中小学校的课程，为学生锻炼身体、强身自卫进行了普及。

民国时期青岛武术全国比赛成绩是辉煌的，习武之风弥漫全城，武术普及到了各个阶层，练习武术人数多，当时青岛不到40万的人口城市，竟有一万人在练习武术，不只有男性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国术教学内容丰富，有不同拳种门派，代表性的武术派别和传人有：“少林长拳：韩愧生、刘殿魁、张鹏福、纪炎昌、张培狱；查拳：王子平、沙吉福、齐奇海、孙玉秀、徐杰三、杨明斋；

孙膑拳：杨明斋、杨钧韶；太乙拳：高凤岭、王汇东、刘英华；螳螂拳：王玉鹏、郝恒禄、郝宾、李占元；地功拳：郝清桂、张克勤、钟瑞臣、李忠先；形意拳：张占魁、田鸿业；八卦掌：张占奎、尹玉常、常秉毅；太极拳：田鸿业、纪炎昌”[6]（9-10），为青岛武术以后的发展做好了群众基础。

解放后，在国术馆训练过的学员发挥着重要作用，传授各自流派的武技，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武术教练员与运动员。“山东省于1958年8月成立省武术队，选调青岛的周永福、赵瑞章为教练又兼运动员，周永祥、徐学义、王常凯、王建忠、邱桂香、刘金芳等为运动员组队”。[6]（P15-16）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武术比赛上，山东省武术队徐学义获短器械冠军、长器械第四名，范桂娥获短器械第四名的好成绩，为山东省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青岛武术名人王常凯从1960年到1981年间，曾随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出访缅甸，1974年又随周总理作为武术教练随团访美，随行的还有青岛籍武术运动员全国武术冠军初学玲教授（2014年青岛大学体育教学部退休）。青岛武术名人不但在国家队、省队、高校担任工作，还有活动在影视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少林寺》电影中的王仁则扮演者于承惠、饰演“十三棍僧之一”的“色空和尚”扮演者孙建魁、武术动作指导者邱方俭，这三人都是青岛籍武术名人。

青岛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集结地，来自不同地域文化门派的武术名家聚于青岛国术馆教学传授武术，成就了拳种丰富的青岛武术文化，在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并在抗击日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曾经辉煌的青岛国术馆，为以后的青岛武术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1983年国家体委召开全国武术工作会议，青岛贯彻会议精神，整理、挖掘出单练拳术157套，对练20套，单练器械139套，对练器械47套[6]（P19-20），近几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拳种有鸳鸯螳螂拳、螳螂拳及孙膑拳。


**参考文献：**

[1] 王艳花.元至民国时期的青岛武术发展及其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14,（4）.

[2] 曾玉华,许万林,陈红军.我国东夷氏族集团体育文化的流变及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第31卷,2008,（11）.

[3]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编纂.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徐强,张胜利.先秦时期齐鲁武术文化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4,（2）.

[6]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体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7] 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青岛史话[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

[8]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9] 张润苏.张之江传略[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10] 周庆.体育文化导刊[J].1992,（02）.

[14] 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鸿烈生平轶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1] 韩冰,路彩红.民国时期学校武术课程发展研究[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10）.

[12] 体育丛刊[M].北京:北京体育研究社编辑出版,1924.



**责任编辑：侯德彤**


#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Qingdao Guoshu Institute


DENG Yi-hua　GE Ji-sheng　CHU Xue-ling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Befor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shu (martial arts) in Qingdao mainly referred to Taoist wushu of Mt. Laoshan and the military wushu practiced in the garrison defense army. In September 1929, Qingdao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State Guoshu Institute was established,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promoting wushu in Qingdao and won awards at the National Games, guoshu competitions and guoshu examinations. The Institute set up the anti-Japanes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roadsword Team, the Explosive Team and the Anti-Japanese Guerillas,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Key words:** guoshu institute; Taoist martial arts; Dongyi Culture

# 道安与东晋清谈

赵 伟

（青岛大学 国学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道安因其卓越的成就，在东晋时便已享有极高的声誉。汤用彤称赞道安能够不借清谈而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与发展，实际上道安对于东晋的清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世说新语》等文献中保存有少量的道安清谈的记载，从中能看出道安清谈水平极高。道安擅长“双玄”，传扬的般若学以及对“双玄”的阐发，成为支道林等清谈者玄谈的重要内容，对两晋清谈的内容、形式和风气都起到了推动作用。道安极好地利用了东晋的清谈，推动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发展。

**关键词：**道安；东晋；双玄；清谈；般若学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60-08

释道安生于晋永嘉六年（312），卒于太元十年（385）。道安对于佛教的建设与贡献之一，是能在清谈之下使得佛教理论得到发展，汤用彤说：“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艰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1]（P132）关于释道安“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而“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的探讨，如译经及其贡献、般若理论的阐发、佛教戒律的制定等诸方面，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诸文、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魏晋玄学论稿》、荷兰学者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日本学者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日文原名为《中国仏教通史》，英译本题名为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m*）、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等著作中，已有充足的论述，本文重在叙述道安利用清谈建设和发展佛教。

## 一

自西晋始，名士们纷纷热衷于读佛经和结交僧徒，《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2]（P2101）这段话表明晋之名士们游山水与玄谈目的之一是为求“乐”“欢乐之趣”，同时表明名士们交往所玄谈的对象十分广泛，除了名士之间的交谈，还有与佛教僧徒、道教道徒们之间的谈论。这些谈论，往往能丰富玄谈的内容，并能推动佛教、道教在理论上的发展。佛教僧徒同样喜欢结交士人，并利用与士人、名士们的清谈发展佛教。汤用彤分析，“得助于魏晋清谈”是两晋佛教兴盛的原因之一。他说：“盖世尚谈客，飞沈出其指顾，荣辱定其一言。贵介子弟，依附风雅，常为能谈玄理之明俊，其商誉僧人，亦固其所。”[1]（P134）此种状况，如《晋书》云：“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2]（P2098-2099）孙绰、李充、许询都是当时的名士；支遁即支道林，作为佛教僧徒，与玄谈之名士们交往颇密。

**收稿日期：**2018-05-23

**作者简介：**赵伟（1973-），男，山东平度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这个过程中的佛教僧徒在宣扬、传播佛教时，多在理论上牵合魏、西晋兴起的玄学，多取《老》《庄》中之名辞，用来比附、释解佛教概念。如《世说新语》载支愍度事云："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所谓的"旧义"，刘孝标注引云："种智有是而能圆照。然则万累斯尽，为之空无；常住不变，为之妙有。"尽累之谓空，即万物未尝无之意，不空外物，非佛教之正理。支愍度摒弃"旧义"，而言"心无"，意如刘孝标注引："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3](P459)此即汤用彤先生所说："推求心之体，以为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1](P188)刘孝标的注引及汤用彤的解释，皆表明支愍度所立新义向玄学的贴近。这种贴近，初衷或许只是"权救饥尔"，在实际中却有效地推动佛教的传扬和发展。

支愍度弃旧义而立新义以"权救饥尔"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如释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4](P562)；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与玄学士人的交往，通过与名士的交往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从而更好地宣扬佛教。在这个背景下，许多僧徒如竺道潜一般，成为了清谈中的"道俗标领"。《高僧传》云："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于时简文作相，朝野以为至德，以潜是道俗标领，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顶戴兼常，迄乎龙飞，虔礼弥笃。"支道林颇"宗其风范"，称赞其为"弘道之匠"。《高僧传》云："潜虽复从运东西，而素怀不乐，乃启还剡之仰山，遂其先志，于是逍遥林阜，以毕余年。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5](P156-157)

支道林比竺道潜交往的名士更多，"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5](P159)这些名士大多与支道林都极为亲近，如谢安曾写信给支道林说："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蹙蹙，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又载众名士对支道林的评价："至晋哀帝即位，频遣两使，征请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波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太原王濛，宿构精理，撰其才词，往诣遁，作数百语，自谓遁莫能抗。遁乃徐曰：'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濛惭而退焉。乃叹曰：'实缁钵之王何也。'郗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问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论辩，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渊源。浩实有惭德。'郄超后与亲友书云：'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5](P160)这些话语都是对于支道林的极高评价。

与竺道潜、支道林等僧徒以标新立异之清谈扩大佛教的影响时，释道安主要在北方进行着"独立之建设"佛教的工作。关于释道安的生平，可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当时的释道安，在与名士清谈方面，似乎要比支道林等人逊色得多。《世说新语》中只在雅量篇录其轶事一则，云："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饷米千斛，修书累纸，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沈约所撰与《世说新语》同类之著作《俗说》中，收释道安事一则："释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广一寸许，著臂如钏，将可上下，时人谓之印手菩萨。"[6](P60)《俗说》一书已佚，本条存于《太平御览》。其与名士们的交往、清谈之风，似乎远不如支道林等人。实际上，释道安与两晋的清谈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能巧妙利用"国主"以及清谈的力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传扬的般若学为其他清谈者提供清谈内容；二，分徒众至扬州和荆州结交彼地之清谈"君子"而弘法，迅速发展了佛教的力量。

## 二

支道林虽然与名士们盛谈双玄，其所宗则为释道安所论之理。《世说新语》雅量篇"郗嘉宾钦崇释道安德问"下，注引《安和上传》云："以佛法东流，经籍错谬，更为条章，标序篇目，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支道林在当时并非佛教活动之中心，活动之中心乃是释道安。梁启超在其《翻译文学与佛典》中说："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符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

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7]（P169-170）许里和说：“考察完晋代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在东部地区的兴起之后，我们将要追踪当时其他三个主要的佛教中心：在襄阳（湖北水部汉水之滨）有由道安主持的教团，兴盛于公元 365—379 年；在江陵（湖北南部长江之滨）有相对逊色但在当时仍属重要的佛教中心；在庐山（江西北部）也有一个中心，约于公元 380 年建立，持续到开山祖师慧远（公元 377—417 年）圆寂为止。”[8]（P305）梁启超所论主要着眼于其功绩，许里和之论则着眼于其译经活动。

释道安是在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因慕容儁略河南，而南下襄阳。在来襄阳之前，释道安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习凿齿在《与释道安书》中说：“又闻三千得道，俱见南阳，明学开士，陶演真言。上考圣达之诲，下测道行之验。深经并往，非斯而谁，怀道迈训，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藏。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情，非常言也。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视明誓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逸响重荡濯于一代矣。”[9] 习凿齿在书信中充分表达了敬仰之意，书末落款“弟子襄阳习凿齿稽首和南”，竟自称是释道安之弟子了。

习凿齿之所以能给释道安写信，自然是看到释道安当时的重大影响。道安自幼“聪俊罕俦”：“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闇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而异之。”后师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颇有轻视之意，佛图澄说：“此人远识，非尔俦也。”[5]（P177）道安在佛图澄门下修学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逐渐在整个北方佛教界建立起一定的声望。石赵灭亡后，冉闵政权不重视佛教，“人情萧索”，道安对跟随他的徒众说：“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隐居避乱，继续修学。道安《道地经序》中对这段时期的状况描述说：“予生不辰，值皇纲纽绝，獯狁猾夏，山左荡没。避难濩泽，师殒友折，周爰咨谋，顾靡所询。时雁门沙门支昙讲、邺都沙门竺僧辅，此二仁者，聪明有融，信而好古，冒险远至，得与酬酢。寻章察句，造此训传，希权与进者，暂可微寤。”[4]（P368）释道安在如此困难时期，周围都有大量志同道合的徒众，其声望与凝聚力自是不言而喻。在其南投襄阳时，其徒众据《出三藏记集》所记有五百余人，其中不乏竺法济、竺昙讲、竺法汰、释慧远等水平很高的名僧。

习凿齿给释道安写信，一定是鉴于其所获得的声望，以及在译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释道安此时在译经方面的成绩，汤用彤总结说：“安公曾读支曜之《成具光明经》。自言中山支和上写《放光》至中山，又为慧远讲般若。则其于汉末以来洛阳仓垣所传之佛学，已备加研寻。而其《渐备经叙》云，在邺得见博学道士帛法巨。此应即在天水为竺法护笔受者。并言遇凉州二道士，皆博学，以经法为意。其一人名‘彦’，曾言及护公所出经，则二人疑亦为护公之徒。叙又云：得《光赞》一卷。则其在河北，已注意及竺法护所传之大乘经矣。其在濩泽，见大阳竺法济，并州雁门支昙讲，与折槃畅碍，作《阴持入经注》。又与支昙讲、邺都沙门竺僧辅注《道地经》。又冀州沙门竺道濩，于东垣界得《大十二门经》，送至濩泽。安公为之筌次作注。三经均安世高所译之禅经。此外《安般守意》《人本欲生》《十二门》等之经，均有关禅数，世高所译，安公各为之作注。”[1]（P141）道安一生对《般若》的研究最为用力，根据汤用彤的罗列，道安与《般若》有关的著述有：《光赞折中解》一卷、《光赞抄解》一卷、《放光般若折疑准》一卷、《放光般若折疑略》一卷、《放光般若起尽解》一卷、《道行经集异注》一卷、《实相义》、《道行旨归》、《般若折疑略序》、《道行经序》、《大品序》、《合放光光赞略序》、《摩诃钵落若波罗蜜经抄序》、《性空论》等。道安在般若学上的所作的工作而受到尊重，并使支道林等人“宗其理”，成为支道林等僧徒与士人们清谈的内容。支道林善讲般若，上引《高僧传》言其注《安般》、《道行旨归》等，又讲《道行波若》等。据《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还讲过《小品》：“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从“道人每辄摧屈”来看，支道林讲般若的效果很不错。和支道林交往的众多名士们，也有许多热衷于讲般若，如殷浩，《世说新语》文学篇云：“殷中军被废东阳，始看佛经。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密太

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又云：“殷中军读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滞。尝欲与支道林辩之，竟不得。今《小品》犹存。”本句下注引《高逸沙门传》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达，欲访之于遁，遂邂逅不遇，深以为恨。其为名识赏重如此之至焉。”

道安、支道林时代的般若学，昙济概括为六家七宗。陈朝小招提寺慧达法师作《肇论序》，言“或六家七宗，爰延十二”，六家七宗的内容已多有论述，此处不加以赘述。其中第三即色宗为支道林所讲，唐元康作《肇论疏》中解释说：“以离缘无心为空，合缘有心为有”；而第一本无宗即释道安所讲，元康《肇论疏》中解释说：“以理实无有为空，凡夫谓有为有”[10](P16-17)。所谓本无，即般若性空。《名僧传抄》之《昙济传》中提到昙济著《七宗论》，讲第一本无立宗曰：“如来兴世，以本无弘教。故《方等》深经，皆备明五阴本无。”本无论的起因是：“夫冥造之前，廓然而已。至于元气陶化北，则群像禀形。形虽资化，权化之本，则出于自然。自然自尔，岂有造之者哉！由此而言，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非谓虚豁之中，能生万有也。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夫崇本可以息末者，盖此之谓也。”即色，《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道林造《即色论》”下引支道林《集妙观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即色表面上与本无没有密切的相关联系，但汤用彤说：“支法师即色空理，盖为《般若》‘本无’下一注解，以即色证明其本无之旨。盖支公宗旨所在，固为本无也。如其《要抄序》曰：‘夫《般若波罗蜜》者……明诸佛之始有，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越无生之径路。何者耶？赖其至无，故能为用。’此谓至极以无为体。因须证无之旨，支公特标出即色空义。”[1](P183)支道林的即色宗，不过是道安本无宗的注解，是故言支道林乃宗道安之理。

支道林之所以宗道安之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道安这样一个有成就的佛教学者，也谈论玄学。本无之所出，乃与玄学有关，“观乎本无之各家，如道安、法汰、法深者，则尤兼善内外。如竺法深之师刘元真，孙绰谓其谈能雕饰，照足开矇。盖亦清谈之人物。故其弟子法深，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而支公盖亦兼通《老》《庄》之人。因此而六朝之初，佛教性空本无之说，凭藉《老》《庄》清谈，吸引一代之文人名士”[1](P171)。道安兼善《老》《庄》，从“本无”一语本身便可以看出。何晏、王弼祖述《老》《庄》，指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支谶《道行经》第十四品名为《本无品》，其中云：“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等无异于真法中本无，诸法本无，无过去当来现在，如来亦尔，是为真本无。”是支谦时便以“本无”译“真如”，道安的本无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沿袭了支谦的译法。这种译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般若》之理趣与《老》《庄》之旨趣相符。道安又在《安般注序》中引用《老子》中语：“寄息故无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无为故无形而不因，无欲故无事而不适。”[4](P245)“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者，《老子》第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庄子》知北游篇中亦云“故曰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云：“般若波罗蜜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正者，等也，不二入也。等道有三义焉：法身也，知也，真际也。故其为经也，以如为始，以法身为宗也。如者，尔也，本末等尔，无能令不尔也。佛之兴灭，绵绵常存，悠然无寄，故曰如也。法身者，一也，常净也。有无均息，未始有名，故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泯尔都忘，二三尽息，皎然不缁，故曰净也，常道也。真际者，无所著也，泊然不动，湛尔玄齐，无为也，无不为也。万法有为，而此法渊默，故曰‘无所有者，是法之真也’。由是其经万行两废，触章辄无也。何者？痴则无往而非徼，终日言尽物也，故为八万四千尘垢门也。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也。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4](P266)这段话融会佛教与《老》《庄》之理。道安的这种援引以释解般若，使支道林尤有同感。

由此来看，释道安是擅长“双玄”的，支道林等热衷于玄学清谈之僧徒与众名士皆“宗其理”的状况，说明释道安对于“双玄”的阐发，对两晋清谈的内容、形式和风气都起到了推动作用。此正如胡适所说的：“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

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11]（P653）《高僧传》等文献皆记载道安对自己所注经不自信事，云：“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堪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5]（P183）猜测道安对自己所注佛经“恐不合理”的担心，应该就是用玄学的观念和方式来注解佛经，采用这样的方式，担心不符合佛经的原意而受到批评。所以要梦到一个“胡道人”（亦有文献说是“梵道人”，比较起来，“梵道人”可能要更准确一些）对于注经肯定其注经“殊合道理”，道安方能安下心来。

## 三

上文述及到，在《世说新语》等记载当时名士、僧徒清谈与轶事的著述中，仅录有两条关于释道安的材料，与支道林等僧徒、殷浩等名士保存下大量的清谈资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是释道安没有注意到当时清谈对佛教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反，释道安在对佛教的推扬过程中，极好地利用了两晋的清谈。

道安为了弘扬佛教，曾两次分徒众到各地去传法。第一次带领五百余徒众南下襄阳时，《世说新语》赏誉篇“初，法汰北來，未知名”下注引车频《秦书》云：“释道安为慕容晋（儁）所掠，欲投襄阳，行至新野，集众议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乃分僧众，使竺法汰诣扬州，曰：‘彼多君子，上胜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扬土焉。”道安在这里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之语，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道安认识到要在中国传扬佛法，必须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这句话的重要性确如历来研究者所论述的。然而其对竺法汰说的扬州“彼多君子，上胜可投”之语，也不可忽略。

道安注意到扬州“彼多君子”，对于佛教的发扬非常有利。扬州的“君子”具体之所指，可从下面事例中看出来。

事例一。《世说新语》黜免篇云：“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殷中军便是殷浩，是非常活跃且影响极大的清谈者，其清谈之水平颇得到时人的认可。如《世说新语》文学篇“殷中军读《小品》”下注引《语林》言其与支道林事云：“浩于佛经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虚怀欲往，王右军驻之曰：‘渊源思致渊富，既未易为敌，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纵使服从，亦名不益高。若佻脱不合，便丧十年所保。可不须往。’林公亦以为然，遂止。”[3]（P124–125）《世说新语》政事篇“殷浩作扬州”条下注引《浩别传》云：“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人……浩少有重名，仕至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殷浩任扬州刺史的时间不短，故《世说新语》文学篇“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条中，直接称其为“殷扬州’。《郭子》中有“殷浩作扬州”条，言其治扬州甚严，云：“殷浩作扬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幞；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6]（P55）

事例二。《世说新语》伤逝篇云：“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注引《灵鬼志·谣征》曰：“文康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旌。’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旌车。’”可知庾亮亦曾驻守扬州。

事例三。《世说新语》贤媛篇云：“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注引《八王故事》曰：“浚字开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吴，自御史中丞出为扬州刺史。元康初，加安东将军。”是“少有才名”的周浚曾于此作扬州刺史。

事例四。《世说新语》仇隙篇云：“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下注引《中兴书》以言王蓝田（述）任职扬州事：“羲之与述志尚不同，而两不相能。述为会稽，艰居郡境。王羲之后为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诣，述深以为恨。丧除，征拜扬州，就征，周行郡境，而不历羲之。”是知王述曾居官于扬州。《世说新语》赏誉篇中亦云：“王蓝田拜

扬州，主薄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事例五。《语林》记王导事，云：“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悦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名颙，时官在都，预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悦，因过胡人前，弹指曰：‘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惧。”[6]（P54）此事并见《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之从兄王敦，亦曾为扬州牧，《世说新语》文学篇“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下注引《敦别传》曰：“敦字处仲，琅邪临沂人。少有名理，累迁青州刺史。避地江左，历侍中、丞相、大将军、扬州牧，以罪伏诛。”

事例六。事例二中所提到的“何扬州”是何充，字次道，亦曾为扬州刺史。《语林》云：“何公为扬州，有葬亲者，乞数万钱，而帐下无有。扬州常有槁米，以赈孤寡，乃有万余斛；虞存为治中，面见，道：‘帐下空素，求粲此米。’何公曰：‘何次道义不与孤寡争粒。’”[6]（P33）《世说新语》政事篇“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晋阳秋》曰：“何充字次道，庐江人。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累迁会稽内史、侍中、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赠司徒。”何充是高层官僚中较早信仰佛教者，《晋书》何充传言其“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亲友至于贫乏，无所施遗”[2]（P2030）。《世说新语》排调篇云：“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瓦官寺是当时士族和名士们汇集的一个中心，上引《世说新语》载支道林曾在瓦官寺讲《小品》，如何充、刘丹阳、王长史、僧意、王修、戴安道、桓伊等士族和名士皆曾在此汇集过。何充之弟何准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充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而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2]（P2417）。

事例七。《世说新语》方正篇“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条下注引《蔡司徒别传》，言蔡谟亦尝为扬州刺史，云：“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人。博学有识，避地江左，历左光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

上述所举七个事例，说明在此前后的时期里，扬州是重臣镇守且众多名士汇集，更有如喜谈佛经又为刺史的殷浩，既符合道安依靠“国主”又迎合清谈的想法，对于佛教的发展必然发挥着重要的推力。

道安第二次分徒众，是在襄阳。《高僧传》卷第六《晋庐山释慧远》云：“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373），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5]（P212）道安这次分徒众，将最器重的门人慧远分向荆州。

道安将慧远分向荆州，反映了他的过人之处，体现了他灵敏的嗅觉。晋南渡之后，有徐州、扬州、江州、荆州等几个重镇。这几个地方的刺史基本上由几个大的门阀望族所占据。这几个州中，扬州和荆州地位尤其重要。在三吴中，扬州与会稽由于一直比较稳定且物产丰饶，是当时晋朝的粮食供应地，都城与军队的粮食基本上依靠的就是扬州与会稽的供应。荆州地处要冲，扼住东晋都城建业的上游，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门阀大族、权臣们争夺之地。任过荆州刺史的庾亮、桓温、殷仲堪、庾翼、王敦、陶侃等，只有陶侃起自寒门“非世族”，其他皆为门阀大族；陶侃虽出自寒门，然亦位高权重。在荆州的不只是权重之臣，更在这些重臣周围聚集了大量的名士，给道安写信的习凿齿亦曾居于荆州，《世说新语》文学篇云：“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习凿齿能居荆州，是因为他是桓温的亲信，颇受桓温的信任。兹列举在荆州之“君子”之事例。

事例一。《世说新语》德行篇云：“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盘，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乃接王忱，本条下注引《晋安帝纪》曰：“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世说新语》识鉴篇记殷仲堪为荆州刺史之原因说：“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王忱乃当时善言谈者，《世说新语》赏誉篇云：“范豫章谓王荆州：‘卿风流儁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殷仲堪亦为善谈论者，《世说新语》言语篇记其与桓玄事：“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世说新语》政事篇云：“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

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又记桓玄与殷仲堪相互攻难：“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语林》亦记二人相互嘲弄事：“桓玄字信迺，沛国龙亢人也。晋时为部公，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语次，二人遂相为嘲。玄曰：‘火燎平原无遗燎。’堪曰：‘投鱼深泉放飞鸟。’次复危言，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树枝。’堪曰：‘井上辘轳卧小儿。’”

事例二。《世说新语》言语篇云：“庾稚恭为荆州。”注引《庾翼别传》曰：“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时论以经略许之。兄太尉亮薨，朝议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进征南将军、荆州刺史。”

事例三。《世说新语》政事篇中提到陶侃在荆州事：“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

事例四。《世说新语》政事篇提到桓温在荆州事：“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桓公”即桓温，本条下注引《温别传》曰：“温以永和元年，自徐州迁荆州刺史，在州宽和，百姓安之。”

这次分徒众是在符秦攻略襄阳、道安被朱序所拘不得出的状况下做出的决定，荆州当时相对比较安稳。释道安让慧远到荆州去，可谓实现了他的目的。慧远来到荆州后，见到了殷仲堪。《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殷仲堪与慧远的对话：“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最终慧远成为了当时佛教的一个发展中心。

上述在扬州、荆州的门阀权臣们，往往本身就是名士，或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与名士结交紧密，否则他们就很难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这些权臣因为政治利益，完成了由门阀士族向玄学士族的转化，这在上述所征引的材料中便可窥见一二，在《世说新语》等类的文献中还有更多的文献可以说明。

道安将最信任的弟子分向扬州和荆州，相信是认真考虑过这些事情，分析过东晋的局势的。即便是他南投襄阳，或许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襄阳所处的位置极为重要，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以指向江陵，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历来是门阀权臣所争夺之地，如先后镇守荆州的庾氏家族和桓氏家族，对襄阳进行着激烈地争夺。道安接到习凿齿的信而南投襄阳，应该是考虑到襄阳的有利位置，以及可能对传播佛教所带来的有利条件。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指出，道安来到襄阳之后，经过努力，使佛教“遂以骤盛”：

>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在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7]（P5-6）

道安在襄阳接纳的，定不止一般的士大夫，更重要的是与当时门阀权臣的接纳。许里和注意到道安在襄阳与士大夫、王室之间的联系，如与道安联系紧密的朱序，在襄阳即将被符秦攻破的情况下，仍不让道安离开，是因他对道安的极其尊重。道安此时还结交襄阳之外的一些权臣，如曾为凉州刺史、荆州刺史的桓豁，主动向他示好、送米千斛的郗超，当时皆居于建业。

根据某些材料来看，在道安之前，佛教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如习凿齿在写给道安的《与释道安书》中说：“且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会悟。”[9]道安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弘扬佛教：“观乎安公南下，从行之众，《僧传》所言，并未尝过于揄扬。盖安公内外俱赡，恰逢世乱。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然其斋讲不断，注经甚勤，比较同时潜遁剡东、悠然自得之竺道潜、支遁，其以道自任，坚苦卓绝，实已截然殊途矣。”[1]（P141）正是道安“以道自任”、艰苦卓绝地弘教，佛教才达到了“骤盛”。许里和曾说：“我们发现在公元 3 世纪末、4 世纪初，出现了形成

僧人知识精英( intellectual clerical elite )的明显最初迹象。他们由中国或本地化了僧人组成,去创生或弘扬一种完全汉化了的佛教教义,这些教义从那时以降开始渗入到中国上层社会。”[8](P94)此即桓玄在《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中所言的:“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9]许里和所说的“中国或本地化了”的僧人知识精英,道安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需要明确强调两个方面的事情。其一,道安将徒众们分向扬州、荆州等地,显示了他对东晋政治局势的一种预判和细致地观察,道安看到了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治中的作用,将其徒众分向门阀士族所控制之地。其二,尽管《世说新语》等记载六朝轶事的著述中,释道安的材料出现得非常罕见,但从上述考察来看,道安是擅长“双玄”的。其所译经及其对佛教理论的发挥、对《老》《庄》的借用,为其他清谈者如支道林等人,提供了清谈“双玄”的内容。道安本身也是擅长清谈的,在襄阳与习凿齿见面时,习凿齿说“四海习凿齿”,道安随即曰:“弥天释道安。”事见《高僧传》卷第五。由道安下意识的敏捷反映来看,道安是非常擅长清谈的,以致于苻坚攻襄阳而得到道安和习凿齿后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此一人半即“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5](P180)。道安的清谈更重要的表现是为当时的僧徒和名士们提供了新的清谈内容,他能利用门阀士族的名士化及与名士们的结交,大力弘扬佛教,使得佛教出现“骤盛”的局面。道安之所以没有支道林那样多的清谈事迹,是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佛教的“独立建设”方面上了。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房玄龄等.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徐震堮校笺. 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鲁迅辑录.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荷兰]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M].李四龙,裴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9] 弘明集:卷十二[M].大正藏本.

[10] 肇论集解令模钞[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M]. 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六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潘文竹**


# Dao An and Idle Talk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AO Wei

(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Due to hi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Dao An already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ang Yongtong praised Dao An for his ability to build and develop Buddhism independently without resort to idle talk. Actually, Dao An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dle talk. There are a few records of Dao An's idle talk in documents like *Shi Shuo Xin Yu*, from which we can see he was very good at this style of writing. Daoan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tent, form and ethos of the idle talk of the two Jin dynasties.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idle talk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h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Key words:** Dao An; Eastern Jin; *shuang xuan*; idle talk. doctrine of Prajna

# 《庄子》文化渊源论析

乔 守 春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从文化角度看，《庄子》的形成，主要有三条渊源：一是以关注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生存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的熏染，一是以巫术、神话和歌舞为内容的荆楚浪漫文化的浸润，一是传统科学技术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庄子的启迪。

**关键词：**庄子；文化渊源；先秦理性；荆楚文化；传统科技观

**中图分类号：**B2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68-08

《庄子》一书，文思浩瀚恣肆，气势恢弘广博，语言瑰丽奇绝，“意出尘外，怪生笔端”[1]（P8），被金圣叹赞为“天下第一奇书”。此等成就，凭空不能产生，而由多种因素促成。仅就文化渊源而言，亦有多条。参酌学界既有成果，本文拟就先秦理性精神、荆楚浪漫文化和科学技术观念三者试做论述。

## 一、先秦理性精神的熏染

中国古代，王朝更易，本不鲜见；但是，周朝取代殷商一朝却意义重大，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2]（P453-454）这个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神性消退，理性滋生。在这种理性精神的熏染下，包括庄子在内的知识分子，积极思考事物的本质特征、探索事物的变化规律。他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3]（P144-187）：

（一）宇宙时空

当时由于天文学、地理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突破“观象授时”和“定之方中”等室外实测方法的拘囿，达到在室内推演运算的阶段；更由于垄断话语权力的周天子威势不再，“士”阶层的崛起，于是，开始对宇宙时空展开讨论，并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话题。比较熟悉的是《楚辞·天问》里的一段：

>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4]（P67-68）

疑问提出，接二连三，显示出人们迫切的心情。这心情就是希望能够探索自然的奥秘，了解宇宙时空的本质，掌握它的运行规律。邹衍扩大五行学说，成为阴阳五行家，对宇宙时空奥秘探求兴趣很浓。他依据当时已有的地理知识，用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边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

道家是首先比较系统涉及宇宙时空话题的，因为道家的“自然哲学”体系，以“道”为最高的范畴 以“自然”为道的本质，以“宇宙”为本体，之后落实到社会人生阈限。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

**收稿日期：**2018-06-21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庄子人生哲学研究”（SK2016A0217）；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基地”（2015ZSXM008）；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大学语文”（2017mooc085）

**作者简介：**乔守春（1972-），男，安徽霍邱人，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副教授。

天法道，道法自然”[5]（P103），即是这一体系特征的表述。老子已从神格的“帝”和“天”的神学宇宙观中蜕变而出，形成了形而上的宇宙的绝对逻辑起点，并将其再抽象为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一切规律。相比之下，庄子对宇宙时空，有更为深入的探讨、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在《天运》篇开首即问：

>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噓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6]（P795）

庄子疑惑于宇宙万物的变化，产生对宇宙时空探索的意识。经过不懈探求，他形成了比较明晰的时空观念，并称之为“宇宙”。在理智思辨的基础上，他对两者作了规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庚桑楚》）①这句话的意思，郭象《庄子注》有比较准确的解释：

> 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6]（P796）

在庄子看来，宇宙时空产生根源在于“道”：

>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

这个“道”，不能知觉，超越时空，先于天地鬼神，不仅产生天地万物，而且“参与着万物的流传变化”，更是“内附于万物”[7]（P92），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二）社会秩序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风云变幻，尤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更是战乱频仍，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因而，社会秩序成了当时人们热衷关心的话题。

孔子直接继承了先周至西周的文化传统，建构了以“礼”“仁”为核心的伦理哲学体系，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8]（P88）的社会管理思想。在他看来，“礼”“仁”结合，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事实上，儒家不大注重社会秩序理论的依据，只把伦理、道德当作一种现成的、肯定的价值和行为。为证明按照这种价值、行为生活的合理性，诸子们纷纷为之寻找依据。他们目标所向，不在天道，而在人的本性。众所周知，孟子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他认为，对这仁心予以呵护，使之枝繁叶茂，则是养身。以之作为榜样，“刑于寡妻”，则是齐家。“举斯心而加诸彼”，扩大到整个社会，“以御于家邦”[9]（P94），则是治国，可以维护稳定，整顿风气，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与孟子不同，另一种对构建良好社会秩序思考的出发点，却是建立在人性属于“恶”的判断上。战国初期的墨子，就指出人有私心，各持己见，以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10]（P77）。鉴于此，他开出的药方是“兼爱”“非攻”。与墨子不同，“人性恶”的判断，使得一些思想家为建立良好社会秩序选择法制主义的思路，申不害、慎到和李悝已为倡导，而在商鞅变成极端。商氏认为，立法分明是良好社会秩序构建的不二法门，而法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唯一标准，如《商君书·君臣》所言“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11]（P132-133）。

荀子调和孟子与商鞅的提法，“一面坚持礼乐的象征意味对社会的垂戒示警意义和理性的自我调节对人类行为的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也重视了现世治理中的实用功利”[3]（P165）。他认为，人要生存，建立社会秩序，必须能“群”，即过一种集体的、社会的生活。离开群体则人不能生存，所谓“人生不能无群”[12]（P424）。

直面眼前的混乱世道，先秦另有一类人转过身去，在历史中寻找理想与记忆。儒家的《礼记·礼运》就给我们勾画了一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世界。而庄子是这类人中最为激烈和极端的。他鄙夷现世，假以远古表达整顿社会秩序的愿望。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

①以下凡引《庄子》文字，只在正文中夹注篇名；所引《庄子》原文均出自清郭庆藩集释、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并参考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特此说明。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

这里展现的图景，是庄子“愿望中的现在”[13]（P152），是他为建立良好社会秩序而做的努力探求。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自食其力、安居乐业，是与稍早《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和后来的《鹖冠子》所谓“民犹赤子”的理想世界传说，如出一辙，大致相类。对庄子来说，这虽是“失去的家园”，“永恒消失的故乡”[14]（P82），可他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致命的寻找，乃至要绝圣弃智，抛仁弃义。

（三）个人生存

上述的宇宙时空和社会秩序，其实都是个人生存的背景与环境。而中国上古时期以至夏商周时期，社会组织皆以“族”为单位，“人”的观念隐没于“族”中。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观念逐渐产生，如史嚚就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5]（P252）。此时，人们开始关注个人生存，追求生命永恒和价值实现。

儒家，对“人”的生命永恒似乎不大看重。孔子虽然尊重人的思想、地位，创立了关于人的学说体系，但却鼓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8]（P600）“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8]（P4985）即便生活艰涩，影响健康，亦无警觉和关注。甚至，他更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对死亡避而不谈。孟子也有相同的思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9]（P843）还是荀子说得直接：“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12]（P424）

在他看来，人是活在现实中的，在生前、死后均无须关怀。墨家已经认识到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是劳动者，人必须靠辛勤劳动才能生存，所谓“赖其力者而生，不赖其力者则不生”[10]（P256）。

而法家抛弃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扼杀了人的情感，赤裸裸地将人同政治连在一起，以为人就是政治动物，民众只是法家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详言之，既是国家粮食生产、物质积累所倚借的力量，所谓“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11]（P7）是也；又是民众是军事力量的来源，所谓“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16]（P5）“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11]（P20）是也。

无论儒家，还是墨家，抑或法家，在个人生存问题上都是强调个体对集体负责，个人对社会负责。而道家首次提出了人性异化问题，并发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对个人生存做出了不同俗流的理性思辨和逆向性的反思。老子鼓吹虚静柔弱，自然无为，说：“夫唯不争，故无尤。”[5]（P32）“强梁者不得其死”[5]（P176）；“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5]（P271）。在个人生存问题上，庄子观点独开户牖，匠心独具。他抛弃老子的消极应付，而代之以乐观对待。他关注生命永恒，并非极力绵延生命，而是“寻求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3]（P183）；也不避讳谈论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自然”“必然”“释然”[17]。庄子希望，人们能按照天道自然完成实现自己的生命，并认为“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人们最大的智慧。他也不看重个人在现实中的社会价值，告诫人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应帝王》），破除“物役”，逍遥“无待”。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反人性异化的产物，恢复人性的自然是其理论的基石，以为返朴归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

## 二、荆楚浪漫文化的浸润

楚人立足其固有的乡土文化，吸收并揉合殷商等其他文化，创造了绚烂瑰奇的荆楚文化。它在中国地域文化史上，一般认为“最具有浪漫主义特色”[18]。而巫术、神话、歌舞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生动地凸现了这种浪漫特色。久居其地，久沐其风，受其浸润，庄子的学说体系也富有浪漫色彩。

（一）巫术

楚国，原始巫风弥漫；巫风，是其文化的首要内容。“宋之衰也作为千钟，……楚之衰也作为巫音。”[19]（P112）“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20]（P1666）《庄子》一书，未直接提及巫术活动，直接提“巫”的也仅有三处：“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人间世》）；“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应帝王》）；

“巫咸招曰：‘来！吾语女。’”（《天运》）庄子所生活的年代已是“道术为天下裂”（《天下》），巫觋已经不能再用他的巫术掌管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浸润于荆楚文化的巫术氛围。《庄子》体现出了与这种巫术相似的思维、活动方式。例如，经常出现的神人、至人、圣人形象，往往能够任意游历，来去自由，其行为接近于神巫：能够腾云驾雾，“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地》）；能够四处游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能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游》）；还能不惧水火，“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他们不是以世间人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以高出于凡尘的神人形象出现。作为庄子终极理想的代表，这些圣人、至人、神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与楚国巫文化的特点不谋而合。藉此，庄子让笔下的“神人”或者说理想化的人格灵魂能够不受约束，遨游无极。

神人恍恍惚惚，遥不可及，与人不能直接交流，与巫还有一定的区别。为阐述得道的至理，庄子创造出一些中介形象，典型的如“畸人”。所谓“畸人”，在庄子眼里就是“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如鲁国兀者王骀、哀骀它、支离疏等。根据庄子自己的解释和他对各个畸人的描述，可见畸人的体征是体残貌丑，智识出众，异于凡人，与天相通，传达“道”的真谛。相较神人，他们形象世俗化，修为略次之。

至于“巫”的特点，《说文》释“巫”字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国语·楚语》观射父在回答昭王提问时说，常人必须通过这样一个人才能登天，与神交流：

> 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21]（P559）

而从其他文献中看，巫与觋其实并无明确界限，我们可以“巫”统称之。这些巫，身体残疾，智慧超群，命运淹蹇。本质上与畸人相通。两者传达的都是“神人”思想，皆为神秘力量在人间的代言人。于此，我们更可以断定：《庄子》里的畸人，是有人之形、有神之德的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存在。相对于楚文化中之巫，它少了装饰和浪漫，多了理性和沉思。这些畸人，说明巫文化已经融入了庄子的思维，成为他表达自己哲思的工具。

（二）神话

楚地原始宗教气氛浓郁，“不仅是滋生大量瑰奇神话的肥田沃土，而且是各地神话广泛传播的良好气候，因此楚地成了神话，包括本地神话和外来神话，聚集的场所”[22]（P211）。这些神话，为庄子所继承，直接孕育了《庄子》一些哲学观点。

首先看时间观念。在文明时代，人们以为时间连续排列，不可逆转，而且可以划分成彼此相等的持续均量。而神话时代却是不同，人们的时间观念水平较低，表现在不但经常前后颠倒，而且过去与今后即未来颠倒。原始时代终结，神话中时间颠倒混乱的现象也一去不返，可在《庄子》书中，却仍有遗留，隐约可见。譬如，鲁国有一个以“善处丧”而闻名的孟孙才，《大宗师》中具体记述了他得道以后的情景：

> 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详审此则资料，不难看见，它的时间观念明显有异于文明时代人们持有的时间观念。

其次看生死观念。原始神话中的时间观念，颠倒错乱；与之相应，它的生死观念中也表现出明显的混乱和虚妄，存有人神不死、生命转化等内容。受此影响，《庄子》的生死观念也表现出原始神话不同程度的特征。如《大宗师》所载：

>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死生存亡之一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两者之间并无区别，不知“死生先后之所在”；进而，不知“所以生”和“所以死”。出于同样原因，子桑户死了，其友孟子反、子琴张非独毫无悲伤，反而抚琴唱吟，非常高兴；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

最后看庄子的主客观关系观念。《庄子》的主客观关系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万物皆

一观念。“万物皆一”,语出《德充符》,是庄子学说中的重要哲学观念。原始人以为,不仅是人和动植物是有生命的,而且世界万物也都是有生命的。故而,以原始神话的生命一体化观念和变形法则来理解庄子“万物皆一”的主张则迎刃而解,因为小草同一于大木、丑女同一于西施、庄周同一于蝴蝶,就等同于原始民族自认为与水生动物或金钢鹦哥同一的想法,这也与神话中夸父弃杖化为邓林、颛顼死后化为鱼妇等等有着同一渊源。二是物我同一观念。《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关于物我同一观念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述,意即主观与客观互相混融,不分彼此。物我同一的境界是庄子想象中的超越现实的神秘世界。神话学早已证明,原始思维所认识的世界主观与客观不分,物我同一。创造神话的原始先民,往往将主观情志与客观世界不自觉地融合起来。“万物皆一”,说的是万物之间彼此平等,没有区别;“物我同一”,说的是物我交融没有界限,实际上也是平等。事实上,作为一个不满黑暗现实的哲学家,庄子“十分向往神话世界中的‘平等’,并最终以‘平等’的神话世界作为他的具有神秘特征的哲学观念的根据之一”[23]。

(三)歌舞

楚地歌舞,远不如周礼循规蹈矩、稳健有秩,而偏重于表现人的情感,姿势舒展轻快、氛围热烈浪漫,尤在舞曲至终,更弦繁管急,人们手挥作为巫具的花草树枝,狂舞高歌,响声喧闹,具有极强烈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活动有两个特征,“一是充分表达自己的理想,一是充分抒发内心的情感,也就是说,理想和情感是这种活动的第一要素”[22](P211)。庄子一直在江淮、江汉各地活动,必然经常目睹甚至亲身参与这种歌舞,感受楚人随自然而生存的情趣和自由奔放的浪漫精神,从而使他积极追求的浪漫主义理想受到启发:

一方面,楚地歌舞影响了庄子的审美趣味。他反对北方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礼乐”,却赞赏顺应自然的“天乐”“至乐”。《庄子》所言“至乐无乐”(《至乐》),究其本质,还是要倡导一种率性自然、反对人为的审美理想。基于这种考虑,庄子虽然一方面要求擢乱六律、灭散文采,斥之以“澶漫为乐,摘僻为礼”(《马蹄》),但另一方面却称颂《咸池》之乐。在他看来,这种舞乐是一种天籁之音、大道之美。尽管《咸池》之乐的内容现已无可稽考,但庄子把他所理想的音乐之背景设在楚国的“洞庭之野”,恐非偶然。有论者就以为,庄氏旨在“赞美南音率性自然的精神和浪漫自由的情调”[22](P211)。

另一方面,楚舞楚乐所体现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再现于庄子的文学笔法上。《庄子》文章,时而奔腾无涯、气势磅礴,时而温柔婉转、细腻精妙,既似一阕阕酣歌,又如一场场狂舞。譬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场面,被刻画得挥洒自如,张弛有致。这就不仅赞美了人所要追求的顺应自然、身心自由的浪漫理想,而且这些活动本身就象一场富有艺术气质的音乐舞蹈,“似乎深得楚舞楚乐的神韵”[24]。同样,在《庄子》文章的组织结构上,有浪漫的戏剧感受。清人宣颖《南华经解》中评《德充符》时曾曰:

> 德充符者,德充于内,则自有外见之符也。劈头出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又一个闔跂支离无脤,又一个瓮盎大瘿,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真是以文为戏也。

形象光怪陆离,情趣盎然;且惊且愕之余,细寻哲理,推绎文思,又使人如沐春风,如饮醇醪。对此,刘凤苞《南华雪心编》持论相同:“凭空撰出几个形体不全之人,如傀儡登场,怪状错落,几于以文为戏。”不论是以文为戏,还是以戏为文,皆与楚地巫术活动的戏剧场面相似。《庄子》文法得益于楚地歌舞,此言不虚。

## 三、科学技术观念的启迪

科学技术观念,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这种观念,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促进世界文明不断进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先秦的科学技术观念,影响着当时的生产水平、社会思潮,自然也极大启迪了《庄子》思想的形成。

(一)从本体论上看,《庄子》主张“天人合一”、自然无为

中国传统科技观念,关注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25]尤里达曾说:“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26]在古代人眼里,科技是利器,破坏自然,

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周易·说卦》从“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三个层面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内涵。由前引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语中,可见他崇尚自然遵循自然,按自然办事,与自然和谐统一。裹挟其中,《庄子》也主张顺应自然,强调“天人合一”。在他看来,“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天道》),万物各有其性,各处其位,故而,能够蓬勃生长,自由运转。《知北游》说:“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指出万物虽然千形万状,千姿百态,然皆不违自然,各有生长规律,人兽类是胎生,禽鱼类是卵生。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万物平等,无有尊卑、贵贱之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秋水》)人应“不敖倪于万物”(《天下》),跳出唯我独尊、以己为自然万物主宰的自我优越感,回归本真状态,与自然友好相处。前引“至德之世”,就是庄子构想的美好生活图景。彼时,科技对自然的征服、破坏并不存在,人与自然都保持着一种天然自在、不失本性的状态,过着一种无社会、无政治、无工具、无理性的理想和谐生活。

相反,人类如果无视于此,用科技对待他物,改造他物,则会违背自然,戕害自然,造成恶果:

>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至乐》)

鲁侯完全违背鸟的自然本性,以己养养鸟,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鸟,结果鸟三日而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庄子呼吁“无以人灭天”,强调充分尊重天地万物本性,遵循自然本性而为。如能做到,使用科技就会达到美的境界,如《养生主》曰:

>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一个屠牛场面,原本血腥残忍,不忍卒睹,不忍卒闻,却被庄子描绘的诗情画意,充满温暖,好像庖丁在做的不是野蛮地宰杀牲畜,而是灵巧地弹奏音乐。之所以这样处理,庄子意在告诉人们,只要天人合一,“因其固然”(《养生主》),顺应自然,遵循本性,适度使用科技,即便屠牛这样的事也会“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养生主》),似歌如舞,何况其余?

(二)从认识论上看,《庄子》对科技持有警惕态度

中国古代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知识成果的获取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所以,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而然就会遭到鄙弃和排斥。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均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受此影响,庄子对科技持有警惕的态度,认为科技存在很多的副作用:

一是物性摧残。制陶者治陶土,木工治木,在庄子眼里,是在残害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人为之罪过也。针对技术过度使用导致物性丧失的后果,庄子愤然斥责:“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胠箧》)

二是生态失衡。庄子认为,科技的滥用会造成自然界混乱,扰乱生态平衡。在《胠箧》中,庄子抨击道:“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诟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辨矣。”因为人类采用比较先进的安有机械装置的工具射鸟、捕鱼和猎兽,各种的动物的生存秩序被干扰。严重之程度,乃至“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喘耎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胠箧》)。

三是人性堕落。庄子认为,过度依赖科技,会使得人性扭曲、堕落。《天地》篇载有汉阴丈人圃畦的故事,阐明由于机械技术的高效率会使人受制于其,长久以往,人自身的能力将逐渐退化,越来越依赖甚至被动受制于机器,成为机械的奴隶。进而,机械将会以其技术效用的原理来影响人的心灵,浸淫和俘获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心变成“机心”,最终使人堕落为以操控意识为惟一本质的机器,人心变得“纯白不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在机械现代化的时代,有可能机器会支配人的身体,甚至人的灵魂”[27](P26)。所以,庄子借圃畦丈人之口,表明对科技的态度“无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天地》)。

四是社会混乱。不仅如此，科技的应用，能把人对象化了，而对象化的人受到科技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应帝王》中有则故事：

>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之死，看似方法有误，实质却是科技"有为"本性所致，是庄子对人类科技造成社会混乱的担忧和斥责。后来，就有人说，"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是一个敌视人类安宁的神"[28]（P379）。确实，科技更会从本源上将人作为生命体本性的自然状况打破，丧失人的主体意义，并代之以一个人为的科技世界，并在人对存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制造社会混乱。

（三）从方法论上看，《庄子》注重直觉思维

先秦时期科技观念较少有纯粹的思辨传统，使科学认识论的发展受到阻碍，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体系，多半停留在经验推断、主观臆测和直观观察的水平之上，体现的是一种直觉思维。譬如，周易的"观象制器"，《老子》（10章）所说的"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等等。延及《庄子》，同样忽视理论思辨，也以直觉思维为其基础。它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整体性，即注重从总体全局上去把握对象，而不是以细化分解的方式认识事物。"修混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识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天地》）；"唯达者知通为一"（《齐物论》），即其义也。领会"道"的最高境界，无需使用逻辑语言分析，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也即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即可。

二是直观性，即不经感官感知，心灵直接把握对象。《田子方》说，楚国的得道高人温伯雪子，自齐返回，途径鲁国，与孔子相见：

> 仲尼见之而不言……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孔子无须言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了解，仅仅一眼即可看到温伯雪子的具有"道"的精神境界。双方默契共振，无须言说书传。

三是意会性，即不须以言辞表达，而只须以默然领会。轮扁斫轮时，榫眼做的宽了，则松滑而不坚固；紧了，则滞涩而难入。而不紧不松，却是得心应手。这种技巧，只可内心领会，"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天道》），所以不可按照常规方式传授。

这种直觉思维的修养方法，《庄子》也极为明确地提出了几种：

一是"心斋"（《人间世》），即要以虚静直观的心灵去观照事物和体认本体之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庄子认为，耳和心皆不能准确认知事物。只有通过气，在虚无空寂的状态下，才能随时应待万物，与"无形"的道达到统一，从而达到正确认知。

二是"坐忘"（《大宗师》），即全忘，外则"忘形"，内则"忘心"。《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其中，"堕肢体"是"忘形"，"黜聪明"是"忘心"；而"离形去知"恰是两方面意思的概括。"离形去知"之后，则可是非莫辨，物我合一，进入"忘知"状态。当然，"忘知"是一个"意识注意力的转移"[29]（P247），不是将知彻底摒除，而是暂时忘记，保持一种虚静状态。

三是"见独"（《大宗师》），也即指洞见独立无待的道，忘怀一切之后对道的直接体认。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进式的。在《大宗师》中，庄子提出一个完整的培养直觉思维的修养路径：

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

在这个路径中，以"见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为"见独"前的直觉思维"准备过程"；后者，为"见独"后的直觉思维"发生过程"[30]（P60）。庄子以为，摈除感官，抛弃智慧，身心俱忘，虚静明澈，天人合一，以直觉思维即可认知世界，体认"道"之境界。

总之，《庄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独具一格，考其文化渊源，如上所论，盖有先秦理性精神的熏染，荆楚浪漫文化的浸润和科学技术观念的启迪等。当然，《庄》书的形成因素，亦有社会战乱、庄子本人的气质特征等。斯乃另文讨论话题，此处不赘。

## 参考文献：

[1] 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

[7] 陈鼓应.老庄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7.

[8] 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 孙诒让.墨子闲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

[13] 张军.论《庄子》的“至德之世”[A].张松如,陈鼓应,等.老庄论集[C].济南:齐鲁书社,1987.

[14] 鲍鹏山.风流去[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1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6] 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7] 乔守春.庄子死亡观论析[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18] 罗运环.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J].武汉大学学报,2003,（2）.

[19]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1]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2] 庄大钧.庄子学派的文学倾向与楚文化的浪漫特征[A].黄山文化书院.庄子与中国文化[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23] 赵沛霖.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根源[J].文史哲,1997（5）.

[24] 朱晓鹏.试论庄子哲学与楚文化的关系[J].江汉论坛,1988,（2）.

[25] 者丽艳.中西方传统科技观比较[J].学术探索,2007,（6）.

[26] [美]尤里达.中国古代的物理和自然观[J].科学史译丛,1983,（4）.

[27]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28]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9] 刁生虎.庄子的生存哲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30] 刘仲林.意会论乃庄子魂[A].黄山文化书院编.庄子与中国文化[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潘文竹**

# On the Cultural Origin of *Zhuang Zi*

QIAO Shou-chun

(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Administration,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Technical Engineering, Wuhu 241002, China )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Zhuang Zi* has three main sources. The first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rational spirit of pre-Qin period, which is focused on cosmic space-time, social order and personal existence. The second is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Chu State romantic culture based on sorcery, myths, songs and dance. Thirdly, *Zhuang Zi* was inspir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Key words:** *Zhuang Zi*;cultural origin;rational spirit of the pre-Qin period;Chu culture;traditional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批判

韩 琛 王紫玉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中国的“重写文学史”虽然众声喧哗、新作迭出，但却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一个不断自我重复的知识生产过程，“重写文学史”似乎变成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方案。具体而言，学科建构的内在悖论、家国体系的认同危机、启蒙思想的当代失落及作者主体的犬儒倾向等原因的存在，则是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进退失据、裹步不前的主要根源。实际上，执着于历史反思、现代转型与文明再造，却始终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奇异状况，并非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独有现象，而是中国至今难以完成其现代性转型的整体性历史表征。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过渡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76-08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已从一个学术议题，变成一个生产运动，各种形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层出不穷，几逾数百部之多[1]。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种种探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的提出，到目下关于“民国文学史”的热烈争论，也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不断自我突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几乎所有“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进行的，主要执着于时间断代、空间容量和经典标准的设定，而惘然于“为什么写”的问题：即在当下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讨论？为何出现了如此多的横跨二十世纪的宏大文学史叙事？这个时代之“重写文学史”的焦虑到底源自何处？不明了为什么重写文学史，那么关于写什么、怎样写的探讨，就会丧失对话性、批判性与现实感，最终变成各执一词的话语游戏。简而言之，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镜像之一的“重写文学史”，约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一新时期主流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学教育领域的投影。至于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焦虑，既涉及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本体的历史合法性辩证，也密切关联于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文化取向与现代性状况。

## 一、学科建构的历史悖论

编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终极志业。王瑶认为，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2]（P365）。新时期中国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多元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形成，大学人文学科的繁荣发展，“重写文学史”运动造成的史观解放，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化等等因素的出现，使个人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可能。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初启的时代，个人化书写本是一个常态。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陈柄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1932）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个人化写作。今天文学史书写的个人化倾向，不过是对早年传统的恢复。

研究者个人意愿与文学史教学需要相结合，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生产遍地开花，几乎每

**收稿日期：**2018-03-26

**作者简介：**韩琛（1973-），男，山东龙口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紫玉（1992-），女，山东济南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个具有较为完备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大学，都曾经组织编写过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用以课堂教学的需要。而新世纪以来，随着政府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资金投入的加大，使各种宏大中国现代文学史规划得以立项，而研究者队伍的扩大与成熟，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获得了人力资源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不同学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学术竞争，而且还事关具体的社科项目、重点学科等名目的利益争夺，让编撰一本大部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了实在的现实利益的驱动。大学扩招、教学需要、学术竞争、学科规划等等，构成了竞相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实性因素。

与此同时，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诠释文本能力的提高，各种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变的新观点不断出现，使得每一次“文学史重写”，几乎总能具备一些新内容。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端的问题，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本，皆以不同史料作为支撑，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不同看法。严家炎以黄遵宪、陈季同等人的言论与创作为依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由“五四”前移 30 年，将 1890 年前后确定为其真正的起点[3]。而朱德发则从社会转型与文学表征之间彼此呼应的角度出发，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国文学才呈现出真正的现代性特征。至于在史学观念和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更新，更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获得了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解放，以新的方法、范式、理论组织现有史料，亦可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别样可能，从而激发了研究者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强烈兴趣。

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体的层面来说，“重写文学史”的话语喧嚣，还密切关系到学科自身的历史合法性重构的问题。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历史叙事，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成型，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大学教育体制中一个独立自足的中文二级学科，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制之后的产物。至于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又分离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则是更为晚近的事件。与似乎完全“自然历史化”的中国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得以成立的各种历史性、政治性因素的存在，令其生成的“历史”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人工性特征”，其几乎注定具有更为政治化、现实性的倾向。然而，伴随激进社会主义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失落，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实际上已经丧失主导性意识形态的有利支撑，如今似乎只能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相对短暂历史阶段而存在，甚至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都受到质疑与挑战，需要对之不断进行讨论与辨正[4]。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通过崭新的方法更新、理论再造与知识实践，来重构自身的自然性、历史性和合法性。

今天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和实践并不简单，而是一次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历史合法性的知识实践。一方面，通过超越《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迅速与“改革开放”的新意识形态结合，有效地重构了学科自身的合法性[5]，甚至使之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显学之一；另一方面，这个不断重写文学史的过程，又充分地暴露出学科自身的悖论和危机——建立在《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之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制，不能与学科体制改革形成互动效用，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与不能重构的学科体制基础之间构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悖论结构。就其后果来看，如果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制方面的重构，“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便沦为一种丧失内在动力、仅仅变成释放现实压抑和历史焦虑的叙事游戏。

更为奇异的是，即便是这个学科内部亦呈现出一种自我分裂的现实状况，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学科之间的话语争夺、利益对抗不断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往往以为，中国当代文学本来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理应囊括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的概念发明，实际上就具有这种学科涵盖性的效果。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则不断证明其学科存续的合理性，并以中国当代文学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在“创作”上的“超越”、以及“历史”上的“断裂”，来证明自身别样的现代性——即当代性[6]的本质。更为奇异的争执是发生在文学史区段的划分上，中国当代文学史学者执意将当代文学的起点上溯到 1942 年，即以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发表为起点的标志[7]，而新出现的“民国文学史”论述则以为，“民国文学”应可囊括“延安文学”。这种学科内部严重的分裂、对立的状况，在呈现出一种学术利益争夺的状况的同时，当然也是一种历史合法性危机的尖锐呈现。

与个人化意向、文学史教学和新史料、新方法的发现等因素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体的合

法性危机——即其在历史自洽性、体制合理性方面的未完成性问题，其实是更为切身性的焦虑感和危机感的来源，这个危机即是走出《新民主主义论》的重写文学史，与建立在《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之上的学科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能认为，在维持现有学科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就能够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真正重写，而毋宁说，“重写文学史”在不断展示“重写”的姿态的同时，既遮蔽又凸显了不能“重写”的无奈。今日“重写文学史”的循环反复，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繁荣的表现，而是这个学科自身的结构性悖论不能解决的一次次无奈延宕。

**二、家国体系的认同危机**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内在矛盾或者未完成性，实际上是现代教育制度、政经体制的未完成性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生产，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密切关联于现代中国的家国想象及其现代性进程，二十世纪中国在每一时期的现代性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历史实践，都强烈制约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规划与写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现，是建立在相对一体化的民国国家建制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历史界定，则表征了社会主义现代性项目的文化领导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的提出，亦与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在新时期的确立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史观的更迭与转换，反映着中国现代性项目及其表意机制的历史性变迁，并证明着新的现代性想象的历史合法性，而每一种文学史观的没落、研究范式的转移，又往往伴随着某种现代性实践的终结，以及新的现代性想象的崛起。革命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沉寂，即是激进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趋于瓦解的直接后果，至于目下的“重写文学史”的焦虑，自然也相关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即作为制度性的认知模式和物质性的国家机制的现代性装置的未完成性。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则会发现，其本意是颠覆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一元化革命史观，通过强调文学史写作的“纯文学性”本质，而达到敞开一个多元化、开放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空间的目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还原论，其实就是一个反封闭、反专政的多元论叙事，意在构建一个各种文学实践交错呈现的历史空间。但是，启蒙现代性运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意外中断，既使“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暂告一段落[9]，亦令社会公共空间的自我生成付之阙如。虽然后启蒙时代的中国完成了激进市场化的转型，但是商品化、市场化过程并没有引发政经体制的相应转换，甚至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市民社会，反而是自由市场嫁接于原有政经体制之上，并创造了一个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的畸形繁荣时代。

一方面是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的市场化，另一方面是知识生产领域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导向；一方面是抽象的“人民”被转变为市场上的抽象劳动力主体，另一方面却是自我保护的公共空间的悬置；一方面是社会民众不断高涨的民生诉求，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裹足不前。于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特征被极其矛盾地总结为“选择性社会主义 / 新自由主义”[10]的危机，以描述其“未完成的现代性”特征。无论哪一种总结，其实都是在描述当代中国之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性诉求之间的奇异结合。而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当代中国的重写文学史，因此也往往处于一种不断摸索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不确定状态，于是导致各种“大同小异”的“重写”此起彼伏，而每一种“重写”皆以构成自己的“新范式、新方法、新体系”为号召。然而实际上，无论哪一种“重写”都不过是某种“过去的范式”——或者是启蒙现代性范式，或者是革命现代性范式——的历史变形。

此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亦是一种现代中国想象的历史建构。法国文学史家郎松认为：“我们不仅是在为真理和人类而工作，我们也在为祖国而工作。”[11]（P2）从现代国家认同的文化生产来看，文学实践及其历史书写是充实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12]（P21-P23）重要举措，文学和文学史既是一个国家的内在精神的表露，也是其国民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生产与教育传播，也是将中国建构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文化策略之一。自民国时代以来，虽然不同意识形态集团通过对于现代文学及其历史的争夺、改写，来表征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自洽性，但是这些文学史书写却并没有溢出基本的中国认同这一范畴，其总体上一直是一个国民国家主体的文学史书写。当然，目前可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往往是以汉语文学典范为中心的汉族中国文学史，少数民族的非汉语文学创作很少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因此需要超越汉

语、汉族中心主义的局限，真正建构一个国民中国的文学史。

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家国体系的未完成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造成的限制。朱德发就在论述中就直接引述梁启超之“过渡时代中国”的提法，即“今日中国之现状”是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不论组建民主化的‘新政体’以取代独裁‘愚民专制之政’，或者创立‘新道德’以取代三纲五常‘虚文缛节之俗’，都是极为艰难的，直至今天有些关注政治改革之士仍在发出忧虑的呼唤”[13]（P37）。当然，“两头不到岸”的状况，既造成了历史书写的限度，也带来了叙述历史的动力。

**三、启蒙思想的当代失落**

“重写文学史”讨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构型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像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14]（P4）。其态度的同一性主要体现于对一种普世现代性的想象，基本内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这其实也是作为“重写文学史”开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重估五四文学运动的主要结论。然而，这种关于普遍现代性的“态度的同一性”[15]，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瓦解，并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敌人的攻击。

一段时间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同时遭遇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质疑与挑战。新左派批评家分析了“重写文学史”之内在的“（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将之联结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当代中国激进市场化造成的阶级分化、后冷战时代之新帝国主义秩序的形成，以揭示其启蒙史观内在的资产阶级立场，进而说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今天的批判性意义[16]（P274–P330）。旷新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17]。后现代论者则解构“重写文学史”的元叙事倾向[18]，意在从民族国家主体的历史大叙事中发现地方性、差异性和混杂性的小叙事，强调偶然性因素在历史生成过程中的效用，并试图揭示宏大历史叙事是如何压抑或者利用复杂的历史现实的。

新左派批评家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而后现代主义者则揭示了其历史目的论的宏大叙事倾向，这两种批判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道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因为，新启蒙运动虽然以反对激进社会主义实践为起点，但却与后者共享着一种历史目的论的现代化叙事逻辑。“重写文学史”即在其线性进化史观的叙述中，又形成新的压抑、束缚与遮蔽，“左翼文学”“通俗文学”等因其“非现代性”而遭遇冷落，而中国启蒙运动内在的“反现代性”因素亦被刻意压制，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作为一种批判性内容浮出水面。当然，最为令人诟病的是，新启蒙运动的同一性破裂之后，其偏向市场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面向，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中国“去政治化的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修辞，而其中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自我批判性内容则被剥离并搁置，其具体体现在一部分人利用资本、市场与权力结盟“先富起来”的同时，又试图通过让这种不平等制度化、意识形态化，来阻碍基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要求。

例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一部分改制小说中，企业工人的下岗就被描述为一个必要而必须的纯粹市场行为，而非权力和市场共谋下的丧失基本人道精神的强制性状况。这种状况也体现于“重写文学史”的符号化和意识形态化上，被祛除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化倾向的纯文学概念成为其全部内涵所在，“重写文学史”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文学史开始，却以生产出一个非政治化的“纯文学”价值标准而告终，不涉及权力、政治而只关涉美学价值的“纯文学史”，实际上与去政治化的“纯市场”想象有内在的意识形态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张爱玲及其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典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就在于其非政治的“纯文学”特征，自然能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文学史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至于晚清、民国时代的通俗文学被不断重构进文学史[19]，未尝不与这个追求“纯文学/市场”的意识形态相关。

在不否认新启蒙运动之负面性的精英立场、进化论逻辑、历史目的论的同时，亦应看到今天之各种“批判性话语”否定其历史价值的保守主义倾向。今日中国知识界由于身份认同、利益取向和理论资源等方面的分化，几乎在所有基本概

念——现代性、自由、民主、平等上都存在分歧，而只在就文化场域的利益分割达成对抗性默契。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共识失落的后启蒙时代，不再有囊括一切的元叙事、元历史和元世界，不再有一个可以进行历史判断的终极性标准。然而，这个表面上价值多元的后启蒙时代，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新保守主义思维的意识形态表述，传统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新威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其中达成了奇怪的联盟，构成了各样异源同构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论述，甚至将市场资本主义造成诸种后果，都归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从而与以民族主义为核心修辞的各种特色话语达成了共谋关系。

左右翼共谋状态下形成的这种公共话语领域的重新封建化，使得一种普遍性的价值思想难以确立：一种给予差异性、特殊性和多元性以合法化的普遍性。当然，在今天的各种文学史实践中，也并不缺少对于启蒙现代性价值的主张，诸多学者依然强调“人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值尺度，便是在各自的文学史实践中，复活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启蒙现代性话语，并同时赋予其多元主义的开放性。

**四、作者主体的犬儒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历史是“作者”的产品，制度建设、价值体系、启蒙现代性的未完成性状况，亦与“作者”自身的未完成性息息相关。这里的“作者”既是狭义上的文学作者和文学史作者，又系广义上的知识者。作者是一个现代神话。在现代启蒙的过程中，为了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同神权作斗争，作者得到命名与推崇，因其能够组织语言，阐述意义、启蒙众生。作者从此凌驾于现象、作品、读者之上，居于世界核心，成为价值规范的立法者。因此，现代作者不能只满足自己的创作与生活，他还需要思考并发明人类存在的意义及未来的可能。当然，知识者的悖论往往在于，他既是历史的作者，又是历史的人质，既是现实的批判者，又是现实的合作者，既充满批判、革命的冲动，又禀赋犬儒主义的精神，因此往往充满内心的矛盾与思想的危机。而在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这种知识者自我分裂的状况尤为突出，并体现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者及其历史作者的身上。

在物质压力、制度力量和消费市场的几重挤压之下，当代中国文学作者呈现为一种严重的精神分裂状况。向往自由与臣服权力、普遍主义与机会主义、美学诉求与现实功利、批判精神与无责任意识等等价值对立项，极其奇特地结合在诸多文学作者身上，想象肆虐、文字狂欢的根底里，似乎永远隐藏着一个踯躅彷徨的无奈灵魂。中国作者似乎并不能把自己和作品统一起来，最后倒像是语言支配了作者，现实支配了写作，而作者的主体性却在投机性的选择中化为乌有。这个不能自我完成、匮乏内在同一性的作者形象的最好例证，或者就是莫言。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亦是国家荣誉，然而却引发巨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作者在价值伦理上的自我撕裂。莫言不得不承受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责难，既不是因为人们总是把文学和政治混为一谈，也不是仅仅针对于莫言本身，而是显示了中国大众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及其作者的不信任。那些左右逢源、中西通吃的知识精英、文化作者，不但被认为无资格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发言，而且其本身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疾病”之一。

莫言并非孤例，而是一种历史现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无一不是作为历史人质的“作者”。其创作也每每被意识形态所绑架，成为不同时期主流文化的传声筒。这种充满内在意识形态张力的历史状况，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充满陷阱，而且也让文学史作者亦陷入一种不能自我完成的矛盾境遇中，并令“重写文学史”变成了“翻烙饼”运动，如同一个随意识形态起舞的风向标。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虽然更具个人化色彩，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学院体制之内的写作，除了少数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历史作者之外，“大部分教授甚至尚未怀疑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工作”（制度比他们强大的多，并且把他们挤压变形），或者更糟，他们用最先进的发现（著名的新方法），并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创新精神来进行‘工作’”[20]（P712），以维护这个学院化的意识形态表像。于是各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断代、史观范畴、价值标准的讨论此起彼伏，不同名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断地被批量生产出来。理论探讨与书写实践的有效结合，让各种文学史的生产自动又和谐，仿佛人们真的是在发现并还原着历史。对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迷恋，实际上来自于对于文学、历史和作者的“不能完成的现代主体性”的历史恐惧，而对于所谓“连续性”的、“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不断书写，或者只是为了回避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无数次“断裂”造成的历史创伤。

然而，对于无数文学史作者而言，“历史”每次

被完成的快乐总是莫名短暂，往往随后便陷入历史虚空的无尽恐慌之中。当代中国的历史作者（知识者）似乎从未如此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然而却又不断闪烁其词地远离了历史。自“五四“以来的数次启蒙运动中，知识者每每从传统、专业和体制中挣脱出来，不断开拓出崭新的公共领域、话语空间和批判意识，从而获得了短暂的思想自由、文化自主和主体意识。可是，这种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启蒙时刻总是转瞬即逝，启蒙思想尚未沉淀结实，就迅速沦落为政治口号，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修辞。一直以来，中国知识者总是无抵抗地接受“最进步的知识”，然后又毫无抵抗地将之否弃，再换一个新的。思想和思想之间，旧我和新我之间，过去和当下之间总是无缝焊接，从未形成真正有效的对话、对抗和论辩，当然也没有让任何思想变成某种具有通约性可能的价值轴线，贯穿于现代中国的历史书写、文学史书写之中。也就是说，除了极其罕见的例外，现代中国知识者从未试图形成自己的价值轴线、思想传统，当然也未能成为真正具有强烈自我批判精神和自我认识能力的主体，从而时刻都处于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21]（P302）状态之中。

在这个多元化的后启蒙/后革命中国，知识者的未完成性既秉赋于历史传统，又缘由其当下病理。知识者与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社会大众、网络空间彼此纠缠，简直就像一个现实版的“盗梦空间”。无论是恪守学术精神的学院教授，还是呼吁民主自由的民间公知，也包括为体制辩护的主流学者，似乎皆有不可言道的政治无意识，其犬儒主义的暧昧姿态，却正是一个社会价值失序、混沌无名的现实状况的反映。

**五、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作为一组现代性概念，学科体系、家国制度、启蒙话语、作者主体的未完成性，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已知的、完整的终极形态可供抵达，而是说这些现实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达了一种极为尖锐程度，使之呈现出一种主体性极度“匮乏性膨胀”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状况”。与此同时，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状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各种后现代性、超现代性以及反现代性话语交叉混杂，让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实践，便显出更为复杂的“两岸不到头”的过渡性形态。意即，启蒙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方案，在当代中国之未完成状况的不断延续，让“重写文学史”也变成了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而每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本身的自我瓦解、自我否定的趋向，则又是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的具体反映。

在名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演讲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方案包含着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的普世主义基础和自主的艺术的无情发展，而“主体的自由”的实现则是这个方案的标志。然而，在现代性方案的具体实践过程，却充满了难以克服的扭曲、异化和压抑，甚至完全背离了其初衷——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使二十世纪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斥战争、屠杀、饥荒的极端的年代。当然，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自我悖反的矛盾，而启蒙思想中也存在着自我倒退、毁灭的萌芽[22]（P3）。即便现代性的后果往往令人震惊、恐惧，但这不足以否认主体的自由与启蒙现代性的密不可分，以及启蒙现代性所确立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遍价值。当然，对于中国等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由于“现代性方案”的西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导致自身的现代性历史实践总是徘徊于抵抗与臣服之间，因此导致各种各样的反西方、反帝国、反殖民的批判现代性思潮的发生。不过，在构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可能的现代性道路之外，现代中国历史上每每生发的各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项目，总是会产生神启般的社会动员力量和激进革命风潮，这些思潮和运动所带来的自由的幻觉与意志的狂欢，往往让知性战栗崩溃、理智荡然无存，而惨痛的后果却需要在漫长的时间中显现并消化。然而并不意外的是，这些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思想创造及其历史实践，以不可遏止的自我堕落与终结，证明了自身的无奈和对手的恋物的力量[23]（P1），并让自己无可选择地一次次返回中国现代思想的原点——五四新文化运动。

与“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的历史意识相对，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世界却回荡着各种“历史终结论”的声音。福山认为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表征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之历史合法性的最终确立，“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24]（P1）。中国学者汪晖同样认为，这是一个冷战的终结与革命的终结彼此迭合的时代，二十世纪末叶的世界大转型以社会主义体制的这一资本主义外部体系的终结为标志——“不但是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且也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政党政治等传统政治形式的大规模衰落”[25]（P1-P57）。福山与汪晖

叙述“历史的终结”的政治视角也许完全不同，但是“历史的终结”的根本结论却是异曲同工。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完成了其世界性的霸权建构。而在霍布斯鲍姆的欧洲中心视野的世界历史叙事中，“历史终结”之前的历史极端被描述为“短暂的二十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这一段历史，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时期[26]（P6）。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西方现代性遭遇内在外在危机、并最终克服危机的历史，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战胜社会主义的历史挑战，并最终证明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范畴，可以不断自我肯定并延续下去。当然，这些个基于“历史的终结论”的“短暂的二十世纪”的判断，虽然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然而却既非事实也非历史，而仅仅是一个有关二十世纪革命及其后果的理论假定和历史演绎。

实际上，“未完成的方案”与“历史的终结”并不矛盾，“历史的终结”宣布了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霸权，而“未完成的方案”则表明了现代性之不可消除的内在悖论，及其历史过程对于政治初衷的背离。其实，目下的世界并不离自由、平等的理想更近多少，文明冲突、区域争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等等矛盾对抗所在多有，而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状况的恶化，则令历史终结时候的世界资本主义举步维艰，所谓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其实依然延续。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其追求现代性的二十世纪历史非但没有终结，而且似乎漫长得令人沮丧不已，并形成了一个“漫长的二十世纪”的历史状况。“漫长的20世纪”是现代中国难以克服的追求现代性的危机的不断生成与延续，其间发生的各种另类现代性实践在展示一个未来乌托邦愿景的同时，却往往以陷入理性崩溃、知性失落、人道沦丧的野蛮状态而告终，从而令中国的二十世纪变得跌宕又漫长，并充满各种戏剧性的因素[27]。正是由于这个梦魇般的二十世纪的绵延持续，让历史终结的渴望纠结于历史绵延的焦虑，滋生了建构各种宏大的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的冲动。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的发生，尚是一种有关“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无意识，那么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则具有了深刻的历史自觉。例如，“现代中国文学史”被朱德发描述为是一个始于戊戌变法，并延续到今天仍未结束的“漫长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而严家炎在新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建构了一个连头带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些宏大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表征。

今天中国出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依旧坚持着一种宏大启蒙史观，但其目的却并非在于建立什么最高的典范标准、价值体系，而是试图就中国现代性、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达成最低的历史共识。这个事关历史与未来的宏大叙事，或者与这个流行小叙事的“后时代”愈行愈远，然而却是在这个延续至今的“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中，拯救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历史的几乎唯一途径。

**结论**

1901年，梁启超如此描述其时中国：“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抑过渡时代，又恐怖时代也”[28]（P27-32）。1927年，在《〈尘影〉题辞》一文中，鲁迅则写道：“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由此得死”[29]（P571）。及至今日，这个暧昧莫名的“过渡时代”仍未完成，并导致了一个延续至今的“漫长的20世纪”，而关于这个时代及其文学的历史书写，由此也变得晦暗不明：我们如何想象这个似乎没完没了的“过渡时代”以及其中的自己呢？于是，今天的一切现代中国文学史所能明确的，不是什么文学精神、历史规律和价值旨归，而是这个“过渡时代之中国”的诸种不能与可能、绝望与希望，并因此而赋予“重写文学史”以意义。曾几何时，鲁迅讽刺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30]（P568）。依照同样逻辑言之，“重写文学史”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历史的。不过，显示出这种种“没有”不得消除的历史状况，想象“漫长的20世纪”之可能的尽头，也许才是今天的人们身陷历史之中，却执着于重写历史的真正缘由。

**参考文献：**

[1] 洪亮.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2,（7）.

[2] 王瑶.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A].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C].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1）.

[4] 冯光廉.中国现代文学是最佳学科名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1）.
[5] 朱德发.五四文学初探[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6]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J].文艺研究,2009,（12）.
[7] 陈晓明.《讲话》的方向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启蒙传统的突变[J].文艺争鸣,2007,（12）.
[8] 张中良.回答关于民国文学的若干质疑[J].学术月刊,2014,（3）；李怡.民国文学：阐释优先,史著缓行[J].学术月刊,2014,（3）；周维东.再谈“民国”的文学史意义——以延安时期文学研究为例[J].学术月刊,2014,（3）.
[9] 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J].上海文论,1989,（6）.
[10] 赵月枝.选择性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国传播政治的转型[J].二十一世纪,2008,（6）.
[11]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修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13]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4] 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证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
[15] 汪晖 . 预言与历史 :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J].文学评论 ,1989,（3）（4）.
[16] 贺桂梅.新启蒙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J].南方文坛,2003,（1）.
[18] 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事[J].文艺争鸣,2007,（11）.
[19] 范伯群.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
[20]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A].李迅译.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北京:三联书店,2006.
[21] 鲁迅.写在《坟》后面[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2]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3] 劳拉·穆尔维．恋物与好奇[M].钟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4]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6]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M].马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27] 韩琛.近代的超克、漫长的20世纪与“竹内鲁迅”[J].学术月刊,2016,（6）.
[28]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A].饮冰室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9] 鲁迅.《尘影》题辞[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0] 鲁迅.革命文学[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冯济平**

#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HAN Chen　WANG Zi-y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mainland has aroused clamors and produced some new works; however,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are lost, making it a self-repeating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eems to be a mission impossible. Specifically, the inner refuta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risis in identifying the family-country system, modern loss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the cynical trend of authors are the major causes that prevent the further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n fact, it is not unique that the research o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is obsessed in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rebuilding of civilization, and fails to accomplish this mission. It is the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unaccomplished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at leads to such failure.

**Key word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modern literature; modernity; transitional times; lengthy 20th century

# 日常生活关联下的新历史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论

关 峰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新历史主义视历史为本文，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系统，表达了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日常生活的特性。新文化运动也在传统和现代的多元架构上实现了文化调适，蕴含了日常生活的“着陆”旨趣。历史传统的重构表达了权力的生产和抵制，而这种权力维护的恰恰是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一如原始野性力量所守护的延续几千年的日常生活惯例那样。历史剧争鸣的倾向性选择透露了直面日常生活的消息。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特性和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历史主义的形成。二是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政治的某种放逐中实现了文化置换和超越。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从过去转向现在，以今带古，自觉建立了表述的日常生活系统和修辞。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84-07

思潮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初见于1982年《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号上。命名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即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1943—）后来称之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1]（P1）。不满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和让-弗朗索瓦·利欧塔的后结构主义式资本主义释义，格林布拉特赞赏“一种关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即在“利欧塔和詹姆森所阐述的两种资本主义之间的摆动”[1]（P10）。这一“诗学”与新历史主义的“实践”密切相关。同样，另一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注意到“使熟悉之物陌生化”[2]（P138-139）的福柯式作法，即“使感知回复到一种对日常事物新奇性的觉悟上去”[2]（P140）。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未尝不是一种面对日常世界的批评建构。反观作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多维实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镌刻了日常生活及其诗学的印痕。本文拟于日常生活诗学维度并置和透视新历史主义及因适用方便而征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案例，借以管窥兼有日常生活品格的（后）现代性诗学空间及其关联。

## 一、新历史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本文化

作为对形式主义趋向反拨和超越的产物，新历史主义也对旧历史主义表达了不满和抵制。旧历史主义建立在实证论基础之上。科学历史的伟大倡导者列奥波尔德·封·兰柯（Leopold Von Ranke）就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仲裁过去，或者出于将来的利益考虑利用过去指导现在，而是‘仅仅显示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3]（P76）。相反，新历史主义却提出：“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描写过去事情的方式，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有一些本文和一种阅读、诠释这些本文的策略组成”[4]（P56-57），海登·怀特所谓“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也就是“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5]（P165）詹姆森（Fredric Jameson）也相信：“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

**收稿日期：**2018-04-2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视阈下陕西长篇小说的精神谱系研究”（2016J033）

**作者简介：**关峰（1971-），男，河南夏邑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6](P19)基于“历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科学地复原过去而只能从现在的视野中构造过去”[3](P84)的看法，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把新历史主义与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相对主义者联系起来，以为就取代新批评而言，新历史主义正是相对主义者的卷土重来，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历史”[4](P60)。面对历史主义的两难处境，詹姆森认识到：“当我们要决定分析关于过去的形式或客体时，我们首先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出随意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支配着我们与过去联系”，因而，“我们一直局限在我们自身的存在之中”[6](P20)。为此，詹姆森特别讨论了从德国生命哲学出发的存在历史主义与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立场。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意在整合主、客体为独立开放的本文系统，用路易斯·孟酬士（Louis Montrose）的说法就是“‘重新确定’（reorient）所谓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重心，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本文去替代那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本文”[7](P95-96)。这也正是新历史主义之所以选择现代早期的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这个时期的作品与社会，作家与赞助人（patron），美学与政治问题最为微妙且明显”[8](P260)。无独有偶，作为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体现了这样的“微妙且明显”：新与旧、雅与俗、激进与保守交错混杂，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冲突和制衡景观。周作人曾在比较“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及“三一八惨案”后下结论说，前者之“不开枪”，系“舆论所不许”[9](P603)。看似谐谑，实际上正从一个侧面折射了那时的文化心态。周氏自己的《前门遇马队记》（刊载于1919年6月8日的《每周评论》第25期上）就被警察所视为“不正派”的“要不得”[10](P437)之作，最终不被追究不能不说是拜美学与政治关系上的宽松所赐。在麻木和冷漠的社会征候下，新文化倡导者或“呐喊”或激进的彻底姿态（“全或无”）无异于建立了某种“谈判”关系，就像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在它所发生时代中的‘定型化意识’之外的复杂事件”一样。根据福柯的观点，“一个时代的定型化意识并不随着发生在其近邻或各种人文科学所标界的领域里的‘事件’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事件通过一个特定时间与地点占统治性的再现方式所许可的句法策略把它们拼入这套词汇表与分析之中而获得了‘事实’的地位”[2](P117)，因此，他对一部作品或一部作品全集与其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关系缺乏兴趣。新文学者的规划不啻拼入“定型化意识”词汇表的“流通”战略。

新历史主义视历史为本文，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现实的共时性系统，表达了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日常生活的特性。同样，新文化运动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架构上实现了文化调适，蕴含了日常生活的“着陆”旨趣。且不说白话文的提倡、“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精神的张扬，就是反灵学的“物质主义”和贞操讨论等也都充满了日常现代性气息。不过，最重要的表征却是自我的呈现。台湾学者曾就格林布拉特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戏剧化”加以表述道：“观察作家于表达观念、感情，呈现本身的欲求时，所牵涉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自我的形成及表达方式”[8](P268)。“五四”时期“自我塑造”的过程便是文化本文的结果。最早讨论“我”的文章是《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年正月号）上易白沙的《我》。有感于“各丧其我”，作者意图“招魂”，认为“我之性质，即独立之性质，即对于他人他族宣战之性质”。事实上恐怕是对“一战”形势的回应和立论。在胡适看来，真正代表《新青年》人生观的文章无不从“我”上生发，如“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之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陈独秀《人生真义》）；“总之，道德的行为，必据一己之知识心思，以为裁夺，然后行之，而又绝不能以一己之利害为前提者也”（陶履恭《新青年之新道德》）；“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李大钊《“今”》）；“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这一自我塑形昭示了对“先天下”（范仲淹语）式传统价值观的疏离，同时也拨用了自由主义的他者信仰。面对自我（“小我”），鲁迅就不乐观，但“救救孩子”（“大我”）却是他的希望所在。周作人也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重塑了自我，不过与长兄相反，他把希望留给了前者。这也是他此后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之一。文化传承制约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抉择，日常生活机制则强化了自我的现代启蒙。传统和现代的较量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标竿，同时也

生成了像林纾和学衡派与钱玄同(“废汉文”)和郭沫若(“凤凰涅磐”)的对立场域。

**二、新历史主义与战时权力的“贸易”**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以否定性方式构建了历史与现在的关系的话,那么抗战以还的新启蒙运动则重建了历史意识。借由修辞性隐喻,历史成为置换现实的象征空间和权力能指。作为福柯的主导性范畴,权力同样是新历史主义的关键词。在反对旧历史主义的透明表现论的基础上,格林布拉特“以一个新的自我质询的历史主义者出现,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力量的场所,是意见纷争与利益变更的地方,是正统力量与反对势力冲撞的场合’。所以对一个历史主义者来说,文学决非是对稳定与统一的历史事实这个‘背景’的冷静的反映。它既是这个‘事实’本身的一部分也在规定着被我们所认为是事实的东西。”[11](P148)受福柯影响,格林布拉特明确表示:“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这一“操纵”既有“我们自己的操纵”,也有“原作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1](P14)。或者说,“这种权力既体现在特定的机构中”,“也溶合在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表达法的典型方式、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中”[11](P149)。对此,美国学者弗兰克·林特利查(Frank Lentricchia)解释说:“权力不是确立在一定的界限内,而是从不知什么地方跑出来扩散到所有地方,并吸收了一切社会关系以至使社会集团之间所有的争端与‘冲突’都成为仅仅是政治纷争的表现,成为一切建立在一种单一力量基础之上的事先设计好的冲突剧”[11](P149-150),即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就是某种默契与妥协的产物。演员与官方政策之间对权力的分解和让渡成为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为《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格林布拉特强调了不同于“书橱戏剧”的各种权力形式,如残酷的商业性娱乐业,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现状等等,就像他在“中文版序”中所说,莎士比亚“更勇于面对必须建造一个他所谓的‘美丽新世界’的激进性挑战”[12](P2)。

面对新历史主义的权力运作方式,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思·劳德·牛顿承认“‘历史’被讲述成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故事”,或者说,历史“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13](P201)。因此,对主流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而言,新历史主义往往伴随着矛盾和异质的日常生活断片,像谢恩的赠答文字、祈祷文等都可以作为权力的形式参与本文的营造。牛顿就曾调侃自己对“国会辩论、妇女指南、医学书籍、小说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之间的种种联系”[13](P202)的研究的新历史主义特征。其开篇惯用的离题的迂回方式也寓示了权力的战术和簇集。值得注意的是,除权力机构的博弈外,抗战时期“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表达法的典型方式、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也是不约而同的角逐领域。苏雪林曾解读沈从文“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4](P160),抗战一样需要中华民族的“野蛮”力量,像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曹禺的《北京人》等就都带有蛮性之力。关于郭素娥,路翎曾坦言:“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并自述,“我只是竭力扰动,想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15](P52)。曹禺也历来寄热情和希望于刚健和质朴,如《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中打夯的劳动者、《原野》中仇虎的复仇意志和广袤深刻的原野般生命强力就都是破坏与抗争的精神所在。难怪胡风回击“提倡回到原始时代的‘复古’倾向的”[16](P106-107)质疑,更把为取得艺术上的完整性而将“北京人这条线抽掉不用”的提议称之为“艺术上的和尚主义”[16](P110)。比较而言,胡风所说“作者有在命题上的说不出的原因”与路翎“‘革’生活的‘命’”的心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耐人寻味。

文化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原始事物’是更富人性的选择之物”,并慨叹“文明人类远离他所谓的原始和可能更富有人性的对应者是多么具有悲剧性”[2](P141)。不过,就像以郭沫若《屈原》为代表的国统区历史剧所暗含的借古讽今的意图那样,历史传统的重构也表达了权力的生产和抵制,而这种权力维护的恰恰是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一如原始野性力量所建构的延续几千年的日常生活惯例那样。1942年3月23日,胡适曾在华盛顿纳德克立夫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的讲演。以生活方式立论,意在抗战权力的保障,也在对人的权力的维护。战争把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日常生活都带进了焦点之中,既产生了像巴金《憩园》、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师陀《无望村的馆主》等暴露、控诉和反思社会伦理积弊,以期再造和更生的“自己谴责”之作,同时也有像朱光潜、冯至、废名等直抵传统思想资源深处,不无整合用意的“远取譬”文本。即便像周作人、“战国策派”的不少言论也隐含了

某种权力符码，于抗战不无裨益。战时的周作人就力主“常识的、实际的”“人生主义”[17](P6)；不谈玄学或物理后学；实行关怀“人民生活”[18](P373)的“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像“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汉文学的前途·附记》）；“在这乱世是这么的还仍在有所努力，还想对于中国有所尽心，至于这努力和尽心到底于中国有何用处，实在也不敢相信”（《沙滩小集》序）；“在这乱世有什么能做本来是问题，或者一无所成也说不定，但匣子里的希望也不可抛弃，至少总要守住中国人的立场”（《十堂笔谈·汉字》）；“两国的人相谈，甲有甲的立场，乙有乙的立场，因此不大容易说得拢，此是平常的情形”（《武者先生和我》）等。司汤达曾称小说中的政治是“在音乐会中打响的手枪”[19](P235)，而在詹姆森看来，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这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沦陷区文学里未必不可应用。

**三、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剧争鸣的日常生活隐喻**

詹姆森曾定义历史主义为“我们同过去的关系”，不必说，新历史主义也在我们与文学的过去之间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可能。按照孟酬士的说法，与强调现在怎样利用它对过去的各种描述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不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的重心“被置于最初产生文艺复兴文本的那一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3](P68)。这一说法的准确与否值得商榷，就像廖炳惠所说：“美国学者对殖民政策、种族歧视、女权问题、资讯传播等主题也相当重视，讨论也往往触及政治层面”[8](P267)。对此，布鲁克·托马斯相信，新历史主义的权威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之上：“对于现在来说，对于过去的认识是至关紧要的。承认历史不是对历史曾经真是什么样子的陈述，而只是一种业已卷入目前的政治论争之中的现在构建”。这一“信仰”深受福柯影响，即“对于过去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暗含在现今的权力以及统治结构之中，因而决不可能是超然的”[3](P92)。在海登·怀特看来，福柯是一位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属于结构主义的末世学派。末世学派“致力于研究意识结构是如何掩盖世界的现实的；掩盖的结果是有效地将人类孤立到不同的、不必说互相排除的话语、思维和行为领域内”，但“最终是分散的，因为它将思维引向特定的意识形式的内部”。这就解释了上述新历史主义中现在与过去关系的定向。怀特的结论是，末世学派“在含义上是深刻地反科学的，在方法上是顽固地反启蒙主义的”[20](P249)。詹姆森曾把解决现在与过去关系困境的方法归纳为四种类型：“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其中“存在历史主义”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都侧重现在对过去的重构。以阅读为例，詹姆森认为：“每一个阅读行为，每一个局部阐释实践，都是两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相互冲突和相互审查的媒介物”[6](P47)，柯林伍德（Collingwood）所谓“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的“建构的想象力”[5](P163)。其他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结果历史成为战胜者的历史”（本雅明语）；“世界史就是末日审判”（席勒语）等都是现代性的方式和结果。

与兰柯的“持平客观”不同，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所有存在的事体和道理都处在历史的变迁之中，而历史本身也是合理的过程”[21](290)，即“凡是现实的都是理性的，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22](P497)。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中，针对吴晗“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及“历史剧必须受历史的约束”的看法，李希凡特别引用了黑格尔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例子，以为“历史细节的精确对于他们也就不应有什么严肃的兴趣”。这里的“他们”特指“广大的听众”，而非“认为这种历史的珍奇事物为着它们本身的价值也应搬上舞台去”的批评家。李希凡的目的是想证明“黑格尔大概不会赞成历史剧负担‘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的”[23](P299)，从而强调“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正象一般文艺创作中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一样”[23](P300)。实际上，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的讨论中，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基于日常生活现实的“新历史主义”问题。即便是坚持“历史剧要求反映历史实际的真实”[24](P269)的吴晗自己也不否认剧作家的立场、观点，像“不能不在作品里面曲折反映时代生活的某些方面，以服务于现实斗争。‘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剧，是从来不曾出现于文学史上的”[25](P133)等。王子野也在《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中提醒“剧作家写历史人物一定要依据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即“新历史剧的人物性格要尽量符合历史科学的新的评价”。古为今用就是这一对待历史态度的集中概括。

历史剧争鸣的倾向性选择透露了直面日常生活的消息。所谓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个综合性概念，泛指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与时代精神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重视历史的科学

性一翼也许正是论争的起点。很多讨论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强调历史的真实，如周建人就总结说："社会主义是依照社会发展规律来办事的，是科学的。"[26](P161)何其芳在肯定《胆剑篇》时也是从"对于古代人物和古代事件的描写是近情近理的，令人相信那时在古代可能有的，可能发生的"来立论的[27](P164)。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同样提示："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不过，在历史剧到底是艺术，还是历史的辩证认识中，艺术派还是占了优势，朱寨就在《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中"坚持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显然是正确的"。不消说，在反历史主义和现代化的制衡中，前者固然应该反对和祛除，后者却也同样走了极端。还在1958年，学术界就曾讨论过"厚古薄今"的问题。对"今"的置重无疑是对古为今用原则的贯彻，如"那些只会做古人的传声筒，旁征博引而无补于实际，把历史现象和古代遗产搞得支离破碎，却不能正确地说明任何一个问题的人，又算得什么真才实学呢？"（华夫《厚古薄今要不得！》）"单纯追求学术论文的'科学性'的研究思想，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王积贤《研究现代文学也要"厚今薄古"》）等。与之相反，有别于历史小说的"故事小品"，吴晗立名的"故事剧"则是对历史科学的认可。即便是历史小说，如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也未尝没有对日常俗务的放达情怀在。詹姆森曾说："过去是关于匮乏（privation）的一课"[6](P47)，证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历史剧争论，恐怕不无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政治境遇的隐喻表达罢。

**四、新历史主义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征候**

作为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文化特性和诉求。这一"特性和诉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历史主义的形成。按照朱迪思·劳德·牛顿的说法，"'新历史主义'出自新左派，出自文化唯物论，出自1968年的危机，出自后现代主义者对这场危机的回答，出自作为这个回答的一部分的后结构主义；当然，主要还是出自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编纂学"[13](P202)，进一步讲，"新历史主义一直都热烈地卷入到当代的各种思想新潮中"[4](P54)。这些都表明了它的文化品格。就文学批评而言，则是其边缘化境地的某种不甘和反拨，因而才"把批评家抬高于作者之上"[4](P53)。二是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海登·怀特曾就对传统研究的冒犯阐释道："对于新历史主义而言，这种历史语境是一种'文化系统'，而社会制度和实践，其中包括政治在内，都被解释为这个系统的功能，而不是刚好相反。"[7](P97)格林布拉特也在利欧塔和詹姆森之间作了妥协，承认审美与真实之间的"流通"，由此他建议重新审视以摹仿为代表的旧文学批评，而代之以"一些新的术语，用以描述诸如官方文件、私人文件、报章剪辑之类的材料如何由一种话语领域转移到另一种话语领域而成为审美财产"[1](P13-14)。对这种文化学方法的命名并不一致，有如"厚描"（"深描"），据说是对政治现实视而不见，并且表现出保守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格尔茨文化学。再如"交叉文化蒙太奇"等等都指示了新历史主义文化主义的路径。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意在建构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文化本文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中的寻根小说也在有意搭建文化平台，而且颇为相似的是，它们都有立足现实的日常生活考量。对于前者而言，正如研究者所说："批评者使历史'再现'，为历史确定一个现在的位置。但是'再现'历史的作法并不能逃离受现在价值观的支配。我们需要提问：恢复的是谁的历史？"[28](P7)这一"现在的位置"或"价值观"显然遵循了日常生活的法则。同样，后者也在面对走向世界的追求和热情中整合民族传统文化，在集体无意识的日常生活长河中审视和省察，以重溯促重构，如《爸爸爸》中的丙崽和《小鲍庄》中的捞渣（鲍仁平）虽生死不同，但都表达了某种历史深处的永恒，同样是民族日常生活的投影和隐喻，只是态度不同罢了。捞渣的仁义和丙崽的古怪不无对先前日常生活不再的探问和忧虑。到了莫言那里，更是达到了思痛和忏悔的地步，如他在《红高粱》中所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作者在文末自述写作的目的即在"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并再度自责为"不肖子孙"。相反，《棋王》却大写了"汇道禅于一炉"（《棋王》）的文化英雄的传奇形象。王一生的辉煌暗示了承续先人遗愿的当代神话。无论如何，上述寻根小说都蕴含了走向日常生活的主题，就像《棋王》结尾所写："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李锐在《厚土自语》中也呼吁："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其他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1985）、《老棒子酒馆》（郑万隆，1985）、《最后一个渔佬儿》（李

杭育,1983)等也不乏对过往日常生活方式不再的伤悼和纪念。

美国理查德·特迪曼指出:“不管新历史主义在别的方面受到多少指责,其实践起码重新建立起了一种对于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关系形式”[29](P226)。詹姆森也提出:“如果我们要理解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们所起的具体历史作用的话,我们必须在这种文化革命(目前对我们来说是陌生和异己)的语境之中来看待他们的成就和失败。”[19](P242)两人所说的“文化”大可以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得到印证,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政治的某种放逐中实现了文化置换和超越。有观点认为:“‘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是同根异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写的时空领域推移到历史之中”[30](P309)。实际上,他们都透露了“文化革命”的信息,都在对政治的反拨和疏离中回归日常和自身。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是,与唐浩明、二月河、赵玫等“写历史小说就是在写历史”[31](P43)的创作方法不同,包括《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等在内的苏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似乎“从来是不完整的,甚至有时是错误的”[32](P207)。按照“不能虚构”的历史小说写法来写的《武则天》(《紫檀木球》)就连作者自己都“不愿意谈”,甚至自嘲写得“很臭”[33](P99)。倒是有着白日梦冲动的《我的帝王生涯》才真正实践了他“表达‘人’就是表达历史”[32](P207)、“个人眼中的历史”的历史小说理想,而“从帝王沦为杂耍艺人”[34](P123)的设置也最大程度地彰显了新历史小说的日常生活美学。社会嬗变是新历史小说生成的温床,而作家主体经验则是其基石。陈忠实就多次提及,是中篇《蓝袍先生》的创作打开了他《白鹿原》的“记忆”和“库存”(陈忠实:《我与〈白鹿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讲演稿》《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等)。刘震云甚至不认同《故乡天下黄花》与“另一种真实的历史”的关联,反而强调“中国民间文化之胃的消化能力”[35](P22-23)。詹姆森曾大谈民族和文化(甚至是孔子儒学),恐怕与以莫言《红高粱》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的文化表征恰相契合。

**五、结语**

格林布拉特强调新历史主义“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以为“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negotiation)以后的产物”[1](P14)。廖炳惠也认识到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性,是反省、质疑、推翻性的知识活动”[8](P258)。概而言之,新历史主义之“新”就在于从过去转向现在,以今带古,自觉建立了表述的日常生活系统和修辞,正如格氏在信仰、兴趣、作品、回家、家庭和一生最喜爱的女人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从而得出“莎士比亚的想象力从没有彻底飞跃日常情境”,及“一个乡绅的日常生活,这是他多年来逐渐塑造起来的角色”[12](P284)一样。在与历史关系的“谈判”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作出了现实主义的选择,重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和世界。

无论是笃信进化论的新文化运动,拨用历史传统资源的文化抗战,还是古为今用的历史剧讨论及小历史时代的新历史小说,都或此或彼、程度不等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战术”(米歇尔·德塞尔托语)和诗学。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向一种文化诗学[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 海登·怀特.解码福柯:地下笔记[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布鲁克·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C].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6]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8] 廖炳惠.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 岂明.恕府卫[A].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 弗兰克·林特利查.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2]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M].辜正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 朱迪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4] 苏雪林.沈从文论[A].茅盾等.作家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胡风.《饥饿的郭素娥》序[A].杨义等编.路翎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6] 胡风.论《北京人》[A].胡风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7] 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A].止庵校订.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8] 周作人.女学一席话[A].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上下身[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9]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0] 海登·怀特.解码福柯:地下笔记[A].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 伊各斯.历史主义（HISTORICISM）[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2]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23] 李希凡.“史实”和“虚构”——漫谈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A].《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1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4] 吴晗.谈历史剧[A].《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1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5] 刘知渐.关于《汉宫秋》的评价问题——与翦伯赞同志商榷[A].《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1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6] 周建人.闲话《昭君出塞》[A].《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1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7] 何其芳.《胆剑篇》印象[A].《戏剧报》编辑部编.历史剧论集:第1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28] 张京媛.前言[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9] 理查德·特迪曼.所在见教,有无种类？[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0]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1] 王巧玲.二月河:我从不含沙射影[A].吴圣刚编著.二月河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32] 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A].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3] 林舟,苏童.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A].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4] 苏童,王雪瑛.回答王雪瑛的十四个问题[A].汪政,何平编.苏童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5] 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A].禹权恒编著.刘震云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冯济平**

#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Poetics of Daily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GUAN Fe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

**Abstract:** By returning to the co-existing system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o the greatest degree, the new historicism regards history as text, and expresses the quality of daily life as social non-sense.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lso succeeds in accommodating culture i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rameworks, which embodies the "touch-down" purport of daily life.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traditions shows the 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of power, which protects the national way of daily life, just as the national custom of daily life is preserved by the wild primitive forces. The selective tendency of historical drama shows the message towards daily life.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the New Historicism. One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the other is its doctrines. By separating itself from politics, the New Historicism fiction finishes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newness of the New Historicism lies in its turn to the present from the past, and its setting up a daily life presenting system.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daily life

# 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的形成

徐 萍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晚清是报刊印刷新媒介兴起时期，它为现代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的形成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和办刊，西方传播观念在中国的跨时空嫁接阶段；二是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自我塑型的“本土化”时期。新媒介最终被接受且为我所用，并深刻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繁荣以及变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91-07

晚清时期，被称为第一大众传媒的报刊印刷新媒介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兴起来了，最终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媒介，也成为文学生产的新媒介环境。“新媒介是环境而不是简单的工具，它们能够成为人内心和外表变化的场所。”[1]（P269）包括新型的文学内容和形式变化的场所。而一种主导媒介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行，被各方充分运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传媒即报刊印刷媒介作为晚清至民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媒介，是晚清社会各项变革、特别是文学变革中的一个关键部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媒介环境。而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媒介环境的研究，不止给我们提供了回到历史现场、了解一个时代文化氛围的绝好机会，同时还会让我们打开思路，重构那个时代的文学场域。面对浩瀚的文学场域，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资料库，让我们清晰地看出在报刊印刷这种特定媒介主导的情况下，现代中国文学的先声——“新小说”是如何产生、发展、兴盛以及如何不断变化着的。

现代报刊印刷媒介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是整个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变革的重要场域和环境。作为传播媒介，它们是物质的；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它们又是精神的，其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报刊印刷媒介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与19世纪西方国家实行的“前全球化”（殖民化）政策有关，更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关系密切。几乎整个19世纪，是现代大众传媒登陆中国并在中国萌芽、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自我塑型的“本土化”时期。西方传教士们来华“传教”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教民、传播西方思想观念，以此影响中国的百姓，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基础，以便实行进一步的殖民化。传教士们借以利用的最有效且先进的手段，就是在中国各地办报刊、设书局、建新式教会学校、开医院（本篇限于篇幅和内容，对“出版”、“学校”、“医院”暂不涉及）。因此，最早用中文出版和最早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现代化报刊，都是传教士的杰作。传教士在办报刊的过程中，将西方的办报理念、报业思想自然地带进中国。报刊印刷媒介经过在中国本土的自觉改造和自我形象的塑型，最终被国人所接受，直至为我所用，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报刊印刷媒介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8-03-16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与新文学话语的建构”（18BZWJ03）

**作者简介：**徐萍（1963-），女，山东龙口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传教士宣教和办刊 :传播观念的跨时空嫁接

20 世纪中国人意识中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传播媒介、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的激增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一次次冲击,它们令人眼界大开,目不暇接,体会深刻。从报刊印刷媒介到广播影视媒介再到计算机网络媒介,媒介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媒介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使得人类的视野越来越深广,对事物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中,以致整个世界被大众传播媒介所覆盖,广袤的世界成为真正的"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那么,到底什么是"传播"?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传播究竟能为人类做些什么?人类又利用传播做了什么?发端于西方的传播观念最初是谁、又是如何跨越时空嫁接到东方来的呢?

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传播"一词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在时间上,至少有 1400 年以上的历史。[2] 中国早期的"传播"理念,只限于单向度的"广泛散布"(现代汉语词典),其涵义显然不同于今日所用之"现代传播"的"传播"之意,与西方的"传播"甚至属于不同的传播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传播活动是受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和禁锢的,直至清朝中晚期之后,也就是西方现代传播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业才开始有所转变。

在西方,"传播"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语的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原意为通讯、传达、交换(意见)、交流、交通等等"[3](P1)。在西方,"传播"最初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是"传播的传递观",一是"传播的仪式观"。[4](P4)"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没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他们的手段'"[3](P3)。在第一大众传媒——报刊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类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货物(或人)所达到的地方也是信息所到之处。[4](P5)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传给他人",就是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以实现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传播时的速度与效率。[4](P5)在此,传递和运输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传播的"传递观"的基本含义。在人们思想的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然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4](P5)。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传播的"传递观"的最好诠释。为了"全球化"以及更深远的目的,传教士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实现了空间和地理上的位移。传教士们在传教和发展信徒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以期控制和改造中国这"荒蛮"的封建社会,建立和开拓"上帝"的领地,实行一种他们认为的"救赎"行动,这是"传播"一词的精神含义。之后每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都被视为一种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之物,报刊印刷媒介进入中国即是如此。"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4](P7)仪式观来自一种宗教观,"它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P7)传教士们就是为着实现这两个在当时还有点模糊的观念来华传教的,但是他们的传教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传播基督教义来控制中国人,构建他们自己预想中的文化世界,最终实现支配中国人的一切行为的目的。

大众传播(即报刊印刷媒介)的产生始于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机械印刷复制技术,它给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历史分为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等三个不同的时期。口传文化时期,人的交流是面对面的、在场的、双向互动的,在这种语境中,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而印刷文化时期,印刷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信息具有了可复制性,几乎无限地扩大了人类分享信息的能力,信息的交流不再依赖于是否在场,它可以储存在可移动的印刷媒介(如报刊、书籍)中,于是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时代,报刊媒介被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实现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我们今日所接触的现代报刊不是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来自西方,是西方传教

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传播手段和工具。传教士们看中的是报刊印刷媒介的传播功能和作用，因为报刊印刷媒介不仅是信息的增值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传输管道，更是信息所走的道路上权力很大的把关人。它可以对信息进行有效取舍，及时收集大量信息并使之快速增值和极其广泛地传播和利用，在控制和扩散信息的同时使自身能量发生量变，也就吸引到了更多的人的注意力。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印刷媒介在欧洲历史中多次起到了重大的革命性力量，如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印刷媒介的巨大促进作用，其实这个作用是相互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报刊印刷媒介的发展，报刊印刷媒介又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和报纸的作用；还有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都离不开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教科书的复制刊印更是在人民渴求知识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合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事业。报刊印刷媒介的巨大作用不胜枚举。

确切地说，晚清之前的中国并不是西方传教士所认为的“荒蛮”的地域，他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文化的浑厚可以消解任何异域文化。虽然中国的识字人口所占比例不大，也没有廉价的报纸、便捷的交通和先进的机械文字复制用品，但是中国人民和历代王朝有着自己的文化、文明和信息的传播方式，并自得其乐、自给自足地生活着，并一直将自己的国土认为是“王土”“天朝”。所以说，传教士们想把“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化、文明传送到自己并不熟悉的“荒蛮”中国，就必须得利用先进的现代的传播工具和手段以及有效的传播策略。实际上，东西方之间在自然地理、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宗教信仰上都存在天壤之别。这种“传递”“运输”“传达”的解决方式，只可用一句笼统的话来说，就是“东西方的沟通”。而在中国非常封闭、排外的时代，传播的“交流”特性很难做到。那么，传教士要做的就是“嫁接”，把西方的文化嫁接到中国的文化基础之上。在嫁接的同时，需要吸收中国文化的养分，这种工作实际上就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艰巨任务。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不信奉上帝的地方，把古老的欧洲文明嫁接到世代鄙视异域文化的国度，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嫁接所产生的效果也一定不是传教士们所预期的，结果一定是一种不同质的新的文化的出现，而且嫁接后的痕迹更是清晰可辨，需要时日的磨合。要把新的经验在古老的东方“仪式化”并巩固下来，一定要取自东方本土的资源才能完成。东渡的传教士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一开始就极其细致地、有预谋、有计划地做着本土化的努力。

## 现代报刊“本土化”形象培植

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对中国贸易的日益增长，英国政府特别想早于其他国家打开中国一直紧闭的大门，以抢占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于是就率先采取了传教、办学、行医以及出版书籍报刊等方法，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期配合日后的经济侵略。“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5]（P10）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报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外文报刊、中文教会报刊及中文商业报刊。外文报刊以殖民主义者母语出版，主要面向殖民主义者发行。由于当时懂西文的中国人士较少，所以这类报刊并不掩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和实质，“同样是外国人办的报纸，英文报纸要比中文报纸的侵略性更强、反华的叫嚣更露骨”[6]（P74–75）。这类报纸尽管办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新闻，但是从编辑人员、报刊形式等各个方面来看，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本文不作为重点论述）。然而，教会中文报刊和中文商业报刊在创办、发行过程中，虽程度不同但都相当自觉地在追求中国化和本土化。

中国早期的现代报刊不仅仅是传教士用来传教的工具，更是他们企图控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最理想手段。作为大众媒介的报刊，其工具行为比较复杂，因为在中国报刊尚属外来的新生事物，不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这就需要它不断地包装和改变自己的异域形象，以期被中国的受众接受，达到传播的“说服和要求”的目的，即最终达到传播的“控制”目的。所以，这个时期是现代报刊是否能够和如何顺利进入中国，西方的传播思想能否和如何影响国人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报刊及传播活动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从事传教及出版活动，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包装报刊等印刷媒介的外表，伪装他们的传播思想和目的，以使传播行为能够顺利进行。

传教士和商人们最初是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南

洋等华人聚居地创办中文报刊、书院及印刷所，出版报刊和宣传小册子，然后再伺机进一步把地盘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终深入到中国内陆地区，以深化传教等传播活动。在所办报刊的形式和内容上也是力求本土化，用国人熟悉的形式以便被接受。

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报刊印刷媒介（包括报纸和杂志），一般被认为始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杂志。作为一份以宗教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号召中国学人要勤于考察世俗人道，分辨是非善恶，劝人向善。其所载文章内容大多属宗教之事物，宣传上帝的全德全能。还有天文地理等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和现代科技常识，有利于中国人了解科学和西方文化，后来又增加了时事政治新闻报道和通俗易懂的插图等。“在宣传策略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处处附会儒学，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相比附”[6]（P45-46），每期封面都印有《论语》语录，例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等，落款是“博爱者撰”，但刊物的内容与儒学毫不相关。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杂志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类似中国的线装书。[6]（P45-46）1821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1823—1826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模仿续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两种刊物内容、风格、外型形式一致，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内容为宗教、时事、历史以及杂俎等。1828—1829年，英国教会组织在马六甲又传播了第三份中文月刊《天下新闻》，也是宗教性刊物，由于是商人资助，刊物商业色彩增加，内容以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和宗教为主，宗教色彩相对淡化。与前两种刊物不同的是，《天下新闻》对刊印形式进行了大胆尝试，实行散张，类似今天的新闻纸。

1833年，德国籍汉学家、传教士郭实腊在中国本土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传媒意义的现代期刊。从此，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闯进了中国，也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新的阶段。该刊物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将原来的宗教为主的办刊主旨做了调整，把主要内容调整为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贸易活动、世俗杂谈等，增加新闻以及各国家情况介绍，宗教内容则退居次要地位。在宣传策略上，期刊也注意附会儒学，版式采取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大小相当于现在的32开书籍，刊号则使用当时清政府皇帝的年号纪年，署名“爱汉者”；封面上印有中国传统格言，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多录自《四书》，尽最大可能在表面上与中国文化相吻合。刊物通过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文明及先进科技成果，旨在打破中国人闭关自守的观念，为国人最早认识世界开启了一扇窗户，并对中国现代报刊的诞生在版式、内容、编辑、办刊方针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示范作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现代报刊史、新闻传播史和新闻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刊物在中国境内出版，只有淡化宗教色彩才不致于被清政府查封，从刊物的名字上也可看出其宗教色彩的弱化趋势，“东西洋考”就是介绍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信息资讯等的现代传播的成分。可以看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初步具有了报刊自我定位、自我形象设计、自我推广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虽然略显短视，且其规划也欠连贯，技法也不系统，但是其现代性色彩却显露无疑。1838年，麦都思又在广州创办了《各国消息》月刊，办报方针和内容都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相似，不同的是宗教性内容已不复存在。

早期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办报刊，大都属于宗教性报刊，其目的一是阐发教义、发展教友；二是宣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以便为以后的殖民统治做舆论宣传；三是发布经济信息，重商业利益。在20几年的时间里，传教士们所办报刊，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而政治和经济色彩日益浓厚。办报刊的人大多是传教士，少部分是在华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熟悉中文，熟悉中国的情况，有的就是“中国通”，能在中国许多地方自由地交流和生存。但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文言古文化还达不到精通，所以他们大多请中国人协助办报刊。这些中国“助手”们成为日后国人报刊的第一大力量，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办报刊的要务，更加熟悉中国的本土状况和国人的文化水准，为现代报刊的本土化埋下伏笔。

虽然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和传播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以殖民主义立场为西方侵华作准备，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国家自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向外扩张的野心也在膨胀。而清政府为了抵制西方的入侵，采取了一系列闭关自守的政策，中西方文化得不到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从学习。传教士们

带来现代传媒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现代文明带进了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矛盾冲突，这是由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它的核心内容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固化的文化心理和观念。中国社会对于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观念是难以平静地接受的，所以冲突不断。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为了避免冲突，消除国人的抗拒心理，传教士们想方设法采取了一些“附会”的手段，把他们自己的目的隐藏或包裹在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里，进行隐蔽式浸入。如早期的报刊，在每期封面上都印有摘自《论语》的句子，报刊的形式如同中国的线装书，采用雕版印刷等等，这是西方现代报刊最初进入中国时的方式方法。

自鸦片战争至18世纪60年代末期，是西方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传播业开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国门被打开，由于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办报行踪几乎遍及全中国。这一时期办报刊的目的比之前有所变化，办报不仅仅是为宗教、文化目的，更多是商业目的，而且政治侵略目的更加明显。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办的外文报刊，由于读者都是外国人，对他们的扩张野心和罪恶的侵略行径毫不隐瞒，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它们很重视“文字播道”，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方言繁杂，办医院、学校等都不如印报刊宣传来得广博、迅速，而且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有利于报刊的刊播。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书报印刷传播的快捷、高效、廉价效果，以期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控制国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目的。用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来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5](P19)，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刊，“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之后发展的更快，到1890年发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5](P19)18世纪中期，香港首先成为报刊特别是中文商业报刊的崛起之地，各国在这个经济、交通要地创办商业报刊。到18世纪末，上海成为全国最繁荣的报业中心。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中文报刊的创办者都是外国传教士，报刊的性质虽然属于宗教性报刊，但内容不再仅限于宗教教义，而是综合性期刊。如1853年，麦都思在香港办的《遐迩贯珍》，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办的《六合丛谈》，都增加了文学内容。特别是1868年林乐知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它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改名之后，宗教色彩淡化，政治色彩渐浓，其出版时间之长（直至世纪末），影响之大（从教徒到社会各界），成为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重要传播工具。重要的是《万国公报》还参与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企图引导清廷当局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改良，……企图由外国人和他们所培养的买办知识分子掌握中国的宣传大权。”[6](P60-61)比较著名的教会报刊还有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办的《格致汇编》，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889年办的《成童画报》，后来改名《福幼报》，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1891年林乐知办的《中西教会报》等。还有法国教会办的中文报刊，如《益闻录》《圣心报》，办报时间长，且影响较大。

由于中外贸易的需要，外商在上海创办了大量的中文商业性报刊，并很快成为上海报业的主流，其中问世最早的是1861年的《上海新报》，影响最大的有1872年的《申报》、1882年的《字林沪报》和1893年的《新闻报》等。经营的最成功的是《申报》，创办人是英国商人美查。《申报》的办报目的是纯商业的，所以对报纸质量极其重视，主笔一直是中国人，以期为中国读者喜欢。《申报》在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地域性等方面做得很好，并向各方征求文学稿件，宣布对送刊的稿件“概不取值”，并向作者赠送报纸数张，以示酬谢。这对一直是自己掏钱刊印作品的文人来说是一个大喜讯，对创作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中国日后兴起的稿酬制打下基础。

到了19世纪中期，报刊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读者群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读者，外报还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来迎合中国读者习惯。申报馆可谓这方面的先驱，《申报》的主要读者群为旧式文人，为满足这一群体的阅读兴趣与爱好，《申报》向社会征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6](P64)，刊登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申报馆在征收了过多的文学稿件后，特别刊印了文学期刊《瀛寰琐记》，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瀛寰琐记》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字林沪报》则通过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及《花团锦簇楼诗》等旧的文学样式来扩大发行面。[6](P69)

《申报》业务史上最大的创举是开辟专门刊

登文艺类作品的版面，成为以后报纸副刊的先驱。后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都效仿《申报》开辟了副刊，专门刊登文艺类作品。申报馆在《申报》创刊不久的1872年11月11日，又创刊发行了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刊有诗词、骈文、散文、小说、翻译作品，以及时事政论、史料、知识小品等。[6](P69)连载的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日本名著《江户繁昌记》为后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小说连载新形式的昌盛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1876年，申报馆刊发的《民报》，将读者群体直接指向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社会，以使之扩大见闻、增长知识。《民报》是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开使用白话和标点符号办报刊之先河。申报馆还兼营出版业务，创办书局出版社，如点石斋印书局、上海图书集成局等，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等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大部丛书，对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卓有贡献。《申报》在发行、广告等报业经营业务上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6](P67)《申报》是我国商业性报纸成功的典范，它的创办和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带动了上海商业性报刊出现繁荣局面。

《申报》还不断拓宽新闻的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本土化的新闻来吸引读者。1874—1877年，用3年时间连续报道杨乃武被诬事件的整个过程，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使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大新闻。[6](P66)有些报纸甚至用方言来写作，比如福建出版的《教会使者报》《厦门新报》《漳泉公会报》均用闽方言写作，广东汕头出版的《潮惠会报》，则用潮汕方言编写。适当运用方言，追求的是新闻的进一步本土化，打造报刊的本土特色；增强了报刊的亲近性，适当运用方言，便于方言中心区的方言言说者与非方言言说者沟通，从而消除国人对外人的抵制。[6](P71-73)

19世纪中后期，办报人的身份、办报目的、办报思想也复杂起来。因为各自的利益，传教士、打着教会旗号的商人、政治掮客等都在积极办报。这时的传教士办报，也不再只是热衷于“阐发教义”“发展教友”，“宗教”不再占主要地位，而时事、政论、事务、消息等新闻资讯类以及文学类内容增多。这也是办报刊者的斡旋之计，一是由于中国基督教精神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二是由于传教士的身份带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印记，中国人对他们一直是冷淡和排斥的，所以他们也只好采取灵活的宣传策略，增加没有宗教色彩的时事、文学等内容。经过调整，传教士们注重了文化传播色彩，这也正暗合了中国人崇尚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期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教会报刊愈加兴盛，读者也慢慢增多。

直至19世纪末，宗教性质的报刊仍是在华外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0年据美国传教士法罕统计：自1860年至1890年，基督教系统在中国发行的报刊累计已达76种，其中宗教性质的40种，“世俗”的即所谓“文化”性质的36种。1895年，据李提摩太统计，自1815至1894年，全国先后出版的中文近代化报纸共有76种，其中60%为教会方面主办；仍在出版的28种，教会方面主办的有15种，占54%。[6](P70)全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报刊大多是传教士创办，随着开放口岸和城市的增多，外国人创办的报纸遍及全国各地，他们的努力前后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到19世纪末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传教士或教会组织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5](P18)，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络。这些报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影响重大，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在19世纪末，配合着维新改良运动，中国人自办报刊在中国兴盛起来，传播活动空前高涨。报刊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发了梁启超等人之后的办报、办文学期刊、创作“新小说”等一系列“启蒙”“新民”活动。

国人办报热潮兴起：传教士办报时期，西方新闻观念在中国传播最快。传教士们在报刊的“序”“小引”“缘起”“告白”“启”“宗旨”等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文字中，对西方的文化观念、传播学思想、传播理念都有涉及。在力倡办报方面，还专门刊发文章加以论述。如1834年（道光十四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登的《新闻纸略论》，介绍了西方报纸的起源，以及各国报纸的出版情况及新闻自由等等，是中国报刊发表的第一篇介绍西方新闻思想、新闻理念的文章。后来在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上，这种内容的文章很多，特别是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后，很注重这方面的宣传和介绍，“当时《申报》把各国的报纸现状，及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报上反复阐述，促使中国人重视报纸上的报道。此举使《申报》扩大了销路，也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化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7](P4)此类文章对中外报刊的社会功能、办报方针、办报理念、报刊业务问题、中西方的报业总体状况等都进行

了介绍、研究、论述。这些办报实践和理论宣传对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必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最终被国人关注，开始有效地模仿办报刊的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1862 年，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系《字林报》或《字林西报》之中文版）面世，1872 年全国第一大报《申报》出版。著名改良主义者王韬 1871 年也在香港购下印刷所，成立中华印务总局，于 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己办现代报刊的历史。

戊戌变法期间，报刊宣传与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变革密切相关，国人掀起办报刊的热潮，报刊在思想启蒙、舆论动员方面，发挥了其他社会组织难以企及的作用，报刊成为政治变革的倍增器。梁启超在 1895 年和 1896 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炳麟 1897 年创办《苏报》等。甲午战争后，仅上海一地就有民办日报报馆 32 家，报纸 66 种，杂志数十种。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民间自办的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掀起国人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1902 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有 124 种。辛亥革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全国报刊达 500 家之多。袁世凯上台后，曾封闭查禁，使得新闻界一度萧条冷落。到 1919 年，据胡适统计，全国有报刊 400 种；到 1921 年，全国报刊总数为 1104 种；而到了 1927 年，据估计全国共有报刊 2000 种之多。[8]（P208）

晚清的最后十几年，是现代传媒正式在中国登场并成功塑造出自我形象的时期，到五四时期塑型完成，并得到更大发展。现代传媒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兴盛以及变化的整个过程，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3]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6]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冯济平**


# Late Q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the Media Environ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U Pi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saw the rise of new media for newspaper printing, which created a new media environment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went through two stages: the missionaries' mission and publication of magazines in China through which the western communication concept was combined with that in China;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mass media in China. New media was finally accepted and used by the Chinese, which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edia environment; localization

# 2006—2016年老舍研究述评

魏韶华 李雅坤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2006—2016年的老舍研究可以说是在艰难中前行的，取得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并非易事。在老舍研究的瓶颈期，旧题重作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学术界正推动着老舍研究呈螺旋式地逐渐上升。在此期间，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可喜的学术成果，大多从老舍先生的背景、地位、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创作文本研究、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多方面展开，力求从一个更新的视角解读老舍及其作品，呈现多点开花又有所侧重的格局。其中，老舍的背景、地位、创作研究及文化研究则成为众多研究领域中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老舍；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4-0098-09

## 一、文学史地位研究

老舍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拥有很高的文学史地位。那么，是什么铸就了老舍如此之高的文学史地位呢？王卫平、张英在《老舍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1]中认为：“老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几乎仅次于鲁迅。”[1]他的作品译本众多，文学样式丰富，传播广泛，成为世界人民了解老舍的直接途径。该文从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指出老舍的小说观是一种世界性的小说观，同“伟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些共性，这是其在世界上影响力大的根本原因。老舍的作品仿佛是一面明镜，能让世界人民真切地了解最为真实的中国社会，老舍更是世界级的“人民艺术家”。段从学在《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2]中梳理了老舍抗战时期对“文协”的贡献，让我们看到一位文坛巨匠对待工作时认真负责的大无畏精神。舒乙在《老舍文坛地位变迁路》[3]中梳理了老舍在文坛地位的变化情况，是随着社会大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老舍文坛地位的逐渐上升与读者的欣赏习惯关系甚大。此外，还有傅光明《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4]、徐仲佳《论老舍在新中国文学场的占位》[5]、梁秉堃《在老舍师身边》[6]、牛颂《解密老舍》[7]、傅晓燕《从老舍的生命背景透视〈二马〉民族情的书写》[8]等，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一问题。

2009年是老舍诞辰110周年，该年度发表的许多论文都与纪念活动有关。其中，有吴小美的《“最老舍”的〈老字号〉——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年作》[9]、杨迎平《老舍与〈茶馆〉——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10]、王昉《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11]、刘大先《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12]、舒展《笑的哲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随想》[13]等。其中，吴小美的《“最老舍”的〈老字号〉——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年作》[9]一文，对《老字号》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钱掌柜、周掌柜、辛德治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出其中蕴含的现实寓意与文化寓意。王昉在《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11]中指出，老舍作为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其作品是以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现状为出发点的，老舍对“国民性”、“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不同于主流观点，这些问题都能

**收稿日期：** 2018-01-17

**作者简介：** 魏韶华（1963-），男，山东东阿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雅坤（1994-），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答案。文中细致地分析了《赵子曰》、《二马》、《断魂枪》、《月牙儿》等经典文本，彰显出老舍无尽的人文主义倾向与情怀。201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老舍先生的作品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出版与传播。2006年到2015年间，第4至7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2015年，“老舍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第7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于此，围绕老舍与重庆、老舍与抗战文艺、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论题展开研讨，掀起老舍与抗战文学的研究热潮。

**二、思想精神研究**

老舍作为一位内心世界丰富的“人民艺术家”，有其独到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感悟，对国民性、民族观、文化观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并将思考的精华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一代文学大师思想的灵魂所在。

关纪新《老舍民族观探赜》[14]一文，结合老舍的满族出身与个人经历，探索其文本中所隐藏着的民族观。作者细致分析了《正红旗下》、《二马》、《小坡的生日》等老舍文本中的经典桥段，指出倡导民族平等、和平发展、友好共处是老舍民族观的核心内涵。老舍先生性格平和，也总是以“平和”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这使得他逐步形成了一种“平和”的世界观，这种“平和”已然已渗透到老舍的各种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当中了。此外，作者还从爱国主义的层面阐释了老舍的民族观，用《猫城记》、《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等作品中所折射出的爱国主义之光，有力地诠释了老舍先生的赤子之心，指出“国家至上”是其民族观中的基本原则。邵宁宁《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15]一文，对《四世同堂》里“国民”意识的复杂性、局限性以及意识启蒙等问题进行探究，深入分析了老舍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思索。傅晓燕《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16]一文，按照老舍在不同时期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结合其各个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将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串联起来，展现了老舍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此外，关于“老舍观”的学术成果还有关纪新的《老舍研究个案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17]、谢昭新《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18]、吴小美 李向辉《老舍的生死观》[19]、孙郁《老舍的鲁迅观》[20]、王俊虎《平民作家老舍交友观探析》[21]、陈千里《老舍早期作品中的家庭书写与家庭观念——以〈离婚〉为中心的讨论》[22]、董克林《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分析》[23]、迟蕊《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思考及与鲁迅的差异》[24]等。

老舍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境界是纯洁而高远的，他所处的时代恰好位于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交汇点上，在融满、汉思想为一体的同时，又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关纪新在《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25]一文中指出，老舍先生的作品亦是一部部道德启示录，他在文学作品中呼唤着新型的民族道德，这终将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傅光明《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26]一文，梳理了老舍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创作的文本及其言行，彰显出他奋战到底的决心，赞颂了其高尚的民族气节。魏韶华《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27]一文，将老舍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肯定了乌托邦对老舍精神世界的影响，这种关联既是事实上的，又是精神上的。文中阐释了写实与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探索了老舍乌托邦情节的源头，展现了老舍与乌托邦之间的精神关联。邵宁宁《寻找“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评〈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8]一文，归纳并总结了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所著之书《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9]的突出特点，注重从精神的角度研究文化问题，以“精神纽带”为根基，探讨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作者对老舍研究的总体概况加以简述，给予该书以高度评价。王本朝《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30]一文，阐释了民粹主义与中国民粹主义的相关概念与特征，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舍先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选材多选自于社会底层且具有大众化倾向的艺术特色。与此同时，对老舍民粹思想倾向的局限性进行了思考。王晓琴《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31]一文，结合了老舍先生的家庭出身、生活背景，梳理了自20世纪20年代至建国后这段时期内，老舍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及这种民族精神的转化，指出老舍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省意识的作家，其文学创作亦是一部伟大的民族精神启示录。除此之外，关于老舍先生思想精神研究的论文还有吴效刚《老舍的自由心态与其小说的人本思想》[32]、冯健飞《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浅析老舍小说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33]、禹明华《老舍小说与墨侠精神》[34]等。

### 三、老舍与文化研究

老舍与文化的研究作为2006—2016年来老舍研究领域的重阵，大多将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纷繁多样的文化内容联系起来，从中窥探老舍内心世界中所隐藏着的文化精神、理想以及情怀。老舍与各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多元化的联系，对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发展意义重大。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始，对老舍的文化阐释依然形成一个学术传统，但并非再无新的话题可以继续探讨。近10年来，有些专著继续着这一话题的言说，并力图有所突破。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35]、谢昭新《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36]、吴小美 魏韶华 古世仓的《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29]、石兴泽 石小寒《东西方文化影响与老舍文学世界的建构及其研究》[37]、杨剑龙编辑的《老舍与都市文化》[38]等。其中，《老舍与都市文化》[38]一书作为“老舍与都市文化高峰论坛”学术会议的文集，汇集了关纪新、舒乙、舒济、吴小美等知名学者的独到见解，将老舍与其所到之处的都市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老舍在不同地域所创作出的不同作品都体现了该都市特有的文化特色，而这些都市文化也对老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颇具学术价值，进一步推动了老舍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35]共分为8个章节，分别从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老舍的人文模塑、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等方面进行解读，将老舍置于整个满族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索老舍研究中的未解之谜。作者通过对满族的历史文化、伦理观念、社会变迁等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发掘出这些因素对老舍的创作思想、心理、艺术风格、作品形式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解密其创作与满族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张桂兴《老舍论集》[39]，是作者本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将文献史料学的原理与方法论科学地运用于老舍资料研究的领域，指出其中的成就与不足，并对《老舍全集》的编选工作进行重新的审视，总结了其中的成就与缺点。书中提及老舍与宗教文化的情缘与老舍心中的宗教情结，追溯到老舍少年时期的史实，探寻其对老舍后期创作的影响。此外，作者还对老舍先生的生活轨迹、创作类型以及人生中所遇的良师益友等作了详细的解读。该书全面细致地对老舍及其创作进行深度剖析，呈现出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佳作。傅晓燕《多维视野中的老舍创作研究》[40]，从不同的角度对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运用文化视野、文本视野、比较视野的眼光阐释了“老舍创作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老舍创作文本细读与阐释；老舍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丰富的多维视野，拓展了老舍创作研究领域的维度，在老舍创作的文化背景、民族意识、民族形式、文本解读等方面均见解独到，创新意识强，为老舍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谢昭新专著《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36]，内容涉及老舍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老舍与五四文学、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等方面，对老舍创作过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及其文化心理进行探索，该书将老舍的创作与各种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全面论证了老舍对现代化和民族化的追求。老舍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与思想精髓，为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带领人们不断发掘老舍研究的现实价值与其作品的当代意义。

除综上所述外，近10年出版的老舍研究专著还有吴小美《老舍散文三十八讲》[41]、《老舍小说十九讲》[42]、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人民艺术家》[43]、关纪新 舒济《老舍图传》[44]、舒乙《老舍的平民生活》[45]、傅光明《老舍的文学地图》[46]、《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47]、王本朝《老舍研究》[48]、崔思卿 高玉琨《走近老舍：老舍研究文集》[49]、蒋泥《老舍之谜》[50]、王俊虎《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51]、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52]、张曼《老舍翻译文学研究》[53]等。

谢昭新在《老舍与儒家文化》[54]一文中指出，老舍精神世界中所体现出的儒家文化与其家庭教养以及早期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有关。儒家文化中的“仁”、“礼”、“中庸”等思想以及生命观不仅影响着老舍的行为方式，还从多个方面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其塑造出以祁瑞宣、张大哥、赵庠琛等为代表的带有典型儒家文化色彩的人物形象。其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还唤起了老舍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创作出大量激发爱国斗志与弘扬民族精神的佳作。此外，他还在《老舍抗战散文中的文化心理透视》[55]中，总结了老舍在抗战期间发表的散文作品，从中提炼出老舍在特殊时期内的生命精神与文化心理，展现出老舍浓浓的爱国之情与对民族复兴的追寻。岳凯华《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56]一文，着眼于老舍对儒家文化的矛盾态度，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联。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

理想与〈大地龙蛇〉》[57]一文，全面分析了剧作《大地龙蛇》中所体现出的老舍的文化思想，指出这是一部“理念化”的“受命文学”作品，文章揭示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开掘出研究该剧的价值所在。关纪新《老舍，一位文化巨子的伦理站位》[58]一文，探求了老舍对伦理道德以及民族精神文化的追寻，发现其思考的维度十分广泛，关乎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论述了老舍作为一位文化巨子的伦理站位。周丽娜《〈二马〉的文化新解》[59]一文，从不同文化的不同层面解读了老舍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英文化的矛盾性、复杂性，阐释了老舍是如何将自己对中英两种文化的不同态度与理解应用于《二马》的创作当中去的，用全新的眼光透视了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指出需用一种科学的理性认知去看待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张菊玲《阅读老舍，记住曾被遮掩的民族历史文化》[60]一文，将老舍的创作视为一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记录了老北京独特的满族文化与历史文化。此外，关于老舍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陈红旗《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61]、曹金合《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62]、李惠《茶馆对世情人生的隐喻——由话剧〈茶馆〉看老北京茶文化的兴衰》[63]、关纪新《中华精神文化的批判与重构——“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64]、《多重文化场域中的老舍》[65]、黄伟林《潜入民族文化深水区，探究文学多样性——从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问题》[66]、陈建宁《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67]、林朝霞《从〈骆驼祥子〉看老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68]、胡登全《重庆 1938—1946: 老舍的文化分水岭》[69]、陈夫龙《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70]、马丽蓉《论老舍的伊斯兰文化情怀》[71]等。

**四、创作及作品研究**

老舍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文学作品形式多样，体裁众多，富有独到的创作视角与特色。近年来，学术界对老舍创作的研究有增无减，挖掘出其创作的重要意义与更为深层次的内涵。

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72]一文，论述了老舍在抗战期间新诗创作的特征，作者认为“老舍将抗战看作是其新诗创作千载难遇的机会”[72]。这些新诗的创作情感丰富、通俗易懂，饱含着作者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孙洁在《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隐现》[73]一文中，分析了老舍创作在新中国时期所体现的“北京”元素，探析了老舍的创作三次回归北京的缘由。石兴泽《从保留到皈依：老舍思想理论和创作追求与社会主义文学思潮》[74]一文，论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梳理了从保留到皈依的过程及其间的复杂关系。杨春时《老舍创作的多向性——现实主义、启蒙主义与革命古典主义》[75]一文，深度剖析了在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老舍的多种创作方向，其中包括现实主义、启蒙主义及革命古典主义等，阐明了每种创作方向所要表达的主题，并结合相关作品加以例证。于昊燕《老舍在昆明、大理的经历与创作》[76]一文，介绍了老舍在昆明和大理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详细解读了其在云南的经历与话剧《大地龙蛇》的诞生之间的联系，指出老舍在云南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也对云南的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凤媛《“茶馆”重塑与老舍 1949 年后的创作》[77]一文，重点探讨了老舍 1949 年以后的创作，在社会由“老北京”转型至“社会主义新北京”的大背景下，探究老舍先生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陈涛在《老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研究》[78]中总结了老舍文学作品的特色，即创作视角的多元化，文字幽默通俗，善用隐喻与悲剧化处理等。此外，关于老舍创作研究的成果还有李遇春《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79]、张娴《老舍文学创作启蒙思想辩证》[80]等。

近年来，对老舍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和戏剧这两大领域，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典作品仍吸引着学术界的目光，特别是着重对这些作品的英译本进行研究，专家学者尝试用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去解读，赋予了作品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小说研究

2016 年是《骆驼祥子》创作发表八十周年，与此同时，掀起了一股研究《骆驼祥子》的热潮。张丽军《“恋身”、“失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81]、狄昌超《从平民视角看人生悲喜的典范之作——再读〈骆驼祥子〉有感》[82]、江腊生《〈骆驼祥子〉的还原性阐释》[83]、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84]、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读〈骆驼祥子〉》[85]、白志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骆驼祥子形象分析》[86]等文，从祥子这个个体的视角出发，探寻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等问

题及其与整个社会大环境之间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生存的思索，力图从一个更新的角度解读祥子这个个人。还有，关于《骆驼祥子》各种译本的研究也是一大热点。例如金洁 吴平《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87]、孙会军《〈骆驼祥子〉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88]、孙会军 于海阔《从〈骆驼祥子〉英译本对引语模式的处理看小说风格的再现》[89]、黄立波《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探讨——以〈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人称代词主语和叙事视角转换为例》[90]、《〈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91]、孔令云《〈骆驼祥子〉英译本校评》[92] 等文，对《骆驼祥子》的各种译本进行研究，比较了各种译本之间的不同之处，从侧面反映出了《骆驼祥子》的海外传播状况。

除《骆驼祥子》外，《四世同堂》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吴小美《抗战时期长篇小说中的〈四世同堂〉》[93]，讨论了《四世同堂》的创作特色及其在整个抗战时期长篇小说中的地位，认为《四世同堂》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颇高。江腊生《〈四世同堂〉中的生活形态解读》[94]，对抗日战争中北平人民的生活形态进行解读，从家庭生活、国家存在与个人享乐等世俗生活的层面出发，写出了老舍在这部作品中对战争、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朴希亘《论北京曲剧〈四世同堂〉对原著的改编创新》[95]，探讨了北京曲剧版《四世同堂》对原著的继承和创新，通过这种新的形式，这部小说有了更新的表现形式。此外，研究《四世同堂》的学术成果还有魏韶华《〈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96]、魏韶华 刘红涛《浦爱德的“怪英文”对老舍〈四世同堂〉英译的独特影响》[97]、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98]、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99] 等。

（二）戏剧与抗战文学研究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同时也掀起了对老舍抗战时期创作的研究热潮，老舍与抗战文学的主题成为研究热点，这集中体现在对其戏剧创作的研究上。

王本朝在《论抗战时期老舍的戏剧创作》[100] 中认为，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实验及其所积累的学习成果，对其今后的戏剧创作意义重大。这体现出老舍对抗战文艺、战争以及自己的作家身份的认识，也体现出老舍在戏剧创作上的矛盾处境。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101] 一文，指出抗日战争是老舍戏剧创作中的重要转折点，使他从一位小说家转变成充满人民性的戏剧家，这也是作者眼中老舍的两个形象。文中探讨了老舍在这两个时期内过渡、转变的过程，认为老舍是长期为人民创作的“人民艺术家”，其抗战戏剧的创作是具有“人民性”这一大特点的。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刍议》[102]，总结了老舍抗战戏剧的三大特性，即时代性、人民性与实验性。老舍先生在戏剧的创作中不断探索、创新、融贯中西，为其今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李卉《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103]，总结了老舍在重庆时期对抗战题材戏剧的创作状况，分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与思想特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对老舍今后的戏剧创作意义重大。2006—2016 年，研究老舍戏剧的学术成果还有翟瑞青《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104]、王俊虎《都市风情线与世态风俗画——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三》[105]、杨迎平《〈茶馆〉：“驰骋古今，综合中外”的戏剧艺术——纪念老舍诞辰 110 周年》[106]、董克林《从“第一次”到戏剧大师——老舍的戏剧艺术实践分析》[107]、陈军《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108]、梅琳 王本朝《老舍〈残雾〉的创作、演出与论争》[109] 等。

此外，老舍与抗战文学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一大热点。关纪新《老舍抗战观扼要》[110]，总结了老舍先生抗战观中的几个基本点，指出老舍在其抗战观中所表明的倾向与态度。老舍的抗战观是与民族观及人文背景密切相关的，他的主张根据对象的不同也就不一样，这同时也反映出老舍先生的精神世界。谢昭新《老舍抗战散文中的文化心理透视》[55]，深度分析了老舍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散文，从中透视了老舍的抗战文化心理与生命精神，总结了其抗战文化心理的四个层面。杨剑龙在《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72] 一文中写到，抗战是老舍新诗创作的重要时期，老舍创作的新诗也是抗日战争的记录。文中就老舍新诗的倾向、形式与追求等问题展开论述，也提及了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卢军在《从文协“会务报告”看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111] 一文中，以“会务报告”为切入点，探析老舍在整个“文协”活动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及对抗战文艺的贡献。有关老舍与抗战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还有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

国民政府抗战》[112]、孙洁《老舍 1941 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113]、刘东方《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114]、李卉《老舍重庆时期抗战小说论》[115]、傅光明《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26]、刘涛《老舍抗战佚文考》[116]、陈建宁《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67]、傅晓燕《在时代规范与艺术诉求之间——论老舍与曹禺抗战时期的创作转型》[117] 等。

老舍研究无疑是向前推动的，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这些意见从总体上距离老舍文学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很远。比如，老舍与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学、文化、哲学等的关系研究尚未全面展开；老舍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关系也缺乏集中的探讨。这些都需要在纵横交叉的维度上对老舍进行解读，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老舍"及其"老舍世界"。

老舍是具有世界视野的世界性作家，对老舍及其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在这一时期有所涉及，但是，还远远不够。增林《方兴未艾的域外老舍热》[118] 一文，总结了众多海外国家的文学界对老舍及其作品的研读状况，因老舍有着国外的生活经历，所以其作品也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域外一直保持着研究老舍的热潮。白杨《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119]，总结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历程并叙述了对其建国后作品的研究情况，从写作风格、普世意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发扬、政治环境等四个方面解释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广受欢迎的原因，论述了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状况。李逸津《19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老舍研究》[120]，介绍了苏联汉学界对老舍创作的译介与研究状况，俄罗斯汉学家一直在进行着自己的老舍作品翻译与研究工作。文中详细介绍了学者 A·罗季奥诺夫的学术成果《老舍与中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121] 以及沃斯克列辛斯基等学者所编辑出版的老舍作品集。张曼　李永宁《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122]，对自 1944 年以来老舍作品在美国的翻译、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在与国内同时期研究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特点。高方《试析法兰西棱镜中老舍的多重形象》[123] 一文，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呈现的多重形象进行揭示与原因分析，衡量了老舍作品在异域的价值。此外，相关学术成果还有李澜雪《"双重目光"下的求真译作——评程抱一、程艾兰的法译本〈骆驼祥子〉》[124]、娄晓凯《老舍小说的本土立场及其翻译的异域化倾向》[125]、石兴泽　石小寒《中国与苏联老舍批评研究的历史检讨》[126]、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127]、孟庆澍《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美国（1945–1946）》[128]、陈谊《施译〈骆驼祥子〉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129]、叶林果《老舍文学作品的英译概述》[130]、高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131] 等。老舍研究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的加盟，需要对老舍研究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联合协作。

以往我们更多的是把老舍置于 19 世纪世界文学的视域中来认识，那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可是，老舍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英国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的，那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新时代。老舍明确提到的如文学的康拉德、劳伦斯、亨利·詹姆斯，心理学的弗洛伊德，哲学的叔本华。这些都与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思潮具有重要的关联性，不对老舍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行研究，认识不到老舍文学的现代主义成分，对老舍的整体性认识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还有老舍的文艺思想研究，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展开，作为一个作家，老舍还积极进行文学批评活动，在大学讲授文学概论并有完整讲义存世，他还写有大量美术评论，这些都可以放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去研究。另外，老舍作为文学作品在被改编成各种影视及舞台作品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他活在当下，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我们的同代人。而老舍研究日渐学院化的同时，选题也越来越技术化，而如果脱离了老舍与当代文学、文化和生活的密切联系，老舍研究就会失去与当代的对话，失去人文学术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 王卫平,张英.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J].民族文学研究,2015,（2）.

[2] 段从学.论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7）.

[3] 舒乙.老舍文坛地位变迁路[J].文学教育（下）,2010,（7）.

[4] 傅光明.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3）.

[5] 徐仲佳.论老舍在新中国文学场的占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9）.

[6] 梁秉堃.在老舍师身边[J].剧本,2016,（12）.

[7] 牛颂.解密老舍[J].中国民族,2013,(12).
[8] 傅晓燕.从老舍的生命背景透视《二马》民族情的书写[J].山东社会科学,2010,(5).
[9] 吴小美.“最老舍”的《老字号》——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年作[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10] 杨迎平.老舍与《茶馆》——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J].文艺争鸣,2009,(6).
[11] 王昉.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老舍诞辰110周年纪念[J].文学评论,2009,(1).
[12] 刘大先.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9,(5).
[13] 舒展.笑的哲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随想[J].北京观察,2009,(4).
[14] 关纪新.老舍民族观探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
[15] 邵宁宁.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J].甘肃社会科学,2010,(11).
[16] 傅晓燕.从底层人物塑造看老舍民族意识的嬗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3).
[17] 关纪新.老舍研究个案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18] 谢昭新.论老舍的“和谐”文化观[J].民族文学研究,2009,(5).
[19] 吴小美,李向辉.老舍的生死观[J].文学评论,2006,(9).
[20] 孙郁.老舍的鲁迅观[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1] 王俊虎.平民作家老舍交友观探析[J].兰台世界,2009,(3).
[22] 陈千里.老舍早期作品中的家庭书写与家庭观念——以《离婚》为中心的讨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23] 董克林.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24] 迟蕊.老舍对“国民性”书写的思考及与鲁迅的差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7).
[25] 关纪新.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
[26] 傅光明.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4).
[27] 魏韶华.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J].中国文学研究,2007,(7).
[28] 邵宁宁.寻找“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评《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
[29] 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0] 王本朝.论老舍文学创作的民粹思想倾向[J].民族文学研究,2006,(11).
[31] 王晓琴.老舍文学世界:民族精神启示录[J].民族文学研究,2006,(11).
[32] 吴效刚.老舍的自由心态与其小说的人本思想[J].江苏社会科学,2009,(7).
[33] 冯健飞.一面病态人格的镜子——浅析老舍小说对官本位思想的批判[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4] 禹明华.老舍小说与墨侠精神[J].中国文学研究,2007,(7).
[35]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36] 谢昭新.老舍与中外文化综论[M].安徽: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7] 石兴泽,石小寒.东西方文化影响与老舍文学世界的建构及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38] 杨剑龙.老舍与都市文化[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9] 张桂兴.老舍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0] 傅晓燕.多维视野中的老舍创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1] 吴小美.老舍散文三十八讲[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42] 吴小美.老舍小说十九讲[M].广西:漓江出版社,2009.
[43] 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人民艺术家[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7.
[44] 关纪新,舒济.老舍图传[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45] 舒乙.老舍的平民生活[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46] 傅光明.老舍的文学地图[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47] 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48] 王本朝.老舍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49] 崔恩卿,高玉琨.走近老舍:老舍研究文集[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50] 蒋泥.老舍之谜[M].北京:中国书店,2007.
[51] 王俊虎.老舍与曹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2] 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53] 张曼.老舍翻译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54] 谢昭新.老舍与儒家文化[J].江淮论坛,2014,(1).
[55] 谢昭新.老舍抗战散文中的文化心理透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9).
[56] 岳凯华.老舍小说与儒家文化[J].文学评论,2011,(9).
[57] 吴小美,冯欣.老舍的文化理想与《大地龙蛇》[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7).
[58] 关纪新.老舍,一位文化巨子的伦理站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59] 周丽娜.《二马》的文化新解[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8).
[60] 张菊玲.阅读老舍,记住曾被遮掩的民族历史文化[J].民族文学

研究,2009,(5).
[61] 陈红旗.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J].民族文学研究,2012,(12).
[62] 曹金合.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J].东岳论丛,2013,(2).
[63] 李惠.茶馆对世情人生的隐喻——由话剧《茶馆》看老北京茶文化的兴衰[J].农业考古,2014,(11).
[64] 关纪新.中华精神文化的批判与重构——“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系列论文之二[J].江汉论坛,2008,(1).
[65] 关纪新.多重文化场域中的老舍[J].满语研究,2007,(12).
[66] 黄伟林.潜入民族文化深水区,探究文学多样性——从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5).
[67] 陈建宁.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68] 林朝霞.从《骆驼祥子》看老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9).
[69] 胡登全.重庆1938—1946:老舍的文化分水岭[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5).
[70] 陈夫龙.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J].宁夏社会科学,2007,(7).
[71] 马丽蓉.论老舍的伊斯兰文化情怀[J].民族文学研究,2006,(2).
[72] 杨剑龙.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J].甘肃社会科学,2013,(3).
[73] 孙洁.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隐现[J].当代作家评论,2012,(3).
[74] 石兴泽.从保留到皈依:老舍思想理论和创作追求与社会主义文学思潮[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75] 杨春时.老舍创作的多向性——现实主义、启蒙主义与革命古典主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0,(5).
[76] 于昊燕.老舍在昆明、大理的经历与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
[77] 凤媛.“茶馆”重塑与老舍1949年后的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9).
[78] 陈涛.老舍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研究[J].作家,2012,(22).
[79] 李遇春.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
[80] 张娴.老舍文学创作启蒙思想辩证[J].求索,2012,(2).
[81] 张丽军.“恋身”、“失身”、“洗身”与“毁身”——论祥子身体的自恋与毁灭[J].民族文学研究,2008,(5).
[82] 狄昌超.从平民视角看人生悲喜的典范之作——再读《骆驼祥子》有感[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5,(6).
[83] 江腊生.《骆驼祥子》的还原性阐释[J].文学评论,2010,(7).
[84] 邵宁宁.《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J].兰州大学学报,2006,(7).
[85] 孟庆澍.“反成长”、罪的观念与个人主义——重读《骆驼祥子》[J].文艺研究,2017,(3).
[86] 白志坚.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堕落——《骆驼祥子》形象分析[J].前沿,2008,(1).
[87] 金洁,吴平.基于《骆驼祥子》英译本序言的译者翻译理念及其主体性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
[88] 孙会军.《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
[89] 孙会军,于海阔.从《骆驼祥子》英译本对引语模式的处理看小说风格的再现[J].外语研究,2013,(8).
[90] 黄立波.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探讨——以《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中人称代词主语和叙事视角转换为例[J].中国外语,2011,(11).
[91] 黄立波.《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1).
[92] 孔令云.《骆驼祥子》英译本校评[J].新文学史料,2008,(5).
[93] 吴小美.抗战时期长篇小说中的《四世同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1).
[94] 江腊生.《四世同堂》中的生活形态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2).
[95] 朴希亘.论北京曲剧《四世同堂》对原著的改编创新[J].东岳论丛,2014,(6).
[96] 魏韶华.《四世同堂》英译与老舍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J].文学评论,2011,(7).
[97] 魏韶华,刘红涛.浦爱德的“怪英文”对老舍《四世同堂》英译的独特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1).
[98] 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99] 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3).
[100] 王本朝.论抗战时期老舍的戏剧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2).
[101] 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11).
[102] 梅启波.老舍抗战戏剧刍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103] 李卉.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J].四川戏剧,2011,(1).
[104] 翟瑞青.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J].山东社会科学,2014,(9).
[105] 王俊虎.都市风情线与世态风俗画——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三[J].戏剧文学,2009,(2).

[106] 杨迎平.《茶馆》:“驰骋古今,综合中外”的戏剧艺术——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J].文艺理论研究,2010,(5).
[107] 董克林.从“第一次”到戏剧大师——老舍的戏剧艺术实践分析[J].戏剧文学,2008,(9).
[108] 陈军.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J].戏剧艺术,2006,(12).
[109] 梅琳,王本朝.老舍《残雾》的创作、演出与论争[J].贵州社会科学,2016,(2).
[110] 关纪新.老舍抗战观扼要[J].中国文化研究,2015,(12).
[111] 卢军.从文协“会务报告”看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J].文艺评论,2016,(10).
[112] 史承钧.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国民政府抗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113] 孙洁.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114] 刘东方.老舍《丈夫去当兵》与抗战歌诗[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7).
[115] 李卉.老舍重庆时期抗战小说论[J].民族文学研究,2013,(12).
[116] 刘涛.老舍抗战佚文考[J].新文学史料,2010,(5).
[117] 傅晓燕.在时代规范与艺术诉求之间——论老舍与曹禺抗战时期的创作转型[J].民族文学研究,2011,(6).
[118] 增林.方兴未艾的域外老舍热[J].中国民族,2016,(8).
[119] 白杨.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J].俄罗斯文艺,2015,(10).
[120] 李逸津.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老舍研究[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121] A·罗季奥诺夫.老舍与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M].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6.
[122] 张曼,李永宁.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23] 高方.试析法兰西棱镜中老舍的多重形象[J].外语教学,2013,(9).
[124] 李澜雪.“双重目光”下的求真译作——评程抱一、程艾兰的法译本《骆驼祥子》[J].小说评论,2016,(11).
[125] 娄晓凯.论老舍小说的本土立场及其翻译的异域化倾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8).
[126] 石兴泽,石小寒.中国与苏联老舍批评研究的历史检讨[J].民族文学研究,2015,(2).
[127] 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J].民族文学研究,2012,(8).
[128] 孟庆澍.经典文本的异境旅行——《骆驼祥子》在美国(1945-1946)[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129] 陈谊.施译《骆驼祥子》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J].小说评论,2010,(7).
[130] 叶林果.老舍文学作品的英译概述[J].兰台世界,2011,(12).
[131] 高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J].小说评论,2013,(5).

**责任编辑:冯济平**

#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Lao She in the Past Ten years

WEI Shao-hua　LI Ya-kun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Research on Lao She can be said to have been done in a hard way from 2006 to 2016 since major breakthroughs are that not easy. Despite difficulties in such a bottleneck period when scholars tended to repeat old topics, the academia was pushing research forward in a spiral way. During this period, a number of gratify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roduced, most of them about Lao She's background, status, ideology and spirit, values, creative text research, cultural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trying to interpret Lao She and his works from an updated perspective and presen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aying some emphasis. Among them, priority was given to Lao She's background, status, creative research and cultural research.

**Key words:** Lao She; research; comment

# 新发现四则老舍佚文

金 传 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新近发现老舍1930至1940年代的4则佚文：《打游击战》《明日的文艺》《文艺的创造》《小押儿在北平》，其中包括鼓词、杂文、演说稿等多种体裁。这对于进一步完善《老舍全集》的修订，推进老舍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老舍；佚文；史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107-06

2013年，新版《老舍全集》历经七年修订后终于面世，尽管有不足与缺憾，但依然当得上“收文全面，校勘精良，是阅读研究老舍的必备文本”的评语。正如所有的作家“全集”都只是相对意义上而言，新版《老舍全集》的出版并不表示老舍作品的辑佚工作便告停止。笔者近来在查阅报刊时，便陆续发现了几则老舍佚文。它们既未被新版《老舍全集》收录，又不见于《老舍年谱》等各种老舍研究资料，史承钧、段从学等先生的补遗文章[①]也未提及。为了有助于《老舍全集》的再度修订与增补，今按时间顺序将这些佚文整理出来，并略加考释，以期对老舍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篇佚文是鼓词《打游击战》。该文刊发于1938年2月21日《老百姓》第1卷第5、6合期，署名老舍。《老百姓》是十日刊，1938年1月1日创刊于兰州。由老百姓编刊社编辑发行，是一份综合性刊物。主要登载通俗的抗日理论、歌谣、小说，各地老百姓的抗日实况。《打游击战》在目录页注明为“转载”，说明它原载于其他期刊，只是由于资料阙如，暂时无法确定其首发处。全文如下：

## 打游击战

日本鬼子昏了心／横行霸道目无人／飞机大炮齐来到／杀害我们良善民／我们不慌也不怕／大家原作义勇军／靠山结寨藏得好／远远放哨在松林／敌人前进我们退／引他追赶入山深／山沟处处埋伏好／一声不响把枪伸／敌人军马入山里／我们拦腰把贼擒／空有大炮难开火／钢甲车大难转身／第一要会用地势／一人能挡百十人／第二要断贼后路／毁路拆桥兵法新／第三要有好联络／前呼后应要齐心／这边退来那边打／累得小鬼跑断筋／第四要把气沉住／随机应变显精神／能打便须都拼命／不好打来便转身／心灵手快气又稳／劫粮劫草困敌军／我们若退都拿走／不给敌留草一根／人人奋勇个个巧／子龙将军胆包身／小鬼心毒计又狠／也怕游击似追魂／敌人占了城和市／一步不敢出城门／我们单身也敢战／枪不虚发瞄准心／有时也去放把火／偷偷把他军火焚／有时假充傻百姓／带他偏把错道寻／人人都能这样作／管教贼兵抹泪痕／这兵叫作游击战／奇就专打日本人

**收稿日期：**2017-01-06

**作者简介：**金传胜（1988-），男，安徽芜湖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参见史承钧：《新版〈老舍全集〉补正》，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史承钧：《新发现老舍佚文、佚信及其他》，载《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段从学：《老舍佚作六篇》，载《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4期。

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思想，鼓舞民心士气，激发爱国情绪，老舍一度致力于用鼓词、京剧、坠子等大众文艺形式大量创作语言俚俗、风格活泼的作品。《打游击战》便是一首通俗鼓词。关于游击队题材，老舍还创作有：《游击战（鼓词）》，载1938年2月2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1卷第7期；《打（游击队歌）》，载1939年4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现均已收入新版《老舍全集》第13卷。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号召民众积极投身抗战，歌颂了游击队员们同仇敌忾，奋勇抗击日寇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文艺作为武器与号角的功能，从而为抗战宣传教育及争取民族解放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1年春，老舍“因贫血，患头晕，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1](P251)6月10日，江西泰和的《江南文艺》创刊号在“江南电台”栏目中刊登了老舍的回信：“……接示甚谢，甚愧！近患贫血症，工作已停月余，在最近尚难执笔，千祈谅之。”《江南文艺》由江南文艺社编辑出版，勒公丁任发行人。该社社长为艾金，即宋之的，所以此信可能是老舍对宋之的来函约稿的回复，应写于春初。虽为残简，但亦可略窥老舍当时的身体状况与文学交往。

1941年10月6日，昆明《当代评论》周刊第1卷第14期刊登了一篇杂文《明日的文艺》，署名老舍，亦是一篇佚文。《当代评论》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停刊，由当代评论社编辑发行，中央日报社印刷，属于综合性评论刊物。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 明日的文艺

今日的努力是为了明天，对明天抱着希望，今日的生命□[①]能欣欣向荣。文艺写家们，从抗战开始到今天，差不多都辛苦的用着笔墨宣传抗战，打击敌人。饥寒困苦并没能把他们压伏在泥土里，因为他们心中有个胜利的明天。

在抗战史里必有写家们的光荣的一页；在胜利后，他们也必因今日的奋斗而给明天的文艺一些新的光彩。

看吧：从抗战以来，文艺写家们就团结到一处，一心一德的谋抗战文艺的发展；密集的笔力，正如同密集的火力，才能消灭敌人啊。他们知道：相互敷衍不是团结；敷衍只是使真理陷没；他们也知道，抗战四年来，文艺理论上之争论并未曾因团结而停止，什么是民族形式？怎样接受文学遗产？如何朗诵诗歌？……这些问题，都有过热烈的争辩。可是，争辩虽烈而无谩骂，谩骂是浪费笔墨，智者不为。

再看：[②]各地方文艺团体座谈会的记录吧：提出了问题或作品，大家面对面的驳辩与批评，而并没有面红耳赤的叫骂起来。团结使大家得到了批评与接受批评的正当的态度——不许客气，可也不许强词夺理；诚恳的批评，谦虚的接受。

因此，我相信明日的文艺批评必能成为使人心悦诚服的作品，作家与批评家将因批评而成为知心的朋友，一同在真理的面前坚定他们的友谊。

在创作方面，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这四年来，都经过了严格的实际考验。以言诗歌，在抗战前，诗是纸上的东西，歌的声音仅在学校的围墙以内。纸上的东西走不甚远，而李白杜甫的佳句倒还铿锵如故，依然在人口中、耳中，无怪旧体诗几欲复活而新诗的脸色日见惨淡！战争把纸上的文字送到民间的耳边去。民众比文艺批评家更不客气，“不懂啊，先生！”于是，有了朗诵运动；文字要俗而精，文法要暂避欧化，音节要有本国语言的自然之美。新诗又兴旺起来，不过这还只是些技巧问题，诗人在屋子里亦能精心制造。炮火使诗人走出了书斋，他看见了火，血，地狱一般的人间，与英雄豪杰一样的军民；他的感情不再缠绕在一枝小花，或云隙的一颗小星上；他立誓要写更高伟壮烈的东西。即使才力不足，而心向往之——有了绿芭，就能有那么一天开开红花。明日的新诗不难推测：有自己的最高的理想，自己的深厚的感情，有自己的最美的言语，因为今天已有了这样的

①原文无法辨认处以□表示。
②此处冒号应多余。

准备。

歌曲久已推倒学校的围墙，而走到山村与战场去了。礼乐已衰的中□，现在又会唱了。想想看，假若没有那几百首抗战歌曲啊，以我们的军队生活之苦，将怎样使士兵身经百战而还不疲怠呢？因为歌曲的殊勋，社会开始注意到音乐，旧乐与新乐的研究与传习是最近二年来建设事业中很显著的一项——可是话似乎出了题，即当打住。

小说似乎沉寂。原因：（一）诗歌戏词在抗战宣传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不少的小说家因此暂时改行。这是热心抗战，而且也有多学习学习的意思。（二）时代太伟大，而小说家的认识不足，故暂且停一停；是小心，也是自省；自省，我希望，能不减少勇气，而更增进努力！（三）写家已经，或正在，收集材料，预备写出较大的作品。（四）生活困苦，不能空起肚子去写长篇。（五）印刷困难，不易找到承印大部头著作的人。

就四年来已有的小说看，小说并未失其优越：（一）诗歌戏剧都有更多的形式的限制，所以就内容而言，四年来的小说叙述到的方面之多，远非诗歌戏剧所能及。（二）在运用旧形式上，小说既不必关心舞台上的限制，如戏剧；又不必旧瓶新酒，如新的鼓词。它只要略改一改风格，以中国固有的简炼的语言，爽朗的叙述，就能不着痕迹的□旧相融，而产生中国风格的作品。

我相信小说有它的光明的前途。

戏剧是抗战文艺中的天之骄子，谁□没想到它曾这样的得意，可是战时的要求使它一帆风顺，由都市扩展到战地与乡村。小说，诗歌，即使能朗诵，也不如戏剧的以活人表现活人，有声有色由眼由耳直达到心灵。一幕《再上前线》就使多少受过伤的弟兄决心马上重赴战场。

不论抗战戏剧还有多少缺点，它已被军民接受是个事实。它已建起了路网：从五原，榆林，韶关，或昆明，哪条道路都可以通到舞台，我想他[①]不会自己拆了台，而必能由今日的试验，找到明日的建设。它必能因为与民间的接触，减少表演技术的洋化，而增加本地风光；因认识本国的文化，减少模仿，而努力创造。

旧剧也并未完全袖手旁观。它的锣鼓也想击动出抗战的音声，可是，二黄戏与地方戏都已成定型，改革不十分容易。它的明天的模样，很难预测，不过它一定有所变动，则可断言。

总之，战争带来的艰苦，使写家们更会深思默虑，战争中所表现的民族的精神，使他们的情感更深厚博大。抗战文艺的成就也许不很大，但是它所供献的都有精神上的酬报！他[②]的子粒已种在国土里，杨子与黄河的水，南国的和风与华北的春雨将使它发芽，生长，开花，结实。它将成为中华本位的文艺。

也许呀，在胜利之后，会有些专摆弄文字，吟咏小花小草的诗文，美其名曰抗战文艺的纠正。患病之后，总有些撒娇，亦在情理之中。不过，抗战不是患病而是死□求生，得到生命的不会再去自杀吧？我想，明日的文艺宁可是过火的粗莽雄壮，也不会是细嫩秀弱的小花小草。呕，难道无边的热血，就换来一个梦吗？……

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老舍时常在工作汇报、学术演讲与著述中回顾抗战文艺的发展状况，总结其得失，并对下一阶段的文艺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希望，如《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抗战与文艺——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等文皆是如此。《明日的文艺》也是老舍关于抗战文艺所做的一次检视与巡礼。文章对抗战四年来的文艺批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发展情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尽管小说略显沉寂，抗战戏剧存在缺点，旧戏改革困难不少，老舍依然充分肯定进步文艺工作者们的辛勤工作与爱国热忱，并对“明日的文艺”与抗战的胜利满怀信心，显示了其务实苦干的态度与乐观主义的精神。

1938 年至 1946 年，老舍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

① “他”应作“它”。
② “他”应作“它”。

重庆。1938年2月6日，重庆的沙磁文化区宣告成立，这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专设的文化区[2]。抗战时期，该文化区是大后方乃至全国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聚集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等学府。1940年12月5日，中央大学等五所院校创办了《沙磁文化月刊》，在中央大学设沙磁文化社，负责编辑工作[3]（P104-105）。创刊号由时任中大校长的罗家伦题写刊名。老舍的佚文《文艺的创造》揭载于1942年3月该刊第2卷第1、2期合刊。同期有李长之译诗，胡小石、卢前、唐圭璋、汪辟疆等人诗词。《文艺的创造》见于“沙磁学术讲座”栏目下，且有题记“本篇由本社记者笔记，有失原意处，由记者负责”，说明该文是老舍一次学术讲演的记录稿。关于此次演说发表于何时何地，则尚待进一步的考证。全文不长，兹过录如下：

## 文艺的创造

提到创造，普通有误认是种凭空玄想的东西。以前文人确是坐在房子里玄想的，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曾经有人因洋鬼子从海那边打过来，□是在海这边挖一条大沟，上面盖起草来，鬼子一到，便都陷在沟里，这当然也是创造。

文艺确是想像的，但不是想入非非，而须根据人生经验，将事实重新组织一番，世上并不一定有这回事，但细微处都是人生经历。不过表现的要比普通深入，感动能力也特别大。创造□重要是自信心，我要创造，我就有权力创造任何人或事，不要模仿旁人，因此就愈是自己清楚的就愈先写，有些人以为写东西，自己非有见解不可。其实不然，合古今中外能有多少见解？所以见解倒不怕是别人的，表现的方法则要是自己的。

试分文为文艺与文学[①]两方面，前者是具体的表现，指创造部门；后者是叙□记载方面，指研究部门的。前者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后者如文学史声韵学等，懂得文学的，不见得能创作，声韵文学史之类，只可帮助创造，用为文学中创造的工具。所以创造的人，固然要研究学问，但不要被学海所淹没，被学问关住了不敢动手，要知道有此[②]研究更要紧的，这就是生活，创造的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将学问渗透到生活里面去。“渗透”两个字是个人甘苦中得来。文人都欢喜说公道话，在战前很多文人专做同情下层阶级的文章，但对洋车夫却又拳打脚踢，这种人是不能将正义感渗透到生活里面来。这种创造是虚伪的。所以大学同学除上课上图书馆外，应该有些文艺活动，如组织剧团之类，光背莎士比亚，只是“字”；自己无生活经验写出的东西，也只是“字”。所以我们光坐图书馆是不行的，因为只客观的看旁人创造，总难望深刻。抗战以来，文坛非常空虚，只是坐在后方梦想战场上，有炮响了，轰轰轰……。机关枪，咯咯咯……！满纸轰轰咯咯，实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倒是真正在前线奔走的几个文人，写出的东西，比较充实。

故对于“生活”“文学”及其他各种学问都应吸收容纳，可以参加任何社团活动，多一种活动，就多一种生活经验，要注意的是在任何场合下不要利令智昏，不要忘了“诗人”的立场，此处“诗人”指一般的文艺创造家，即不忘文艺的观察和判断。观察的东西，或不免平凡，但不要怕平凡，自古至今留传的作品，都是平凡的。红楼梦上并没有说林黛玉打死了老虎，大观园也并没出妖精，文艺家的责任，就是给每个平凡的东西，一个最妥善的解释。更要注意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充实。虽是极细小节目，也要注意不要只树立几根柱子，注意中间彼此如何接头，如何联络，这是记“事”的方面，“人”的描写自然也重要。不要把“人”看得太简单，弄得“黑白分明”，每个“人”都是负有一部历史的，即如一字不识的农人，何以能慷慨赴义，即是他承继了已□数千年的历史，同时也开来了数千年的历史。描写“人”要有深度，不要写成个扁的，平的[③]只看到单纯的善恶。谈到风格，只要自己凭自己体会经验写的东西，不渗杂不模拟旁人

①据后文推断，“学”疑为“字”。
②“此”应作“比”。
③此处应有逗号。

作品，久之自然有独特风格。

综括以上所叙要点即是：一、创造不是凭空想像而是根据实际经验。二、文艺是具体的表现，不是客观的叙述。三、要学问渗透到生活。四、在万象中冷静观察。

最后还须提到的，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呐喊正义，要为正义而活着，要成功一个伟大作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要准备终身做个牺牲者，四十年五十年始终如一的尽瘁于创造，为社会为大众献身，才能成功像杜甫莎士比亚荷马但丁那样伟大的作家。

由于听众主要为大学生，老舍在演讲中既传授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并建议、呼吁青年们多去参加文艺活动或社团组织，增加社会经验；不能被学问束缚住了手脚，而应“将学问渗透到生活里面去”；在文学创作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进行创造，学会观察生活，只有抱着献身精神，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此篇讲稿虽可能未经老舍审阅，但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老舍对于文学事业的热忱，和对于青年学子的殷切期许与厚望。

1946 年 3 月 1 日，汉口《生存》半月刊第 1 卷第 1 期上刊登了一篇《小押儿在北平》，署名“絜青”。《生存》为综合性刊物，创刊于武汉，由生存社编辑出版，发行人李大炳。社址位于汉口交通路二十一号，应是联营书店汉口分店（实为三联分店）所办。该刊设有栏目短论、哲学讲话、阅读讲话、艺术丛谈、科学常识、通讯、书评等。封面上特意标注了“特约撰述”，包括巴金、以群、老舍、向林冰、沙汀、金仲华、马宗融、曹禺、叶圣陶、翦伯赞、丽尼等人。该刊笔者仅见第 1 期，内有翦伯赞的《论“正”与“伪”》、向林冰的《从“人生本质”说起》、王亚平《说谎的城》等诗文。根据刊物特点与文章内容，不难判断此“絜青”即是老舍。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 小押儿在北平

近几年来，北平城里有着一种特殊的情形，那就是脚踏木屐，鸭拽鹅行的日本鬼子，和穿着大领的短筋骨的上衣，拖到脚面各色的长裙，脚登单脸刚刚挂着脚趾浅鞋的朝鲜人，散居在北平城里各胡同中。现在平均起来，每胡同总有他们两三家。因为市面上奇窘穷困，小偷，溜门子的也特别多，家家户户都紧闭双门，避免他们去光顾。北平以前的陋俗，妇女们常常喜欢站门子，闲眺望，如今这种情形已不多见了。可是来来去去的行人，仍然川流不息。

如果你稍微留点神，就可看出下级的人们，如拉车的，作小买卖的，常时往朝鲜人住的门里跑。原来朝鲜人正开着一号买卖——“小押儿”！专门收买当票。他们这种剥削老百姓的财物，真叫厉害！

譬如在当铺里当一件东西，只值五块钱，因为急等钱用，但又舍不得出卖当票，那就可以拿这张当票到朝鲜人开的“小押儿”再押，价值可以押到十五元左右，利息确要百分之十五，那就是说一块钱要扣你一毛五的利，半个月就满期押死了。如果你在半月中再给他送利息去，那便可以再延长半个月。不过十之八九，这般穷苦的人，很少如期凑得现款，马上能赎出来，结果半个月就押死的很多。朝鲜人马上拿着这张押死的当票到当铺去赎东西。

自从日本鬼子霸占北平后，当铺一行也就受了限制。伪机关每天要报销，预备的当款每天也要有一定。不管当来的东西值多少钱，就给写五块三块的。至于愿当不愿，那就看当主儿了。往往一二两重的金镯，也是只能当上三块钱。如果想再多使点钱，那只有押入朝鲜人手里了。

这样一翻腾不要紧，日子长了，许多值钱的东西，都入了鬼子们的腰包。这种意想不到的挤压剥削老百姓的毒招数，全叫他们使出来了。

这般朝鲜人把得到手里的货，再刀尺刷新一番，就可出脱给古玩行，估衣铺，打鼓儿的。他们不管什么货，一概都要。货物装璜起来，再卖给好贪便宜的主儿，往往买回来，不到三天，就准出毛病。如手表，他能改换里面的好机器，自行车掉换零件。诸如此类的手法不一而足。北平城之大，你在日本鬼强治之下那里能防范这些坏脓包呢！这笔账似乎该算一算了吧？

该文介绍了北平沦陷后城内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典当行业——小押儿，剖析了其剥削、毒害贫苦老百姓的实质。文章表面上揭示、批评了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实际上则将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与侵略政策，表现了老舍关心民瘼、反对异族压迫的爱国主义情感。

以上是笔者在查阅报刊时陆续见到的老舍集外佚文，希望它们能够对老舍研究有所助益。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抗战时期社会动荡，兵燹不断，文学作品与报刊杂志的散佚情况比较严重，加之老舍 1938 年后对于通俗文艺作品“随写随弃，无从汇印，也不想汇印了”[4]（P43），因而老舍这一阶段的著述尚有可以辑佚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老舍.《剑北篇》序[A].老舍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 舒琳.沙磁文化区:复活70年前的文化记忆[N].中国文化报,2008-04-13.

[3]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M].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

[4] 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A].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冯济平**


# Four Lost Works by Lao She Rediscovered


JIN Chuan-sheng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



**Abstract:** Four lost Works by Lao She during 1930s and 1940s have been discovered recently, which are Conducting Guerilla Warfare, Future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etty Pawn in Peiping. Including drum ballads, essays, speeches and other genres, they are of great value to further revise the complete works by Lao She and the study on Lao She.



**Key words:** Lao She; lost article; historical material

# 人物品藻与六朝文学批评

王今晖 张晓晴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人物品藻是汉魏六朝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主要以人物的德行、才能和精神风貌作为评价和考量的对象。人物品藻中论人的品评语汇，常被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者所借用，成为十分重要的理论术语和诗学范畴。此外，人物品藻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尤其是意象品评法，在六朝文学批评中更是广泛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人物品藻；气韵；风骨；意象品评法

**中图分类号：**I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113-06

人物品藻，也称作人物品评、人物品鉴，是对人物的德行、才能以及精神风貌等方面的考量和评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末尤其是魏晋时期，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从这种文化现象的最初产生来看，先秦儒家以德行与才能来品评人物，不过是对个体言行的要求和约束，是砥砺意志品格的表现。因此，相对而言，德行的高下是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两汉时期，人物品藻和朝廷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在与行政体系相联系的同时，社会影响力也得到了空前加强。不过，与士人的政治才能相比，这时期对士人道德层面的要求显得更为突出。汉末魏初的人物品藻则明显体现了一种当代的政治需求，社会上对人才的渴求，决定了人物品藻重才轻德的价值取向。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士人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物品藻在两晋时期开始走向了审美化的道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文艺批评。

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十分发达，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汉代以来人物品藻风气对其产生的影响。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指出："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皆能以名节自立"[1]（P465），但他并没有完全以德论人，而是充分肯定了作家的个性才学。他还据此评价了建安七子的作品，肯定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这些都是与曹魏时期人物品评中重才轻德的总体倾向相一致的。钟嵘借用人物品藻的方法，"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将自汉至梁的122个诗人分为三品，以彰显优劣。具体说来，汉魏以来人物品藻中论人的品评语汇，常被文学批评者所借用，成为十分重要的理论术语和诗学范畴；人物品藻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尤其是意象品评法，在六朝文学批评中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

## 一、人物品藻所用的品评语汇成为文学批评中的理论术语

首先来说一下"气"。气在先秦哲学中是指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性元素，这种元素又与人类喜怒哀乐之情的生成密切相关，如班固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2]（P1027）。同时，"气"作为人的精神境界，又常被提及，如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P62）。当然，"气"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人的血气，如《礼记·乐记》所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4]（P539）；又如王充所云"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5]（P875）。当然这层含义与"气"为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性元素这层含义有直接关系，所谓"夫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5]（P946）。刘劭品评人物的理论将气血与

**收稿日期：**2018-03-19

**作者简介：**王今晖（1969-），男，黑龙江海伦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晓晴（1993-），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指出人的禀气不同，性分各异，所谓“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6](P15)，这便将“气”与人的性格、气质联系了起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P525)，便是由刘劭的理论演化而来，强调“气”作为作家与生俱来的先天禀赋，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这种气就是作家个性气质的来源，当然也是作品独特风格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曹丕用他的文气理论，对建安诸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1](P524)，对于孔融高妙的气质进行了肯定；又如“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1](P465)，指出了刘桢具有超逸的个性气质，对于其文笔不够强健有力的弊端也提出了批评。刘桢也曾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7](P265-266)对于孔融的“异气”与其独特文风的关系谈了自己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带有对人的个性气质的探讨，在魏晋以后的文论中，其理论术语多为“性”所取代，如对于体性、情性的探讨，这当然与魏晋玄学中的才性之辩有诸多关系。即便如此，魏晋以后的文论中，依然还是大量使用“气”的概念来评价作家作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论及曹植、王粲的文风，称“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8](P297)刘勰承认作家的个性气质也是有差别的，所谓“才有庸隽，气有刚柔”[7](P256)；指出了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7](P60)的创作态势；在谈到声律问题时强调“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7](P301)；论及风骨问题时，也强调了“守气”的重要性，“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7](P264)。钟嵘称赞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9](P36)；称赞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9](P37)；称赞刘琨“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9](P61)等等。

与“气”相联系的另一个语汇是“气韵”。在六朝文论和画论中“气韵”是十分重要的美学概念，这是人物品评术语中的“气”与“韵”相结合而形成的。“气”之外，人物品评中也常常用到“韵”，这在《世说新语》以及许多正史的人物传记中都可见到，如“天韵”“风韵”“思韵”“高韵”“神韵”“体韵”“雅韵”“清韵”“道韵”“玄韵”等等。这里的“韵”，显然是指某种韵味、格调和气质。“气韵”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在人物品藻中极少出现，河南荥阳出土，刻于北魏正光三年的《郑道忠墓志铭》中，有“君气韵恬和，资望温雅，不以臧否滑心，荣辱考虑”的评价[10](P783)。在文论和画论中对“气韵”有更加明确的表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11](P907)指出了文章的本质在于作家内在的个性、气质、才情以及精神境界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是刻意为之者所难以企及的。这里讲到的“气韵”似乎与“律吕”有一定的关联，说明这一概念的使用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萧子显之后，谢赫在《古画品录》中也使用了“气韵”这一概念：“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12](P301)这样“气韵”的概念便不局限于人物品评和文学批评，而成为古典文艺中重要的美学范畴了。

再来说“风骨”。《世说新语》中有关人物风神气度等仪态的记载很多，常用风姿、风流、风仪、风神、风韵、风概、风标、风轨、风度等语汇。略举如下：

>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容止》）[13](P335)
>
> 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方正》）[13](P192)
>
> 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雅量》）[13](P200)
>
> （张）天锡见其（王珉）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赏誉》）[13](P270)
>
>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赏誉》）[13](P261)
>
> 王大将军与元皇表云：“舒风概简正，允作雅人，自多于邃。”（《赏誉》）[13](P246)

此外，风、气二字常连缀使用，如《言语》中刘孝标注引《桓温别传》称桓温“少有豪迈风气”[13](P64)；《识鉴》中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称褚爽“及长，果俊迈有风气”[13](P224)；《赏誉》中刘孝标注引《文章志》称王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13](P256)等。关于“骨”在人物品评中的运用，主要从秦汉时期的骨相、骨法之术发展而来。骨相本是秦汉方士和星相家相人的术语。刘劭《人物志》将“骨”与人的

性格联系起来，《九征》指出“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6](P14)；《八观》指出“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6](P120)。魏晋以来，“骨”逐步转向审美性的人物品鉴，与玄学所追求的超尘脱俗的风度美结合起来。《世说新语·赏誉》云：“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13](P262)“垒块”原指众石错落突兀，此指陈玄伯的骨骼挺拔，因此王羲之说他有“正骨”。“风骨”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也经常出现于人物品评中，如《世说新语·轻诋》云：“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刘孝标注引《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13](P453)韩康伯肥胖臃肿，长得象肉鸭，被人讥笑没有风骨。又如《世说新语·赏誉》云：“殷中军(浩)道右军清鉴贵要。”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清举也。”[13](P260)说王羲之“风骨清举”，也就是说他风度清俊超逸的意思。由此可见，“风骨”在中古时期的人物品评中，主要指人的外在形貌特征。分而论之，则“风”虚“骨”实，“风”侧重人的精神超远，“骨”侧重人的躯体挺拔。

魏晋人物画评论中关于“风骨”一词的使用，也沿用了人物品评的内涵。东晋顾恺之将“骨法”运用到绘画理论当中，虽然他的《论画》一文已佚，但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引“重叠弥纶，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14](P89)等文字，可知顾恺之所谓的“骨法”“形骨”等，都是指人的骨相形体。南齐谢赫有《古画品录》中的“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12](301)，足可见其对于“气韵”和“骨法”的重视。谢赫评曹不兴的画时说：“观其风骨，名岂虚哉！”[12](P303)有学者认为，“气韵生动”就是指“风”，“骨法用笔”就是指“骨”，如詹锳、王运熙均持此论。许多学者据此进一步指出了人物论、画论和文论中“风骨”概念内涵的一致性。如廖仲安、刘国盈指出：

> 当以风骨论人的时候，风指神；骨指形。以风骨论人物画的时候，风指神似；骨指形似。以风骨论文的时候，风指文章的情志，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义，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骨骼。从论人、论画到论文，风和骨的观念都有它一脉相贯的继承性，这就是风近于形而上的道，骨近于形而下的器。[15]

王运熙也说：

> 可见风骨这个概念，魏晋南朝时原用于品评人物，风指清俊爽朗的神情态度，骨指挺拔端正的骨骼。后来即用以品评人物画，风即气韵生动，指画中人物神情风貌奕奕生动；骨即骨法用笔，指画中人物轮廓勾勒良好，线条明晰有力。再移用到文学批评上，风指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骨指语言端直刚健。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风均指清俊爽朗的风貌，骨均指端直劲健的骨骼。[16]

这两段文字对于文论中“风骨”概念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有较大差距，但却都将文论中的“风骨”与人物论和画论中的风骨联系了起来。比较而言，前一段文字说“风指文章的情志，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义，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骨骼”，通过比喻的方式来取得联系，显然不够直接，还有些勉强；后一段文字倒是将文论中的“风”“骨”从艺术风貌上较为直接地与人物论和画论联系了起来。实际上，除了画论以外，在书论中也用到了“风”和“骨”。如袁昂《古今书评》云：“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12](P203)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12](P222)再如王僧虔《论书》云：“郗超草书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12](P162)

虽然《文心雕龙·风骨》中从《诗》之六义来讲“风”的来源，同时又回避了对“骨”的溯源，但其又指出：

>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7](P264-265)

从这段对“风骨”的释义文字来看，刘勰在使用“风骨”一词时，对于魏晋以来在人物品评和人物画论、书论中广泛使用的“风骨”概念，不可能完全没有启示或借鉴，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彦和风骨范畴在风虚骨实这一点上，显然有着人物品评的风骨论的影响。”[17](P335)

## 二、人物品藻所用的具体方法为文学批评所借用

人物品藻的具体方法，如直接品评法和意象品评法，对于六朝文学批评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意象批评法，更是在中国古典诗学中长盛不衰。

（一）直接品评法

当事双方以口头语言直接表达对他人或自己的看法。《世说新语·品藻》载：

>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13]（P284-285）

在司马昱的追问下，孙绰先后对刘惔、王濛、桓温、谢尚、阮裕、袁羊、殷融以及自己的个性特点做出了评价。又如《世说新语·赏誉》载："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13]（P271）司马道子对于王恭和王忱的个性特征也直言不讳。有时这种品评还会通过比较的形式来完成，显得并非那么直接。如"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13]（P290）孙绰认为在超脱世俗方面，自己不如许询，但是在吟诗作赋方面则胜过他。又如"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曰：'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弈弈神令。'王、刘善其言。"[13]（P286）桓伊对于杜义和卫玠的比较，得到了刘惔和王濛的认可。又如"或问林公：'司州（王胡之）何如二谢？'林公曰：'故当攀安提万。'"[13]（P292）对于王胡之的评价，是通过与谢安和谢万的比较来完成的。

这种通过比较来进行的直接品评法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突出体现在钟嵘的《诗品》中，先以上品中所论诗人为例：

> （王粲）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9]（P38）
>
> （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於公干，文劣於仲宣。[9]（P42）
>
> （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9]（P45）
>
> （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於陆机，而深於潘岳。[9]（P46-47）

对于王粲五言诗的成就，通过与曹植、曹丕的比较而得出结论；对于陆机的五言诗，拈出"气"与"文"两个方面，通过与刘桢和王粲的比较来进行定位；张协五言诗的艺术价值是在与潘岳和左思的对照中来实现的；至于左思的五言诗的评判，同样也是在与陆机和潘岳的比照中来完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野"应为"浅"，前贤已辨，此不赘言[18]（155）。再看中品所论诗人，钟嵘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俶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9]（P70）；称谢朓五言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9]（P71）；评价范云和丘迟诗作，"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9]（P73）；称沈约"故当词密于范（云），意浅于江（淹）也"[9]（P75）。当然，在各类比较中，钟嵘所选取的艺术层面是有差别的。

（二）意象品评法

指比喻性词语的使用，富于意象性。余嘉锡认为"凡题目人者，必亲见其人，挹其风流，听其言论，观其气宇，察其度量，然后为之品题。其言多用比兴之体，以极其形容"[19]（449）。《世说新语·容止》载："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13]（P342）"濯濯"指茂盛和清美；濯濯的春柳则让人觉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以此凸显人物的高雅脱俗之美。又如《世说新语·赏誉》中的几则故事：

>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13]（P231）
>
>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13]（P233）
>
> 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13]（P235）
>
> 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13]（P236）

文中所使用的意象种类是十分丰富的，既有

龙、凤、金、玉之类的自然意象，也有琴、瑟之类的人文意象。

这种以具体的意象来品评人物的气概、风度的方式，也渐渐扩大到评论人物的学问、语言乃至于创作的风格和特色。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13](P117)这是评论南北学人的治学特色。刘孝标注曰："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覈，易覈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13](P117)又如《世说新语·赏誉》："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13](P241)这是评论郭象谈玄时滔滔雄辩的语言风格。

在六朝时期的书论和画论领域，较早借鉴了人物品藻中的这种方法对书法和绘画作品进行评价。首先来看书论，梁朝袁昂的《古今书评》所评凡二十五人，上起秦代李斯，下至梁代书家，不显等级，几乎通篇都运用了意象品评的方法，既有自然意象，也有人物意象，如：

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尚风范，终不免寒乞。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能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庾肩吾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殷钧书如高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乏精味。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师宜官书如鹏羽未息，翩翩自逝。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孟光禄书如崩山绝崖，人见可畏。李斯书世为冠盖，不易施平。[12](P203-204)

以自然意象来论书的方式形象生动，较易为读者所接受，而以人论书的方式非常新颖，虽欠明确具体，却能激发欣赏者的想象力，显然受到了人物品藻方式的影响。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对于袁昂《古今书评》多有借鉴，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李镇东书如芙蓉出水，文采镀金。……王僧虔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程旷平书如鸿鹄高飞，弄翅颉颃。又如轻云忽散，乍见白日。李岩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12](P222-224)其次来看画论，顾恺之《论画人物》："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12](P270)顾恺之用轻云蔽日来描绘殷仲堪画像的艺术效果。又如谢赫《古画品录》论姚昙度："天挺生知，非学所及，虽纤微长短，往往失之。而舆皂之中，莫与为匹。岂直栋梁萧艾，可搪突玓瓅者哉！[12](P307)"对其画作给予了较高评价。

在文学批评领域，较早的意象批评法的使用，见于曹植的《前录自序》："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20](434)这是泛论理想的作品风格，也是对自己创作的一种自信。其后的意象批评，也多半是就作家作品的整体风格而论。《南史·颜延之传》载："延年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21](P)鲍照在比较谢诗与颜诗优劣时，巧妙地借用了意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南朝的文学批评家在其著作中也多采用意象批评法。钟嵘《诗品》云：

> 《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黄门郎潘岳》）[9](P43)
>
>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宋临川太守谢灵运》）[9](P48)
>
> 季鹰"黄华"之唱，正叔"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9](P57)
>
>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9](P73)

钟嵘将人物品评中的意象品评法充分运用到了对诗人和诗作的批评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萧统《陶渊明集序》云："玉之在山，以见珍而招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犹芳。"[22]（P8）这是对陶渊明人格魅力的高度评价。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8]（P341）以"红紫"和"郑卫"来形容鲍照诗歌的淫艳。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云："若夫天文以烂然为美，人文以焕乎为贵，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握牍持笔，思若有神，曾不斯须，风飞雷起。"[8]（P345）这是形容萧统的才思敏速。至于理论范畴的分析，如果借助于意象，可以简化理论本身的深奥，便于读者理解，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7]（P286）这里用了几个特定的意象，将文与质之间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再如《风骨》篇中论风骨和辞采的关系时说：

> 夫翠翟备色，而翻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鹪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7]（P266）

通过野鸡与鹰隼的比较，强调有文采而缺乏骨力和有风骨而缺乏文采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文采照耀而高飞冲天，才堪称文章中的凤凰。

总之，人物品藻中的意象品评法对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其后的文学批评中依然还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如司空图的《诗品》，在其所评论的二十四种诗风中，绝大部分的篇幅都运用了意象批评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傅亚庶.三曹诗文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王玫.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9] 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1] 萧子显撰.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 潘运告编著.汉魏六朝书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13] 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15] 廖仲安,刘国盈.释风骨[J].文学评论,1962,（1）.

[16] 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到建安风骨[J].文史（第九辑）,中华书局,1980.

[17]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8]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0]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2]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潘文竹**


# Character Evalu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WANG Jin-hui　ZHANG Xiao-qi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Character evaluation is a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periods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t always evaluates and considers people's moral integrity, abilities and spirit. The vocabulary used in character evaluation is often borrowed by the literary critics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terms and poetic categories. In addition, the specific methods of character evaluation, especially the image evaluation method, were widely used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 words:** character evaluation; artistic concept; strength of character; image evaluation method

# 别具只眼的唐宋古文研究

## ——近五十年台湾地区与日本、美国的古文研究回顾与反思

李 伟[1,2]

（1.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2.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近五十年来，经过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数代学者的努力，他们在唐宋古文运动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常可观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本领域的研究不仅走向深入，而且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式，台湾学者以中学积淀深厚、注重中西融通的学术方法见长，日本学界强调史料分析与理论阐释的客观中立，持论严谨，而美国汉学家的古文研究则以知识介绍和新颖的理论阐释为主要特色。这些研究实绩不仅显示了唐宋古文研究所具有的宏阔发展空间，而且透露出我国古典学术研究正在国际化的推动下日益走上属于自己的理论创新之路。

**关键词：**古文研究；研究方法；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I2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119-06

唐宋古文革新运动历来是中国古典散文研究的重点，加之这一现象的背后牵涉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文学等诸多历史线索的发展嬗变，其折射出的唐宋变革问题更是我国古典学术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一。基于此，古往今来的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注到这片本已耀眼夺目的学术领域。随着学术文化交流的进程日益加快，唐宋古文研究也逐渐成为台湾及日本、美国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形成的观点和著述构成了新时期以来唐宋古文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相比于此前学界更为关注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研究状况，对唐宋古文运动研究的介绍则相对较少。本文拟通过梳理近五十年来台湾和日本、美国关于古文运动的总体情况，以说明这些地区的学者在古文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以后古文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趋势作一回顾与反思。

### 一、台湾地区古文研究的实绩

近五十年来，台湾地区较早关注唐宋古文革新的学者首推钱穆先生，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卷）中有《杂论唐代古文运动》和《读〈柳宗元集〉》两篇重要的论文。[1]《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尤其新见迭出，思路开阔，能够结合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宏观背景，深入探讨唐宋古文革新的诸多重要问题，可谓是唐代古文研究方面难得的佳作，可惜在很长时间内未得到后人充分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先生首先将中唐兴盛的古文运动溯源至初盛唐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古诗运动，其复古思潮的延续性一脉相承，这对古文运动兴起背景问题的研究是一大突破。其次，钱穆先生又着重辨析了张籍批评韩愈古文的“驳杂无实”之说，以为该说是针对韩愈早年《猫乳说》等文章而不是后人一致认为的《毛颖传》，藉此说明了韩愈的古文思想实际存在

**收稿日期：**2017-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八至十世纪中国的文士转型与古文变迁研究”（16CZW022）；“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2016M592165）；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2017T100484）

**作者简介：**李伟（1982-），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着一个发展演变的线索。本文的另一个观点是对当时存在的著述形式问题的争论进行了分析，钱穆先生指出以“整襟陈义”为目标的古文家崇尚先秦子书创作的形制，因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成一家之言”，即以书的形式流传后世。而韩愈和柳宗元则明显不同于此类观念，钱穆先生指出：“子厚乃站在文学本身立场上发议，抑且站在韩、柳二公在当时所欲提倡之新文学见解上立论，故既与如张籍之专重著书以卫道之观念有别，亦与同时乃及身后一辈人对文学之评价相异也。然则推柳氏之意，文之为体，固可不尽于诏策、奏议、辞赋、歌谣以及夫论辩之类，而当有所新创，要之求其能不失于褒贬之于讽喻，而能兼夫著述与比兴二者之美，庶可以穷极六艺之所蕴，而不限于古人之成格。”[1](P34) 这一观点可谓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问题，即写作形式的区分与文体有别的结果并不是古文创作的关键，最终这一切都从属于“能不失于褒贬之于讽喻，而能兼夫著述与比兴二者之美”，文章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而不断更新“道”的内容，发挥文章积极的社会功用，并出之以文学化的形式，这才是古文运动的重心所在。关于此点，业师葛晓音在其相关的研究中已经将这一思路明确化[2]，只有顺承这一思路，才能找到解决唐宋古文运动发展演变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台湾地区研究唐宋古文较有成就的学者以台湾大学何寄澎、台湾师范大学王基伦为代表。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一书中指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及其在文章创作中的体现是北宋古文运动能够成功的关键，而这一思潮后来在道学家的理论挤压下逐渐消褪，最终导致北宋古文运动的转折与变质。[3]欧阳修的创作是何寄澎关注的焦点，他也因此以欧阳修为限，把北宋古文发展的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该书的最后又对中唐和北宋的古文运动进行了深细的比较，附录中则是北宋古文家与佛教的关系考论。另外，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一书又集中讨论了唐宋一些重要的古文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观。如对于范仲淹，何先生认为其文学观在载道辅政之外，还兼具文采形式的规矩，不同于经术派和政治家，实为柳开、杨亿二者观念之融合与修正；而对韩愈和欧阳修的古文作法，何先生立足于两人的具体作品，总结了韩愈和欧阳修面对不同的文体而采用的各具特色的文章写法，包括布局谋篇、语句衔接和炼字炼意。[4]王基伦《唐宋古文论集》中，对韩愈古文在中晚唐至北宋的接收、《尚书》和《春秋》与柳宗元古文创作的关系以及欧阳修、曾巩的古文都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其中对中晚唐北宋时期韩愈接受史的考察，发现贯穿其中的是重视韩愈古文的“怪奇”特点，这主要体现于接受韩愈时是与扬雄的文章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5]在《〈书〉与柳宗元古文表现风格之关系析论》中，王基伦发现柳宗元在“辅时及物”的创作思想作用下注重《尚书》中叙写大政的内容方面，反映在具体作品中则有“质朴、简要、真是”的特点，而且柳宗元在取用典故时并未蹈袭模拟，而是主张个人独创。对曾巩古文的分析，发现曾巩对写史与作墓志铭的区别分得很清楚，史书要写公是公非方能传诸久远，而墓志铭则不书死者之恶，态度必须谨严。曾文中以序跋和杂记较为出色，因其能出入经史，莫不寄予道德修养、仁心仁政的儒者情怀；曾巩的古文原本经训、长于道古，其本色须从议论典型、学问有得方面观之，其文闳博渊雅，醇厚浓郁。何寄澎、王基伦古文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能通过作品文本的细读发现问题，关注古文大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不同点则是何先生承袭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步步为营，较为平实，而王先生更为注重对西方文论方法的借鉴，力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其结论显得新颖而突出。此外，王基伦另有《韩柳古文新探》等著述，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有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此外，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中收录了几篇有关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论文，较有分量的是《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性书〉思想渊源再探——汉唐心性观念史之一章》。[6]前文揭示了中唐古文运动所具有的浓厚北方士族背景，他们所承载的北方文化传统对初盛唐以来文学“南朝化”形成冲击，重视文学为政教服务的复古风气是北方文化传统的核心理念，也是促成中唐古文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文则在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论述李翱思想史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李翱的哲学思想对汉唐关于心性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晚唐五代古文的研究，台湾吕武志的《唐末五代散文研究》是目前不多见的专题研究晚唐五代古文的著述之一。该书对晚唐五代的古文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是此前很少有人给予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该书总体上是以文学史的描述方法为主，通过考察晚唐五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学术思潮和时代发展演变的因素，具体列举了晚唐五代古文创作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想主潮和文章艺术特色，其结论是“实践元白讽喻精神”、“矫正散文道学气息”、“延续韩柳古文传统”、“扭转散文怪异

风格”、“精研散文写作技巧”、“拓展散文写作视野”和“开启北宋古文契机”等[7]，大体勾勒出处于中唐向北宋过渡阶段的晚唐五代古文的面貌。

除此之外，台湾仍有不少学者对唐宋古文运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在中唐古文先驱的个案研究方面，出现了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3 年版）、萧淑贞《李遐叔及其作品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 1989 年硕士论文）和杨承祖先生《元结研究》（台北编译馆 2002 年版）等重要成果，这些成果从文集版本流传、作家生平、作品艺术特色等角度展开研究，代表了当前台湾学界对中唐古文家个案研究的高度。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唐代古文研究推动最值得关注的，是罗联添的《韩愈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88 年增订再版）。该书已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述，不仅解决了韩愈生平中的一些含混之处，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后人继续探索的新问题，如韩愈之后古文发展的两条线索韩门与非韩门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韩愈古文精神的继承问题。

**二、日本与美国有关唐宋古文革新的研究成就**

海外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具成就的地域当推日本，有关唐宋文学和文化的部分汗牛充栋，其中就包括古文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因此，谈及域外研究唐宋古文的既有成绩，则须先从日本的汉学研究开始。

二十世纪中后期，较早对唐宋古文进行深入研究的日本汉学家是清水茂，他的《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和《杜牧与传奇》等论文[8]，都是日本有关唐宋古文研究的重要文章。他指出中唐古文运动中的古文、骈文看似对立，实则在创作中也隐含着互相吸取彼此创作经验的方面，韩愈的古文中就有许多骈偶因素，这些特点都使得中唐的古文更趋成熟。《杜牧与传奇》则是立足于古文与传奇的互渗影响，深入探讨了杜牧所作的墓志铭等文章中在运用古文笔法中借用传奇的创作特色，这对突出文章中的人物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唐文学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点，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观念，京都学派的学者大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唐文化的过渡特征上。其中京都大学川合康三的《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9]，便是代表近年来中唐文学研究水平的力作。该书《奇——背离规范的中唐文学语言》一节，重点分析了“奇”的概念在韩愈和皇甫湜的创作中的意义；虽然全书是以诗歌为重心，但对韩愈和皇甫湜古文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启发。

随着近年来中日学术文化翻译工作的开展，日本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也不断被引入国内。其中有关唐宋古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有鹿儿岛大学高津孝的《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东英寿的《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和同志社大学副岛一郎的《气与士风——唐宋古文的进程和背景》。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 1989 年至 2005 年间，反映了这段时期日本中青年学者研究唐宋古文的成绩。关于唐宋古文研究的文章，高津孝有《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和《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10] 这些文章在从科举视角关注文学的大思路之下，着重探讨了进士科举之前行卷行为对北宋士人的入仕和文章创作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并结合唐宋科举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来观照受到科举制度制约的文人是如何适应时代文化的变化而进行创作。其中，《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展示了北宋初年与古文发展进程相关的几个文学流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辨析文体内部的彼此关系，说明当时的文学革新思潮受到士人科举的深刻影响；其对“西昆体”与北宋科举的关系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把唐宋八大家说法的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这四个阶段分别与宋代学术界的思潮密切相关；这其实运用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探索文学发展背后的文化动因，可谓是比较成功地沟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副岛一郎《气与士风》和东英寿《复古与创新》二书，是专门研究唐宋古文发展的力作。《气与士风》中的《从“礼乐”到“仁义”——中唐儒学的演变及其背景》，延续并发挥了葛晓音《论唐代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的论点，并结合时代背景指出了从“礼乐”到“仁义”的儒学思想的转折给中唐士人的人格塑造和淑世精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中唐古文创作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副岛一郎继续考察唐宋古文中的创作主体在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士人风骨及其与当时古文写作风格的关系，如《唐宋古文中的“气”论与“雄健”之风》和《宋初的古文和士风——以张咏为中心》。[11] 东英寿则具体以欧阳修的古文为中心，围绕北宋科举的各种文化因素，将古文创作、时代的文学风气和文学研究的外围因素结合在一起，深入考察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复杂关系，其中的《从行卷看北宋初

期的古文复兴——以王禹偁为线索》《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从科举的考前活动看古文复兴的开展》《欧阳修的行卷——着眼于客居的考前活动中与胥偃的关系》等章[12]，与高津孝的相关研究彼此照应，且更为深入。而对于欧阳修这个作为北宋古文运动成功的关键人物，该书也用了相当的笔墨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相比之下，美国研究唐宋古文成果的深度和广度虽不及日本，但在理论视角的创新方面较有新意。美国汉学界较早进入唐宋古文研究的，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陈幼石。他的《韩柳欧苏古文论》是古文研究在美国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该书主要梳理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四位唐宋古文大家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特点，借此形成了对唐宋古文发展线索的整体性认识，即由韩、柳古文对骈文的“破”到欧阳修、苏轼古文风格的“立”，使得作家在表达对社会、历史题材的看法时，在灵活运用各种体裁并赋之以诗的情调时，能够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道”的意义随着创作的深入，由韩愈所提倡的古典主义的“典范”转变为欧阳修、苏轼古文中致力于寻找“常人”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而较早对唐宋古文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是海陶伟（James Robert Hightower），他的《作为幽默家的韩愈》（《哈佛亚洲研究》第44卷第一期）一文，着重分析了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表彰韩愈写作《毛颖传》的功绩，表达了对柳宗元这一看法的肯定之意。

此后，印第安那大学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中，设“新古文运动”一章，专门讨论韩、柳所推动的中唐古文的创作情形，其中涉及古文运动的性质、特点和概况。该书指出：

> 在形式和内容上这一汗牛充栋的散文整体基本上是儒家性质的，其文体则是主要源于先秦诸子的作品和汉代的史书。新古文运动本身把儒家学说抬高到佛教和道教之上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一散文运动鼓吹复古，不仅指的是儒家经典的内容，而且是指写作这些作品的古典文体。骈文是一种对偶文章，作为对这种唐以前时期矫揉造作的文章的反应，在唐代出现的新散文称为古文，指作为启发它的源泉的古代经典著作而言。它的目的在于抛弃华而不实的词藻，采用朴素有力的散文作为表达思想感情以及从事严肃地论辩的工具。这种对古代文体的复归是跟六朝的浮华文体的影响是相对抗的，强调古代的形式，也排除在正规文章中采用方言。[14]

同时，该书还在论述中穿插分析了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苏轼的古文名篇。

近年来的美国汉学界，威斯康星大学的倪豪士（W.H.NIENHAUSER）教授在唐宋古文研究方面用力较多。他主编的《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的概述，指出当时存在着三种创作演变倾向和阶段：一是以王勃、杨炯等“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骈文日趋繁复华丽的态势；二是以张说和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的文章中所显露的骈俪化语法因素的减弱与崇尚汉代文风的思想；三是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高潮。在具体论述唐代古文的概况时，倪豪士教授首先指出唐代古文的文体特征是单行散体语法结构的自由体文章，而且这类文章与当时的骈文彼此对立，同时看到了此次古文运动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是与科举考试和日渐崛起的低层士人的入仕问题纠缠在一起。其次，韩愈和柳宗元的创作功绩也是倪豪士教授论述的重点。在他看来，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其实是确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与司马迁、欧阳修并称的三大散文家。再次，对中唐古文与传奇小说的关系问题，倪豪士教授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与其争论传奇小说与中唐古文之间的影响问题，不如把这两种文化现象都看作当时一些以历史学家刘知几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所导致的结果。进入晚唐，倪豪士教授将论述的重点放在韩门弟子和重要的小品文作家那里，他指出在晚唐继承韩、柳古文的作家主要是樊宗师、李翱、皇甫湜、孙樵和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其中韩愈之后的古文发展呈现出两种趋向的分化，即皇甫湜和孙樵为代表的重“奇”风格与李翱代表的重“道”倾向。[15]虽然晚唐有上述那些创作不凡的古文作家，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倪豪士教授的观点是晚唐古文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倪豪士教授在由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担任主编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6]中也承担了关于“prose”的写作部分，其中关于唐宋古文的认识大体与前书一致，属于文学史介绍的内容。此外，在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中，倪豪士还有一些涉及到唐代古文运动发展问题的专论，如《〈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

的关系》、《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和《柳宗元的〈逐毕节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17] 在《〈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及古文运动的关系》中，倪豪士通过材料的对比发现了柳宗元的山水记文与中唐传奇的笔法颇为类似，文章最后虽没有提出明确的结论，但为后来者提供了继续探索古文与传奇在中唐文学中的关系的有益思路。而《柳宗元的〈逐毕节文〉与西方类似物的比较研究》则是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成果，这也是西方汉学家理论优势的体现。

另外，对美国古文研究有深刻影响的是包弼德。其《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是美国汉学界中以文学的材料研究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其中《755 年之后的文化危机》《文治政策与文学文化：宋代思想的开端》两章主要论述了唐宋古文的思想史意义。[18] 包弼德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文化届弥漫着重新确立价值观的问题，而获得价值观的来源最后就落实到圣人之道的方面，这一问题又是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即改革士人选拔的方式和充实士人的道德观念，变革取士方式就是要注重真才实学而反对雕章琢句的辞采，充实士人的道德则必须恢复孔孟之道的内圣外王，这也导致了此时文章风格的急剧变化，因此古文运动的思想史意义推动了当时的文体变革，这也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核心所在。包弼德先生的这一观念在美国汉学界影响很大，并被后来的邓百安（Anthony Deblasi）所继承，他的《Reform in the Balance——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是近年来美国研究中唐文学的力作之一。其中提出，中唐出现的思想主流就是寻找人文教化的观念和方法，而这一转变发展出两个阵营：以古文写作为主的改革派和维持现状的传统派。他们坚持着不同的文化理念，尤其是以古文写作为主的改革派强烈希望能够把文化革新作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关键。[19] 由此可见，邓百安的主要观点都是承自包弼德的著述，只是他把全书论述的中心放在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作品上，因为他们对政治评论的意见更直接和集中。

### 三、回顾与展望

纵览台湾和日本、美国有关唐宋古文运动研究的状态，可以明显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本领域的钻研，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以各具面目的成果显示着鲜明的学术特色。台湾学者大多接续古典传统，在学养积淀、研究路数和选题视角方面，能够顺承古文研究的传统路径，把相关问题置于我国文化传统的宏观背景中予以深入考察，纵横捭阖，上钩下联，辅之以当代古典学术研究中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经验，如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接受美学等理论领域所取得的有益成果，因而台湾学界近四十年的古文研究既平正通达，又有理论深度，某些方面对古文研究的整体性推进助益良多，甚至影响和启发了大陆学界在新时期以来的古文研究，如古文作家对扬雄的接受过程的分析，以及古文创作与唐宋思想史的关系等论题。至于日本和美国的唐宋古文研究，基本代表了海外本领域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而且大致反映出两国学者的学术趋向，日本学者持论严整，不妄下断语，立足于史料分析和理论阐释的适度原则，研究视野较为宽广，研究所得扎实可信。而美国的学者一方面承担着向汉语以外的学界介绍中国古典学术的重任，在此情形下，那些以英语写就的中国文学史多以知识整理为主，具体到古文研究而言，即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梳理唐宋古文发展的整体概况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以新颖的理论方法研究唐宋古文的具体问题成为美国学者本领域研究的另一面向，尤其是那些站在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所作出的实绩，对当前唐宋古文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有着宝贵的理论示范意义。

结合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唐宋古文研究在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大致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从资料辑佚和文献整理的角度进行专门化的古文评论内容的清理，尤其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欧阳修等古文大家的相关评论，散见于历代文话和文评中。这方面可以时代或专题等为分类标准开展资料汇编的工作，既可以奠定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对推动此后相关研究可以产生深远影响。二是立足于古文作品文本，结合政治、哲学、文学、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进行非常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与古文相关的文体论研究，牵涉政治史、制度史和文化史等众多领域的关键问题，深入挖掘文学现象背后隐涵的宏观历史问题。这使一些原本迂阔难立的问题可以落在较为实际的文化层面上，例如宋代科举、策论文和经学嬗变等诸多问题都可以进行通盘联系，既扩展了古文研究的文化视野，又能从历史的纵深透视当时颇为复杂的现象。三是借鉴中外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方法论成果，对唐宋古文进行艺术形式、语言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开拓研究。相对于我国传统的以义理、考据、辞章为核心的文章评论路数，国外文学研究多采用文学本位的立场，从文学内部研究入手，着重于形式、艺术和语言等细部问题的解读，他们依托

的是类似形式主义文论、原型批评、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上述理论，有时也能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观点。

近五十年来唐宋古文研究愈益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展望未来，这更预示着古文研究正在成为继古典诗歌和诗学领域之后又一正在崛起的古典学术研究新热点。尤其是随着《历代文话》和《历代文话续编》等文话古籍的全面整理，古文研究也能像诗学研究那样，重新回归经典文章学的传统，在深入梳理文章学的理论概念、历史发展和范例解读基础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且阐释有力的文章学理论话语体系，这已成为古文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章学研究的当务之急。这些研究新趋向的日益显现不仅昭示着古文研究已进入到一个“破旧立新”的阶段，即破除延续多年的旧有理论框架，建立属于中国文章学特有的研究体系，更意味着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在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走向“古 / 今”与“中 / 西”的全面融合，在理论方法、研究范畴和学术视野等方面有着更为广阔的探讨空间和分析维度。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四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 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 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2.

[4]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M].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

[5] 王基伦.唐宋古文论集[M].台北:里仁书局,2001.

[6]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M].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 吕武志.唐末五代散文研究[M].台北:学生书局,1989.

[8] [日]清水茂.清水茂汉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9] [日]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M].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 高津孝.科举与诗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 [日]副岛一郎.气与士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2] 东英寿.复古与创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 陈幼石著.韩柳欧苏古文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4] 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M].倪庆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5] W. H. NIENHAUSER edito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 Victor. H. Mair edito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17] 倪豪士.传记与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8]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修订版）.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19] Anthony DeBlasi. Reform in the Balance—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责任编辑：潘文竹**


# A Review of Tang and Song Classical Prose Study


LI Wei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



**Abstract:** Tang and Song classical prose stud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gram in Taiwan, Japan and USA.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som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study, and att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Taiwan scholars are good at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Western culture, Japanese scholars have well maintained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merican scholars prefer innovation in theory. In the new era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re is large room for ancient Chinese prose study, and evidence shows that classical Chinese academic study has been developing by making variou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Key words:** ancient pro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 系统动力学学科建设薪火相承

## ——评《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

贾仁安 徐 波

作为共性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基模，其结构如何，可能的行为模式有哪些？怎样逐步添加因果变量而建成一个系统动力学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有效性如何检验？沼气供应链断链问题等等。钟永光、贾晓菁、钱颖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相关研究获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由科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了《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一书。

系统动力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引入中国，杨通谊、王其藩、许庆瑞和胡玉奎等学者是先驱。王其藩教授师从系统动力学创始人 Forrester Jay W.。钟永光师从王其藩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钱颖师从 PålDavidsen 教授，在挪威卑尔根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PålDavidsen 曾在 MIT 访学，师从 Forrester。贾晓菁自中学时代就跟随父亲贾仁安教授开始接触系统动力学，深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在南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系统动力学作为研究方向，并一直从事系统动力学研究。

王其藩教授 195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9 年至 1980 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81 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访问，师从系统动力学创始人 Forrester Jay W.，1983 年被吸收为 MIT 系统动力学研究中心终身成员，回国后，积极推动系统动力学在国内外的发展，20 世纪 80—90 年代先后出版了《系统动力学》《高级系统动力学》[1-3] 等专著，并于 1987 年在上海主持了第五届国际系统动力学年会。其专著《系统动力学》[1] 获 1990 年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王其藩教授是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创始人、国际系统动力学会中国系统动力学分会创始人，曾任 *System Dynamics Review* 杂志副主编、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至第三届理事会主任委员、国际系统动力学学会主席（2006—2008 年）等职。令人悲痛的是，2016 年 5 月，王其藩教授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 82 岁。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敬献挽联："治学求真，依反馈回路研复杂系统，道启中国一脉；教书育人，由因果关联寻最优决策，薪传学界千秋。" 王其藩教授用毕生心血为中国系统动力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幸的是，2016 年 11 月，Forrester Jay W. 也与世长辞，享年 98 岁。这是国际系统动力学界的又一重大损失。Forrester 生于 1918 年 7 月，在 MIT 攻读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之后，一直在 MIT 工作了 77 年。20 世纪 70 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尝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与资源日益枯竭的矛盾，这一复杂系统存在诸多反馈回路、延迟等现象，常用的研究工具已经不再适用，而系统动力学恰恰能精准地刻画这些问题。在 1970 年 6、7 月间，Forrester 教授向俱乐部提出了使用系统动力学来研究这一问题，并建立了世界模型雏形（WORLD Ⅱ）。罗马俱乐部采纳了 Forrester 教授的建议，决定提供研究经费，项目负责人是 Forrester 的学生梅多斯（Dennis Meadows）。这项研究报告 *The Limits to Growth*（《增长的极限》）[4] 受到广泛关注，拥护者有之，批评之声也从未断绝，被西方称为 "70 年代的爆炸性杰作"。《增长的极限》的结论是 "悲观主义" 的，似乎给人们描绘了一幅 "世界末日" 式的图景，然而它也包含着希望，敲响了可持续发展的警钟。在第 1 版出版 20 年后的 1992 年，Meadows、Meadows 和 Randers 又出版了 *Beyond the Limits：Confronting Global Collapse，Envisio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一个可持续的未来》）[5]，对 1972 年在《增长的极限》中的研究进行了 20 年来的更新。在第 1 版出版 32 年后的 2004 年，Meadows、Randers 和 Meadows 出版了 *The Limits to Growth：The 30-Year Update*（《增长的极限 30 年版》）[6]，该书对第 1 版进行了 30 年来的更新。第 1 版出版 40 年后的 2012 年，Randers 出版了 *2052：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2052：未来四十年的全球性预测》）[7]，该书详尽地预测了 2052 年时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Forrester 团队生生不息，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Forrester 为庆祝国际系统动力学创立 50 周年，2007 年在 *System Dynamics Review* 专刊上，发表了总结过去的 "System dynamics——a personal view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8] 和展望未来的 "System dynamics——the next fifty years"[9] 两篇论文，从中都提到了共性结构 "generic structure"。1995 年王其藩教授指出：回顾系统动力学的发展历史，大部分系统动力学模型都是针对

某一特定情况、条件构造出来的，其通用性、类推性较弱，这就大大降低系统动力学的建模效率。因此，根据系统相似性，对一类或多类系统辨识和提取共性结构，对推动系统动力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3](P155-156)作为共性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系统基模，其结构如何？可能的行为模式有哪些？对这些问题，王其藩教授的博士后张显东教授，2004年在《系统动力学》课堂上曾引导学生系统思考，钟永光恰在其中参与讨论。12年之后，《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给出了解析。

系统动力学建模过程：逐步添加因果变量绘制因果回路图，之后逐步添加存量流量绘制存量流量图来建立模型的，但迄今为止，对一个系统动力学模型是怎样逐步添加而成的，这个模型含有多少反馈环，各反馈环中又有何具体反馈关系？建模者自己也难以说清楚。《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中给出了原创性回答，研发出流率入树建模法、枝向量行列式反馈环计算法、枝向量矩阵反馈环计算法、极小基模生成集法、顶点赋权图法等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这些研究成果，全部来源于贾仁安及其团队的系统工程实践，既解决了实际管理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系统动力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10]。

钱学森院士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美国人搞的所谓系统动力学，代表人物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福雷斯特（Forrester）。福雷斯特自己比较客观，他在《系统动力学》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谦虚地说，他这套办法到底行不行？还得看。实际上也是太简单，因为系统动力学里用的参数也是那么十来个。所以耗散结构、协同学、系统动力学这些比较现代的理论，他们用十来个参数把这整个'特殊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里面的问题简化到那样一个程度是不合适的。如果你硬要那么简化，那当然是主观的，也就是唯心主义了，所以是不行的。我看了这些东西以后，觉得我们还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像他们那样。当然我也不是说耗散结构、协同学、系统动力学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们在处理简单的巨系统是可以的，复杂巨系统不行。"[11](P43)他进而警示大家："系统动力学创始人Forrester自己就提出，对他的方法要慎重，要研究模型的可信度。但国内有些人对此却毫不担心，'大胆'使用。"[11](P201)钱老的话可谓真知灼见。《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力图在模型检验方面有所贡献。

2017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规模化养殖水平显著提高，保障了肉蛋奶供给，但大量养殖废弃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和利用，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抓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系畜产品有效供给，关系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改善，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事实上，在广大农村地区，沼气是处理养殖废弃物的有效工程手段。但是，由于缺乏稳定的沼气原料（主要是畜禽养殖废弃物）供应，很多沼气池闲置；另一方面，畜禽规模养殖产生的大量粪便无法运输到农户沼气池，随意排放带来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在应用部分就沼气供应链断链问题给出了理论参考。贾仁安及其团队自1985年在南昌大学开设《系统动力学》课程以来，三十多年来一直为《系统动力学》的教学和科研而奋斗，以江西省规模养殖污染物处理为研究对象，在科学出版社等出版了系列原创性成果[10][12-15]。2014年，贾仁安教授荣获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应用贡献奖"。

系统动力学学科建设薪火相传，上下求索，生生不息。

## 参考文献：


[1] 王其藩.系统动力学（第1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2] 王其藩.系统动力学（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3] 王其藩.高级系统动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4] Meadows D H, Meadows D L, Randers J, Behrens III W W.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M].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5] Meadows D L, Meadows D H, eds. *Toward Global Equilibrium: Collected Papers*[M]. CambridgeMA: Productivity Press, 1974.

[6] Meadows D H, Randers J, Meadows D L. *The Limits to Growth:The 30-Year Update*[M]. Post Mills VT: Chelsea Green, 2004.

[7] Randers J. *2052: 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M]. White River Junction, Vermont: Chelsea Green, 2012.

[8] Forrester J W. "System Dynamics – A Personal View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 [J]. *System Dynamics Review*, 2007, 23（2-3）.

[9] Forrester J W. "System Dynamics – The Next Fifty Years" [J]. *System Dynamics Review*, 2007, 23（2-3）.

[10] 贾仁安.组织管理系统动力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1]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2] 贾仁安,伍福明,徐南孙.SD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8（6）.

[13] 贾仁安,丁荣华. 系统动力学——反馈动态性复杂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4] 贾仁安，王翠霞，涂国平等. 规模养种生态能源系统工程反馈动态复杂性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5] 贾晓菁，孙健，贾仁安.养殖场原料供不应求条件下沼气反馈供应链波动规律的仿真和微分方程解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 32（10）.



（作者：贾仁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四、五届理事会副主任委员；徐波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第四届理事会主任委员）

# 当代小说应有的理论深度与价值担当

## ——《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读札

刘 佳

当梁启超赋予“新小说”以“文以载道”的使命，并敏感地注意到小说文体变化的巨大能量时，就注定了“新”/“现代”不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天“烙印”，也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社会转型、时代变革之间或隐或现的联系。因此，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反映论，还是强调新时期文学的独立性，都无法回避这一前提性的视野。贾丽萍的专著《社会转型与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就是在这一学术视野中展开的。该书以“小说”这一文体自身的变革为经，以“城市”这一最能彰显中国由传统进入现代的文化空间为纬，以历时性的角度把握小说的发展走向及理论探索的研究状况，在“社会转型”这一变奏主题中考察当代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心态，在立体的交叉格局中思考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作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形态塑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城市绝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划分，而是一种“内在精神”，“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富于个性的时代精神”。按照理查德·利罕的说法，“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对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城市与文学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而是相互塑造、彼此建构。著者所截取的研究时段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恰恰是在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再次开启对小说观念、文体形式探索的关键20年，作家们以反叛者的姿态和否定精神，挑战传统的美学原则和小说艺术规范，引发了审美意识、审美趣味、艺术观念等全方位的变革，而现代城市，作为与乡土迥异的文化空间，也成为承载文学探索精神的文化空间。该书把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讨与城市相联系，试图构架“小说”与“城市”之间的意义关联，显示了选题的敏感性。

在此基础上，该书的理论观照十分突出。如著者所言：“在中西小说创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辨析西方小说创作观念及小说美学形态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发现中国小说创作与西方之不同，突出中国小说自身的发展特点，厘清中国小说发展的脉络。”可以说，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小说的主体性这一理论抱负是有其时代意义的。新时期以来，在“后革命”的历史视野中，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曾经一度陷入对西方文学的膜拜与迷思中，西方文化几乎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合法形态，这种对现代性的片面理解影响了作家的写作观念与小说的美学形态。该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如何创造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和精神立场的优秀作品，是当代中国作家无法逃避的现实责任”，并将目光投向对20世纪80—90年代社会转型期小说创作的剖析，侧重考察小说创作观念与美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在理论阐释与作家评论并蒂相形的论述架构中，结合小说观念及美学观念考察小说写作的诸多困境，从题材选择、艺术探索、美学倾向和文学精神等方面，总结出作家们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书写倾向，巧取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化写作形式，以邱华栋的自我书写、城市作家的物化写作、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为基桩，在对作家们进行理解观照的同时，分析其问题和文本局限，希冀能引起作家们及读者的警惕性。著者在结语部分着重讨论小说创作在21世纪的走向问题，立足于对当下文化语境的具体分析，提出重塑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虚构意识是小说创作获取新生的重要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理论观照并不是形而上的逻辑体操，而是实实在在落脚在作家作品的剖析上，这使得该书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加之著者的目的并非落在对于某一类型某一派别的臧否上，而是注重整体性观照，使得对具体文本的研究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厚度。这点在该书“附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附录”中对张欣、王安忆、毕淑敏等几位女作家的研究分别从都市女性的婚恋、性别角色、死亡主题等角度进入，收束了为全书结构所暂时不能纳入的作家与主题。而这也表明了该书本身在理论上所具备的开放性特征，或者说，作者本身对于理论上的圆

熟与自洽宁肯保有一种警惕的态度，而时时将理论置于社会与小说文本这一宏大的“跑马场”上进行历练，以锻造和保持一种理论的活力。这种理论抱负与关怀也影响了该书的结构。全书共七章，除“引言”与“结语”之外，分为两大部分，即20世纪80年代小说观念和小说美学形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写作的诸多困境。两部分之间看似以历时的关系展开，却有内在的精神联系。

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著者用笔简练，从各种思潮主义中抽取了小说创作观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美学形式的变化，在与西方小说理论的比较中阐释20世纪80年代小说斑驳陆离的底色。在小说创作观念上，“虚构”与“真实”观念的变化与联系成为作者讨论的焦点，因为它不仅涉及小说创作方法论和小说文体边界问题，而且涉及小说与现实/历史的关系。著者认为，一方面，“虚构”绝不仅仅是作家炫耀的技巧，而是20世纪小说艺术自身发展与时代的共同要求。“虚构”的目的不在于显示与现实的界限，而在于展现小说对于可能世界构建的可能性与自由性。而这种能力的成功依赖于“令人信服的思想”，这种“令人信服的思想”直接来源于作家独特的想象力，“只有想象力才能赋予作品深邃的思想内涵，读者便在创造性的想象世界中体会到思想的智慧”。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在对“真实”的理解上也经历了一个巨大转折——从强调小说的反映功能到注重小说的虚构品格。以先锋派为代表，他们认为现实是“虚伪的现实”，真实只存在于“精神”之中。“精神真实”开始否定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而“历史”、“意义”也就成为不可知的虚构，甚至也不再有探索的必要。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正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出现的，“虚构”成为连接小说文本与现实的“浮桥”，不过支撑着“浮桥”的，不再是意义。在小说艺术形式的嬗变上，著者认为“怎么写”绝不仅仅是文学技巧问题，而是关涉到作家如何理解世界和生活，如何对它们进行重新想象与安排。该书进一步从“故事”、“叙述视角”、“结构形态”等方面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形式变革的文本意义和内涵，即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兼顾到形式变革的文化立场、情感指向和价值判断等因素。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作者将其与80年代小说“续接”，选取了三种有代表性的创作现象进行分析，对于这一时期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书写倾向进行了批评。如果说，对于20世纪80年代小说而言，“虚构”并不是虚无主义，并未彻底抛弃真实，不过是以别一种方式表达对真实的理解，“它寻求的是对世界重新命名的可能”，就像王安忆所追求的“我现在终于可以来讲一个故事”的这种故事方式和空间，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然失去“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上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一样都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此前通过对作家主体性建立和集体话语颠覆而确立自身合法性的个人话语，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越来越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无论是邱华栋的自我书写，还是城市作家的物化写作、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都属于个体经验的不同表现形式。作者把这三种形式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化、商业化大潮中，在小说与城市、小说与社会转型的相互关系中考察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以个案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细致地诊断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病因。尤其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小说，作者在理论与文本间穿梭，考察“身体”这一场域如何从一种解放性的话语力量陷入了个人私话语的困境之中。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作家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几乎停滞不前，或者说，仍然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惯性之中，等到耗尽了惯性的力量之后，缺乏清晰的创新意识和动力的作家们很容易陷入自我书写的误区，从而放弃对小说艺术品格的探索，偏离了小说的美学规范，加上现代商业文化和市场机制的包装和鼓励，终于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繁荣之下的沉沦，而文学也成为失去了“光晕”的复制品。

如果重新追溯起源的话，20世纪最后20年无疑与今天的文学状况更加密切，因而对于这时期文学的研究一定隐藏着当下文学问题的密码。在此意义上，该书的价值或许并非开创性的，最后提供的答案“重建作家的主体意识”与“重塑作家的虚构意识”也面临着实践上的难度。毕竟，体制化文学解体之后，对于作家思想观念的“改造”也不再可能，但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该书为我们“重提”了小说之于当下生活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为这一价值的重塑指明了道路。归根结底，我们依然需要文学，因为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家园的全部想象。

（作者为山东工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 敬 告 作 者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学术性、现实性、创新性。立足本校,面向国内外学术理论界。为繁荣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服务,为提高青岛大学的学术知名度和推进青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服务。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佳作。

为适应编排规范化的要求,投稿时敬请注意以下事项:

(一)论文用 Word 软件编排,须提供纸质版(用 A4 标准纸打印)和电子版各一份。

(二)论文编排顺序为: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包括地区和邮政编码)、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属于基金项目的,另请注明项目名称及编号。

(三)论文具体格式

1. 标题:一般不超过 20 字,居中,用小 2 号黑体字;
2. 作者姓名:居中,用四号楷体字;
3. 作者单位、地区和邮政编码:外加圆括号,用 5 号宋体字;
4. 摘要:包括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两字用 5 号黑体字,其他用 5 号楷体;摘要应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不能出现介绍性和评论性的语句,如“本文认为……”“本文分析了……”“对……问题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等,字数在 300 字以内;英文摘要应与中文内容一致;
5. 关键词:包括中、英文两种,中文“关键词”三字用 5 号黑体字,其他用 5 号楷体字;关键词数量一般在 3–8 个,必须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尽量根据《汉语主题词表》标取;英文关键词须与中文一致,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
6. 正文:用 5 号宋体字,大段引用文字须用 5 号楷体字;标题一般不超过 3 个层次,除一级标题用 5 号黑体字外,其他均用 5 号宋体字,一级标题序号格式为一、二、三、……,二级标题序号格式为(一)(二)(三)……,三级标题格式为 1、2、3、……;文中凡表示确切数字和年月日的均用阿拉伯数字;
7. 参考文献:论文中标明引文出处的一律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末,在正文中根据出现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采用上标格式标明,如“[1][2][3]……”;如同一文献多次被引用,正文中只标第一次出现时的序号,文末只列一次;引文出自专著的须在正文序号后用圆括号标明页码,如“[1](P256)……”;附:

1)参考文献类型标识:[M]– 专著,[J]– 期刊文章,[N]– 报刊文章,[D]– 学位论文,[C]– 论文集,[A]– 专著或论文集中析出文献,[R]– 研究报告,[S]– 标准,[P]– 专刊,[Z]– 其他未定类型文献,[EB/OL]– 电子文献;

2)几种示例:

①专著类:陈其泰 . 清代公羊学 [M].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1997.( 页码标于正文中序号后 )

②期刊类:陈顺武 . 论世界的多样性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1).

③报纸类:张俊喜 . 公司治理的焦点 [N].21 世纪经济报道 ,2002–08–05.

④电子文献:商务部亚洲司 . 2009 年 1–12 月我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 [EB/OL]. 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g/date/1/201002/20100206775934.html.

8. 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正文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在正文中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示(如①②……),采用页下注方式,每页重新编号;
9. 其他:投稿需提供作者的详细信息,具体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单位、职称、学位、研究方向和联系信息(包括地址、邮编、电话、电子信箱等)。

(三)联系方式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宁夏路 308 号 青岛大学东方论坛编辑部(行政楼 408 室)　　邮 编:266071

电 话:0532–85953730　　传 真:0532–85953730　　E–mail: dflt@qdu.edu.cn

(四)本刊对拟用稿件在尊重作者本意的情况下,有权对文章的语言文字、内容层次和编辑规范进行删改,不同意者请事先声明。

(五)本刊对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凡投稿 2 个月内未收到编辑联系者,可自行处理稿件;本刊杜绝一稿多投,凡由此引发之后果一律由作者本人承担。